


《畅销书摘》系列书（6）

华引 杰生 编著



政治谋杀
目击录

政治谋杀目击录

华杰 引生

惊天大刺杀 ——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案

肯尼迪总统被刺

总统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街头、路边，早已是万人空巷。据最保守的估计，起码有 50 万居民热情地、自发地涌出家门，从四面八方奔向主要街道，疯狂地挥舞着美国国旗，热情地叫喊着，欢迎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也是最潇洒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和他身边那位美丽的、风姿绰约的总统夫人积琪莲。

天空晴朗，阳光明媚，达拉斯的气氛极为热烈。年轻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对着迎面驶过来的座车大喊：

“嘿，积琪莲——嘿，杰克——”

车队由 16 位骑着摩托车的警卫开道，他们训练有素，车距、速度、甚至连动作都整齐划一，头戴头盔，装束像古代罗马的武士，威风凛凛。紧随其后的是总统的林肯牌加长轿车，肯尼迪总统坐在后座右侧，后座左侧是总统夫人。中间一排是两只可折叠的座椅，右边坐着德州州长康纳利，左边坐着州长夫人。驾车的是特工处特工威廉·格里尔，他的右侧是保镖首领罗伊·凯勒曼。在座车两侧特制的踏板上，各站着两名特工。

第二辆敞篷车上载有八名特工，负责保卫总统的安全。

第三辆敞篷车上坐着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夫人及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拉尔夫·亚巴勒。

车队正缓缓驶入横贯市区的中央大道，欢迎的人群欢呼雀跃。显然肯尼迪总统也受到感染，他不断地扭转身体，向两边的人们挥手致意。

州长夫人兴奋地转过头对肯尼迪说：

“瞧，总统先生，您不能说，达拉斯不喜欢您！”

“是的，毫无疑问我不能这么说。”肯尼迪满怀喜悦地说。

12 时 30 分，车队驶进中央大道、豪斯顿大街、埃尔姆大街的交叉路口时，在西北角，德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六层的一扇临街的窗户中，出现了一名拿着枪的男子。对面大楼有人清楚地看见了他，嘟哝着说：“警卫工作做得多好，大楼里还有人在保卫总统的安全。”

车队向西南方急转弯，驶上了埃尔姆大街，站在人行道上的市民查尔斯·布伦德手中抱着五岁的儿子，孩子天真烂漫，向总统举起胖乎乎的小手，格格地笑着。

肯尼迪愉快地向他微笑着，也举起了手。说时迟，那时快，沉闷的枪声响了。

一颗神奇的、异乎寻常的、违背了物理学和弹道学的任何规律的子弹射中肯尼迪总统背部脖根部位，穿透了身体，又击中前面康纳利州长的背部，从他右乳头下钻出，穿过州长的右手腕，打伤了他的大腿。

康纳利只觉得背上像被锤子重击了一下，看到膝头上溅着自己的鲜血，便向天空歪着脑袋绝望地惨叫起来：

“啊，不！不！我的天呐！他们要杀死我们大家！”

总统夫人积琪莲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心

想：“天啊，他干嘛这么叫喊？”她不安地向右转过身去，立即看见

了可怕的一幕：一颗子弹准确地击中了她丈夫的后脑勺。此时的肯尼迪，一脸迷茫和沉思，他突然举起右手颤抖着似乎想抓住后脑勺，但很快就无力地落了下来。瞬间，鲜血伴随着白色的脑浆像喷泉一般向四处喷洒而出，溅到积琪莲的脸上、身上，溅到康纳利夫妇和前面开车的特工格里尔和保镖凯勒曼的身上。肯

尼迪上身的西服上浸满了鲜红的血，玫瑰花火红火红地淹没在血泊中。积琪莲手足无措，她本能地俯到肯尼迪身上，随即跪到座椅上，转身朝着仍在欢呼的人群失态地喊叫：

“我的天呐，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天呐，他们杀死了杰克，他们杀死了我的丈夫。杰克！杰克！”她拼命摇晃着。

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像电影镜头的定格：

“1963年11月22日上午11时32分，肯尼迪总统遇刺……”

保镖首领凯勒曼命令：“离开这儿，我们遭到了袭击！”接着他用无线电通知前面的向导车：“立即带我们去医院！”

林肯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向四英里以外的帕克兰纪念医院飞驰而去。

总统车队用无线电向达拉斯警察局报告，警方立即通知帕克兰纪念医院做好抢救总统的一切准备。

总统和康纳利州长分别被白衣天使们的担架车推进一号和二号手术室。积琪莲流着泪，扶着肯尼迪的头紧随其旁，粉红的华贵的衣裙上沾满了血迹，她被外科医生礼貌地请出了手术室。她对守候在走廊上的白宫助理说：“去找一位神父来。”医院立即给附近的罗马天主教堂打了电话。

担架床上的肯尼迪睁着眼睛，瞳孔放大，监视屏上的心律只是一条长长的直线，他已经死于前往医院的路上。医生们还是尽力抢救一阵，最后无能为力地关掉了氧气瓶的阀门，用一块洁

白的床单，轻轻地蒙住了肯尼迪的身体和脸。

神父奥斯卡·休伯随着积琪莲走进手术室。肯尼迪的脚露在外面，伤心欲绝的总统夫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眼前的一切。现在是下午13时10分，40分钟前，她的丈夫还愉快地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现在却全身冰凉地躺在医院的手术中。她伸手抚摸着肯尼迪的右脚，深情地俯下身吻了一下，然后走到肯尼迪右肩一侧。

神父揭开床单，积琪莲再一次俯下身，把自己的右脸颊贴在丈夫赤裸的胸膛上，用泪水和爱，与亲人作最后的告别。

神父开始用拉丁语进行临终祈祷。

白宫助理、新闻秘书马尔科姆·基尔达夫在达拉斯的帕克兰医院向蜂拥而至的记者们宣布：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在场所有的人都哭了，达拉斯全城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全城所有教堂的大钟都在不停地哀鸣。

消息传遍美国，人们都震惊了，很多人都流下热泪，妇女和儿童失声痛哭……

肯尼迪总统被刺的消息，使全世界感到震惊……

肯尼迪死时仅46岁，离开了他34岁的年轻妻子——美丽的积琪莲和6岁的女儿、3岁的儿子，还有更多割舍不下的东西……

谁杀害了肯尼迪总统？

据美国达拉斯警察局的官方报道，凶手是一名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德的青年人，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想加入苏联国籍、背景似乎与古巴有关的

人。1962年，古巴出现了“导弹危机”，赫鲁晓夫在肯尼迪的压力下，被迫拆除并运回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使得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事业受到损害；而奥斯瓦德正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崇拜者，甚至表示有兴趣加入古巴军队。这似乎是一个与国际共产主义有关的谋杀事件。

当天下午13时53分，奥斯瓦德被达拉斯警方逮捕。奥斯瓦德生于1939年10月18日，16岁退学，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感兴趣，自称信仰共产主义；17岁时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1959年9月退役。1959年10月他曾去莫斯科，希望成为苏联公民，后获准在苏联定居，并与一名19岁的俄罗斯姑娘结婚，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女儿。1963年6月，他们获准重返美国，回到德克萨斯的沃思堡。1963年9月下旬，奥斯瓦德前往墨西哥，拜访了设在首都利马的苏联和古巴大使馆，要求获得前往苏联和古巴的签证。据说，古巴政府表示，如果苏联政府向他颁发准许进入苏联的签证，古巴政府也同意向他颁发签证。但奥斯瓦德的努力失败了。10月3日，他回到达拉斯；10月16日，他在德克萨斯教科书仓库获得一份工作；五天以后，他便闯下了弥天大祸。所有的证据都对奥斯瓦德不利。他的一位同事说：“11月22日早晨，奥斯瓦德走进教科书仓库大楼的电梯中，带着一包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长长的东西。他对同事说：‘这是窗帘。’”警方指证：那里面是一枝用来刺杀总统的步枪。奥斯瓦德的妻子证明：她曾在家中见过这枝步枪。在奥斯瓦德房间中还发现了一张地图，图上从教科书仓库大楼到总统被害地点被划上了一条粗黑的杠杠。有位公共汽车司机作证，在总统被刺几分钟后，奥斯瓦德乘他的车逃离现场。奥斯瓦德对司机说：“总统遭到了枪击。”说完他发出了一阵得意的笑声，令人毛骨悚然。司机记住了乘客的特征，并向警方描述。在奥斯瓦德的裤子口袋里发现了这辆汽车的车票。

有位目击者曾在那幢大楼的一扇窗户中，发现过一个符合奥斯瓦德特征的人。警方在射出子弹的窗口附近和房间内发现了奥斯瓦德的指纹。

最有力的证据，是奥斯瓦德曾向芝加哥一家邮购商行订购过一枝意大利制造的步枪，枪上的编号证明，这就是枪击发生后不久在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窗口附近被警方发现的那枝枪。弹道学家证明，杀害总统的子弹就是从这枝枪中射出的，枪上还留有奥斯瓦德的指纹。

奥斯瓦德订购这只枪时用的是假名，但订购单上是他的笔迹。

11月22日晚19时10分，不利于奥斯瓦德的又一有力证据传来。他被指控在枪击过总统约45分钟后，又杀害了一名叫蒂皮特的巡警。在他逃离现场时，有几位目击者都看见了他手中的手枪。奥斯瓦德就是凶手。

警方在凶手逃离枪击现场的路上，发现了奥斯瓦德匆忙扔掉的短上衣。在枪击现场找到的子弹壳都与奥斯瓦德被捕时所持的手枪吻合。

当天午夜，达拉斯警察局局长杰西·柯里在警察局的会议室中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警察将奥斯瓦德带到记者面前。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记者们大声地向奥斯瓦德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杂种，天晓得他都于了些什么，在这么多人面前还神情自若的！”记者们议论纷纷。

局长杰西·柯里宣布：“根据以上证据，星期天，也就是24日上午10时，我们要把奥斯瓦德从市政局监狱转送到达拉斯县监狱。”

24日清晨，全国的电视台、电台和新闻机构、报刊的记者们已将市政局

监狱的地下室挤得水泄不通。电视台将向全国现场直播奥斯瓦德转换监狱的实况。

上午 11 时 20 分，在狱警的押解下，奥斯瓦德迈步出监，走出地下室。人群骚动起来，群情激愤，几名警察走过去，簇拥在凶手周围。

在电视摄影机强烈耀眼的灯光下，奥斯瓦德依然神情镇定，脸上隐隐透出一丝嘲弄讥讽的冷笑，昂首走向囚车。

此时人群中奋力挤出一个人，当他闯入奥斯瓦德的视线中时，奥斯瓦德神色大变，惊恐万状，嗓音都变了调，大叫道：“啊！不！”这个人冲了过来，枪口正对着尖叫的奥斯瓦德。

“砰！”这个人向奥斯瓦德的腹部开了一枪、同时愤怒地骂道：“你这个狗娘养的！”

李·哈维·奥斯瓦德能说明问题的嘴永远闭上了，他痛苦地呻吟一声，倒在地上便失去了知觉。

全国观众都守在电视机旁，目睹了一个真正的杀人镜头。

奥斯瓦德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杀。

杀凶手的凶手

杀凶手的凶手，名叫杰克·鲁比，52 岁，是达拉斯“旋转木马”夜总会的老板。

单从“旋转木马”的名字上看，这一出凶杀案就够令人头晕目眩了。

杰克·鲁比当场被警方逮捕。他坚决否认与奥斯瓦德有联系，只是说他枪杀凶手，完全是出于对总统的爱戴和对凶手的仇恨。

新一轮的调查又开始了，谋杀肯尼迪总统案，要从杰克·鲁比身上搜寻新的证据。

1963 年 11 月 22 日凌晨 1 时 30 分，“旋转木马”夜总会中光怪陆离的灯光摇曳明灭，过惯夜生活的年轻人还在疯狂地跳、尽情地唱。老板杰克·鲁比精神十足，他随着音乐的节奏不停地抖动着。

一位瘦瘦的、衣冠不整的、长着一头黑发的年轻男子像幽灵一样，进了另一家叫“卢卡斯”的餐厅。

女招待玛丽·劳伦斯殷情地上前，甜甜地问：“先生，您需要什么？”

“不，我只是在这里等鲁比先生。”

玛丽问：“大名鼎鼎的‘旋转木马’夜总会的鲁比先生？这会儿他正忙着，你干嘛不去那儿找他？”

“这个你别管，走开！”年轻人显得很不耐烦，随即找了个墙角的座位坐下。

一小时后，秃脑门鲁比推开了“卢卡斯”餐厅的门：“请来一杯橙汁。”说着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幽灵般的瘦子立即靠过去。

玛丽认识鲁比先生，后来从电视上认出，来“卢斯卡”找鲁比先生的年轻的瘦子正是奥斯瓦德。她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说：“我完全相信，与鲁比见面的就是李·奥斯瓦德。”

“你能去联邦调查局接受更详细的调查吗？”特工问。

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还有一名与玛丽一同当班的女招待也证实了这一情况。一位名叫卡罗尔·贾金纳的律师也证明鲁比和奥斯瓦德认识。

10 月 4 日晚 10 时许，贾金纳与一名叫罗宾·胡德的脱衣舞女到“旋转木马”夜总会去寻欢作乐，这个脱衣女郎还想和老板鲁比谈谈工作之事。他

们在楼梯口的一张桌边坐下，贾金纳在喝啤酒。此时，一个 20 多岁的瘦瘦的黑头发年轻人站在售票处：“我要见鲁比先生。”

一位保安带他去见鲁比，两人在贾金纳隔壁的桌边坐下。

鲁比神色颇不耐烦：“你来这儿干什么？”

来人更不耐烦，暴躁地说：“别称呼我的姓名。”

“你现在用什么名字？”

“H. L.李。”

“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一些钱。我刚从新奥尔良来，我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和一份工作。”

“你有家庭，是不是？你是不是要与他们住在一起？”

“他们不知道我回来了，我想自己找一个地方。”

“那件差事办妥后，你会拿到钱。”这是鲁比的声音。

“不，现在付一半，办完事再拿另一半，怎么样？”

“不！不过不用担心，办完事我会一分不少地准备好你的钱。”

“多少？”瘦子追问。

“我们原先谈好的数目”，鲁比用手势比划了一下，又说，“我怎么知道你能办成那差事？”“这很简单，我是海军陆战队的神射手。”瘦子得意洋洋地说。

“你能保证干好？除了州长，不会射中其他人？”鲁比表示怀疑。

“我能保证。我已准备好了工具。”“你试验过没有？要不要做点练习？”

“别担心这些。我将在哪儿干？”

“某大楼的楼顶。”

“不，那样太冒险，周围的人太多。”

“可是，他们忙着看车队，不会注意到你。”

“然后在我还未撤离之前，让他们把我撕成碎片”，瘦子嘟哝着，“完事之前付我一半，其余的一半以后寄给我，怎么样？”

“那不行。如果出了什么意外，你不能干掉他，他们将立即收回钱。我不能说，我已付你一半钱，他们会认为我欺骗他们，那我就惨了。记住，他们想要办成那件差事的焦虑心情不亚于你需要钱。”

10月5日，贾金纳怀着一位公民的责任感，打电话将昨晚听到的谈话告诉了公共安全部门，并要求将上述谈话转告康纳利州长。

总统遇害的当天，贾金纳便从报纸上毫不费力地认出：凶手就是与鲁比坐在一起的“李”。他将那天发生的事又详细地回忆一遍，用挂号信寄给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

络绎不绝的调查人员走马灯似地询问了他。

重要证人的下场

从 1963 年到 1983 年，与暗杀肯尼迪总统案有关的重要证人，一个一个地丢了性命，被杀人数已达 188 名之多。这充满恐怖的死亡与血腥味，足以说明肯尼迪总统被刺案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谋杀；其影响之大、牵涉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毋庸置疑地证明，这是一起本世纪最大的政治谋杀案。

第一个死于非命的便是达拉斯当地的警察蒂皮特。他在总统被刺杀 45 分钟之后，被所谓的“奥斯瓦德”枪杀。凶手是一名长着黑色卷发的青年男子。

但是，不知警方是有意还是无心，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奥斯瓦德的脑袋上，长着稀稀拉拉的栗色头发。现场找到的一枚空弹壳与奥斯瓦德手枪的型号根本对不上。

有位目击证人哈罗德·拉塞尔亲眼看到了杀害警察蒂皮特的凶手，凶手的相貌与倒霉蛋奥斯瓦德根本不一样。几天后，哈罗德·拉塞尔莫名其妙地被一颗不知从什么地方射来的子弹击中要害而亡。

更可疑的事还在不断发生。

另一名重要的证人是铁路工人列·鲍尔斯，他向警察局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情况：肯尼迪总统的车队前方，是一条铁路路基，那一天，路基后面的停车场上停放了几辆鲍尔斯不熟悉的汽车。在刺杀总统的枪声响起时，停车场附近有一些忙乱的人，其中有几名军人和一名持报话机通话的人，他们迅速离开了停车场。鲍尔斯的情况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即另有人在向总统开枪。

问题又回到第一枪那粒神奇的子弹上面。奥斯瓦德所使用的是一枝 1940 年意大利制造的旧式步枪，没有自动装置，瞄准不便。射出的那颗“导弹”式的子弹，在穿透肯尼迪和康纳利两个人的身体后，几乎完整无缺，这是令专家们难以置信的。更何况，子弹从肯尼迪总统的脖子中穿出后，必须在空中向右急转弯，才能击中康纳利州长的右背部；如果子弹不转弯，就只能击中康纳利的左背部。通常子弹是不会转弯的，除非它具有导弹的性能。

这就给调查者留下一个思索，即：射击者可能是两个人，他们向总统不止开了三枪，而是四枪，因为一枝老式步枪从开始到结束的五六秒钟内，最多只能射出三颗子弹。由此联想到总统车队正面路基后的军人、枪和无线电对讲机，可以设想有两个射手正从不同的方向向总统开枪，这样才有可能做到万无一失。

“神奇”子弹据说在案发当日下午 14 时左右，在达拉斯的医院中被发现，但很奇怪地被特工处特工理查德放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中，而不是被立即送往华盛顿。直到晚上 19 时许，子弹才被送到华盛顿，在特工处长罗纳利处又停留了两个多小时才被送到联邦调查局。

解剖室的医生们在肯尼迪的脖子下部发现了一个小伤口，里面并没有子弹，但是休姆斯医生的食指只能伸进伤口一半。就是说，子弹并没有穿透总统的脖子。这是一个“非穿透伤口”，子弹有可能是在达拉斯的医生们在给总统作心脏按摩时，掉到担架上的。

这些都足以说明另有人在向总统开枪。

铁路工人列·鲍尔斯将他看到的铁路路基这一侧发生的事情，报告给调查总统死因的沃伦委员会后，很快，当他步行在街头时，被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撞出很远。他也永远闭上了那张不甘寂寞的嘴。

另有一位名叫瓦伦·雷诺兹的目击者，也看到了杀害警察蒂皮特的凶手。他被带到联邦调查局接受询问时，肯定而明确地告诉调查人员说：“杀害警察蒂皮特的凶手决不是奥斯瓦德，而是另外一个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一个陌生人向雷诺兹开枪，子弹重创了他的头部。他还清醒，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伤愈后再次接受联邦调查局讯问时，便坚决否认了他以前的证词。

报社的年轻女记者多茜西·卡尔戈伦曾有机会到达拉斯的监狱，对杀害奥斯瓦德的凶手——杰克·鲁比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的独家采访，不久后便传来了女记者暴死的消息。知趣的杰克·鲁比懂得该如何延续生命，他再也不敢对记者“胡说八道”了。而鲁比于 1967 年 1

月3日患癌症死于狱中，这似乎属正常死亡。但在临死前，他曾痛苦地呻吟说：入狱后，有人作了手脚，人为地使他患上了癌症。

1963年11月24日晚，《达拉斯时代先驱报》的记者吉姆·利泽与杰克·亨特，在杰克·鲁比枪杀奥斯瓦德几个小时之后，有机会进入鲁比的住宅进行过调查。不久，两人双双死于非命。吉姆·利泽在自己的家中被枪杀。杰克·亨特，与美国电视剧中神探亨特同名，死得更加离谱：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滩警察局的大楼上，警察的手枪“走火”，击中了亨特……

知情人死得越来越多，令人谈虎色变。

詹姆斯·瓦雷尔清晰地记得，11月22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一名男子慌慌张张从大楼中逃出。当时他正站在教科书仓库大楼的后门附近，那张充满杀气的脸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这个人并不是出现在报纸上、电视中的奥斯瓦德。一天，瓦雷尔的车被一辆急速开来的卡车撞翻，他死于“车祸”。

罗杰·克雷格也是一名现场目击者，他到调查局作证：奥斯瓦德决不是一个人作案，他有同伙。克雷格亲眼看见奥斯瓦德在作案后坐上一辆前来接应的轻型客货两用车逃走，开车的是另外一名男子。他的证据，使沃伦调查委员会感到不快。不久，克雷格遭到身份不明者的枪杀，他侥幸躲过，从此，他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生活着。过了12年后，几个陌生人闯进他家，于是他成了枪口下的冤鬼。

美国的证人如此，别国的也概莫能外。

荷兰记者威廉·奥尔特曼斯对扑朔迷离的肯尼迪被刺案产生了兴趣。他很仔细地一遍遍阅读沃伦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从中了解到有位名叫乔治·德·莫伦希尔德的石油地质专家，在达拉斯的石油业中名气很响，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但他与猥鄙贫困的凶手奥斯瓦德却是好朋友，并千方百计地照顾他。连奥斯瓦德的母亲都对莫伦希尔德与她儿子的亲密关系迷惑不解。她向联邦调查局作证说：“噢，我始终不明白他与我儿子的关系，但他们的确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也许，他为了什么事需要我的儿子。”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莫伦希尔德先生是肯尼迪夫人积琪莲父母的密友。于是奥斯瓦德——莫伦希尔德——积琪莲家族三点成一线，成了荷兰记者威廉·奥尔特曼斯的研究对象。他也知道研究此案是个禁区，很多人为之丧命。于是他于1967年来到美国，直接找到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亲弟弟，请求罗伯特·肯尼迪为他提供必要的保护与帮助。在罗伯特·肯尼迪的关照下，两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前来“保护”奥尔特曼斯。他们喋喋不休地询问这位荷兰记者为何对莫伦希尔德感兴趣，了解多少内情。荷兰记者回答得十分谨慎，只说是受荷兰电视台的委托。第二天，这位追根寻源的记者便九死一生，在地狱的门口转了一圈。奥尔特曼斯记下了这个惊心动魄的事件：

第二天，我开着自己的汽车去曼哈顿。很快我就发现，有一辆计程车长时间地、一步不离地跟着我。突然，它赶上来，猛地‘切’了一个角度，我的汽车全速飞向路的对面……当我醒来时，我已在医院里。几周后我康复了，我断定，在结识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第二天就发生了我平生第一次车祸，这是不祥之兆，于是立即离开了美国。

在他回到荷兰后，一位自称史密特先生的“美国律师”拜访了他。

这位律师恫吓说：“听着，威廉，我真诚地奉劝你停止调查，你也知道，你将会遇到什么事。在纽约或在其他城市的街头巷尾，几个年轻人会突然拦住你，将你拖上汽车，运往某个私人机场，再将你装上私人飞机，‘扑通’一声，你将偶然落进大西洋中……”

这位记者仍不死心，以“虽九死犹未悔”的精神，在数日后重返美国，终于与他昼夜“想念”的石油地质专家莫伦希尔德见了面。

两人谈得很投机，莫伦希尔德不仅向奥尔特曼斯详细地讲述了自己与李·奥斯瓦德的关系，并且很感慨地说：“你知道，李是那么听我的话，那么相信我，如果我对他说，必须干掉肯尼迪，因为他对美国是危险的，李会毫不迟疑地这么做……威廉，如果你突然得知，我参与了暗杀总统，你会有什么反应？”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忧郁、困惑。

这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他的目的是为了使得荷兰记者相信，奥斯瓦德是无罪的。他的这种假设，迫使荷兰记者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肯尼迪被害学”。美国和世界上有相当一批人在从事这种研究，就像中国几代人研究“红学”一样。

奥尔特曼斯通过几年的调查和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终于在1977年向再次调查肯尼迪总统案件的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结论。特别委员会用了三个多小时听取了奥尔特曼斯的证词，认为他的材料和观点对调查肯尼迪总统被刺案具有重要意义，即“莫伦希尔德是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证人”。委员会立即传讯莫伦希尔德。但是，这位富有的石油地质专家接到通知后，便一命呜呼了，而且没法确定他是自杀还是他杀。证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大量证人的死亡，逐渐使美国公众认识到，奥斯瓦德只是一只可怜的替罪羊。到肯尼迪总统被害20周年时，美国《新闻周刊》的调查结果表明，只有11%的人相信奥斯瓦德是唯一的罪犯，74%的人相信他不是单独作案。

肯尼迪遗体之谜

肯尼迪的遗体是由贝塞斯达的美国海军医疗中心负责解剖的。

美国公众一次又一次受到愚弄与欺骗。装着总统遗体的青铜棺是由“空军一号”专机运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去机场迎接。

晚上21时的电视实况镜头：

一队汽车驶到海军医疗中心大门口，身披黑纱的总统遗孀积琪莲哭泣着，在罗伯特·肯尼迪的陪同下，从载有青铜棺的救护车上走了下来。医院的前厅挤满了军人、记者们，采访者蜂拥而上，特工们用力推开人墙，为积琪莲等开道，他们走进楼上的房间，医院的院长告诉亲属：解剖马上开始。

但是，总统遗体的秘密解剖工作早在亲属们到来以前就已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原来，积琪莲等人护送来的价值390万美元的由八名海军陆战队员抬下的沉重的青铜棺竟然空空如也。

在特工的监视下，海军医疗中心的X光师、摄影师给总统遗体拍照、摄影，特工们取出胶卷亲自显影，并拿走了底片。但摄影师根本不能在最佳角度、最合适的距离最清晰地拍摄遗体的受伤部位，只能按规定的距离和角度拍摄，不少部位根本拍不到。

摄影师后来发现，许多底片失踪了，电影胶片在拍摄完成后就“曝光”了，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难以辨认的、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照片。

沃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和其他的证词一致认为：在达拉斯和返回华盛顿的路上，没有人在总统的头部施行过颅骨的外科手术。

但当时联邦调查局两名新手特工奉命护送铜棺，他们在以后的报告中说：

总统的尸体从运他来的棺材中移了出来，放在解剖桌上（棺体抬入解剖室时他们并不在场）。那时总统的身体完全用被单包了起来，此外，头部还包着浸透了血的绷带。在去掉这些覆盖物后，总统身上没有任何衣服和内衣，显而易见的是，此前还作过气管切开手术，在头部即颅骨的上部也作过外科手术。

1966年10月底，一名叫戴维·利夫顿的大学生研究了联邦特工的报告后，大胆地提出一个假设：在肯尼迪总统的座车接近一个草木茂盛的小丘时，有人躲在小丘后面向总统开了一枪，子弹从前面射入总统的头部。这颗子弹被偷偷取了出来。弹道被破坏了，以便掩盖子弹真实的飞行方向，并且有人设计了新的。能证明似乎只有一个人从后面开枪的弹道。

有人说，再检验一下总统的大脑或许可以证明弹道的轨迹。

当时负责解剖尸体的休姆斯、博斯韦尔和芬克三位军医说：“总统头部的伤口非常吓人，大概有10毫米×20毫米。颅腔空空如也，诚然、在颅腔的某些地方，看得到脑组织的少量残余。”

就是说，总统的大脑不翼而飞了。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并在拍了照片后用海绵填塞颅腔。

而在此之后，总统的尸体再次出现在医生面前时，脑子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了。

肯尼迪的脑子与解剖时的照片和X光片被交到罗伯特·肯尼迪手中，他又于1965年交给国家档案馆。按照规定，五年以后才准专家们研究这些资料，而保险柜的钥匙放在他最信任的秘书手中，但1966年10月29日，这些资料统统失踪了，只有空空的铁柜仿佛在嘲弄后启者。

种种现象表明，有一股势力在千方百计地掩饰、篡改事实的真相。

来自官方的调查和内部消息

1963年11月22日12时，副总统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宣誓就任总统。八天以后，他下令成立一个由七人组成的总统委员会，调查肯尼迪被杀事件的真相。委员会由美国最高法院院长厄尔·沃伦、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库帕和共和党众议员杰拉尔德·福特、民主党众议员黑尔·博格斯等组成。该委员会以沃伦为首，故称为沃伦委员会。

经过近10个月的调查，调查人员寻访了552位证人，联邦调查局还访问了约2.5万人，该委员会交上了总数多达4600页的800份报告。沃伦委员会最后作出的报告达912页，洋洋洒洒共29.6万字，包括照片和图表，加上证据、证言和其他文件共25册，总字数达百万字之多。

但是所谓结论，仍是老调重弹：

（一）杀死肯尼迪总统和使康纳利州长身负重伤的子弹是由李·哈维·奥斯瓦德射出的。子弹从德克萨斯教科书大楼南角的六楼窗中射出，一共发射

了三颗子弹。

(二) 奥斯瓦德在杀害肯尼迪总统大约 45 分钟后，又枪杀了巡警蒂皮特。

(三) 李·奥斯瓦德或杰克·鲁比与国内外任何暗杀组织没有牵连。他们两人没有任何联系。

(四) 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联邦的、州的或地方的官员有针对美国政府的密谋和不忠行为。

(五) 李·奥斯瓦德的犯罪动机是因为他对一切权威的憎恨及显示出来的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开信仰。

除以上论点外，该委员会对其他的证据和说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沃伦大法官哀叹道：“在目前一代人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揭露达拉斯悲剧的秘密的。”

与此同时，美国谍报部门的唐纳德·唐纳森将军却有惊人之语。1975 年，唐纳森给美国参议院调查谍报机关活动的专门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切尔奇寄去一封绝密信。信中透露：

我非常仔细地观察着您的委员会在美国本土和在国外的活动，我希望当您的委员会发言人，我向您保证，我知道某些十分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其中之一是关于准下令杀害约翰·肯尼迪总统。总统知道，是谁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当他得到有人将刺杀他的警告后，他告诉了我。他要求我在您的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其活动的那些组织和人们中寻找潜在的凶手。当总统得知是谁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后，他感到非常的惊讶。

1976 年 2 月，唐纳森到白宫会见当时的总统福特，他们就肯尼迪案件交换了好几个小时的看法。唐纳森说：“肯尼迪总统的遗孀积琪莲、肯尼迪总统的兄弟和他最亲密的助手西奥多·索伦森都知道暗杀肯尼迪总统的真相。”前总统卡特曾提名索伦森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声称索伦森非常熟悉中央情报局的机制，能够一劳永逸地迫使情报机关结束一切杀人行为与黑手党的联系。但是，卡特总统的提名遭到中央情报局的反对，他只好放弃了这项提名。唐纳森将军断言：肯尼迪家族不敢揭露杀害肯尼迪总统的秘密，他们担心这个家族三兄弟的许多子女的安全。

唐纳森将军还对荷兰记者奥尔特曼斯说：“您在报道乔治·德·莫伦希尔德与奥斯瓦德谋杀总统案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您断言莫伦希尔德是华盛顿的密谋策划者与达拉斯的伏击者之间的主要联络员，这是对的。您显然没有意识到，什么样的危险在威胁着您。但您确实是对的，您的确百分之百地击中了目标……有两个人杀害了莫伦希尔德……”

唐纳森在奥尔特曼斯的采访中还说：“自从总统遇难的那一刻起，您第一个宣称莫伦希尔德是参与谋杀的人，从而识破了密谋的实质。你的揭露狠狠打击了我们在中央情报局内部的敌人。这个强有力的集团不服从于任何人。两三年后人们将了解这个集团，那时事情将比水门事件更明朗。是他们迫使莫伦希尔德签署败坏您声誉的文件，然后又杀了他。我在五角大楼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与您的谈话。我们在这方面有自己的计划。如果您把我们的谈话转告美国总统，那么，您将处于我们的保护之下。如果其他什么人得知我们的谈话，您就会被杀死……”

唐纳森将军和其他埋在地下的证人一样，说得太多了，他很快便消失在空气之中，无影无踪了。

暗杀背后的强大政治背景

美国的国家政权是依靠大财团、大企业家支持的。这些巨富们的利益，是国家机构、总统、决策人制定政策的行动准则。

肯尼迪总统是个新式的有进取心的年轻总统，他有句名言：“旧的时代已经结束，旧的行为和旧的思维方式已不再适用。”在他竞选总统的过程中，美国政界中的保守人物便视其为眼中钉。肯尼迪成为总统后，便试图改变保守的政治机器，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1962年，肯尼迪与美国主要经济部门——钢铁工业的大亨们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肯尼迪不允许钢铁大王提高产品价格。而这些骄横跋扈的大亨们毫不理睬，竞相涨价。作为总统的肯尼迪予以坚决反击：下令五角大楼不向美国钢铁公司购买钢铁，转向那些不涨价的公司购买。肯尼迪的行为令钢铁大王们暴跳如雷，但丢掉五角大楼的订货将丧失巨大的利润，最后他们不得不让步。这是第一个敢于同钢铁巨头们斗争并获得胜利的人，思想保守的实业家是无法容忍这种人担任美国总统的，可他在公众眼中的威信很高，极有可能连任下一届总统。因此，钢铁大亨们必欲去之而后快。

肯尼迪还与石油大王、亿万富翁汉特为仇，此人是极端保守主义者。就在肯尼迪到达达拉斯的那天早晨，汉特的儿子在（达拉斯晨报）上刊登了一整版加上黑框、象征哀悼的广告，并冠以《欢迎光临达拉斯，总统先生》的标题，提前为肯尼迪之死发出“讣告”。

肯尼迪反对向古巴派遣军队。1961年4月，流亡的古巴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支持下在猪湾突袭古巴，遭到卡斯特罗的猛烈打击而归于失败。指挥猪湾行动的负责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查尔斯·凯贝尔和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的有关人物多次向肯尼迪总统要求派遣美国军队直接干涉古巴，遭到了总统的拒绝，使这些人气急败坏。查尔斯·凯贝尔就曾公开谩骂总统是“叛徒”。

肯尼迪总统最直接最凶险的敌人是以胡佛为首的联邦调查局。胡佛统治联邦调查局已有很多年，经历了几代总统。很多地位很高的政治家和总统都因为有隐私和把柄握在胡佛手中而让他三分，只有肯尼迪总统不买账。1961年，他任命其弟罗伯特·肯尼迪当司法部部长，第一次迫使联邦调查局服从司法部的领导，限制了胡佛的权力。肯尼迪与胡佛势如水火，本来，撤换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已提上了总统的工作日程。

肯尼迪的死敌还有美国的黑手党和种族主义者。早在1961年，肯尼迪兄弟对黑手党的打击和压制，已使黑手党在新奥尔良的党魁会议上制定了暗杀肯尼迪兄弟的计划。出席会议的人就包括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调查局总部对此一清二楚。

1963年11月22日中午，肯尼迪总统的车队按预定路线通过达拉斯中央大道后本应沿着迪利广场前进，这条路线远离射出子弹的两幢高楼和铁路路基，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安全。但车队临时接到达拉斯市市长厄尔·凯贝尔的指示，改变行车路线，从中央大道向右转到豪斯顿大街，再向左转到埃尔姆大街。这正好使总统的车队从两幢高楼的窗下驶过，又驶过铁路路基。这个凯贝尔市长正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凯贝尔的孪生兄弟。

现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案”将被更多有兴趣的人研究下去，但是这场

政治谋杀案的真正策划者、组织者、联络者、执行者却永远没人能说得清楚。

悲剧再一次上演

1968年又是美国总统的选举年。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宣布：正式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看来，这位年轻的司法部长已从其兄被谋杀的巨大阴影中走了出来，恢复了自信，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巡回竞选活动。

6月4日晚，他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闹市区的大饭店，在那里等待投票结果。

晚上22时30分，加利福尼亚州预选的最后统计结果表明：罗伯特·肯尼迪获得了46%的选票，超过他的对手麦卡锡4个百分点。这胜利表明，罗伯特·肯尼迪已稳操胜券。

罗伯特·肯尼迪兴高采烈地举行晚会，向他的支持者们表示感谢。他向他的支持者们许诺：

“我认为，我们能够结束美国国内的分裂，结束暴力。”

紧接着，罗伯特·肯尼迪离开饭店大厅。穿过厨房时，厨师长向他伸出手来说：“胜利将属于您，肯尼迪先生！”

肯尼迪微笑着与厨师长握手，一个黑发青年走上来，突然掏出手枪，对准肯尼迪连开数枪。

肯尼迪倒在了潮湿的水泥地上，头上全是鲜血。他的妻子在他身边跪下，俯下身去轻轻他说着什么。肯尼迪嘴唇微微张开，下嘴唇像往常那样向下卷曲。他的眼神似乎在说：“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显然，有人担心和感到害怕，一旦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进入白宫，便会大张旗鼓地下令调查肯尼迪总统被害一案。

凶手是西尔汉，24岁，约旦人，是种族主义者，举家迁居美国。他杀罗伯特·肯尼迪，是因为肯尼迪答应给以色列20架歼击机。因此，他在日记中写下：“肯尼迪必须在1968年6月5日前被杀。”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约旦三国发动闪电式战争，六天便攻占了西奈、加沙、耶路撒冷东城区和约旦河西岸全部地区和戈兰高地，占领阿拉伯6.5万平方公里土地。1968年6月5日，是阿以战争一周年纪念日。此案动机似乎很明确。

但是，更深一步的调查表明，西尔汉不是单独作案，而是受人指使并有合谋者。

西尔汉对肯尼迪开了四枪，其中三枪击中了肯尼迪，第四枪击中了他的衣服；站在肯尼迪身后的其他人中有五人被击中，在这些人身上都取出了子弹；在天花板上还有三处弹痕，因此在犯罪现场共发现12处弹痕。而西尔汉的手枪弹匣最多能容纳八发子弹。警方解释为：多余的弹痕为子弹反弹。但专家认为，在犯罪现场至少开了九枪，也就是说还有一枝枪。而且从肯尼迪头部取出的子弹与另一名伤者身上取出的子弹根本不是来自同一枝手枪。

是谁向罗伯特·肯尼迪开了致命的一枪？

这个人名叫坦思·塞扎，是肯尼迪的警卫人员，与黑手党有密切的联系。罗伯特·肯尼迪在失去知觉前，可能已意识到塞扎在向他开枪，在倒地之前，他扯下了塞扎的领带。

在调查时，和第一次悲剧一样，第一现场拍的照片和能弄清凶杀真相的物证永远消失了。1975年，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局长说：“在这个世界上，罗

伯特·肯尼迪是我最仇恨的头号敌人。”

罗伯特·肯尼迪也和他的哥哥约翰·肯尼迪一样，热衷于政治。他说：“我喜欢政治。政治是一种高尚的冒险。”可惜的是，他也未能幸免于难，他又多挣扎了 25 个小时，才痛苦地死去，年仅 42 岁。

冷战下的谋杀 ——刚果（金）总理卢蒙巴之死

中央情报局认为：卢蒙巴比卡斯特罗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两大阵营，东西方出现了冷战局面。

自 1945 年 8 月，一团可怕的蘑菇云在日本广岛上空升起之后，原子弹成了毁灭人类最恐怖的武器。当时，只有美、苏两国拥有原子弹。拥有最多的原子弹，便是世界霸主的象征。

而在美丽富饶的非洲大陆，有一处对美苏两大霸主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即有“中非宝石”之称的刚果（金）。我们知道，制造原子弹最重要的核燃料是铀。铀矿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极不均衡，只有少量存在于独居石等稀土矿石中，而刚果（金）1958 年生产的铀占世界铀产量的 50%；与铀具有同样价值的钴属银白金属，可磁化，与钐、镍等共熔可得良好的磁性钢，可用于制造超硬耐热合金和磁性合金，是制造原子弹和喷气式飞机不可缺少的原材料。钴 60 是具有巨大杀伤性的放射源，刚果（金）出口钴的数量在 1958 年占世界产量的 75%。刚果（金）的铜、锡、钽、金刚石等产量均列世界前茅。刚果（金）丰富的资源足以使西方老牌殖民主义者和新崛起的世界霸权主义者垂涎三尺。

刚果（金）虽处于非洲中部，但刚果（金）河，是通向大西洋的狭长走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1960 年，长期被西方殖民主义者霸占的黑非洲，刮起了一股猛烈的独立旋风，16 个非洲国家相继独立。6 月 30 日，刚果（金）宣告脱离比利时殖民统治，实行独立。刚果（金）人民推出了一位不为西方国家所欣赏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非洲土著人帕特里斯·卢蒙巴担任刚果（金）总理。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了达到控制、操纵刚果（金）的目的，不使它投向苏联，由中央情报局策划了暗杀刚果（金）总理卢蒙巴的秘密行动。同年 8 月 26 日，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发给中情局驻刚果（金）利奥波德维尔（即今扎伊尔金沙萨）站长劳伦斯·德夫林一份密电：

上峰的观点很明确，如果卢蒙巴继续占据高位，将使刚果（金）变得更加混乱，并为共产党国家接管刚果

（金）铺平道路。这将使联合国的威望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认为，干掉他是我们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是我们目前秘密行动中优先考虑的大

事。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杜勒斯恶狠狠地说：“在刚果（金），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卡斯特罗式的、甚至比卡斯特罗更坏的人。”美国对卢蒙巴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终于，到了 1961 年的 1 月 17 日，卢蒙巴血溅加丹加。艾森豪威尔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心满意足了，此时，离他下台只差五天。

卢蒙巴是被共产党收买的人？1925 年 7 月 2 日刚果（金）开赛省桑库鲁区的卡塔科一康比村，在被称为巴特特拉族的部落的一间草棚中，一对信奉基督教的黑人夫妇添了一个健壮的男孩，他就是卢蒙巴。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一年四季只能在腰间围一块破布，赤着脚，吃的只是木薯，过着极其贫困的

生活。

比别的黑人孩子幸运的是，卢蒙巴的父母是基督教徒，由此他进了欧洲白人创办的天主教教会学校，学会了用法语交谈、用法文写文章；加上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接触到西方许多先进的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思想，他的知识已大大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他通过了殖民当局的严格考试，成为一名合格的“进化人”。但是在殖民统治下，广大的黑人是没有人格地位的，受到的歧视无以复加。直到1960年独立前不久，全刚果（金）1400万人当中，只有26人受过大学教育，在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主任科员”，在军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是班长。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在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后，卢蒙巴的思想产生了变化。他在斯坦利维尔担任刚果（金）全国农业研究所所长期间，经常通过演讲这一形式，向当地人发表演说，讲述“种族歧视”和“好白人”与“坏白人”。后来，卢蒙巴渐渐成了土著黑人的发言人，担任了土著雇员协会主席一职，在黑人乃至白人中间的影响渐渐增大。

1954年，卢蒙巴参加了比利时自由党，并担任斯坦利维尔支部的副主席，成为著名的黑人领袖。他开始认真思考如何为刚果（金）人民争取更多的权力的问题。当时，刚果（金）具有先进的民族独立思想的人犹如凤毛麟角。约瑟夫·卡萨武布便是一个反对比利时人统治的激进分子。他是巴刚果（金）人，来自一个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强行瓜分非洲时被分裂的部落，该部落被强行分割在刚果（金）、法属刚果（金）和安哥拉等国。巴刚果（金）人仇恨比利时人的殖民统治，也排斥其他部族人移居巴刚果（金）地区。约瑟夫·卡萨武布成立了阿巴科——巴刚果（金）人联盟，担任该组织主席。这个组织只要求利奥波德维尔以西至大西洋的狭长地区（即下刚果（金）地区）独立，对刚果（金）其他地区不甚关心。

卢蒙巴的眼界高出卡萨武布等以部族人利益为重的集团一筹，他是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看待问题的，并成立了一个跨部族的政治组织。1958年10月，刚果（金）民族运动党成立，党员来自全国的各个部族，卢蒙巴被选为该党主席。该组织主张通过非暴力方式来争取刚果（金）独立。

1958年12月5日，在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倡议和组织下，首届“全非人民大会”在加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召开。十几个非洲国家的3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对卢蒙巴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增强了他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

卢蒙巴是在全非人民大会上崭露头角的政治新星，他在会上热情地发言，广泛地接触各国多方代表，给参加会议的代表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作为刚果（金）代表被选进大会执行委员

美国非常重视即将独立的非洲各国的未来领导人和政治代表，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已经注意到卢蒙巴的言谈举止。“这是一个潜在的重要人物，应密切注意他的动向”，特工向上级报告说，“卢蒙巴是学法语长大的，对英语却不甚熟悉。”于是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暗探伪装成卢蒙巴的译员，跟随他在各国代表中穿梭，搜集有价值的情报，并了解卢蒙巴的思想倾向。

卢蒙巴回到刚果（金）的利奥波德维尔以后，饱含激情，在7000人出席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阿克拉会议要求全非洲立即独立。1960年以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应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很高兴地说，会议的决议和我们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将把刚果（金）人团结起

来，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向殖民政权和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进行清算。现在是刚果（金）人民起来斗争的时候了。”

卢蒙巴告诉人民：“独立将不是比利时赠予刚果（金）的礼物或施舍，独立是我们固有的权力，我们现在要做的，便是恢复我们的权力。”

比利时派驻刚果（金）的总督科内利调集了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愤怒的人群在演说的鼓励下，捡起石头、操起棍棒与前来镇压的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1959年1月4日，黑人的暴动开始了。他们拿起了木棍、砍刀及其他自制武器，自发组织起来，袭击政府办公楼、商店、仓库和白人住宅区，焚烧车辆，袭击白人。利奥波德维尔市的上空浓烟滚滚，街上一片狼藉。

军警们用手中的枪向愤怒的人群猛烈开火，白人手持政府发放的枪支，向冲上来的黑人开枪，许多人被打死，更多的房屋被焚毁。军队的坦克车、汽车向黑人区包围而去，士兵们无情地疯狂扫射，见人就开枪，几百名黑人死于冲突中。比利时政府一向认为刚果温顺、听话，通过这次要求独立的大暴动，也认识到非洲的独立已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959年1月13日，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宣布：比利时王国对刚果（金）的独立“既不一味拖延，也决不仓促行事”。比利时政府宣布：“逐步和渐进地”让刚果（金）独立。但是，比利时的计划并不能使卡萨武布的阿巴科组织和卢蒙巴领导的刚果（金）民族运动党满意，各地的反抗与暴动层出不穷。

1959年10月下旬，卢蒙巴在斯坦利维尔召开的刚果（金）民族运动党代表大会上，号召全刚果（金）人民积极行动起来，结束比利时的殖民统治，解放刚果（金）。10月31日，当局指控卢蒙巴煽动暴乱，并发出通缉令。愤怒的黑人走上斯坦利维尔街头，游行示威，以示抗议，前来镇压的军警再次制造了流血事件，冲突中有20多人被打死，伤者不计其数。卢蒙巴被捕，并被押送至距斯坦利维尔上千公里之遥的伊利沙白维尔监狱中。当局还迟迟拖延对他的审判，以便阻止他参加1960年1月20日由比利时政府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解决刚果（金）独立等问题的比利时——刚果（金）圆桌会议。

刚果（金）各部族、地区的政党，传统的部落酋长，有政治影响力的人均参加了布鲁塞尔圆桌会议。他们的政治主张虽各不相同，但推翻殖民统治的目标却空前一致，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和争取独立的决心。

会议伊始，刚果（金）各方组成的代表团一致要求殖民当局释放卢蒙巴，并邀请其出席会议。就在此时，从伊利沙白维尔传来消息，地方法院已宣布判处卢蒙巴六个月的监禁。

在圆桌会议召开时，比利时首相环顾出席会议的刚果（金）代表，发现个个神情严肃，有的人眼中流露出不是感激而是愤怒。果然，他发言刚一完毕，便有刚果（金）代表大声要求释放卢蒙巴，如果卢蒙巴不能出席会议，刚果（金）代表团将用回国的方式来抵制会议。

比利时政府让步了，第二天，比利时代表团团长宣布：“卢蒙巴今晚可离开伊利沙白维尔，将乘飞机抵达布鲁塞尔。”

卢蒙巴已成为刚果（金）与比利时关心的焦点人物，第二天，他到达比利时首都后，刚果（金）代表团关于独立的要求又有了新的变化，最终，比利时政府被迫同意6月30日为刚果（金）独立日。

1960年6月30日，刚果（金）宣布独立，卢蒙巴出任政府总理，卡萨武布出任总统。

卢蒙巴在就职典礼上，面对数千名贵宾和刚果（金）各界人士，进行即

席演讲。他针对比利时国王博杜安的发言“刚果（金）的独立是利奥波德二世国王伟大的天才和崇高勇气的结果，也是比利时政府慈爱的结果”，针锋相对地说：

“我们宣布独立，虽然是按照比利时的协议进行的，但刚果（金）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独立是经过斗争才赢得的。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一场火与剑的斗争。刚果（金）的儿女们在那场斗争中前仆后继，经受了种种磨难、痛苦，甚至流血和牺牲。那场斗争，是泪与恨、血与火的斗争，我们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因为那是一场崇高的正义的斗争。为了结束殖民主义者用武力强加给我们的耻辱和奴隶制度，斗争是必要的。”

卢蒙巴又说：“这就是我们在长达八十年的殖民统治下所经受的一切。我们的心仍在流血，我们的伤口还在疼痛，我们怎能忘记这一切呢？我们经受过轻视、侮辱和殴打，这并不是因为别的，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皮肤是黑色的。”

卢蒙巴的发言，把比利时国王博杜安气得七窍生烟，也引起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反感，他们认为卢蒙巴是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危险人物、独立后的刚果（金）将会奉行亲苏路线而投入社会主义阵营，这势必使冷战政策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一场阴谋从这里悄然展开了。

独立与危机并至刚果（金）独立后的第五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盘旋在处于襁褓中的刚果（金）新政府的头上，差点毁了这个微弱的生命。驻首都利奥波德维尔地区的刚果（金）治安部队哗变了。这支由2.5万人组成的部队，指挥权完全控制在比利时军官手中，指挥官是埃米尔·扬森斯将军。他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是个殖民主义者。刚果（金）独立前，他曾致函刚果（金）的政治家们：“为了渡过权力过渡和新国家成立后最初几个月这一最困难时期，治安部队应该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其指挥官、传统习惯、纪律、军官等级、士气等，都不能动。”他反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军队本国化。

而刚果（金）籍的下级官兵却企盼比利时籍军官滚出军队，希望得到军阶等方面的改善。政治经验不足的卢蒙巴虽兼任国防部部长，却对士兵们的要求和主张认识不足。

7月4日这一天，在利奥波德维尔市郊的军营中，一位黑人下级军官对士兵说：“刚果（金）已经独立了，没有必要再听从白人指挥官的指挥了。”

这句话道出了长期受压抑的黑人士兵的愿望，却引起了指挥官扬森斯的暴怒，他亲自去军营宣布解除那位黑人军官的职务。军营中的士兵一片哗然。

卢蒙巴总理立即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决定政府立即组织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改组治安部队，有计划地将指挥权交给刚果（金）籍的军官，并为此发表了公告。这样，更加激怒了扬森斯将军，他直接致函卢蒙巴总理，信中充满了威胁：

我要告诉你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政府里某些人的说话和行为不加检点，军队有可能干出最糟糕的事情来。我再一次郑重地、正式地重申，如果政府继续采取不合理的、与军队纪律精神不相符合的方法，我们将面临灾难。

7月5日上午，扬森斯将军专门赶到利奥波德二世军营内，集合所有白人军官和黑人士兵，恶狠狠地宣布：“治安部队和独立前一样，一切保持不变。”他亲手在操场的黑板上用粉笔写下“独立前等于独立后”的标语，扬长而去。

当晚，军营内黑人士兵的不满情绪爆发了，他们占领弹药库，逮捕比利时籍军官，骚乱开始向其他军营蔓延。7月6日上午，卢蒙巴总理在扬森斯将军的陪同下，来到利奥波德二世军营，召集黑人士兵开会。他未认识到事态扩大的严重性，只是说：“作为总理和国防部长，我代表政府向你们致敬……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从7月1日起，所有的军士和士兵都晋升一级。”他向士兵保证：“我们将对军队进行新的改革，废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最后，他又强调：军队要遵守纪律。

军队没有平静下来，士兵们认为，每人晋升一级，并不能改变比利时军官压制他们的局面。于是怒火像火山一样喷发，大规模的哗变开始了。一部分士兵前往总统府和总理府，要求解除扬森斯将军和卢蒙巴的职务，并表示要干掉这两个人；接着，另一部分士兵武装起来，逮捕白人军官，并向首都进军。在骚乱中一些违纪现象、打砸抢和强奸事件相继出现。

7月8日，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卢蒙巴和卡萨武布率领政府部长来到利奥波德二世军营，作出紧急决定：（一）解除扬森斯及所有比利时籍军官的职务；（二）刚果（金）治安军改名为刚果（金）国民军，各级指挥权完全刚果（金）化；（三）由驻军单位的士兵进行选举，推出各级指挥官；（四）留用一批可以信赖的比利时军官作为国民军顾问。卢蒙巴任命维克多·伦杜拉为国民军总司令；任命总理府秘书约瑟夫·蒙博托为国民军参谋长。

加丹加省和开赛省的比利时籍军官拒绝向刚果（金）籍军人移交指挥权，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开始了。这给了不甘于放弃殖民统治的比利时政府一个干涉的借口，军事干涉计划正在酝酿。

7月10日，比利时国防部部长吉布森命令：动用军用运输机，将卡米纳军事基地的比利时伞兵及装甲车、吉普车运往伊利沙白维尔机场。当天清晨6时许，机群降落在跑道上，一群比利时士兵跳下飞机，迅速占领了指挥塔和军事要地，接着比利时伞兵坐着装甲车和吉普车向伊利沙白维尔市区推进，很快便占领了市中心，兵营亦被比军两个连的伞兵占领。军事行动在继续和扩大，7月18日，刚果（金）全境基本上被比军控制。

就在此时，刚果（金）内部的科纳特党及其领导人冲伯，在比利时人的支持下，公开宣布加丹加实行独立，并制定了“国旗”，成立了“中央银行”等。如何驱逐比利时人的入侵、制止加丹加分离，成了困扰卢蒙巴和卡萨武布的主要问题，搞不好有可能使新生的独立政权毁于一旦。但刚果（金）本身没有力量制止入侵、制止分裂，卢蒙巴向美国、苏联等国及联合国发出了派兵援助的请求。卢蒙巴在发表的声明中提出：不论是谁，只要帮助刚果（金）收回加丹加省，并将比利时人赶走，他就愿意接受对方的支持。美国和苏联正处于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约而同，都极想插手刚果（金）事务，争夺刚果（金）丰富的战略资源。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产的原子弹，投到广岛后，毁灭了那座城市。那枚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就是用刚果（金）生产的铀制造出来的。比利时政府与美国签订的秘密协定中，将刚果（金）生产的所有的铀，全部供给美国。因此，美国对刚果（金）十分关心，刚果（金）刚一独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便抢先派出大使克莱尔·廷巴克，进驻刚果（金）。美国认为，卢蒙巴的声明是投向苏联人的一种表示。现在美国有理由认为：卢蒙巴是个被共产党收买了的危险分子，他会毫不客气地将白种人从黑非洲赶走，而不付一分钱。因此，美国决心阻止刚果（金）的这种倾向。

苏联更是关心刚果（金）的民族独立运动，并向刚果（金）的一些政党提供了有限的资金。苏联还以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旗手的面目出现，也颇能迷惑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主义者。刚果（金）独立后，苏联也迫不及待地派出自己的大使。

刚果（金）政府向美、苏两国提出出兵援助请求后，美国因与比利时是盟国关系，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便拒绝了刚果（金）政府的要求。美国大使婉转地告诉刚果（金）政府，最好请联合国提供援助，由中立国派出部队。美国的目的是想利用联合国来抑制苏联，也不要派兵到刚果（金）去，这样可一举两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也在打联合国这张牌，他致电卢蒙巴说：

苏联已经用最坚决的语言谴责帝国主义对刚果（金）的干预——联合国安理会已作出很大努力，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比利时政府从刚果（金）领土上撤出其部队。苏联政府宣布，如果侵略继续下去，联合国和刚果（金）事业站在一起的热爱和平的其他国家将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卢蒙巴与卡萨武布又联名向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去急电，请求军事援助，提出几点：（一）所需要的援助并非用于恢复刚果（金）国内秩序之目的，而是为了保卫国家领土主权；（二）所需要的是一支由中立国家部队组成的联合国军；（三）如果刚果（金）所要求的援助未立即得到满足，共和国将被迫向万隆会议国家请求援助。

两大集团的争夺与斗争刚果（金）处在美苏两大阵营争夺的漩涡中。美国和西方国家认为，比利时人的军事干预，是为了保护欧洲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并未构成对刚果（金）的侵略，因此，比利时须等到联合国军有能力在刚果（金）维持秩序和法律后再撤军。应通过联合国向刚果（金）提供军事援助，但这种援助并不是用武力将比利时军队赶走，而是恢复刚果（金）国内的法律和秩序。苏联和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认为：比利时军队的出动，侵犯了刚果（金）的主权和领土，这是侵略行为，比军应立即无条件地从刚果（金）撤出。

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着手组织联合国部队，决定由非洲的加纳、几内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等部队组成联合国先遣部队，立即开赴刚果（金）。7月17日，大约有3500名各国士兵到达刚果（金）。哈马舍尔德是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立场上的。他在对联合国军司令官的训令中指出：“你们的任务是使这个国家恢复秩序和平静。”联合国军进入刚果（金）后，并没有像卢蒙巴所希望的那样，取代比利时军队，而是缴了刚果（金）士兵的械，在城市和兵营中，高高地升起联合国军的旗帜，降下刚果（金）的国旗。这使得比军迅速扩大战果，控制的城镇和地区越来越多。

卢蒙巴忍无可忍，向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夫尔·本奇发出最后通牒：（一）联合国军在24小时内将比利时军队赶出刚果（金）；（二）重申对苏联出兵的请求；（三）指责联合国军行动迟缓。

联合国安理会再次讨论刚果（金）问题。苏联副外长库兹内索夫发言，指责比利时入侵刚果（金）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阴谋的一部分，指出加丹加省冲伯集团的分裂活动，是西方为了维护在刚果（金）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目的是肢解年轻的刚果（金）共和国。苏联代表要求立即停

止对刚果（金）的一切形式的军事干预，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尊重刚果（金）的领土完整，不从事任何有损于刚果（金）领土完整的活动；如果侵略活动继续下去，一切热爱和平、同情刚果（金）事业的国家将采取更多的积极措施。

美国代表洛奇针对苏联代表的发言，毫不含糊地说：“美国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将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阻止未经联合国批准和请求对刚果（金）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他威胁说：一旦发生此类军事行动，不仅是对联合国的挑战，而且将严重损害在刚果（金）恢复稳定与秩序的努力。

刚果（金）问题加剧了东西两大阵营的对抗，不利和受害的只能是刚果（金）。卢蒙巴决定立即前往联合国总部，向西方各国澄清一个事实：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只要美国及联合国真心诚意地帮助刚果（金）渡过眼前的这场危机，刚果（金）将恪守中立，不会倒向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7月23日，卢蒙巴乘加纳政府提供的专机，离开刚果（金）利奥波德维尔，中途作了短暂的停留，于24日抵达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他马不停蹄，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举行了两次会谈，卢蒙巴向联合国秘书长表明了刚果（金）政府和国会要求比利时立即从刚果（金）领土上撤军的决心。卢蒙巴认为：除非比利时立即撤军，否则刚果（金）不能恢复和平。哈马舍尔德则认为：向刚果（金）派遣联合国军是应刚果（金）政府要求、依据安理会决议而采取的行动。

卢蒙巴在纽约期间，两次在非洲某国驻联合国大使办公室会见了苏联副外长库茨内索夫，双方进行了会谈。莫斯科电台报道说：“卢蒙巴已接受苏联政府的邀请，在不久的将来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政府极为恼火，认为这是卢蒙巴秘密投靠苏联的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并取消了艾森豪威尔与卢蒙巴的会见。美国驻刚果（金）大使廷巴克莱则向其政府建议：不要支持卢蒙巴，不与之合作，以便再扶持一个亲西方的傀儡政府。美国国务卿哈特在会见卢蒙巴时有意冷落他，并宣布说：美国不可能越过联合国向刚果（金）提供双边援助。

7月28日，卢蒙巴在回国途中顺便访问加拿大，特意会见了苏联驻加拿大大使。苏联大使告诉卢蒙巴：苏联政府已决定通过双边途径向刚果（金）提供一批军事援助。

卢蒙巴在得不到联合国和美国的支持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使美国和联合国不快之举，即访问一系列非洲的独立国家，争取绕过联合国，直接寻求援助。

卢蒙巴像旋风一样，在非洲大陆进行国事访问，从8月2日到8月8日，先后访问了突尼斯、摩洛哥、几内亚、加纳、利比里亚和多哥等六国。卢蒙巴在突尼斯还与阿尔及利亚临时革命政府领导人进行接触，并接纳了对方推荐给他的新闻秘书，一位有着俄国血统的年轻人谢尔盖·敬尔。卢蒙巴走得越来越远，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表示：如果联合国军不采取措施结束加丹加的分裂局面，刚果（金）政府可以任意调遣几内亚全国的军队。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向卢蒙巴保证：如果联合国未能使比利时全部和无条件从刚果（金）撤军，加纳将和其他非洲国家一道，建立联合武装力量指挥部，联合出兵刚果（金），用武力赶走比利时军队。卢蒙巴则表示：愿意同加纳实行两国统一，成立“非洲联盟国家”，设立单一国家元首和议会，联盟内不设边界，可自由往来。埃及总统纳塞尔表示：支持卢蒙巴和恩克鲁玛的方案。

刚果（金）的局势在美、苏等国的插手下，愈显复杂。比利时全力支持冲伯集团，帮助它建立加丹加宪兵队，大规模招募和训练武装力量。冲伯集团还高薪聘请比利时军官和白人组成雇佣军，分裂势力越来越大。8月4日，加丹加“议会”炮制出一部《加丹加宪法》，8月7日，冲伯出任加丹加“总统”。不久，南开塞省也宣布脱离刚果（金）。

在刚果（金），忠于卢蒙巴的军队开始与联合国军发生冲突。

联合国安理会为刚果（金）问题第四次召开会议。美国指责卢蒙巴是苏联人的“走狗”，甚至他的每一封信都是苏联人起草的；苏联则指责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和副秘书长本奇是西方集团的“走狗”，而冲伯的所谓“共和国”只是靠西方刺刀支持的一个傀儡集团。

8月中旬，卢蒙巴决定不再依靠联合国，用自己的力量收复加丹加和南开塞省。苏联的军事援助于8月23日开始运抵南开塞省的弗朗基港，首批运达的总计100辆汽车和零件，用于国民军在南开塞省的行动；8月26日，六架伊柳辛式军用飞机也陆续抵达斯坦利维尔机场并举行了交接仪式。

第二天，卢蒙巴率领一部分飞机飞回首都利奥波德维尔。国民军总司令伦杜拉少将率领几千名国民军士兵在机场上接受了卢蒙巴的检阅，在聆听了总理所作的保卫祖国、英勇作战、严守军纪的演讲后，便登上运输机和直升飞机向卢卢阿堡地区飞去。

很快，在伦杜拉少将指挥下，士气高昂的国民军收复了南开塞省，卡隆吉分裂分子的高级官员们纷纷被擒。接着，国民军又进军加丹加，捷报不断传来，国民军乘胜前进，准备发起最后的总攻，彻底摧毁冲伯集团老巢的战斗即将开始。

中央情报局的阴谋

卢蒙巴的亲苏立场以及苏联对刚果（金）的军事援助，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为恐慌。卢蒙巴已成为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首要危险人物。8月26日，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向中央情报局驻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劳伦斯·德夫林发出了密旨：暗杀卢蒙巴。并要求他与大使商量，“设法得到他的帮助，如果发生了特别的情况，我们没有时间再拖延了。”

正当卢蒙巴的国民军准备向加丹加冲伯集团发起总攻时，卡萨武布的阿巴科组织的一个秘密代表团访问了伊利沙白维尔。冲伯向他们表示，只要能干掉“共产党分子”卢蒙巴，冲伯集

团愿与中央政府进行和解。总统卡萨武布在外长邦博科和负责

比利时欧洲事务的部长艾尔伯特·德沃斯的支持下，与国民军总参谋长蒙博托达成协议：军队保持中立，不干涉政治。9月5日晚8时15分，卡萨武布在刚果（金）国家电台对全国广播：“由比利时国王任命的刚果（金）总理卢蒙巴背叛了他的使命，独断专行，我行我素，目前正把国家拖入内战的漩涡之中。我决定立即解除他的职务，解除副总统基赞加和姆万巴、格本耶、卡萨穆拉、波兰巴、伦巴拉等五位部长的职务，并解散国会。”

晚9时整，卢蒙巴赶到刚果（金）国家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

“同胞们，国家电台刚刚广播了国家元首约瑟夫·卡萨武布先生的声明，宣布解散我所领导的政府。现在我以刚果（金）政府和整个国家的名义，对他的声明予以严正的驳斥。国家元首与政府之间从未讨论过这件事。我们的政府是通过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得到了议会的充分信任。因此除非这个政府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否则谁都无权解散它。目前政府仍享有人民的信任，

整个国家都在我们一边。

“我们决定保卫我们的人民，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我们曾拒绝过将我们的国家出卖给比利时殖民者及其同伙，拒绝了那些企图继续剥削我们的人的要求，现在我们将以荣誉和勇气，保卫人民的权利。我们将继续执政，完成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

卢蒙巴又宣布：“从现在起，卡萨武布不再是总统了。”

在关键时刻，美国人安德鲁·戈迪亚起了特殊的作用。9月上旬，他来到刚果（金）首都利奥波德维尔，负责行使联合国刚果（金）行动的军政指挥大权。他先是与卡萨武布策划了罢免卢蒙巴的阴谋，卢蒙巴起来反击时，又派联合国军中的摩洛哥部队去保卫总统府。戈迪亚知道忠于卢蒙巴的国民军一定会乘苏联飞机赶回首都，他果断地下令关闭刚果（金）除加丹加以外的所有机场，除联合国的飞机外，其余飞机一律不得起降。

果然，国民军总司令伦杜拉将军得知卡萨武布发动政变的消息后，立即率部乘坐飞机从斯坦利维尔起飞去靖难。当飞机成批地飞到恩吉利机场上空后，机场已在联合国军的控制之下，飞机盘旋着，试图强行降落，但因跑道被封锁，只好飞回去。

戈迪亚又指挥联合国部队占领刚果（金）国家电台，割断了卢蒙巴与他的人民和支持者之间的联系。卡萨武布启用了布拉柴维尔电台和设在布拉柴维尔的秘密电台“马卡拉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免去卢蒙巴总理职务的声明，宣布卢蒙巴是“投向共产主义的坏蛋”。冲伯集团也在起劲地攻击卢蒙巴，不明真相的人民却无法知道卢蒙巴的消息。

首都还有刚果（金）国民军 5000 人，这是戈迪亚的心头大患。这时，美国大使廷巴克立即拿出 100 万美元的现款，与卢蒙巴的学生、国民军总参谋长蒙博托达成一笔交易：蒙博托用美国人的钱，给军队发饷，交换条件是将手中的武器交给联合国军保管。

美国人戈迪亚成了刚果（金）的实际统治者，他可以在全国任意发号施令。中央情报局、廷巴克、戈迪亚之间有专门的热线，谁在操纵刚果（金）的政局，已一目了然。

卢蒙巴还在奋斗，他于 9 月 7 日召开刚果（金）下院会议，慷慨陈词：

“关于共产主义，已经说过不知多少次了。关于我本人，也不知有多少种说法。我的朋友，你有没有意识到，有人在玩帝国主义的牌？竞选期间，天主教会印刷了大量的传单，到处散发，说这说那，人民相信他们了吗？没有！人民还是按照他们本来的意愿，投了我们的票。他们称我是共党分子，我觉得很滑稽，因为我现在不是共党分子，将来也不会是共党分子。事情很简单，我出任总理以来，接待过许多来访者，他们既有从美国来的，也有从法国、德国、比利时来的，他们纷纷提出要和我签订这个或那个协议，我一个也没有答应。因此，他们认识到，他们不能用金钱收买我们的政府，便对我们大加低毁。帝国主义者非常强大，也非常富有，而我们在政治上还很软弱，容易受骗上当，轻信别人。以前，当我们在这里进行战斗之时，当我因为要求独立而被投入监狱之时，请问是俄国人给我出谋划策的吗？”

“当我们的兄弟们在全国各地进行战斗之时，请问是俄国人唆使我们要求独立的吗？除了帝国主义者外，还有谁剥削了我们八十年？他们把刚果（金）的财富当作他们自己的国家储备。法国人、美国人、比利时人到刚果（金）来，他们认为理所当然，他们有权来；而俄国人要来，他们就无法容

忍了。……我们的国家究竟还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想保持中立，既不想执行美国人的政治路线，也不想学俄国人，我们就站在这里，站在中间……

“在非洲，任何人只要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帝国主义，他就是一个共党分子，是莫斯科的代理人！相反，任何人只要站在帝国主义者一边，任何人只要接受他们的津贴，他就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好人。我的朋友，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议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宣布：总统和总理的行为都无效，要求卢蒙巴与卡萨武布和解。卢蒙巴接受了议会的决议，议院通过谴责卡萨武布政变的决议，但卡萨武布在戈迪亚的支持下，宣布议会无权取消他关于解除总理职务的命令。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秘书长私人秘书、负责刚果（金）行动的戈迪亚的使命完成了，虽然他在刚果（金）只呆了八天时间，但已控制了局势，卢蒙巴大势已去。9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把戈迪亚的指挥权交给继任达亚尔，便返回了纽约。

9月11日，卢蒙巴亲自率领国民军士兵，来到国家电台，不顾加纳士兵的警告，闯进电台大楼，双方剑拔弩张。卢蒙巴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对加纳士兵晓之以理，但加纳士兵不为所动，在紧张的对峙下，卢蒙巴决定撤走。他又去利奥波德二世军营鼓动士兵支持政府，蒙博托得知后，命令士兵将卢蒙巴扣押起来。幸亏国民军总司令伦杜拉及时采取行动，才将他解救出来。

9月12日，刚果（金）议会召开两院联席会议，决议授权卢蒙巴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掌握首都军队的总参谋长蒙博托一时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联合国和美国等国认为在这场刚果（金）总理和总统的对峙中，取得胜利的很可能是卢蒙巴，他们将希望放在蒙博托身上。

此时的蒙博托正在十字路口徘徊，他犹豫不决，不知到底支持哪方。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开始挑拨离间，说卢蒙巴将解除蒙博托的总参谋长职务，任命原内阁青年和体育部部长莫波洛为总参谋长。蒙博托终于下定决心，在美国的支持下，9月14日，他召集手下的军官们秘密开会后，决定采取行动。当天晚上，刚果（金）国家电台广播了蒙博托的讲话，他说：为了使国家摆脱目前的困境，军队决定实行中立。他要求卡萨武布和卢蒙巴都呆在自己家里不准外出，同时宣布驱逐苏联集团驻刚果（金）的所有外交官。蒙博托是卢蒙巴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卢蒙巴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蒙博托会对他下毒手。他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利奥波德二世军营，求见蒙博托，并与他推心置腹地长谈，希望他能改变目前的做法。但是蒙博托已铁了心，谈到东方发白，他只同意了卢蒙巴会见卡萨武布的要求，并同意安排这场会见。

天亮之后，卢蒙巴又在军营中做军官们的说服工作。蒙博托对此心怀不满，在他的纵容下，一些士兵围攻卢蒙巴，并动手猛揍。卢蒙巴逃到联合国军一所军官食堂中，士兵们乱哄哄地包围上来，但被加纳士兵阻挡住了。乱兵越来越多，将军官食堂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起来，卢蒙巴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负责联合国刚果（金）行动的达亚尔亲自参与了营救卢蒙巴的行动，他从食堂前门出来，向乱兵讲话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卢蒙巴则从后门逃出，在联合国士兵的保护下，乘坐吉普车迅速撤离。但是，在匆忙之中，卢蒙巴将文件箱遗忘在军官食堂里。之后，箱子又被秘密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劳伦斯·德夫林手中。箱子里有极其重要的绝密文件，其中有卢蒙巴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通信。

9月21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举行了国家安全会议。

杜勒斯阴沉着脸，忧郁地说：“卢蒙巴在刚果（金）还是一支有影响的力量，他的存在对我们是极大的危险。目前，这个人尚未被搞掉。”

艾森豪威尔表示，杜勒斯有权全权处理，他们商议后决定：不排除以采取特别行动形式搞掉卢蒙巴。

杜勒斯表示：最好的办法是让刚果（金）人审判刚果（金）人的“罪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亲自下手，以免事情败露。

中央情报局为制造混乱，又假造了几封卢蒙巴与恩克鲁玛的通信，连同原来的几封信和其他重要文件，交刚果（金）报纸发表。其中一封信中说：政府计划驱逐联合国军，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严厉镇压，建立恐怖统治。这些信的发表，使支持卢蒙巴的人开始仇恨并反对他，想杀掉卢蒙巴的人越来越多。

蒙博托下令，由他精心挑选的12名刚果（金）大学生组成“大学生委员会”接管政府各部，赶走部长，解散议会。他又命令进攻加丹加前线的国民军停止军事行动，退回到原来开始攻击的地方。伦杜拉的国民军总司令职务被解除，由蒙博托本人接替。卢蒙巴被软禁在总理府。联合国刚果（金）行动负责人达亚尔在总理府的周围筑起工事，建立岗哨；蒙博托也在外围派驻了军队，严格盘查总理府的进出人员，防止卢蒙巴逃跑。

10月15日，中央情报局总部向刚果（金）站发出密电：

或许可以派突击小组进行劫持，从河岸上向悬崖上的那幢房子袭击……征求你们的意见。

两天后，利奥波德维尔站回电：

无法向目标附近靠近，建议总部尽快送来外国造的配有望远镜瞄准器和消音器的机枪……

卢蒙巴之死，使艾森豪威尔下台无憾的确，卢蒙巴在刚果（金）的力量还很强，政局正悄悄向有利于卢蒙巴的方向转变。软禁卢蒙巴并不是解决刚果（金）问题的好办法，联合国指挥刚果（金）政治军事的达亚尔公开主张卢蒙巴和卡萨武布和解，重开国会，使刚果（金）政府合法化。美国的决策者与卡萨武布、蒙博托等都神情紧张，与联合国刚果（金）行动总部的关系发生变化，互相指责。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等也向达亚尔施加压力。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是置卢蒙巴于死地。

蒙博托派兵冲进加纳驻刚果（金）大使馆，宣布加纳大使德真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驱逐出境；又宣布加纳代办韦尔贝克为“不受欢迎的人”。蒙博托的部队还与保护加纳使馆安全的联合国军突尼斯部队发生冲突。枪声大作，刚果（金）方面负责这次行动的军官科科洛被打死，另有十多人伤亡；突尼斯方面一人被打死，六人被打伤。这起流血事件使联合国军与刚果（金）部队间的关系骤然紧张。

卢蒙巴意识到，蒙博托对他下毒手的日子临近了。卢蒙巴拟订了逃跑的计划，并秘密通知忠于他的几位部长。康扎当即在电话中反对说：“即使你不得已在总理府呆上几年时间，我相信你迟早会作为胜利者回到人民中间。在仍然相信你的人的压力下，你的敌人最终会被迫向你求和的。如果你现在就离开总理府，帝国主义者会抓住你，肯定会对你下毒手。”

然而，卢蒙巴不是一个等待别人来释放他的人，作为一名战士，他必须

战斗。11月27日夜，一个风雨交加的漆黑的深夜，卢蒙巴带着妻子和孩子，在一辆挂有联合国牌照的汽车中，躲过严密的盘查，与他的支持者，参议院议长奥基托、青年和体育部部长莫波洛等人会合，乘坐20多辆汽车，向东方省方向驶去。

卡萨武布去了一趟联合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取得了联合国刚果（金）代表的合法席位。他志得意满，一回国便迫不及待地下令给蒙博托：逮捕卢蒙巴。

蒙博托于28日率军队强行冲过联合国军的防线，闯进总理府时，卢蒙巴早已人去楼空。他立即下令封锁所有的机场，派人四处搜捕。蒙博托认为，卢蒙巴“一是可能去斯坦利维尔，与副总理基赞加会合，另一种可能是去卢卢阿堡，在开赛省建立根据地。”卢蒙巴的死敌刚果（金）（布）总统尤卢立即向蒙博托提供一架低空侦察机，协助搜索卢蒙巴的行踪。蒙博托派出旁戈上尉，亲率追兵，携带无线电台，沿利奥波德维尔——斯坦利维尔公路尾追。

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听说卢蒙巴逃跑的消息后，立即给驻刚果（金）的联合国军下了死命令：不得干预逮捕卢蒙巴的行动。

卢蒙巴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但他并没有像丧家之犬那样只顾逃命，而是沿途每到一处，都向群众进行宣传，群众则载歌载舞地欢迎他。在布隆古镇，卢蒙巴登高向群众进行演说：“同胞们，我今天抵达这里，并不是一名逃犯，我要到斯坦利维尔去，领导刚果（金）人民进行解放战争，把我们美丽富饶的国土从联合国和比利时的占领下解放出来，消灭与外国占领军同流合污的民族败类，保卫伟大的刚果（金）人民。”

11月30日，低空侦察机在开赛省的桑库鲁地区发现了卢蒙巴浩浩荡荡的车队。蒙博托命令旁戈的追兵日夜兼程扑向这一地区，双方的距离在进一步缩小。

12月1日，卢蒙巴的车队抵达桑库鲁渡口，他又到渡口附近的姆韦卡镇向热烈欢迎他的群众发表演说。随后他来到渡口，准备继续向东方省前进。

汹涌湍急的河上，只有一条渡船，卢蒙巴等只好先上船，他的妻子和小儿子准备第二批渡河。他已渡过大河，深情地向河对岸眺望时，对岸响起了枪声，旁戈的追兵已赶到渡口，抓住了卢蒙巴的妻儿和战友。先期过河的人都力劝卢蒙巴快走，尽快脱离险境，但他执拗地拒绝了，义无反顾地登上渡船，回到对岸，终于落入旁戈的追兵之手。旁戈大喜过望，立即将这一好消息报告给蒙博托。

被捕后的卢蒙巴受到非人的折磨和虐待，当飞机将他送回利奥波德维尔时，恩吉利机场的联合国军人看到的是一副惊人的惨景：卢蒙巴满身是泥、衣服破碎，眼镜不知去向，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伤口的血仍在流淌。他在旁戈的武装押送下，被推搡着上了吉普车。和卢蒙巴一起被捕的奥基托，从利奥波德二世军营中偷偷打电话告诉康扎：

“他们像打狗一样猛揍卢蒙巴，他的衣服被脱掉了，眼镜也被打掉了。你赶快通知联合国人员，让他们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卢蒙巴会被打死的。”

康扎前去哀求联合国的达亚尔，得到的只是冷冰冰的回答：“联合国不能干涉刚果（金）的内部事务。卢蒙巴只要呆在总理府里，我们就会保护他的安全，但他逃跑了，从那一刻起，联合国就不能对他负责了。”

卢蒙巴等三人又被秘密转移到蒂斯维尔的哈迪兵营，被打得遍体鳞伤。

蒙博托欺骗公众说：“卢蒙巴有三名男仆侍候，睡高级床，每天要花去 1000 法郎，还有专门的私人医生。”

卢蒙巴被捕后，许多非洲国家代表和苏联代表纷纷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营救卢蒙巴。哈马舍尔德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联合国的政策没有变，只是具体情况变了。我除了呼吁卡萨武布政府给予卢蒙巴人道主义待遇并根据法律进行审判外，其他都无能为力，因为卢蒙巴是自动放弃联合国保护的。”

苏联代表提出一项草案，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释放卢蒙巴和其他被捕的政府官员，解除蒙博托恐怖主义匪帮的武装。美国代表针锋相对，要求联合国“不要对刚果（金）政治犯采取行动”。苏联代表联合加纳、印度、印尼、摩洛哥、伊拉克、埃及、南斯拉夫等 18 个国家提出草案，要求刚果（金）现任当局立即释放政治犯，重开国会；美国等西方集团坚决否决了苏联等国的草案。

刚果（金）的局势因卢蒙巴被捕而更加复杂。支持卢蒙巴的副总理基赞加于 12 月 12 日正式宣布成立“刚果（金）自由共和国”，中央政府定斯坦利维尔为临时首都，基赞加任总理，任命缪勒尔负责外交事务，伦杜拉负责国防事务。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斯坦利维尔派出大使或特别代表。

基赞加政府和新组建的军队在基伍省和北加丹加不断取得胜利，形势大好。就在这时，风云突变。卡萨武布政府决定借刀杀人，立即杀死卢蒙巴。1 月 13 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刚果（金）人员担心卢蒙巴会再次从蒙博托手中溜掉，向中央情报局总部发出电报，希望总部拿出个万全之策。电报中说：

卢蒙巴可能会利用他的打手队和舆论宣传，利用目前联合政府中出现的一系列的失败情绪，来确保国会对自己的支持……在当前，拒绝采取极端行动将导致美国在刚果（金）政策的失败。

一场看不见的交易在幕后进行着。蒙博托决定将卢蒙巴交给死对头冲伯集团。

1961 年 1 月 17 日，一架 DC4 型飞机秘密将卢蒙巴等人送往伊利沙白维尔机场。次日，冲伯等人来到加丹加关押卢蒙巴的别墅，残酷地杀害了卢蒙巴和奥基托、莫波洛三人。

消息传出后，全世界对这一卑鄙的谋杀行为感到愤怒。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对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进行最严厉的谴责，指责哈马舍尔德应对卢蒙巴之死负直接的责任，并宣布苏联将断绝与哈马舍尔德的关系，不再承认他是联合国秘书长。苏联政府将向刚果（金）人民及其合法政府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摩洛哥国王都对哈马舍尔德进行了指责，认为对卢蒙巴的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年 9 月 18 日，哈马舍尔德在飞往刚果（金）解决问题时，飞机神秘地失事，他也在这次意外事故中丧命，永远封存了一些秘密。

1961 年 1 月 19 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即将下台，中央情报局驻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劳伦斯·德夫林满怀欣喜地向总部报告卢蒙巴的死讯。他说：“感谢帕特里克（爱尔兰的守护神），要是我们知道他要来的话，一定会烤一条蛇来款待他。”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他的继任者肯尼迪说：“在我的任内，卢蒙巴终于死了。”

中东和平死了 ——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刺案

特拉维夫的枪声震惊了世界

1995年11月4日星期六，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多灾多难的中东，半个多世纪以来，枪炮声一直未绝，血和地下的石油一样，流得太多太多。老人、妇女和孩子们声嘶力竭的哭喊，始终在中东地区上空回荡。

以色列总理拉宾，一位优秀的职业军人和出色的灵活的政治家，一改以往强硬的战争政策，用比发动战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向他的宿敌——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主席阿拉法特伸出了和解的手，成为真正的和平“圣斗士”。坚冰在悄悄融化，长期以来冻结在冰下的暗流，将掀起汹涌澎湃的和平大潮。

在中东，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热情呼唤着拉宾的名字。拉宾成了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象征。

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签署了巴勒斯坦人自治原则宣言。

四天以后，即9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拉宾“博瓦尼和平奖”。

1994年，拉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年，拉宾还获得“阿斯图里亚斯王子1994年度国际合作奖”。

这么多的最高荣誉和桂冠，都是对拉宾在中东和平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的嘉奖。

镜头转回1995年11月4日夜，一个人材银花、星光闪烁的夜晚。这一天是星期六，是犹太教的安息日，也是以色列的法定假日。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市中心广场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凡，爱好和平的以色列人聚集在这里，正举行一个名为“赞成和平，反对暴力”的盛大集会。人们情绪高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

们心目中的英雄拉宾总理将出席和平集会。集会是由“支持和谈，结束以阿争端总委员会”组织的。以色列全国有500万人

口，首都10万市民参加了当晚的集会，足以代表人心所向。45年的战争，正像拉宾所说的那样：“血流得太多，泪也流得太多。”和平，已成为大部分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最渴望的事情。

7时左右，人群中发出了欢呼声，彩球、横幅、鲜花组成了欢乐的海洋，拉宾总理在外长佩雷斯和其他内阁成员的陪同下，站在市政厅缓缓升起的电动平台上，出现在国王广场、公众面前。

面对情绪热烈的人潮，满头白发、精神饱满的拉宾，用他宏亮而富有魅力的男低音发表演讲。在晚风中，他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我当了二十六年军人，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那是因为过去我别无选择。但是，今天，和平的机会来临了。为了今天在这里和不在这里的人们，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巨大的机会。”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期待着人们的反应，果然，广场上的人群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拉宾微笑了，坚定地说：

“总会有和平的敌人，他们正在拼命地伤害我们，目的是破坏中东和平。但是，我要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位和

平伙伴，那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过去是敌人，现在已经停止了恐怖活动。没有和平的伙伴就没有和平。为了解决中东冲突中最复杂、最持久、

最敏感的部分——以阿冲突，我们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巴解也要作出自己的努力。我相信，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支持和平，愿意为和平去冒任何危险。”他像一个即将投入战斗的无畏战士一样，勇敢地进行最后的宣誓：“这个大会就是要向以色列人民，向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阿拉伯世界，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支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解决以色列面临的各种问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实现和平的机会。如此盛大的集会表明，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拉宾从口袋中取出了《和平之歌》的歌词，带领全场群众一起高唱：

让太阳升起，让清晨充满光明。

最圣洁的祈祷也无法使他们复生。

生命之火被熄灭的人，

血肉之躯被埋入黄土的人，

悲痛的泪水无法将他唤醒。

也无法使他重获生命。

无论什么人，

无论是胜利的欢乐。

还是光荣的赞歌，

都不能使他从黑暗的深渊中。

回到世上与我们重逢。

所以，请唱一首和平之歌吧。

不要小声地祈求神灵。

引吭高唱和平之歌。

这是我们最应当做的事情。

10万人放开歌吼，发出海啸般的声音。

台上台下的热烈激动情绪将集会推向最高潮。和平理想和和平目标的融合与交流，使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拉宾转过身，张开双臂，与站在身边的外长佩雷斯紧紧拥抱在一起，显示出工党内部的亲密团结。这一对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工党领袖，多少年来一直是竞争对手，明争暗夺党内领袖地位，他们第一次拥抱使台下欢声雷动。

拉宾在群众的簇拥下，走下市政厅讲台，与周围不断涌来的人群握手，表示感谢。秩序显得很混乱，拉宾依旧热情地与他的崇拜者握手，他的保镖开始走过去，奋力推开人群，以便闪出一条通道。一名记者挤上前，向拉宾夫人发出不吉利的提问：

“假如一个疯子此时向拉宾总理开枪怎么办？”

拉宾夫人用责怪的目光看着记者，认为这是一次和平的集会，决不会发生暴力事件。她反问：

“你疯了吗？我们在哪里？在非洲吗？我真不明白，你们记者怎么会有这么多怪问题。”

这时，一名枪手也挤在拉宾周围的人群中，在他冷峻的脸上，眉宇间正隐隐透出一股杀气。他的口袋中藏着一把9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枪把早被手心的汗水浸得湿漉漉的。他使劲挤开人群，来到拉宾身旁。而拉宾却浑然不觉危险正一步一步向他靠近，他与妻子还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在保镖的护卫下，拉宾正走向自己的座车。一名保镖拉开了车门，拉宾正准备上车，枪手阿米尔已挤过人群。黑洞洞、闪着寒光的枪口正准准地对准拉宾。

“ 啪——啪—— ”

拉宾感到胸口被重重捶了两下，剧烈的疼痛，使他不由自主地弯下了腰，凶手又向拉宾背部开了两枪。这位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面对呼啸而来的弹雨从未负过伤，而今却在自己倡导和平的土地上倒下了。保镖、司机、拉宾夫人莉赫急忙围上去。拉宾的嘴唇颤动着：“ 我没事，没事。” 他的头无力地一垂，便失去了知觉。

在前往特拉维夫伊希洛夫医院的路上，拉宾已进入弥留之际，脉搏不再跳动，血压也没有了。但是，医务人员还是奋力进行抢救，为他输氧、打强心针，做心脏人工按摩，准备动手术，希望能起死回生。一个小时后，即 1995 年 11 月 4 日 23 时 11 分，北京时间 1995 年 11 月 5 日凌晨 5 时 11 分，浑身浸透鲜血的拉宾，在手术台上逝世。

以色列总理办公厅主任哈贝尔一脸悲痛，向全世界宣布：

“ 以色列政府深切悲哀及极度震惊地宣告：总理拉宾遇刺身亡。”

以色列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由外交部长佩雷斯任代总理，宣布全国哀悼，定于 11 月 6 日下午 2 时整，为拉宾举行以色列建国以来最隆重的国葬。

拉宾的遗体殓入名贵的棺木之中，灵柩上覆盖着以色列的蓝白国旗，星期天，在六名以色列少将的护卫下，用专车送往圣城耶路撒冷的议会广场。当拉宾的灵柩被以色列士兵从议会大厅抬出，经过拉宾夫人和其女儿身边时，两人泪如雨下。他的灵柩将在耶路撒冷停放 22 小时供以色列人瞻仰、凭吊。按犹太教习俗，停放灵柩的广场上来置鲜花，人们悲伤地祈祷着。在肃穆、哀伤的气氛中，以色列全国被突如其来的巨大不幸压倒了，到处是哭泣声，一天之中，全国有近 100 万人参加了瞻仰遗容的活动。

负责国葬的旅游部部长巴拉米说：“ 已邀请了 4000 名宾客，其中包括 2500 名国外贵宾参加拉宾的葬礼。”

拉宾对中东和平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宁，都有着巨大影响。他的突然去世，将给中东的和平和世界的稳定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拉宾的死讯像旋风一样刮遍全世界后，无疑使各国感到震惊。

全世界都在哀悼拉宾的逝去。

美国对此作出积极反应，决定派出以美国总统克林顿为首、由 40 人组成的庞大的代表团，前往以色列参加拉宾的葬礼。代表团成员包括前总统布什、前总统，产特及夫人南茜、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国防部部长佩里、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多尔及众议院议长金奇里。

德国决定派出以总理科尔及总统赫尔措格为首的代表团。

西班牙的代表团以首相冈萨雷斯为首。

荷兰的代表团由首相科克率领。

匈牙利的代表团以外长科瓦奇为团长。

俄国决定派出由外长科济列夫和总理谢尔诺梅尔金率领的代表团。

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将前往特拉维夫参加葬礼。

中国决定派出自己的使者……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亦将参加。

始终用花中裹头的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主席阿拉法特决定不参加拉宾的葬礼，以免引起以色列鹰派人士的反感。

1995 年 11 月 6 日下午，耶路撒冷的赫茨尔山公墓聚集了 13 位国家元首、22 位政府首脑和数十个国家的代表及以色列全国各界人士。墓地外，还有如

潮的人海。

阴沉的天色更增加了人们内心的悲哀。当地时间下午 2 时整，葬礼正式开始，以色列全国鸣汽笛两分钟致哀。

拉宾的妻子、儿子，孙女出席了葬礼。拉宾的儿子首先悲痛欲绝地致词，悼念父亲。接着，以色列总统魏茨曼，代总理佩雷斯等先后发言，盛赞拉宾的伟大功绩。许多国家元首、政府总理先后致词。

拉宾的敌人和朋友，腮边和下巴上长满白花花的胡子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十分难过，时断时续地致词，令在场的人们泪水难抑。

他的声音略带颤抖：“我从未想到我会来到这样一个场合，一个向我的朋友和同事作这样诀别的场合……”他赞扬了拉宾的和平努力和未竟之业，最后说：“只要我活着，就会为结识拉宾，为能和拉宾一起工作而感到荣幸。……”

美国总统克林顿回顾了不久前在白宫与拉宾、阿拉法特等人一起正式签署巴以协议的情形。他引用了一段圣经中的故

事：

“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祖先对上帝的忠诚，命亚伯拉罕把自己心爱的儿子杀掉。当全心全意信仰上帝的亚伯拉罕果真准备这样做的时候，上帝派人阻止了他。上帝让拉宾去了，他是在用更加严酷的方法考验我们。”显然，克林顿是希望中东各国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将和平进程继续下去。

拉宾孙女的天真童音和真情流露，更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她说：

“我今天不讲什么和平，只讲我的祖父。祖父啊，我愿你的灵魂在天国安息……你也要想到我们，也要思念我们。因为我们将永远永远爱着你。”

下午 3 时 30 分，在一片祈祷声中，八名以色列军官将拉宾的灵柩放进墓穴中，黄土渐渐掩埋了这位伟大的和平斗士，仪仗队鸣枪致哀……

三部曲：军人生涯，辉煌的“六天战争”公元前 21 世纪中叶，一支游牧部落进入巴勒斯坦，逐步征服了当地的迦南人。这支游牧部落便是希伯来人的祖先，他们形成了两大部落联盟——以色列和犹太。星移物换，约公元前 13 世纪、公元前 12 世纪之交，从海上来了腓力斯丁人，他们将巴勒斯坦称为“腓力斯丁人的国家”，希伯来人和腓力斯丁人长期厮杀，犹太王大卫将腓力斯丁人驱逐出境外，定都耶路撒冷，并在锡安山上建了神庙。

到了公元前 722 年，北部的以色列王国被亚述帝国灭亡。公元前 586 年，新巴比伦王国又消灭了犹太王国，拆毁了耶路撒冷的神庙。可怜的犹太人被绳索和铁链束缚着带到巴比伦，成了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他们倍受折磨与煎熬，终日以泪洗面。又过了 48 年，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攻陷巴比伦，允许“巴比伦之囚”返回犹太地区。犹太人又在锡安山上建立新的神庙，视锡安山为圣山。犹太教在此时便最终形成了。该教崇奉耶和华为宇宙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认为犹太人是上帝耶和华的“特选子民”，是优秀的民族。

六、七世纪之交，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崛起，产生了一个新的宗教——伊斯兰教，崇拜先知穆罕默德，并对外扩张，于 640 年攻占了巴勒斯坦等地，称雄中东地区。

“上帝的选民”被迫星散到世界各地，用自己灵活的头脑经商，获取财富。莎士比亚著名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卑鄙无耻的阿巴贡，便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商人。犹太商人在世界上的名声并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成了希特勒大规模反犹事件的藉口。

在那些令人难忘的苦难岁月中，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几百万犹太人丧生，更遑论返回与重建家园了。

二战结束后，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矛盾依然尖锐，在美国支持下，世界各地犹太人重返家园，60万人聚集在圣城耶路撒冷等地和巴勒斯坦地区。1947年11月底，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阿以分治决议，随即阿拉伯武装人员开始围困那路撒冷的犹太人。从那以后中东地区便成了火药桶，先后爆发了四次大规模的阿以战争，每次均以阿拉伯国家的失败而告终。民族间的仇恨越来越深，中东地区持久的和平成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共同的心愿。

上帝将和平之手指向了拉宾。拉宾为了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开始了他的人生三部曲：从军人到外交家，最后成为政治家，实现自己的梦想。

伊扎克·拉宾，1922年3月1日生于耶路撒冷。他的父亲鲁比佐夫生于乌克兰，俄国革命时逃往美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鲁比佐夫报名参军，进入英军第38营，当他的部队开到巴勒斯坦时战争已结束，他遇到一个美丽的犹太护士，并与她结婚。一年后，长子拉宾呱呱坠地。

稍大的时候，拉宾在特拉维夫的学校中读书，后在美国迈阿密大学受教育。18岁时，拉宾加入犹太秘密军事组织“帕尔马赫突击队”。

1941年5月的一个夜晚，19岁的拉宾和他的伙伴配合盟军行动，开进南黎巴嫩去破坏电话线，他的军人生涯从此开始。

他大胆、机敏，富有领导才能，他所在的排很快成了“帕尔马赫”九个排中火力最猛的一个。

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阿以分治决议后，阿拉伯军队将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公路切成几段。那城中有10万犹太人，如果丢失这块宗教意义上的圣城，将会在心理上给复兴的犹太民族产生难以估量的打击。阿以双方都是志在必得。对以色列来说最主要的是，困在城中的10万犹太人所需的武器、弹药、食品甚至水，都要靠公路运输。而这条公路已被阿拉伯国家控制，如果不立即打通这条“生命线”，犹太人只能撤出圣城。

总司令部将这一重任授予26岁的上校团长拉宾。果然，他不负重托，率领部队打通了70公里的“生命线”，另外还开辟了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缅甸路”。

拉宾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胜利是1967年6月5日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当时拉宾任以色列总参谋长。6月5日凌晨，拉宾抱着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派出以色列空军200架战机中的188架，空袭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的机场，在第一攻击波后，便有189架埃及空军的飞机残骸在燃烧。到了中午11时，四分之三的埃及空军力量被摧毁，304架飞机化为灰烬，以军取得了绝对的空中优势。

在以色列空军展开闪电奇袭的同时，地面的坦克部队像甲壳虫一样开始行动，包围和歼灭西奈半岛上的埃及军队。以军仅用六天的时间，便重创埃及、约旦、叙利亚的军队。12日，以军空降兵控制了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制高点，结束了战争。以色列攻占了相当于本上3倍的领土，拉宾和国防部部长达扬成为世界军界熠熠生辉的优秀将领。

战争可以取得一时的胜利，但每一次的胜利后面，便有失败者更持久、更坚强的备战，长此以往，以色列这个小国，在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下，难免再遭“巴比伦之囚”的厄运。此时，拉宾又开始编织一个新的境，即通过外交手段，与某大国结盟，共同对付阿拉伯国家的联盟，这或许是保障以色列安全的好办法。从此，拉宾脱下军装，另觅通往和平的大道。

三部曲：外交生涯，为美国当“打手”

拉宾是穿着总参谋长的军装去见内阁总理艾希科尔的。据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艾希科尔总理听了拉宾的想法，装作受惊似地尖叫起来：“哎呀，快，伊扎克，快抓住我，别让我从椅子上掉下来。”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不适合担任外交官，外长埃维对此也不表态。在拉宾的游说下，以色列工党总书记、“老保姆”梅厄夫人支持拉宾，细细听取了他要求出任驻美国大使的理由。

以色列军队虽然在“六天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也产生了副作用。以军在战争中消耗了不少武器、弹药，法国总统戴高乐却下令中断对以色列的军火供应，苏联又在大张旗鼓地向阿拉伯、埃及、叙利亚等国援助先进的导弹和常规武器。美国总统约翰逊说过：“美国政府对解决中东问题的基本立场是：冲突的双方必须成为和平的双方。如果它们不懂这个道理，便很难想像它们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中东冲突的加剧和海湾国家的紧张形势，将影响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生产和出口，这便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希望中东和平的真正动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耀武扬威，势必导致紧张局势的加剧，约翰逊政府便认为以色列破坏和打破了他们的中东战略，他们停止向以色列供应军火，对在战争中损耗的弹药和零部件也不予补充。约翰逊政府希望苏联也停止向阿拉伯人出售武器，联手制止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苏联则毫不理睬，依旧大规模地补充阿拉伯人在战争中的损耗。这个危险的信号使以色列寝食难安。

美国总统约翰逊还提出了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五项原则：（一）承认每个民族的生存权；（二）公正解决难民问题；（三）制止中东的军备竞赛；（四）确保战时中东地区的通行权；（五）尊重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1967年11月22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出并通过了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

以色列玩弄了一个外交辞令上的花招。以色列外长说：“撤出被占领土，并不是从所有的领土上撤出去，那就需要阿拉伯方面与以方谈判。首要的条件是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并以条约的形式保证它的安全。”

阿拉伯国家则于1967年9月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会议。制定了与以色列“不讲和、不谈判、不承认”的“三不”原则。这使联合国的242号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但是总的形势和世界舆论都对以色列不利，尤其是美国中止对以输出军备的做法，无疑将极大地削弱以色列的国防力量。

拉宾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有一系列目标和计划。去美国走马上任之前，拉宾便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对美外交四个目标：（一）确保美国向以色列供应武器；（二）与美国协调有关的中东政策；（三）谋求美对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四）谋求美国运用其遏制力量防止苏联对中东的军事干预。

1968年2月，拉宾踌躇满志地到达华盛顿，但现实不容乐观。美国人只

关心越南战争，而约翰逊总统正被大选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没人关心以色列问题，美国人对拉宾的兴趣还是在“六天战争”上。他们好奇地问拉宾是怎样指挥打仗的，为什么小小的以色列能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战胜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军队。

拉宾从美国人对大选的关心程度，意识到美国总统的竞选，将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极重要的影响，他开始研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对中东和以色列问题的态度。

显然，约翰逊总统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已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无力自拔。约翰逊上台伊始便向美国公众许愿：“你们在越南作战的孩子们在圣诞节前便可回家与家人团聚。”人民报以欢呼，等来的却是失望，年复一年，美国士兵的尸体被塑料裹尸袋裹着，源源不断地运回来，人民的反战情绪日益强烈，对政府的信任直线下降。约翰逊的教训是：今后美国不能再为它的盟友轻易卷入冲突的漩涡中去，对于中东问题更要持谨慎态度。

拉宾只能寄希望于下届政府。

1968年6月4日，正在纽约的拉宾，从下榻旅馆的电话中，接到极有希望入主白宫的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竞选班子的一位助手的询问：您是否愿意与参议员肯尼迪在纽约大饭店中见面并留影？”拉宾略一思考说：“我非常愿意在参议员方便的时候去华盛顿与我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并有幸结识这位政坛上的明星。但我不习惯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以与人会见并拍照来结束这场会面。”

拉宾万万没想到，6月5日，即第三次中东战争周年纪念日，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一说为约旦人）西尔汉刺杀了罗伯特·肯尼迪，拉宾为此深感悲痛和遗憾。

共和党的竞选人尼克松在与拉宾的接触中明确表示：他支持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战斗轰炸机。

尼克松说：“如果我上台将保证坚决支持以色列，一上台就向以色列提供50架‘鬼怪式’飞机。我认为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可以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起一种平衡作用。”

民主党候选人汉弗莱的态度很含糊。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实质上折射出了超级大国对中东的争夺。苏联对美国施加压力：1968年9月4日，苏联向美国递交一份照会，提出以色列应执行242号决议，以色列军队应按时间表撤出被占领土的新建议。美国正式驳回了苏联的建议，指出：“各方以前签订的停火协议应由一个和平的现实所取代。242号决议呼吁撤退到安全和公认的边界，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边界就是1967年6月4日时的停火线。”约翰逊政府向苏联提出：“中东的和平只能随着各方面的谈判进程而实现……冲突的双方必须签订一个相互有约束力的契约式的协定。”

在大选的压力下，约翰逊政府在口头上宣布卖给以色列50架“鬼怪式”战斗轰炸机。当拉宾要求美方付诸实施时，美国开始踢皮球，国务卿推给国防部，美以双方开始了拖延性的谈判。

拉宾决定打美国犹太人的牌。他把美国政府的两面政策告诉犹太人领袖，这些一贯支持民主党领袖和组织的美籍犹太团体，立即掀起反对约翰逊政府的声浪，并扬言要将选票投到共和党人那边去。

1969年1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在中东问题上同意支持以色列。约翰

逊总统下令：立即无条件向以色列出售“鬼怪式”飞机。

五天以后，共和党的尼克松宣布就任总统。

拉宾担任驻美大使期间，最出色的表现是利用约旦危机，成功地加强了美以关系。这是美国与中东外交的转折点。

1970年9月，约旦国王侯赛因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尼克松，说约旦的军队遭到叙利亚空军和装甲部队的进攻，请求美国向以色列转达，望以派出空军攻击约旦北部的叙利亚军队。

约旦与阿拉伯国家原属同一同盟，侯赛因国王是同情阿拉法特和支持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在约旦领土上发展自己的力量。阿拉法特的游击队“法塔赫”和哈巴什的“人民阵线”的突击队，经常从约以边界渗透到以色列境内发动袭击，或者向以色列发射火箭，而在以色列的报复中受害的却是约旦，这引起了侯赛因国王和他手下的将军们的强烈不满。另外“法塔赫”和“人阵”成了约旦的国中之国，巴解负责人声称约旦首都安曼是“阿拉伯人的河内”。阿拉法特扬言说：“只要侯赛因国王让我们自由行动，他就可以一直坐在自己的王位上。”

巴解组织还枪击约旦王室成员的座车；哈巴什的“人阵”在安曼附近的机场上还炸毁了三架劫持来的外国班机，引起全世界的震惊。

侯赛因国王终于发火了，他下令出动坦克部队进攻巴勒斯坦人的营地，冲突中血流成河，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难民和巴解战士倒在血泊中。在阿拉法特的紧急求援下，叙利亚的空军和装甲部队杀过边境，猛揍侯赛因的军队。侯赛因在绝望中想起了阿拉伯人的天敌以色列，于是紧急求救于美国，美国又开始求以色列。

拉宾立即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逼问基辛格：“美国是不是建议由以色列来干这件事？”

基辛格无可奈何地点头承认：“是的，但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来进行这件事。”

拉宾便像一个精明的“阿巴贡”一样，开始与基辛格讨价还价；如果埃及因此而重新发动战争，美国要给以色列大力支持；假如苏联因此直接威胁以色列，美国要向以色列提供“保护伞”，并将此写入备忘录；此外，以色列还需要武器。拉宾的目的达到以后，以色列的军队集结到戈兰高地，拉开一副进攻的架势，一个装甲旅急驶向边界，尘土飞扬，足以让叙利亚军队心惊胆颤了。以色列的战斗轰炸机一架一架飞越叙军上空，呼啸而下，又飞快地翻身而上，完全是在示威。与此同时，美第六舰队的航空母舰驶往海湾东部海域，美国军官座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到以色列与以方军官们讨论协同作战计划。克里姆林宫慌了神，不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急令叙利亚停止行动。9月22日早上6时，叙军的装甲部队及时地撤回本土，一场更大规模的美苏直接对抗危机化解了。

以色列成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打手”和可以信赖的“盟友”。通过约旦危机，尼克松总统认识到在中东地区必须依靠实力与苏联打交道，外交开始向以色列方面倾斜。基辛格国务卿在9月25日打电话给拉宾说：

“我仅以尼克松总统的名义向梅厄夫人致意。总统永远不会忘记以色列在防止约旦局势恶化以及粉碎推翻约旦政府的企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总统说美国对在拥有像以色列这样的盟友深感荣幸，美国在未来的事态发展中会充分考虑这一点。”

1973年3月10日，拉宾的驻美大使任期将结束，2月28日，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访问华盛顿。3月1日，尼克松在梅厄夫人面前大大地称赞了拉宾一番，又说：

“为了表彰你在美任大使期间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我送给大使先生一件刻有我本人签字的白宫纪念品，作为送给大使先生的生日礼物。”

拉宾连连表示感谢。

尼克松笑着问梅厄夫人：“拉宾先生回国后你们将给他个什么职位？”

梅厄夫人神秘地回答：“噢，那要看他的表现如何了。”

尼克松开心至极，调侃说：“那好啊，要是你们不想要他的话，把他留在这里好了，我愿意用他。”

五年的外交官生涯，为拉宾日后步入政界提供了极有益的帮助，他懂得坚定的目标，有时可以通过灵活的策略和机敏的大脑来实现。但外交官的阅历，也使拉宾明白了一个真理，以色列不过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平衡中东问题上的一枚棋子，中东的和平完全是由美苏在这一地区保持必要的均势战略决定的。被别人操纵的和平之途是不可靠的，要使以色列和阿拉伯民族长期共处下去，真正的和解之途、民族生存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此，他开始步入“三部曲”的第三“乐章”：做一名政治家，从根本上解除阿以矛盾，追求和平之路。

三部曲：政治生涯，问鼎与受挫

1973年3月11日拉宾回国。

他满心喜悦，迎来的却是兜头一盆凉水，工党的领袖们资深阅厚，他只有更努力地工作，才能在竞选中崭露头角。但是他在竞选中排名第20位，对他来说当个部长都是十分遥远的目标。

10月6日是犹太教的赎罪比从日出到日落，犹太人都不能进食、不能喝水。而就在这一天下午2时，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以色列工事上，“轰隆——轰隆——”两声巨响，埃及士兵悄悄埋设的炸药爆炸了，紧接着2000门埃及大炮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了。20分钟的突然袭击中，埃及的200架米格超音速飞机发出巨大的轰响，飞越苏伊士运河，袭击以军的阵地，西奈的指挥系统、空军指挥部、雷达干扰中心、导弹营、炮兵阵地一片火海。以军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目标均被击中，遭到重创。45分钟后，埃及的士兵便在运河东岸登陆，一举突破了“巴列夫防线”。接着埃及人在运河上架设了10座浮桥和50个门桥渡场，战斗打响24小时后，埃军1000多辆坦克、1万多辆汽车和10万军队完成了渡河任务。与此同时，叙利亚在北线的三个师的兵力，在1000辆坦克、1500门大炮和100架飞机的掩护下，向以色列戈兰高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叙以双方共动用1500辆坦克展开大战，叙军伸入以军停火线75公里，重创以军。

以色列的应变能力很强，这不是一个能被轻易击倒的民族。军方制定集中兵力、先北后西的作战方针，动用10万兵力和坦克500辆，分数路向叙利亚境内突入30多公里，距大马士革只有30公里，着实让阿萨德总统惊出一身冷汗。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国军队联合作战，才将以军阻挡在大马士革以西的萨萨。以军及时调整战术，把13个旅的兵力调往西奈对付埃及；又偷渡运河，摧毁了埃军的导弹阵地和高炮阵地，并切断埃及第三军团的供应线。10月24日，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终于停火了。

第四次中东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阿拉伯人仅用了六年

的时间便从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并给了以色列重重的一击。共有 2550 余名以色列士兵在此次战争中阵亡，是“六天战争”死亡人数的 2.5 倍，再发生战争会流多少血，死多少人，谁也说得不准。残酷的现实迫使以色列的政治家们重新进行思考。

以色列在战争初期的惨败，使国内人民对工党政府的不满一下子达到了顶点，国防部部长达扬成了“替罪羊”，内阁中一些阁员也纷纷指责达扬，与反对党一起，要求达扬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梅厄夫人要求达扬和佩雷斯入阁，遭到两人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梅厄声称让拉宾出任国防部长。很快达扬和佩雷斯入阁，拉宾只被任命为劳工部部长。1974 年 4 月，梅厄夫人在内阁成立一个月时便辞职了，拉宾也下了台。但是，这给了拉宾新的希望，他雄心勃勃，开始问鼎总理的职位了。他与佩雷斯进行角逐，4 月 22 日，拉宾以 298 票对 254 票的微弱多数战胜佩雷斯，成为新一届的内阁总理。

1976 年 6 月 27 日星期六的早晨，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本格利恩国际机场，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139 次大型飞机，载着 245 名乘客，直冲蓝天，飞向雅典。中午时分，飞机徐徐降落在雅典机场以后，下了 59 名乘客，上了 56 名乘客。飞机又腾空而起，在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空后，便与地面失去了无线电通讯联系。

“139 次班机失踪了。”客机上以色列国籍的乘客占 83%，机组人员占 12%。这一消息在以色列政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下午，以色列内阁召开例会，一份报告送到内阁会议上。运输部长雅克比拿起报告：

今天上午 8 时 55 分，载有多名以色列乘客的法国

“空中客车”139 次班机，由本格利恩机场起飞后，飞往希腊首都雅典，然后并没有飞往目的地巴黎，而是向南飞行，之后便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雅克比脸色大变，立即将报告交给拉宾总理。

拉宾对此类事情很有经验，他眉头紧锁，判断说：“139 次班机不是坠落，便是被劫持了。如果是劫持，那一定是冲着以色列来的，如果真是被动持，必须尽快搞到情报。”

内阁立即成立了以拉宾总理为首、由国防部长佩雷斯、运输部长雅克比、外交部长阿隆、法务部长查德克、不管部长格里里和总参谋长格尔组成的危机对策委员会。

最初的情报显示，139 次班机已降落在利比亚的班加西机场。指挥这次劫机行动的是国际恐怖集团领导人瓦迪阿·哈达德，他是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过激派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的同党。

哈达德一贯持恐怖主义立场，多次策划劫机。1972 年 5 月，他曾指挥劫持了比利时航空公司的一架喷气式客机，并令飞机示威性地降落在以色列本格利恩机场，以乘客为人质，要挟以色列政府。以色列一方面假意与劫机犯谈判，一方面派遣特种部队展开解救行动，打死、打伤恐怖分子三人，救出了 97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但狡猾的哈达德并不在飞机上。

6 月 28 日凌晨 3 时，国防部长佩雷斯接到来自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恩德培机场的情报：139 次班机降落在那里。劫机是哈达德策划的，他本人在索马里遥控指挥。劫机主犯是巴解人民战线激进派的三名游击队员和一男一女两名德国人。主犯是贾贝尔，1973 年 12 月曾在意大利罗马机场指挥袭击潘

纳姆航空班机，制造了一起导致 35 人死亡的恶性事件。

6 月 29 日 劫机的游击队员通过乌干达广播电台要求释放各国在押的 53 名恐怖分子。游击队在声明中还声称：如果在以色列时间 7 月 1 日下午 2 时还得不到答复，将枪杀人质，炸毁客机。

7 月 1 日下午，乌干达电台广播说：

“ 游击队决定单方面将最终答复时间延迟 72 小时、改为 4 日下午 2 时。……游击队决定释放 101 名人质，只扣押 60 名以色列人、22 名法国人、10 名双重国籍人及 12 名机组人员。 ”

拉宾总理反复权衡谈判和军事行动的利弊，决定以军事行动解救人质。拉宾的老朋友、国防部长佩雷斯说：“ 如果以色列屈服于游击队，以色列的威信将一落千丈，国家的生存就有危险。 ”

拉宾就解救人质计划反复与内阁成员进行磋商。在 7 月 3 日下午的内阁紧急会议上，拉宾以极大的勇气对内阁成员说：“ 如果行动失败，总理自己将承担一切责任。 ”

此时，四架大力神运输机正飞过西奈半岛南端，伪装成民航班机番号，在民航航线上飞行。飞机关闭了无线电，保持编队飞向乌干达。在飞越红海时，飞机贴着海面超低空飞行，以避开阿拉伯的雷达监视。连续飞行了 7 个小时之后，机群于深夜 11 时左右抵达恩德培机场上空，并陆续降落在跑道上，一号机在旧候机楼前停了下来。突击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击毙守候在旧候机楼下的一男一女两名德国人；在冲进大厅时又用暴雨般的子弹击毙了另两名游击队员，整个大厅内的交战只用了 1 分 45 秒。其余突击队员在其他地方也击毙了三名游击队员，此时乌干达警卫部队开火了。以色列突击队把恩德培机场上的 11 架米格飞机一架架炸飞，另一队突击队员拆除了苏制雷达装置，并炸毁了雷达中心。11 时 54 分，搭载人质的二号机比预定时间早两分钟起飞；最后一架飞机零时 30 分飞离恩德培机场的跑道，完好无损。乌干达的机场上燃起熊熊大火，将半边天映得通红，像在用节日的焰火欢送以色列的勇士们。被救的 106 名人质中，在战斗中死了三名，一名去向不明，共有 102 人生还，其中 11 人负伤。以色列的特种行动部队只牺牲了营救指挥官纳塔尼雅夫中校。这是无懈可击的空前胜利。拉宾用他的铁拳，回击了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的游击队员；但这只能加深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仇恨，复仇行动将无休止地继续下去，还有血、泪要流。通过强硬的军事行动，拉宾逐步意识到只有化解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仇恨，化干戈为玉帛，才能得到持久的安定与和平。拉宾在担任总理期间，大力扩充军备，以便对付四周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威胁。以色列的军事实力迅速增加：飞机数量增加了 30%；坦克增加了 50%；自行火炮增加了 1 倍；装甲运兵车增加了 700%。而以色列的经济形势却急剧恶化，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议会对政府和内阁的不满情绪引起了政潮。

1976 年 12 月的一个星期五的黄昏，拉宾和内阁几位部长齐集某空军基地，迎接从美国飞来的一个中队的 F-15 型战斗轰炸机。这种飞机只卖给以色列，连最富有的沙特阿拉伯人也买不到。飞机在进行了飞行表演后，开始鱼贯降落在跑道上。军乐队奏起了欢迎曲，拉宾和阁员们以及将军们走向飞行员，简短的欢迎式后，夜幕降临，他们便坐车回城。此事成为拉宾下台的前奏曲。

在中东的三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礼拜日都在周末，基

基督教在星期天，犹太教是星期六，穆斯林是星期五。但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从星期五日落算起，到星期六晚上天空中出现第一颗星星为止。按犹太教教规，人们在安息日是不能进行非宗教活动的。

议会就拉宾内阁出席迎接飞机仪式一事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拉宾政府有意违反“安息日”教规，由此对内阁提出了不信任案。议会在投票表决时，不信任案超过半数被通过。处于窘境的拉宾宣布解散议会，并于次年5月实行大选。拉宾的做法，给反对党以口实，一时反对本届政府的呼声日益强烈。不久，拉宾夫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被《国土报》曝光，这在以色列是不允许的，尽管只有2000美元。拉宾夫人莉赫被法庭处以25万以色列镑的罚款，约合2.4万美元。

1977年6月21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袖梅纳赫姆·贝京在大选中获胜，拉宾下台了。

在中东地区，寻找和平之路的政治家并非只有拉宾一个人。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埃以关系上也勇敢地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他做得并不比拉宾逊色。

1976年10月9日，拉宾率以色列代表团秘密访问了摩洛哥王宫。拉宾的目的是请哈桑二世国王说服埃及总统萨达特与自己进行秘密会晤。哈桑二世与以色列和萨达特都有良好的关系，当他向萨达特转达拉宾的请求时，萨达特拒绝了。

拉宾并不死心。1977年5月，以色列情报部门得到报告，在距埃及35公里的利比亚的一个丛林中，有一个卡扎菲的敢死队训练营地，这是在克格勃帮助下设立的，目的是要在埃及革命纪念节时刺杀萨达特总统。（卡扎菲认为萨达特是阿拉伯人的“叛徒”，准备与以色列讲和，因此要除掉他。）

拉宾想将这一情报通知萨达特，以打消萨达特的顾虑，使他尽快地与自己会晤。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5月17日，贝京上台组阁，接过了这份“厚礼”，将这一重要情报交给埃及。萨达特开始考虑以色列的建议了。尽管埃及和以色列还处于敌对状态，他仍决定对那路撒冷进行一次私人访问。1977年11月，萨达特在人民议会上宣布：为了和平，他愿意到以色列的议会大厅去。17日，美国驻埃及大使将一份贝京总理的邀请信转交给萨达特总统。

11月19日傍晚，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场上，一架标号01的埃及波音707客机，在成千上万翘首企盼的人们的等待中，降落在跑道上。停机坪旁，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内阁成员整齐地排成一排。舱门打开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萨达特笑容满面地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这一动作，使许多埃及、以色列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埃及《金字塔报》记者胡亚德记述了这一场面，他说：“这比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还要了不起！”这一历史性的镜头，被美国人用10万法郎买走。

拉宾也参加了欢迎萨达特的行列，他后来写道：

我承认，当我站在等待萨达特总统飞机着陆的行列中时，我心中萦绕着一种奇特的感觉。诚然，我参加过1949年同埃及的谈判，但后来发生的事件更加强了我年轻时的想法：埃及是我们的敌人。虽然我任总理时，我们曾尽一切努力去促进和平，可是我不能不说，我真想不到这位埃及国家领导人会这么早就公开地访问以色列，而且我们是以极其盛大的正式的礼仪来欢

迎他的。当飞机滑行到欢迎人群的集中地段时，机舱门开了，在机场等候的人们，心情顿时紧张起来。当萨达特总统出现在舱门口、走下舷梯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达到我过去认为不可能的高度。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无比激动的时刻，这是人们所要求的标志着新的时代的时刻。当以色列军乐队奏起两国国歌，尤其是当萨达特总统随着他的卫队检阅以色列三军仪仗队的时候，我仿佛进入梦境。尽管我耳闻目睹这一切，但发生在我周围的一切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

的。萨达特的声音在以色列议会大厅中响起：“你们愿意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的这个地区，那么我十分真诚地告诉你们，我们欢迎你们同我们在一起。”以色列人听后都流下了渴望和平的泪水。拉宾认为：“一位曾和以色列兵戎相见的阿拉伯领导人站了出来，声称他理解我们对安全的需要，因而必须找出办法满足我们的合法权益。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被看作一场地地道道的革命。”1984年9月至1990年，利库德、工党组成联合政府期间，拉宾出任国防部长。拉宾在镇压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时，充当了丢人现眼的角色，遭到全世界正义舆论的谴责。在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反抗与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87年12月8日，巴勒斯坦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为死难者送葬活动，当以色列派出军队镇压时，数百名巴勒斯坦青年用石头进行还击。冲突加剧时，拉宾悍然宣布要对扔石头的人“尽可能狠狠打击”。他的“铁拳政策”导致的可怕后果是，巴勒斯坦人大批被以军驱逐到约旦和黎巴嫩，而黎巴嫩的右翼势力对2000名手无寸铁的难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这场屠杀中，死亡人数达800人以上。

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在以色列引发了35万人参加的前所未有的反政府大游行。警察向群众投掷了手榴弹。一名参加过“六天战争”的后备役伞兵当场被炸死，很多人受伤。

拉宾执行“铁拳政策”的结果是，从1987年到1992年，有1775名巴勒斯坦人在扔石头时被以军开枪打死。以色列政府受到全世界包括支持它的美国人的抗议与谴责。

上帝将和平之手指向拉宾。

1992年，又是以色列的大选年。

以色列工党二号人物拉宾在党内竞选中击败了佩雷斯，再次当选为工党领袖和总理候选人。

拉宾的竞选对手是利库德集团，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现任以色列总理、枯瘦矮小的沙米尔也很有信心地出现在特拉维夫的投票站，向支持他的选民热情地打招呼，并走到他们中间一一握手。

6月22日晚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在丹·特拉维夫工党总部，挤满了等候大选统计结果的工党党员，他们彻夜不眠，期待胜利消息传来。

这场好戏的主角拉宾却意外地不在现场，他似乎在等候压轴戏的来临。

激动人心的消息终于传来了，工党在大选中获得44席，利库德集团仅获32席，拉宾以12席的优势稳操胜券。

工党党员和支持者们欢呼雀跃，互相拥抱，激动地庆祝他们的胜利。

拉宾姗姗来迟了，70岁的拉宾神采奕奕，蓝而明亮的双眼充满着胜利的喜悦，红红的脸，银白色的头发，领袖的风范依旧，但显得更老练持重。他

身穿黑色暗条的英国高级花呢西服，这位传奇式的人物的出场，给整个以色列、整个阿拉伯国家、整个中东带来了和平的新曙光。

他以特有的浑厚、底气十足的男低音，像朗诵般地对众人说：“鲜血和泪水流淌得太多、太多了！我决心为和平而战。今后工党政府将以推进中东的和平进程为纲领，致力结束阿以冲突，这是政府一切工作的首务。”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拉宾的就职演说极为精彩，他声情并茂，引用了以色列著名诗人肖尔·切米柯夫斯基的诗句：“尽管目前看来还很遥远，我确信，在将来国与国之间出现平静和相互祝福之际，和解的日子就会来临了。”

他向议会建议：以后不要再用“和平进程”这个用了10年而和谈却毫无进展的词了，他提出今后使用“实现和平”这个词，以便更清楚地表明以色列的诚意。他呼吁阿拉伯领导人以埃及前总统萨达特为榜样，大胆地迈出和平的步伐。

拉宾说：“我将邀请约旦国王、叙利亚总统和黎巴嫩总理到以色列议会来发表演讲。我自己随时去这些国家讨论实质性的问题。”

他向巴勒斯坦人呼吁：“听我的话，哪怕就这一回。我们从目前的立场向你们提出最公平和最可行的建议——自治——一种有利的和有限的自治。你们不会得到最想要的东西，可能我们也不会。不要失去这个可能去而不返的机会。”拉宾警告巴勒斯坦的那些好斗分子不要在谈判期间轻举妄动，否则他们的暴力及恐怖活动将遭到严厉的打击。拉宾的和平呼吁如一石击水，引起阿拉伯方面的反响，世界主张和平的国家纷纷表示欢迎。埃及外长穆萨说：拉宾的倡议引起了某种程度的乐观情绪。不久，埃及便邀请拉宾正式访问埃及。出席中东和谈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女发言人阿什拉维认为：拉宾的倡议是令人鼓舞的。

战争使以阿双方都认识到：战争只能导致痛苦、灾难、死亡和仇恨，唯一的选择是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和平与合作。

拉宾的和平行动包括：

（一）宣布冻结100多个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和为以色列新移民建造的6000套住房工程；（二）派遣军警阻止犹太移民在被占领土上的建房行动；（三）驱逐前总理沙米尔执政时，在耶路撒冷强占并强建的新居民点上的以色列人。

拉宾保证：在1993年允许巴勒斯坦人选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自治机构；答应五年后就被占领土的最终地位进行谈判。

拉宾还表示：以色列政府准备修改和废除不准与巴解组织接触的法令；不再反对东那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参加中东和谈。9月10日，拉宾在一次讲话中首次表示，以色列从戈兰高地部分撤出是可能的。

前总理沙米尔指责拉宾廉价拍卖了以军将士用鲜血换来的戈兰高地。9月14日，数百名来自戈兰高地的定居者在议会大厦前举行示威，反对拉宾政府把他们的居住地归还给叙利亚人

的计划。在工党内部，拉宾和平政策的阻力也很大。

在拉宾强大的和平攻势下，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意见开始出现分歧。埃及、约旦认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叙利亚、黎巴嫩和巴解组织认为拉宾的政策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拉宾则充满信心他说：“我认为，

我们在 1993 年是会达成一项协议的。即使不能与所有的阿拉伯代表团达成协议，也会与某些代表达成协议。”

中东和谈经过了 10 轮的艰苦谈判，双方矛盾的焦点集中在那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人自治两大问题上。

1992 年 9 月 2 比拉宾提出建立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

“联邦”的主张。拉宾解释说：

“我十分重视就巴勒斯坦实行自治和过渡时期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但我不排除与他们联合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巴勒斯坦和约旦组成了联邦或邦联，将能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发展权利。”

11 月 17 日，外长佩雷斯将拉宾的建议具体化，提出了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管理四分之一的被占领土的方案。

但与巴勒斯坦人和解的真正魔障却来自拉宾自己。一个星期以后，拉宾声称：

“我认为阿拉法特是和平的一个障碍。我没有说巴解组织，因为我们认为那些在突尼斯的巴勒斯坦人要比他更讲求实际一些。”

这一对仇敌之间的仇恨和偏见实在太深了，几十年来，谁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这一梦想在双方心理上形成了极大的障碍。阿拉法特毫不示弱，立即劈头盖脸地回击拉宾：

“我认为，我并不是和平的唯一障碍。拉宾也是中东和平的

一个障碍。我们两人都有责任会晤，来共同排除这些障碍！”他讥讽道：

“拉宾先生是个聪明人，但他通常仍然用体力而不是脑子来考虑问题。”

1992 年 12 月 13 日，以巴双方冲突升级了。以色列边防警官尼希姆·托勒丹诺少校被巴勒斯坦人绑架，拉宾政府立即表示愿与绑架者进行谈判。但 15 日清晨，人们在一条公路旁发现了警官的遗体。此前，巴勒斯坦敢死队对以色列士兵袭击事件频频发生，枪手们在急驶的车辆中对以色列的巡逻吉普车射出疾如暴雨般的子弹，先后有六名以色列军警被打死，多人受伤。

拉宾杀戒大开，盛怒之下，他差点毁了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在他的命令下，以色列军警在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大肆逮捕了 1600 多名巴勒斯坦人。

12 月 17 日，以色列政府六辆大客车开到黎巴嫩南部以色列自行宣布的“安全区”和黎巴嫩政府军控制区之间的隔离地带。车门大汗，415 名巴勒斯坦人被虎狼般的以色列士兵驱赶下车，“驱逐出境”。这些人被赶入黎巴嫩政府军控制区，他们高举着《古兰经》向黎巴嫩哨所前进时，黎军以枪口将他们逼回去。当他们再准备进入以色列“安全区”时，以色列士兵开始向他们鸣枪，这些无家可归的可怜的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中的难民”，在凄风冷雨中饥寒交迫、瑟瑟发抖。此次被驱逐的难民人数六倍于以往五年的总数。

18 日，愤怒的巴勒斯坦群众再掀反以风暴，以色列军警枪声大作，六人被打死，30 多人被打伤，以军的暴行令国际社会感到愤怒。当天，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谴责以色列驱逐行动的 799 号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欧洲共同体、阿盟和非统组织都发表了声明，强烈要求以色列取消驱逐令，并把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接回家园。一向支持以色列的美国政府对此亦感到厌恶，国务卿伊格尔伯格也谴责了以色列的行径。

尽管拉宾还在硬撑，声明绝不会改变这一驱逐决定，甚至不准国际红十字会取道以色列为被驱逐的难民运送食品和药品，但是他的外交部长佩雷斯承认这件事损害了以色列的形象，副外长伊巴伊公开批评拉宾政府的这一非法行动。

拉宾内外交困，他必须摆脱这个巨大的危机与困境。

就在这个困难时期，拉宾的死对头。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向拉宾伸出了手。关键时刻，拉宾在迟疑中也伸出了手。

接触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993年1月，在冰天雪地的北欧挪威奥斯陆，挪威外交大臣霍尔斯特在炉火熊熊的家中坐立不安，他焦急万分地等待着。终于消息传来，两架班机分别降落在挪威两个机场上。在奥斯陆南方80公里外的一座名叫保尔高德的庄园中，巴以面对面的和谈开始了。挪威外交大臣霍尔斯特是东道主，巴以代表在他的庄园中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谈判。

这年8月，拉宾直接指挥谈判了。为了严格保密，谈判地点经常变换，过关斩将，整整14轮，终于双方都松下了一口气。8月20日深夜，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帕克路45号外交部大楼一个小型会议室中，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巴解和谈代表阿布·阿拉和挪威外交部官员欢聚一堂，大家共同举杯，为以巴和平协议草签举杯同饮，在胜利的喜悦中，代表们的眼中都泛出喜悦的泪光，盼望了多年的一刻终于来到了。8月29日，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内阁会议上，拉宾总理与外长佩雷斯交换了一下眼色，向内阁宣布：经过多轮秘密谈判，佩雷斯外长已于8月20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同巴解组织代表阿布·阿拉草签了秘密协议，在被占领土上的加沙和杰里科地区给予巴勒斯坦人有限的自治。佩雷斯向目瞪口呆的内阁部长们详细汇报了整个谈判的过程以及达成以巴协议的要点。部长们都有一种被总理和外长欺骗了的感觉，心中都是五味坛子打翻，酸甜苦辣涌上心头。但是内阁还是理解了拉宾的做法，佩服他的伟大创举。这又是一个萨达特式的惊人之作，同时也有人心头掠过不祥的阴云：萨达特在与以色列和解四年之后，在10月6日开罗举行的庆祝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胜利8周年活动中，在阅兵式上，被他的一名士兵、一个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刺杀身亡。等待拉宾的命运又是什么？

8月31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以巴协议草案。9月9日，以巴相互承认。

1993年9月23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主持下，拉宾和阿拉法特在以巴协议上签字，当对抗几十年的对手站在一起，微笑着相互握手时，人们不禁回想起已故埃及总统萨达特墓碑上的铭文：是战争的英雄，是和平的英雄。

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对中东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决定将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他们。12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市政厅，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塞叶尔斯泰德向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颁发了奖章、证书和奖金。他们就今后的目标和中东和平进程表明了各自的决心。挪威国王和王后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成就表示祝贺。

中东和平死了？

拉宾的事业由于他的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凶手是一名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头发卷曲的犹太年轻人，名叫伊加尔·阿米尔，27岁，是特拉维夫郊外的巴尔·伊兰大学法律系的三年级学生。他属于被取缔的犹太极右组织卡赫运动的分支机构埃亚

尔。他坚决反对以巴和谈，认为拉宾与阿拉伯人搞和平运动是出卖了以色列的利益，是犹太民族的“叛徒”。每当他听到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士兵、居民的事件时，他都怒不可遏，发誓要把这一切记在拉宾和他的政府的账上。

阿米尔的哥哥哈加伊参加过犹太极右组织“大卫之剑”，这也是一个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他向阿米尔提供了一支雷塔牌左轮手枪，并精心改装了子弹。他在弹头上加了一个铁丸，并在子弹上钻了一个孔，成了一枚达姆弹，一旦击中目标，子弹将在体内爆炸，导致大量出血而置人于死地。

充满仇恨和罪恶的子弹，一颗打在拉宾的脾脏上，一颗击中了脊椎。阿米尔被俘后，在法庭上竟十分坦然，听到拉宾的死讯后，他对法庭说：“我感到满意。”

据警方报告：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拉宾遇刺一共有三名主谋，除阿米尔兄弟外，还有一名名叫斯戈尼克的23岁的以色列男子。警方陆续逮捕了四名嫌疑分子，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参加了这起谋杀案。

后来，随着案情的深入，有迹象表明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卷入了这起谋杀事件。

拉宾夫人莉赫在拉宾的葬礼上泪如雨下，她说了一句令所有人伤心至极的话：“他躺在地下会是什么模样？”

今天，令更多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伤心的是：“一个早晨醒来，拉宾已经死了，中东的和平进程为此而受阻！”

拉宾死后不久，以色列举行大选，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取代了工党的佩雷斯，当选为以色列的内阁总理。1993年拉宾与阿拉法特签署的以巴和平协议已成为他们之间的事情，而不是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协议。内塔尼亚胡坚决反对以土地换和平，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反对开放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

内塔尼亚胡认为，中东和平进程的最大障碍，是与巴勒斯坦相关的恐怖组织和恐怖主义。只有镇压了恐怖行动，保障以色列人的人身安全，才能有真正的中东和谈。

拉宾死后，以阿关系陷入了僵局，和平的空气日益为恐怖氛围所代替，冲突事件不断发生，不断升级，以阿双方因清真寺事件导致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血和泪还要流多久？拉宾的和平事业不会因为他的死而毁于一旦，民族间和睦相处也许还会像不死的凤凰一样展翅高飞的。

绞架下的祈祷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政治谋杀案

“死在安拉的道上不是死亡”

1979年4月4日清晨，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监狱，一座单人牢房的铁锁“哗啦”一声打开了。监狱长带着狱警跨了进去，恭恭敬敬地对面前的一位重要犯人说：“时候到了，请吧，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先生。”布托在被捕前是巴基斯坦总理。他闻声慢慢地站了起来，整了整身上的西装，像平常上班一样，仔细地梳了梳他的头发。狱警反缚了他的双手，他昂着头出了牢房，坦然地走向刑场。

当布托走过身边的牢房时，铁窗前齐集的犯人，一起为他祈祷，念起了《古兰经》，愿他的灵魂早升天堂。

刑场上是一个高大的绞刑架，当刽子手将绞索套在布托脖子上时，他突然哀伤地喊出最后一句话：

“真主！救救我吧，因为我是个无罪的人！”

随即，他的身体离开了地面，身躯痛苦地扭动着，一会儿，便开始僵硬。半小时后，一切归于平静，一个伟大的人离开了苦难的人世。

他拯救了破碎的祖国 1971 年前，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还是一个国家，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和穆吉布·拉赫曼的人民联盟分别是巴基斯坦第一和第二大党，拉赫曼的人民联盟主要是代表东巴基斯坦的利益。而在更早的时候，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都属于英王统治的殖民地之一——印度的版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受到民族解放浪潮的猛烈冲击，答应将印度移交给印度人管理，决定成立临时政府。印度是个多种族的国家，这个国家中印度教徒最多，其次是伊斯兰教徒。在临时政府的选举中，以真纳为首的穆斯林对选举结果不满意，于是坚决主张分而治之。真纳将 1946 年的 8 月 16 日定为建立巴基斯坦穆斯林国家的“直接行动日”。到了那一天，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教徒们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仇杀，从加尔各答到达卡，三天之中有 5000 人死亡，2 万人受伤，10 万人无家可归。

1947 年 5 月 3 日，英国新任总督蒙巴顿抵达新德里后，面对眼前动荡的局势惊呼：“如不迅速采取行动，一场内战即将爆发。”于是蒙巴顿提出了印巴分治的方案，即将印度分为印度教徒的印度斯坦和伊斯兰教徒的巴基斯坦。印巴分治后，巴基斯坦在地理上是相隔 2000 公里的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中间隔着印度。东巴较小，有 1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人口众多，孟加拉族人占 98%，通行孟加拉语；西巴土地广阔，约 80 万平方公里，人口较少，通用的语言是乌尔都语。

1971 年，巴基斯坦总统为军人叶海亚·汗，他要求拉赫曼的人民联盟和布托的人民党进行磋商，在四个月内制定宪法，否则，便要解散议会，实行大选。

布托从西巴飞到东巴的达卡，与拉赫曼谈判，希望能制定一部两方都能接受的宪法，并维护国家统一，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权。而拉赫曼却坚持实行东巴基斯坦全面自治，希望依靠印度的力量从巴基斯坦分裂出去。

正当布托在达卡与拉赫曼磋商之际，3 月 26 日，叶海亚·汗出动军队，对拉赫曼的东巴人民联盟实行军事镇压。一时间火光冲天，枪声震耳，士兵和坦克包围了电台、报社，开始了屠杀。600 万孟加拉难民逃向邻国印度，拉赫曼成了叶海亚·汗的阶下囚。

西巴军队在东巴的疯狂行动，给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一个借口，她打起“建立共同秩序，使不断逃亡到印度的难民能回家园”的旗号，于 1971 年 12 月 3 日，发动了第三次印巴战争。印军分东西两路向东巴和西巴发动了进攻，飞机和坦克隆隆地越过边界，狂风暴雨般地猛击巴军，一天之中，达卡机场受到印度空军多次摧毁性的打击，东巴的空军基本被消灭了。印度陆军迅速向前推进，坦克像旋风一样，横扫巴军的防线，很快巴军便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叶海亚·汗总统虽是军人，此时也慌了手脚，难以招架，急忙去向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布托求救，希望他立即前往联合国，要求安理会制止印度对

巴基斯坦的侵略。

12月9日，布托以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率巴基斯坦代表团飞往美国纽约。在安理会大厅中，布托慷慨陈词，向参加会议的100多个国家的代表揭露印度的侵略行径，要求联合国立即制止印度的侵略行为。美国和刚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权利的中国等许多国家投票谴责印度，敦促印巴实行停火，以免东巴分裂出去，导致苏联势力称霸南亚次大陆。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代表马立克动用了否决权，使安理会意见无法达成一致。布托与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皮埃尔饭店紧急磋商。

12月11日，东巴基斯坦军队面临着数倍于自己的强敌，岌岌可危。布托接到报告：“军队最多还能坚持36小时。”布托一面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接触，希望中国出面干预印度的进攻；一面要求美国向苏联施加压力；同时紧急致电叶海亚·汗总统，要求军队坚持抵抗，并要求叶海亚·汗在西巴开辟西部战场，以减轻东巴部队的巨大压力。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黄华打电话告诉布托：“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巴基斯坦。”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直接打电话给布托：“美国十分担心中国站巴基斯坦一边进行军事干预。”基辛格直接越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与中国代表团交换意见。

12月12日，布托又紧急呼吁安理会通过决议，向巴基斯坦派遣联合国部队，英、法等国投了弃权票，苏联投了否决票。

布托焦急与悲愤的心情溢于言表，他激动地对英、法代表说：“你们或站在正义的一边，或站在非正义的一边；或站在侵略者一边，或站在被侵略者一边。根本不存在着中立，你们应该表明立场。”

联合国大厅的讲坛上，再次响起布托愤怒的声音：“你们想强行做出决定，制定一个比凡尔赛协议更糟的协议，使侵略合法化。我不想参与这一切。好了，你们要你们的安理会吧，我告辞了。”说完，他率巴基斯坦代表团退场。

12月16日，布托一行启程返回巴基斯坦。他说：“即使我们在军事上在达卡失败，我们也不能成为政治上投降的一方，我要通过退出联大会场表明：尽管我们的物质被摧毁，但我们的意志和自尊却不能被毁灭。”

12月16日，被包围在东巴达卡的巴基斯坦军队向印军投降。消息传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便欣喜若狂地赶到新德里的议会大厅，眉飞色舞地宣布：“现在达卡已是一个自由国家的自由首都了。”随即，印度宣布承认孟加拉国独立。

17日，印度在西线宣布停火。随之而来的，便是叶海亚·汗军人政府在巴基斯坦全国的谴责声中垮台。12月27日，作为议会中席位最多的党——人民党党魁的布托自然成了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

在困难的局面下，布托毅然担负起了重振国家的重担和责任。上台一个星期后，他下令释放以穆吉布·拉赫曼为首的原东巴领导人。

为建立民主而奋斗

1972年6月28日，布托总统肩负着全体国民的重托，前往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西姆拉，与英迪拉·甘地总理进行谈判。

当直升飞机在雪山的云雾缭绕的迷茫中飞行时，布托眼前也是一片茫然，吉凶难测。自己的国家即西巴基斯坦5000平方公里的领土仍被印度军队

控制着，9.3 万名战俘还在印度军手中。印巴谈判，恰似一个囊空如洗的人和—个腰缠万贯的人进行一场赌博，只有凭机敏的大脑和多年的外交经验来玩这场“游戏”了。

英迪拉·甘地已在机场上恭候。这位南亚次大陆最大国家的总理，身披纱丽，晚风拂起她额前一缕白发，阴鸷的目光死死盯着布托，俨然是一位战神。

布托却以和平使者的形象出现，以争取舆论的支持。

这完全是一场胜者对败者的清算。印度总理的清单上列出长长的一串——领土问题、战俘问题和印巴间长期遗留下来的克什米尔问题——要求在谈判桌上一揽子解决。

布托却坚持认为，三个问题，应按阶段、分步骤逐一解决。

英迪拉·甘地像猫戏老鼠一样在捉弄她的对手，她知道布托的地位和处境：一个支离破碎、百孔千疮的国家的新当选的总统，是带着巨大压力来到谈判桌前的、如果他不答应印方的要求，不在谈判协议上签字，空手而回时，迎接他的将是什么？这是可想而知的。

布托则认为：“我宁可空手回到巴基斯坦，也不能带回一个印度强加给我们的协议。我宁愿使巴基斯坦全国的愿望破灭，也绝不能带回一个出卖祖国的协议。”

经过四天的艰苦谈判，双方针锋相对，分歧很大，怎么也谈不到一块儿，而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中断了。布托决定次日启程回国。

7月2日下午，布托要去向甘地总理辞行。午饭后，他躺在浴缸内，水温已达到几乎不能忍受的烫人地步，全身皮肤被蒸得通红，大汗淋漓；凉水一激，全身汗毛孔猛烈收缩，头脑却一下子清醒过来。他决心利用这次礼节性的会见，再向印度“管家婆”作一次最后的努力。

布托笑容可掬，但有备而来。他发现，英迪拉·甘地总理脸上尽管是一种不在乎和得意的神情，但这是装出来的，她也在掩饰内心的不安。因为，尽管第三次印巴战争的导火索是西巴军队镇压东巴，但当时，西巴和东巴是一个国家，印度粗暴而蛮横地干涉别国的内政，已动摇了印度在不结盟国家的基础，使印度处于被谴责的被动地位。而且美国政府已宣布中止给印度的一笔贷款。因此，印度也希望和巴基斯坦重新修好。如果此次谈判失败，给印度带来的同样也是失望。

布托对甘地总理说：

“我们两人都是南亚次大陆两个最大国家的人民选出来的领导人，我们应该给南亚地区的人民带来一直向往的和平；不能使人民失望，使原有的伤口更加扩大。军事征服当然也是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但是政治家治国有方才能永远名垂史册。政治家的风度必然是远见卓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让步以换取报偿。而现在，胜利者是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甘地总理为什么不能为了和平而做出这种让步呢？”

晚宴是巴基斯坦代表团为宴请印度代表团而举行的。布托注意到，甘地总理和她的代表团成员脸色初弄，频频举杯，祝愿印巴两国友好而和平。晚宴上的香槟，味道也特别醇厚，布托努力控制自己，不开怀畅饮，因为后面的谈判还将是艰难的。

布托对陪同他前来的女儿贝娜齐尔说：

“我们约定一个暗号，你在楼下的大厅等着，如果协议达成了，就说生

了个男孩；如果谈判失败，就说生了个女孩。你告诉记者们，赶快把消息发回国内去。”

新的谈判又开始了，一方漫天要价，一方就地还价，原则是坚定的，策略却是灵活的。英·甘地总理提出或归还领土、或交换战俘，两者必居其一，没有讨论余地。布托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他事后说：

“领土可以被吸收掉。例如阿拉伯人至今未能收回 1967 年阿以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而战俘被关押一天，印度就要提供 9.3 万人的食品，而且战俘长期被关押，只能引致世界舆论的谴责。”

草案修了又修，改了又改，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大厅中焦急地等待好消息传来的贝娜齐尔坐立不安，反复踱步。午夜零点的钟声响了，新的一天到来了。40 分钟后，有人报告了激动人心的好消息：“生了个男孩！生了个男孩！”

在场的记者们和贝娜齐尔都欢呼起来。布托与甘地夫人签署的《西姆拉协定》规定：（一）印度归还占领巴基斯坦的土地；（二）两国恢复交通和中断的贸易关系；（三）战俘暂不交还，留待以后解决；（四）克什米尔争端问题维持现状。

布托终于从虎口夺食，给巴基斯坦国民带回了部分期待与希望。7 月 3 日，当他的专机在拉瓦尔品第机场降落时，前来欢迎的政府官员们隆重地铺上了红地毯。

布托手捧鲜花，向前来欢迎他的人群发表讲话：

“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这既不是我的胜利，也不是英·甘地夫人的胜利。这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人民的胜利。印巴在打了三场战争之后，终于赢得了和平。”

布托的施政方针和政治主张，是在巴基斯坦建立民主，对于东巴分裂出去建立的孟加拉国，从感情上说，他是难以接受和承认的。布托痛心地质问这段历史说：

“本来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或是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巴基斯坦全国公民投票；东巴人民也可以用投票的方式决定是留在巴基斯坦还是建立孟加拉国。而军人当局决定用镇压的方式解决，以至于巴基斯坦必须遭受向印度投降的耻辱，我们将为此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

布托决心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政府而战。鉴于军人当权的独裁行为及其恶果，他提出要起草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来取代军法这种野蛮的法律。他说：

“我不允许巴基斯坦的国家政权行使在真空状态之中。”

在人民的拥护和多数党的支持下，1973 年 4 月 10 日，巴基斯坦国民议会终于通过了在布托总统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民主宪法，即“布托宪法”。

“布托宪法”采用西方议会制中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政府的内阁总理制，同时保留了总统的权力。该宪法扩充了总理的职权，总统应根据总理的意见行事，议会通过的法律、法规，必须由总统和总理共同签署后方能生效。总统是国家元首，总理是政府首脑，总理由国民议会多数票选举产生，内阁部长由总理任命。宪法还规定了公民的基本人权，禁止种族歧视，禁止教派歧视，禁止歧视妇女；保障最低工资，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力等等。宪法中还规定了每五年举行大选，确保文职政府。

根据宪法，布托的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他组织了人民党政府，并就任

总理。

布托想依照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在充满教权和军权的社会中，开创一股民主与法制的新风，这不可能不遭到千百年来习惯势力的抵制与反对。8月14日，国民议会一致通过了《伊斯兰宪章》，将宗教的权力置于宪法权力之上，舆论和人民都站在布托的对立面上，这使布托目瞪口呆。他只能将这一切归结为东西方文化间的巨大差异。

饱受美国伯克利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知识和法律文化熏陶的布托，面对巴基斯坦的现状，显得书卷气十足。对基本国情缺乏足够的了解与认识，遭到挫折是难免的，但这并不等于他所开拓的方向不正确。

布托依然干劲十足，大刀阔斧推行他的经济改革计划，实行土地改革，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他身体力行，带头从自家的庄园开始改起。他承认：

“在最近三个月我所进行的土地改革中，我的家庭失去了4.5万英亩土地，我个人失去6000~7000英亩土地。以后我将继续失去土地，我的家人们也还要失去土地。”

在工业方面，布托推行大企业的国有化政策，宣布银行、保险、交通运输、钢铁、重型机械制造、电力、石油、化工、水泥等10个基础部门实行国有化，用赎买的政策，将这些大企业收归国有。布托还实行城市建设规划，建设新都伊斯兰堡，修建居民住宅区、公园，绿化城市，修筑和拓宽街道。伊斯兰堡很快便成为喜马拉雅山下的明珠。

布托的种种改革势必触犯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利益，加上世界各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中，经济改革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实惠，国民经济反而停滞不前。布托雄心勃勃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和核武器的计划，引起南亚次大陆及世界霸主美国的不安。反对党、宗教界、亲印派等开始掀起一阵阵反对暗潮，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布托很自信，面对种种谩骂和谣言，大声地回答：

“先生们，巴基斯坦人民党没有完蛋！在我们伟大的使命完成之前，它绝不会完蛋。”

1977年3月10日，巴基斯坦举行全国大选，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在国民议会200个席位中，获得154个席位。

3月11日，反对党全国联盟借口人民党在大选中有舞弊行为，要求重新举行大选，并在卡拉奇和海得拉巴两个大城市发动了骚乱。警察与骚乱者发生冲突，暴乱之风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布托在建议与全国联盟领导人坐下来讨论和平解决遭到拒绝后，被迫采取了断然措施，命令警察拘留了全国联盟的领导人，想使动乱的局势稳定下来。

事与愿违。4月20日，全国联盟在卡拉奇策动了大罢工，使这座城市的公交、银行、商店、工厂都陷于瘫痪；联盟领袖扬言要举行全国规模的罢工，组织200万人进军拉瓦尔品第。

布托意识到一场生死搏斗开始了，为了民主政府及经济改革，他调动了军队，在卡拉奇、海得拉巴和拉合尔等城市，维护社会治安与秩序，暂时控制了局面。

但是大规模的动乱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在冲突中有350人受伤，许多人被捕或受伤。布托的政府已得不到公众的信任，不得已，他下令解散政府，重新举行大选。他充满希望他说：“我现在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让我们祈祷这不是幻影吧！”

阴谋从这里展开了。

全国联盟领导人为了拉选票，提出了口号：“谁投反对我们的票，谁就投反对真主的票；谁投巴基斯坦全国联盟一票，谁就等于祷告了10万年。”他们还恶狠狠地说：“今后要考虑的问题是将布托吊死在阿塔科大桥上，还是吊死在拉合尔集中营的灯柱上！”尽管如此，布托还是和联盟领导人坐在一起谈判，达成了初步协议，双方都寄希望于10月份的大选。

布托从军队中绕过了几名资深的高级军官，提拔了貌不惊人的第三军军长齐亚·哈克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要职。7月3日，齐亚·哈克率领各军司令官到总理官邸拜访布托，用一种谄媚肉麻的腔调表示：“军队和我本人效忠政府，将制止国内的暴乱。”

布托为齐亚·哈克的“忠心”所迷惑，并对军队忠于现政府坚信不疑。那一晚，他们举杯庆贺，香槟酒喝了很多，布托已手舞足蹈，开始失态。他举着酒杯说：“10月份的大选胜利是我们的。”

齐亚·哈克虚伪地笑着，一双眼睛闪烁不定，他正筹划一场更大的阴谋，即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民主政府，代之以军人独裁专制政府。他的部队正秘密调动，向首都靠拢。而布托先生，还在憧憬着美好的和平和民主的明天。

举世震惊的军事政变

一场好梦，夜正长，梦也正香。经过了一连几个月的动乱与危机，布托在得到齐亚·哈克等高级军官支持政府的保证之后，如释重负，放心地进入梦乡。

此时，拉瓦尔品第的大街上，军队已控制了各主要路口，军车运送着部队，马达声在寂静的夜中显得格外恐怖，令人不寒而栗。

凌晨两点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布托从梦中惊醒。

他睡眼朦胧地问：

“出了什么事情？”

布托的警卫乌尔斯急得都变了腔：

“布托先生，军队发动政变了。快想想办法躲起来再说，或者跑掉！”

布托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说：“不会吧？我先打电话问问齐亚·哈克。”

他的电话已被掐断，只好来到小女儿的房间，拿起了电话。这是一条私人专线，还未被军队发现，布托的电话一直要到齐亚·哈克的司令部。哈克此时正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各处的消息，他拿起电话，没想到里面竟然传来了布托总理熟悉的声音。

“齐亚·哈克将军，我希望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部队在干什么？”

哈克大惊，结结巴巴地说：

“对不起，我很遗憾，这是政变。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不得不暂时对您进行保护性拘留，但是我将在90天以内举行大选。您自然会再度当选总理，我也将再次向您致意。”

布托明白，大选已不可能了，因为他已和全国联盟领导人进行了谈判，尽管双方的距离还不小，但已达成协议，同意人民党和全国联盟领导人共同参加大选。在这种形势下，齐亚·哈克害怕大选如期举行，于是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政变。这说明在目前的形势下，民主政治已不可能恢复了。

布托还有机会逃跑，但是他拒绝了。上午9时，军队才拥进总理官邸，布托和往常上班一样，平静地坐进了他的专用轿车。门被关上了，车外是夫人努斯拉特和女儿贝娜齐尔、萨纳姆令人心碎的呼叫，他只来得及回头看他们一眼，汽车便一溜烟地向克什米尔公路边的莫里山总理别墅开去。然后，布托被软禁在那里。

与此同时，全国联盟领导人阿斯迦尔等和人民党其他领导人都遭到逮捕，其中还包括布托的堂弟、交通部部长蒙塔兹·布托和教育部长。但这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很快，阿斯迦尔就被释放了。齐亚·哈克政变完全是针对布托的民主政府和宪法及布托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政策的。

齐亚·哈克向全国宣布实行军法管制，自任首席军法执行官。军法无情，一系列荒唐、离奇的军法法令接踵而至：

未经首席军法执行官允许，不得集会，违者处以10次鞭笞和5年徒刑；凡是口头或书面抨击军队者，处以10次鞭笞和5年徒刑；凡是诱使军人反对首席军法执行官齐亚·哈克将军的，处以死刑。

在废除“布托宪法”的同时，齐亚·哈克还抬出伊斯兰法来强化军法统治。

巴基斯坦突遭大暴雨袭击，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受灾最重的地区是人民党支持者最多的拉合尔地区。一些人乘机煽动说：“这场空前的大暴雨，是布托招来的，现在老天爷都出来反对布托了。”

布托的女儿贝娜齐尔和小儿子沙纳瓦兹奔赴该地区看望人民，所到之处，人们不顾军法法令威胁，热烈地欢迎布托的儿女。

在布托家族、人民党和舆论支持下，7月28日，齐亚·哈克不得不释放布托。这是欲擒故纵的伎俩，更大的阴谋还在后面。

当布托出现在卡拉奇车站时，眼前是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场面。人们呼喊着他的名字，像迎接一位真正的英雄一样，给他戴上花环，向他抛撒花瓣，争着上前摸他的手和衣服。布托很受感动，他向沸腾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他的汽车被群众围得风雨不透，从火车站到克里夫顿70号住宅，半个小时的路，整整用了10个小时才走完。民主的领袖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戴，本身就证明人民还是需要民主政治、反对军法管制的。

布托开始了他的巡访计划，他风尘仆仆前往各地，与支持者见面，发表讲话，为恢复人民民主的信念重新奋斗。

齐亚·哈克派人放出风：布托是一个政治谋杀案的主使者，将受到法庭的刑法审判。

好心人都劝布托赶快离开巴基斯坦，偃旗息鼓，不再抛头露面，或到哪个人烟稀少的地区避避风头。

布托摇摇头，坚定地予以拒绝，他打电话告诉妻子和女儿贝娜齐尔：“我自己的日子不会很长久了，但我不能像老鼠一样躲起来。”

9月3日凌晨，气势汹汹的军队包围了布托在卡拉奇克里夫顿的家。布托丝毫没有感到惊奇和慌张，他很平静地对前来逮捕他的军官说：“我需要半个小时准备一下，你们来得太早

了。

沐浴完毕，他刮干净胡子，梳整齐头发，并仔细地打好领带。然后昂着头离家，平静得好像是出门办事一样。

齐亚·哈克收买了一个人民党的政客艾哈迈德·拉扎·卡苏里。此人仇

人很多，曾多次逃脱政敌的追杀，最后一次，他怀疑布托参加策划了对他的暗杀，导致了他父亲的死亡。布托成立民主政府后，给人民以最大的民主权利，卡苏里便钻了空子，控告布托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当时最高法院受理了这桩杀人案件，根据调查，驳回了卡苏里对布托的控告，案子宣告了结。

卡苏里助纣为虐，又一次向最高法院控告布托参与了谋杀案。齐亚·哈克以此为“罪名”，再一次逮捕了布托。最高法院按照齐亚·哈克的命令重新对案件进行审理后，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布托参与了这起谋杀案，布托在法庭上的陈述和法庭调查都显示出：布托是受诬陷的。13日，布托再次被当局释放。

齐亚·哈克向报界就此事发表讲话时说：

“如果这次法庭释放了布托，那么，我认为军法当局再没有理由拘禁布托先生。”

布托满心欢喜，小心翼翼避免触犯军法当局，一心一意准备参加大选，以便在合法斗争中一举战胜全国联盟，重新上台组阁。

齐亚·哈克却不能容忍布托死灰复燃，再次使出卑鄙伎俩。9月17日凌晨两点多，几十名特工人员和警察翻过布托老家拉卡纳的穆尔塔扎公馆的围墙，打昏了看门人，冲向布托的寝室，疯狂地砸门。布托被剧烈的响声惊醒后，知道厄运又一次降临了，即将进行的大选一下子变得很渺茫了。

砸门声还在继续，布托穿着睡衣，对佣人说：“去把门打开，告诉他们没有必要把门弄坏，可以让他们进来两个军官等着。我需要时间去梳洗一下，穿好衣服。”

警车尖锐地拉起警笛，将布托送进了苏库尔监狱。布托在那里，发现了与他关系密切的几位人民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前内阁交通部长蒙塔兹·阿里·布托、前财政部长皮尔扎达及人民党秘书长拉姆·侯赛因等人。布托苦笑着说：

“好了，这下可以在监狱中参加竞选了。”

狱方告诉布托等人，军方的一个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危害军管政权和巴基斯坦安全或破坏维护和平条件的任何行动”，布托等人的行为已经危害了军管政权的安全，如有不服，可以在20天之内向首席军法执行官齐亚·哈克提出申诉，但是不准在法庭上反对这项条例。在军人独裁的政局下，用一句古语来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罪名虽然是“莫须有”的，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齐亚·哈克这一手真够狠毒的，他用突然逮捕的方法，在大选前剥夺了布托等人民党领导人参加大选的政治权利。

此时在狱中的布托，已经不仅仅是齐亚·哈克的政敌，他已成了巴基斯坦民主的象征，布托的民主精神是扼杀不了的。

巴基斯坦人民党群龙无首，愤怒的党员到处举行自发的抗议、集会和行动，很容易引起军管当局的报复。在此关键时刻，布托夫人勇敢地站了出来，领导人民党继续斗争。

人民党新闻秘书、前宗教事务部部长大毛拉尼亚齐，代表人民党临时成立的“五人委员会”向报界宣布：人民党仍将参加竞选。

9月19日，在拉瓦尔品第，数十万人民党党员在亚卡特公园举行集会。主席台上高悬着布托的画像，人群中不断高呼“释放布托”、“布托必胜，人民党必胜”、“布托万岁”、“民主万岁”的口号。

布托夫人努斯拉特站在台上，激动地对着麦克风大声说：“逮捕布托，是因为他们害怕布托，所以才把布托投进监狱。我们人民党一定要在布托的精神和旗帜下团结起来，参加竞选。”布托夫人被营救丈夫、拯救人民党、拯救巴基斯坦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激励着，东奔西走，到处发表演说。她在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的拉合尔举行的人民党参加竞选的集会上，揭露齐亚·哈克的目的是不让布托参加10月份的大选。“不让人民党参加竞选活动，便是剥夺人民党党员的政治生命”，她愤怒地说，“我既无坦克，也无枪炮，但我有被蹂躏者不可战胜的力量。”她警告政府：“关闭选举的大门就会打开革命的大门！”布托的律师、前检察总长巴赫蒂亚尔向最高法院提出释放布托的申诉。他在法庭上对庭长、陪审员和旁听的群众申诉说：“军事法庭审判布托，侵犯了布托按照宪法规定所享有的权利。在巴基斯坦第一大党的主席和主要领导人被关进监狱的情况下，不可能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首席法官雅各布·阿里·汗听取了巴赫蒂亚尔律师的申诉后，站在公正的法律的立场上要求军管当局允许保释布托，并让他出庭听取审理。

齐亚·哈克恼羞成怒，不但拒绝了首席法官的请求，还将雅各布·阿里·汗革职查办。他派人警告布托夫人、人民党代主席努斯拉特，要求她停止煽动人民进行暴力活动。

在巴基斯坦，要求大选和恢复民主的运动遍及各地。齐亚·哈克心惊肉跳，一方面宣布大选推迟进行，一方面加紧活动，阴谋置布托于死地。军事法庭以政治罪起诉布托，所谓政治罪即1971年印巴战争后，孟加拉国被分裂出去，布托应承担“叛国罪”，加上卡苏里控告布托的“刑事罪”，即参加“谋杀案”的罪名和违反齐亚·哈克颁布的军管法，所谓三罪齐发，死罪难逃。目的只有一个：用政治谋杀的方法，杀死布托。

军管当局还出动警察和军队，镇压群众的游行和集会。在木尔坦和拉合尔，军管当局便逮捕了1600多名布托的支持者。

人民党骨干分子以绝食、组织妇女上街游行等方法与军管当局进行斗争，并号召全国人民以1978年的1月5日——布托的生日，作为全国的“民主日”，要求全国的工人、群众行动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1月5日清晨，当木尔坦的纺织工人们前往厂内集合、准备上街游行时，装甲车、汽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并封锁了工厂。军队在附近的高层建筑上向工人聚集的广场开枪，许多人中弹倒下，血肉横飞。就在这一天，全国各地数千名人民党人及其支持者被捕。但是，争取大选、营救布托的行动并未停止。

齐亚·哈克的军事独裁暴行，激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

这个小个子首席军法执法官，腆着个大啤酒肚子，油光水滑的头发从中仔仔细细分开，紧紧贴在脑袋上。他暴跳如雷，来回在地毯上踱步，绞尽脑汁。

“决不能让布托再活着，决不能。”他已反复下定了这个决心，妄图以此扼杀民主精神。他秘密召见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冷冷地吐出几个字：

“我只要看到他死，剩下的事你去办！”

3月18日，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悲愤、失望和痛苦的气氛再次笼罩了巴基斯坦全国，拉合尔高等法院作出对布托的最后判决：

“前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因为在1974年下令进行政治谋杀而

被判处绞刑。”

“倘若我得以生存，我将继续战斗！”

一个为民主而奋斗的战士即将被军事独裁者政治谋杀，而罪名是“下令进行政治谋杀”。这种公开的丑恶行径，是一个阳光下的大阴谋，有头脑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奥妙。

最高法院在判决之后，不等布托上诉，便急忙将他转移到科特拉克帕特监狱，投入关死囚犯的牢房中。

齐亚·哈克下令：为防止全国可能发生的骚动和暴乱，禁止人民党举行集会、游行及一切政治活动。军警四处捕捉人民党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又有几百人遭到非法拘禁。齐亚·哈克严厉地命令新闻部门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一切报刊上不得出现“民主”、“竞选”字样和任何“反现政府”的言论，违者将遭到严惩。军队将布托一家严密包围起来，对布托夫人和女儿实行软

禁。

齐亚·哈克还命令军队和警察，一旦发生骚乱，将进行毫不留情的严厉镇压。

布托被判处死刑 48 小时之后，拉合尔有上千人上街游行，抗议当局的无理判决。示威者在街头与大批军警发生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使用警棍以驱赶群众。示威者则拾起石头进行反击，并放火焚烧了几辆公共汽车和小轿车。还有 1000 多名工人举行静坐示威。拉合尔的达亚尔·辛格学院的学生举行反政府集会，他们发表演讲，高呼口号，向警察投掷石块，并在学校大门口焚烧了一大堆汽车轮胎，阻断了交通。拉合尔的行动迅速波及了其他城市和乡村，在卡拉奇和白沙瓦市都爆发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

有几名布托的激进的支持者，甚至用自焚的方式进行抗议。他们坐在拉合尔市中心广场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悲壮地死去。

军管当局在新闻发布会中诬蔑这些自焚者是被人民党花钱雇佣的。

贝娜齐尔沉重地说：“难道人的生命就这样不值钱吗？不！这些勇敢的人是有理想的人，他们宁愿忍受痛苦，也要献身于民主和正义事业。我向他们致敬。”

斗争还在继续。军管当局又展开新一轮的对布托追随者的迫害行动。当局逮捕了有影响的 16 名布托政府的内阁成员和人民党领袖，他们当中有前国防部长蒂汗、财政部长及三名内阁成员，并立即判刑。一些人民党领导人被迫转入地下，继续斗争。在布托被判死刑之后，共有 90 多名政治领袖、人民党中坚分子被捕入狱。

5 月 17 日，拉瓦尔品第的最高法院开始审理布托的上诉。布托提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安瓦尔·哈克没有资格充当首席法官，他对此案的判决不会做到公正。因为，我们之间曾有过私怨。”

然而，布托的要求被法官驳回。

布托在狱中曾写下长达 30 页的上诉书，布托的律师叶海亚·巴赫蒂亚尔开始反对他在 5 月 6 日审理上诉案时提交上诉书，因为提出上诉的时间通常规定为两年；同时，他还建议布托抵制法院的审问，以致耽误了时间。上诉的拖延使两名了解内情的法官因退休而无法参与审判。

在死囚牢中，布托尝尽地狱般的滋味。他的脚被链条绑在床腿上，牢房黑暗、狭小而潮湿，老鼠横行，蚊虫孳生，咬得他浑身都是疹块。他抗议当

局的非人折磨，拒绝进食，几天之后，他骨瘦如柴。在抗争之后待遇稍有改善。

布托曾从狱中想尽办法，托人带出一封信，详尽描述他的遭遇。

10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桌上摊着这封远涉重洋、辗转来自死囚牢中的信。信中说：

我丝毫不夸张地告诉您，我蒙受了比纳粹对犹太人或非洲种族主义者对待其受害者还要坏的待遇。大会应知道，自从1977年7月5日巴基斯坦发生政变以来，她的民选总理遭受到今人不可忍受的苦难。到目前为止，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同样清楚地知道给我制造了一桩谋杀假案。我被投入惨不忍睹的死牢也有半年之久。信的结尾处，布托大义凛然地写道：

我的鲜血一旦溅洒，定将染红他们的双手，从而使他们在历史上欠下一笔血债。在另一封致法国总统德斯坦的信中，布托表现出了一名为民主而斗争的真正猛士所具有的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信中说：

面对这死牢，我无法从坚实的铁栏里伸出我的双手；否则，我早已向您握手致意，并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了。对于您的关心，我无法报答；在我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我只有将我的血滋补南亚次大陆上的男女青年，如同肥料一样，去养育春日里无比妖艳芬芳的法国玫瑰。

从15岁起，我就为自由而斗争，不屈不挠……在我最纯真的爱情之中，最为绚丽的乃是我与人民的爱情。对我来说，人民的力量并非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永不枯竭的源泉和坚贞不渝的信仰。即使西方自私的短见与东方盲目的野心——如同两个超级大国所体现的那样——将人类拖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人民也将在大屠杀的灰烬中再生，而且会日益强大。美丽的世界如此博大，致使它决不会在一场败者丧生、胜者奄奄的格斗之后灰飞烟灭。世界总会留下点东西，

这就足够了，有朝一日，它将重放光彩，如花似锦。

所以说，总统先生，倘若我得以生存，我将继续战

斗，犹如沙场中央的斗牛士，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如果我难免于一死，我只好在此向您道别。同时，

我将祈祷比我更强的人，去完成我的遗志，把我国人民

从贫困与苦难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1978年12月18日，布托终于公开在拉合尔最高法院出庭为自己辩护了。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由于长期不见阳光而呈现满脸病容，眼窝深陷，一套考究的英国花呢西服显得空空大大的。法庭内外挤满了人，尽管军管当局一再限制，来的人还是很多，还有数千万的群众等待在法庭外的大街上。

布托用眼睛搜寻着前来旁听的人，一下看见了妻子努斯拉特，他们用眼神互相同好，互相给对方以力量和勇气。

在法官对布托进行指控后，布托开始答辩。他是学法律出身的，根据法律条文，从对他的指控中找到矛盾百出的地方和证据不足的薄弱环节，进行逐条反驳。他滔滔不绝，语调时而高亢，时而激烈，抑扬顿挫，侃侃而谈。他指责所谓的参与谋杀是虚伪和捏造的，连审判他的人都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阴谋，而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谋杀他本人和他的民主国家。

最后，布托动情地说：“凡是活着的人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人不能为了活而活着，但我要为正义的事业而活着。我希望澄清我是清白无辜的，这并不是为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本人，而是出于更深刻的考虑，也就

是说，这起案件是十分荒唐的，是不公正的。”

他大声疾呼：“我要的是公正，不是怜悯！”

其实，在审判布托前四个月，“真凶”就已经出来说话了。是年8月，北爱尔兰电视台播送了一条新闻：侨居在爱尔兰的一位巴基斯坦商人阿卜杜勒·米尔扎对新闻媒介供称，1974年他住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市时，为了20多年前一次行贿事件，借助巴基斯坦游击队的力量，暗杀了一个叫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汗的人，这个人便是卡苏里的父亲。这起杀人事件与布托总理根本没有关系。

巴基斯坦国内的新闻机构在齐亚·哈克的军事控制下根本不敢报道来自爱尔兰的真实情况。巴基斯坦人民虽然无法了解真相，但他们都相信布托总理是被人冤枉的，他根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参与那桩谋杀案。

1979年2月6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驳回布托的上诉，由于法官们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只能以表决的方式决定布托的生死。在4:3的微弱多数情况下，布托仍被维持原判，处以绞刑。

同一天，阿卜杜勒·米尔扎闻讯后再次对爱尔兰的新闻部门说：致使布托总理被判刑的“谋杀政敌案”是他本人和游击队干的，不应栽在布托身上。他表示要到巴基斯坦去亲自证明这件事。这一则消息与布托被处以死刑的消息同样是爆炸性的。但巴基斯坦驻英国使馆没收了米尔扎的护照，不准他回国作证。

对布托的审判是一桩有背景的政治谋杀，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各国领导人纷纷打电话、电报给齐亚·哈克，请他重新考虑，允许国际观察员公开参加诉讼过程，谴责巴政府这样一意孤行“不容于文明人类的良心”。中国政府、美国政府、挪威、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对头——印度总理英·甘地都发出了挽救布托生命的呼吁。英国议院的150名议员敦促英政府采取步骤，制裁巴基斯坦。齐亚·哈克全然不顾国际舆论的呼吁与谴责，坚持处死布托的判决。

齐亚·哈克厚颜无耻地说：

“我们不能接受这些劝告，如果接受，我们最好下台。”

齐亚·哈克又假惺惺地说：

“如果布托承认所犯的罪行，如果他本人或其亲属恳求宽恕的话，可以给他一个面子，改判无期徒刑。”

布托的牢狱生活，使他对人观察到入木三分的地步。他说：“齐亚·哈克是一贯反对民主的准则和制度的。我并不是说他的为人有多么庸俗，但他是信仰庸俗的风头主义的。同时，他还怀有卑鄙的野心，他从不愿意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布托说：“不要再中齐亚·哈克的圈套，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不能因‘莫须有’的罪名而乞求宽恕。”

1979年4月3日，布托人生之旅最后一天就要来临了。他与他的亲人、妻子和女儿进行最后的会见。

牢狱的铁栏阻隔了与亲人的拥抱，泪水像春雨一样，潜潜而至。布托充满感情地对妻子和女儿说：

“你们受的连累太多了，现在他们要杀我了，我想这会使你们获得自由。如果你们想离开巴基斯坦，最好是离开！”

布托夫人硬咽着，但坚定地说：

“不，我们决不能离开，如果我们走了，谁来领导人民党呢？不能让齐亚·哈克以为他赢了……”

贝娜齐尔哭成个泪人，布托安慰道：“我很高兴，我的女儿，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你一直是我的珍宝。我真的很爱你……”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狱卒对此黯然神伤，监狱长只准许这场生离死别持续了半个小时，他们的手被强行掰开，布托和努斯拉特、贝娜齐尔互相悲切地喊着：“再见！”高墙内外，回荡着不屈的声音。布托沐浴后，吃了顿饱饭，念了《古兰经》，听完监狱长宣读的处决他的“黑手令”，安静地等待死神的临近。4月4日清晨，

出现了本文开头的悲惨一幕……

布托的遗体被运回家乡，军队团团围住了墓地，如临大敌。

一个死了的布托，不知为何竟令齐亚·哈克如此害怕。军官还专门设立了指挥所，在几十枝枪的瞄准下，挖好了墓坑，然后用没有烧过的砖坯砌成墓穴，铺上树枝。

直升飞机在天空盘旋，然后降落在空地上，从上面抬下了一口棺材，1500名村民赶来参加布托的葬礼。当遗体下葬后，墓地里响起了春雷般的《古兰经》诵经声……

布托死了，布托的民主精神不死，他的灵魂和思想依然领导着巴基斯坦的人民。

尾声：布托“谋杀”了齐亚·哈克

1988年8月17日上午，在布托逝世九年之后，民主与军事独裁的斗争仍在继续。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在晴朗的日子里，乘一架C-130专机前往巴基斯坦东部靠近印度的巴哈瓦尔普尔，去视察军队的军事演习，同机随行的有陆海空三军参谋长拉赫曼上将等10名高级军官。专机由两架战斗机护航。下午3时47分，齐亚·哈克观看了军事演习之后，心满意足地登上飞机，在马达轰鸣声中，飞机越跑越快，飞上了蓝天。4分钟以后，护航机驾驶员观察到总统的专机冒出了烟，他刚来得及向地面指挥塔报告，就见一道耀眼的闪光，总统专机变成千百万银屑，金属片像雨一样在距巴哈瓦尔普尔7公里处的高空纷纷落下，

飞机残骸遍布方圆10公里内，机上人员无一生还。

是谁杀害了齐亚·哈克，一时间众说纷坛。

九年前，布托临死前留下一本日记，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不是个乞丐，我不打算乞求什么施舍，我也不打算像狗一样蹲着，举起两只前爪合十求乞。我相信，我的同胞们决不会沉默，他们不会让哈克将军安然逃遁。他也许不知道在巴基斯坦军队里可能有个卡扎菲式的人物，一位激进的少校或上校呢。总有一天早晨，我们可能一睁开眼，发现他取代了哈克将军的位置。齐亚·哈克死了，但巴基斯坦的民主制度仍像一只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船，依然在艰难险阻中挣扎着航行。

饮弹阅兵场 ——埃及总统萨达特之死

盛名之下的失误

1981年10月6日，埃及开罗的胜利广场上旌旗猎猎，战车辚辚，军容严整，军乐嘹亮。检阅台上贵宾端坐，将星云集，勋章闪耀。现代化摩托化部队列队通过检阅台，接受埃及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的检阅。突然，一辆受阅的军用卡车戛然而停，从车上飞身跳下一名军人，向检阅台上投下一枚手榴弹，紧接着卡车上的机枪喷出了火舌。埃及总统萨达特身中数弹，气绝身亡。

埃及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民族文化。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与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了三次战役，几乎是屡战屡败。以色列的侵略使这个文明古国失去了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大片领土，使几千万难民无家可归。是这个古老的国家历史包袱太重，还是另有原因？

1970年，萨达特就任埃及总统，他上台伊始便有惊人举动：在国际上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国内大力发展生产，从苏联进口大批武器，在装备上加速现代化，以报前三次中东战争之仇。

1973年10月6日14时，在苏伊士运河边，埃及的2000门大炮喷出了复仇的火焰，200架飞机闪电般地出击，一举突破了

以色列苦心经营的“巴列夫防线”。这次作战，虽然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在后期一度转为被动，但击碎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

这次中东战争的总指挥就是萨达特总统，他成了阿拉伯民族的英雄。为了纪念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胜利，埃及人民在开罗修建了胜利广场，每年的10月6日，埃及国家领导人都在这里检阅军队。10月6日，成为埃及仅次于国庆的重大节日。

70年代末，萨达特对以色列采取了与以往大相径庭的政策：在美国的斡旋下，他主动与以色列和谈，在美国的戴维营签订了协定。以色列是阿拉伯民族的世敌，和谈被大多数伊斯兰教徒视为大逆不道的举动。本来，按照历史的经验，没有永远的敌人，萨达特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他缺少文官的耐心说服，多了

一些军事独裁的味道。

在阿拉伯民族中，宗教派别林立，稍有不慎就可能使社会上出现不安定局面。人们对萨达特的做法不满，一时又无法发泄，各地便出现了一些动乱。1981年9月3日，天刚破晓，埃及军队和大批警察按照萨达特的命令，在全国进行了大搜捕。这是空前的大规模搜捕活动，总共逮捕了3000多人。在被捕的人中，有学生和普通原教旨主义者，更有埃及社会生活中大约250位最著名的人士，这其中有萨达特的政治对手，有僧侣和知名的教长。政府宣称，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平息宗教纠纷，但被捕者中有不少是批评政府政策的人士，对此，萨达特本人也不能自圆其说，搜捕行动显然带有政治目的。一时间，整个埃及上空弥漫

着不安的烟云，人们谈虎色变。

对此，萨达特曾在有关重大场合解释：采取镇压行动是为了清除那些威胁埃及安定和团结的因素。为了说明他的计划和逮捕行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萨达特先在议会进行解释，后又召开记者招待会辩解，但人们对此反应冷淡，他们似乎仍旧不相信他做的一切解释。最使萨达特气愤的是，每次出席会议讲话时，他都认为自己是慈父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但总是适得其反。他感到公众背叛了他，于是他决定通过电视对全体国民作一次像罗斯福总统那样的讲话，来挽回影响。

9月15日，萨达特在电视机前与观众见面了。开始时，他显得心平气和，通情达理，但讲着讲着便东拉西扯、语无伦次了。他竟用一个小时攻击老资格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赛拉盖丁，对其进行人身攻击：“这封建王朝的宠儿，过的是花天酒地的生活。”

接着他话锋一转，又攻击埃及的几位宗教领袖。他尖刻地指责他们的奢侈生活方式，谩骂吉汉的马哈拉维教长：“现在这个卑鄙的教长已经进了监狱，像一只狗似的关在牢里。”

马哈拉维教长是位德高望重的教长，萨达特不仅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他，还用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他，这是大众所不能容忍的。

更使埃及广大民众反感的是萨达特喋喋不休，信口开河，一会儿讥讽原教旨主义者，一会又挖苦戴面纱的姑娘，说：“她们走在街上像一顶顶帐篷。”他还嘲笑那些蓄须青年。尽管他旨在解释他所谓的“九五革命”，但他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马拉松式演说中却把听众搞得糊里糊涂，如坠云雾。在埃及，由于萨达特的行为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愿，侵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失去了群众基础。

阿拉伯世界在宗教上非常敏感而又特别严肃和认真，萨达特对宗教人士的攻击和对阿拉伯风俗的嘲讽，也引起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不满。一些国家的电台开始对萨达特进行攻击，煽动埃及的对立情绪。这样，萨达特统治的危机到来了。

阿拉法特的提醒

对萨达特的不满情绪在开罗悄然扩散，原教旨主义小组在暗处四下放风要对萨达特采取行动，在开罗的各教派组织不时传言要杀掉萨达特。事后证实当时有11个不同的组织要干掉他。

阿拉法特是知道暗杀萨达特的传闻的。他为萨达特的安全担忧，同时他意识到，如果萨达特真的被暗杀，就会有人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横加指责，阿拉法特会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为了保证萨达特的安全，为了让他有所防备，阿拉法特认为应当把这些传闻先告知萨达特。他认为这样做，也正表明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暗杀萨达特的传闻无关。

于是，阿拉法特指示巴解组织驻开罗大使赛义德·卡迈勒与萨达特的儿女亲家奥斯曼·艾哈迈德·奥斯曼（萨达特女儿的公公）取得联系。此人曾长期随萨达特左右，是萨达特总统身边的智囊人物，前不久还随萨达特访问了以色列。阿拉法特令赛义德·卡迈勒向奥斯曼说明埃及、特别是开罗关于暗杀萨达特的传闻。

在开罗的赛义德·卡迈勒比阿拉法特更了解暗杀萨达特的传闻，他身在开罗，对埃及的社会情况比较熟悉，和埃及的上层人物、特别是宗教领袖有着广泛的接触，能了解到他们的思想动态。阿拉法特所了解的情况，大部分

是通过赛义德·卡迈勒获得的。

于是，赛义德·卡迈勒决定直接去找萨达特，向他陈述利害。

要见一位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统身在最高层，要通过层层台阶、一个个机构，除非是有特别重要的事，否则根本无缘晋见。萨达特总统深居简出，由他秘书安排会见的人物极少极少，但赛义德·卡迈勒坚持一定要见萨达特。他向有关人士强调说，他带来的情况非常机密，而这件事只能告诉总统本人。

这一招果然奏效，赛义德·卡迈勒提出要求的第二天，有关人士通知他，萨达特总统要接见他，但接见谈话的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

赛义德·卡迈勒来到戒备森严的总统住处。

“什么事情？”没有寒暄，也没有问候，萨达特劈头问了一句，开始了谈话。

赛义德·卡迈勒把阿拉法特的信交给了萨达特。

萨达特一脸不屑的神情，漫不经心地将阿拉法特的信看了一遍，然后随手丢在桌子上，说：“你回去告诉阿拉法特，要他还是多关心他自己的安全问题吧。”

接见就这样结束了，时间不到两分钟。

赛义德·卡迈勒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总统府，他心中默默为萨达特祈祷：

“愿真主保佑他！”

安古小组的活动

埃及青年人，包括政府中、军队里收听外国反对萨达特广播的青年很多，其中有一名陆军上尉，他的名字叫哈立德·艾哈迈德·沙乌其·伊斯兰布利。此人长得凶悍，鹰钩鼻子，留着一撮浓密的黑胡须。就是这撮小胡子，前几天曾被萨达特在电视上攻击过。

哈立德家住麦拉威村，其兄穆罕默德是埃及的穆斯林小组的成员之一，因组织从事反对萨达特的政治活动，于9月3日被军队逮捕并投入监狱。

哈立德因其兄被捕，加上他对政府特别是对萨达特不满，在9月3日大搜捕后加入属于“伊斯兰崛起”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是由观点相同的原教旨主义者组成的，哈立德参加该组织后被编入“安古”小组。“安古”在阿拉伯语中是“一串葡萄”的意思。“安古”中的某一颗“葡萄”出了事，受影响的只是自己，不会影响其他的人。该组织表面上看比较松散，可内部纪律却十分严密。

“安古”小组在1981年1、2月间开过一次会，会上讨论了推翻萨达特的统治、夺取埃及政权的问题。有人提议说：祖穆尔中校的家乡与萨达特总统的巴里奇别墅仅一河之隔，萨达特乘直升机回别墅时，必定经过祖穆尔住宅上空，可以在祖穆尔家附近隐蔽的地方架起高射炮，一举击毁萨达特的座机。但由于萨达特回别墅时总是三架直升机一起出动，搞不清他在哪一架上，此方案被否决了。接着，又有人提议趁萨达特在别墅居住的时候，用高射炮平射的办法轰击别墅，因为此方案也不能保证刺杀成功，又被大家否定。与会者认为，必须制定一个更详细、更具体的暗杀计划。

会后不久，有人提议利用阅兵式，因为届时萨达特总统和政府要员都将出席，而且会在最显眼的地方出现，趁此机会，可让一架参阅直升机袭击他们。这一方案一直未实施。哈立德参加“安古”小组后，得知了小组的方案。

1981年9月23日上午10时15分，哈立德的上司阿尔少校把他召去，通知他参加10月6日纪念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胜利八周年阅兵式，并要求他届时率领一个由12辆炮车组成的分队。哈立德因打算回家乡麦拉威村与家人共度宗教节日，不想参加阅兵式，和少校发生了争论。争论中哈立德想起“安古”小组曾议决在阅兵中刺杀萨达特，而在他看来，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于是他装作被阿尔少校说服、服从命令的样子说：“好吧！我接受这项任务，这是天意，不能违抗。”他下决心由自己来刺杀萨达特，并立即准备行动。

缜密的刺杀准备

哈立德从接受参加阅兵式的任务时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刺杀萨达特的准备工作。

9月24日，是阅兵式的预演日期。哈立德和他的炮兵分队列队从空无一人的检阅台前走过，哈立德两只鹰样的眼睛扫视着检阅台。他向最前一排摆设特殊的座位看了一眼，中间那个位置就是萨达特的。“两周之后，萨达特将率政府要员在那里就坐，那时，我就要进行一个神圣的行动……”想到这里，哈立德心中不禁一阵惊喜。他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端枪的动作。接着，他仔细地观察了检阅台四周的环境。这次观察增强了他行动的信心，他确认自己的计划是可行的。他对自己要做的事充满信心，认为有真主保佑，行动一定会成功。但真正实施还需要几名帮手，他下定决心去物色几个可靠的人。

9月25日晚7时，哈立德到一个朋友家中去会见安古小组的精神领袖法拉格，向他汇报前一天预演时实地观察的结果和自己的行动方案与构想，法拉格对他的行动方案大大褒奖了一番。哈立德很是兴奋。接着他请求法拉格为他物色几名可靠的帮手，法拉格未置可否。为此，哈立德有点焦虑和扫兴。他想，是不是这三名助手难以挑选？

哈立德的猜测是对的，他的三名助手着实难找。其首要条件是要像哈立德一样意志坚定，敢于献身；其次是枪技必须精湛，做到马到成功。法拉格没有把握，怎能马上答应哈立德的要求？9月26日，法拉格通知哈立德到他的朋友家中见面。哈立德赶到时，法拉格带着三个人正在等他。三个助手中有一个是安古小组的成员，名字叫阿里。阿里当过军官，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认为当兵不是侍奉真主的最好方式，因而自动脱离军队。他在开罗经营一家书店，现在是安古小组的联络员。另一个是27岁的预备役军官工程师雷海尔。第三个是民防学校的教官侯赛因，他在学校中担任射击教官，在陆军的射击比赛中连续七年保持“神枪手”的称号，说他“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一点也不过誉。

法拉格面对四个人，神情十分严肃他认真询问他们是否甘愿为行动付出生命。四个人都作出了十分肯定的回答，行动方案确定后，与会者向真主起誓保守秘密，在诵读了《古兰经》后散会。

9月27日，法拉格派人到一直处于警方严密监视之中的一伙原教旨主义分子那里取来了四枚手榴弹、一枝手枪和120发科拉什尼可夫式步枪子弹。

随着10月6日这一天的临近，哈立德的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他调开了他带领的炮兵支队中的三名成员。他告诉支队的其他人说，支队将调来三名士兵顶替，这三名士兵来自情报部门，因为最近国内形势紧张，他们是奉命来检查阅兵中的安全措施的。哈立德的这个谎言编得比较圆，居然连他的上级军官和下属的士兵都深信不疑。

10月6日凌晨3时，受阅部队开始了受阅的准备工作，他们必须在6点钟之前做好准备。

哈立德从机械库中挑选出四挺机枪，装上子弹，交给侯赛因。侯赛因在装上子弹的机枪筒里塞上小布条作为标记，再将这几挺机枪混入别的机枪里。

出发前，哈立德又将司机支走，把四枚手榴弹藏在车座下边，一切准备就绪。

血洒阅兵台

10月6日，埃及开罗天高云淡，秋高气爽。胜利广场彩旗飞舞，彩色的气球在空中飞舞，一派节日景象。

10时30分，胜利广场的四周早已是戒备森严，就是天上的苍鹰、地上的狡兔也休想逃过保安人员的眼睛。广场的一边，千军万马军容严整，受阅部队列队等待阅兵大典的开始。

埃及政府的官员们前呼后拥地到来，各国外交使节和夫人们已陆续登上检阅台。记者来往穿梭，争先恐后地选择最佳拍摄角度。

虽然埃及最近的局势给参加庆典的群众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人们的脸上仍然露出了微笑，不管怎么说，10月6日是他们庆祝胜利的日子，是他们值得自豪的一天。

11时整，萨达特总统健步登上检阅台，他身着灰蓝色的将军制服，左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在斜披的绶带上缀着许多星星。勋章和星星在灿烂的阳光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在众多的官员和来宾当中，他最引人注目。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埃及领袖中创造奇迹的人。整个广场上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广场沸腾了。萨达特面带微笑，向欢呼的人们招手致意。庆祝大会开始，每年大会的程序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在奏国歌之后，副总统穆巴拉克和国防部长加札勒跟在萨达特身后，默默地走到无名战士墓碑前。萨达特把花圈端正地放好，倒退几步，立正，然后缓缓地举手向英雄敬礼。烈士一腔热血，英

雄胸前勋章。每个活下来的人都不能忘记为祖国牺牲的人们——有名的和无名的，大人物和列兵，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萨达特敬礼的手久久没有放下，他注视着墓碑，像是在沉思着什么。

雄壮的军乐奏响了，阅兵正式开始。步兵方队首先接受检阅。步兵们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同一瞬间，随着响亮的口令，头“刷”地一下转向右边的检阅台，向总统、埃及武装总司令行注目礼。萨达特伫立着，面容严肃、庄严，举手还礼。

坦克、装甲车尾随着步兵隆隆驶过。金戈铁马，好不威风。

几乎同时，一队伞兵从天而降，恰好落在检阅台前，他们向总统行持枪礼。

萨达特再次举手还礼。

受阅部队继续通过。萨达特突然感到一阵阵疲乏袭来，他紧紧地皱了一下眉头，坐了下来，又拿起心爱的烟斗。

萨达特对阅兵已习以为常了。除了每年的国庆、“十六”两大节日外，他每次出访、国内巡视都要阅兵。他是军人出身，对

军人有着偏爱，相信武力能征服一切，但最近在国内遇到了麻烦，虽然

动用军队进行了大搜捕，效果却不佳。人们对他的不满情绪强烈，国际上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对他的谴责之声不绝。军

人对军事比较敏感，判断正确，但在政治上的选择往往是错误的。近来的政治问题搞得他心力交瘁。私人秘书哈菲兹对此观察得细致入微，他走到萨达特身边悄声问道：“总统阁下，您的身体？”

萨达特举起拿烟斗的右手，示意哈菲兹别吱声，然后用烟斗指了指正在通过检阅台的队伍。

炮兵分队向检阅台走来，在滚滚扬起的尘土中，军用卡车牵引着大炮隆隆驶过。炮兵分队的到来，使萨达特顿时兴奋起来。火炮是战争之神，十月战争时，埃及军队一举突破“巴列夫防线”，全歼以色列的装甲旅，靠的便是火炮。他看着一尊上仰的炮管，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正在这时，六架海市蜃楼式战斗机从远处呼啸而来，俯冲而下，几乎擦着检阅台顶端而过。空军的表演惊险、刺激，俯冲时人们几乎将心提到了喉咙口，直到飞机掠过检阅台才松了口气。

萨达特叼着烟斗，仰着脸聚精会神地凝视着飞机。空军的特技表演也是萨达特特别喜欢的军事表演项目，但他今天却未露出像往常那样的兴奋笑容。

飞机迅速爬高，机尾喷出了红白蓝三色的彩烟，宛如白云中悬下了彩带，壮观如画，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幸福与欣慰之中。这些都显示了埃及国防力量的强大，表明埃及受以色列侵略的时代，自1973年10月一去不复返了。

在人们仰望长空，观赏飞机进行的精彩表演时，突然，一辆受阅的炮车在检阅台前停下，哈立德从驾驶室里像松鼠般敏捷地飞身而下，向前冲出两步，随即投出一枚手榴弹。手榴弹在检阅台前爆炸。与此同时，侯赛因从卡车上站起来用机枪朝总统所在的方向扫射。首发命中，第一枪便击中了萨达特的颈部，正是这致命的一枪使萨达特毙命。在侯赛因扫射时，卡车司机和哈立德的另两名助手也跳下车来，藏在检阅台后面，雷海尔抛出一枚枚手榴弹，在卡车和检阅台之间爆炸了。一时间，检阅台上下硝烟滚滚，热血横流。

这突如其来的猛烈袭击，惊呆了在场的人们，许多人都还以为这是阅兵式的一项精彩内容呢。当哈立德的第一颗手榴弹爆炸后，只有秘书哈菲兹明白过来。他大叫“刺客”，奋不顾身地向萨达特扑去，一面大声疾呼：“卧倒！快卧倒！总统！！”

萨达特看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也听到了哈菲兹声嘶力竭的呼喊，但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像铁塔一样屹立着，两眼炯炯发光，注视着发了疯的哈立德。这是英雄与疯子的较量，哈立德一心要杀死萨达特，萨达特则企图以他的威严、他的精神吓退哈立德。

手榴弹突然在检阅台前爆炸，萨达特本能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应该说 he 比秘书哈菲兹反应更快。他应卧倒，但萨达特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不仅仅是总统，还是三军统帅，他身上佩带的勋章和绶带，正闪耀着威严的光辉。他戎马一生，在早年推翻法鲁克王朝的斗争中，在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无数次的鏖战中，他曾遇到过无数次的危机，都没有畏缩后退过，也没有胆怯。此刻他能不顾尊严，像狗一样蜷伏在地上，像怯懦的小人一样钻到桌子下吗？不，不能，他相信真主，真主会保佑他的。他自信没有人能夺取他的生命。

然而他错了。胜利可以让人自豪、自信，也容易使人固执，这是萨达特

有生以来由于自信所犯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错误。

侯赛因不愧为神枪手，他不仅首发命中，而且那长长的一串子弹，一个长长的点射，全部击中目标。萨达特的全身像筛子一样向外喷着血。

萨达特倒下了，但他不是瘫下去的，是直挺挺倒下的。

萨达特倒在血泊中，殷红的血还在泊泊地流着，他的面容依然沉着、平静，只是偶尔抽动一下，大概是枪伤引起的疼痛。他的嘴角微微地翁动着，似乎用了极大的努力，缓缓发出一串不连贯的、模模糊糊的声音：“不可思议。”这是他留给埃及的最后一句话。

萨达特完全处于昏迷状态，血压和脉搏全没了，身体各部分均无反射机能。他死了。医生们竭尽全力，使遍了浑身的解数，但都无济于事。萨达特从颈部、前胸到手臂、双膝，全都中弹，以至于医生们一时无法查清到底有多少子弹击中了他魁梧的身躯。医生们不得不在总统死亡证明书上签下了他们的名字。

在检阅台上同时还有7人被打死，28人受伤。

萨达特用自己的鲜血为自己的军事、政治生涯划上了句号。他的鲜血溅洒在勋章上，也浸透了绶带，绶带上所缀的星星也因浸染着渐渐凝固的鲜血而变得黯淡无光。

萨达特终于离开了埃及，他的眼睛始终睁着，仿佛在思索着什么。或许他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幕。他是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去见真主的。

哈立德的目的达到了，他与侯赛因等同伙杀死了萨达特。他的下场很明显，他对自己所做之事、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

事后的审讯中，哈立德交代了刺杀萨达特的原因：

- （一）最近许多穆斯林领袖被捕，并受到迫害和辱悔；
- （二）埃及现行法律与伊斯兰教法相悖；
- （三）政府与犹太人讲和。

换句话说，他之所以行刺，是因为对国内社会、经济状况不满，对戴维营协议不满，对政府压迫不满。哈立德等四人在审讯后被处决。

在宗教国家，在一个军人专制的国家，政府在制定内外政策的时候，国家领导人在采取某项重大行动的时候，让大多数人理解是必要的，如果一些人不理解又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不知究竟该由谁来回答。

1982年4月24日，以色列军队按照戴维营协议全部撤出西奈半岛，被以色列占领15年的领土终于回到了埃及人民的手中。埃及举国上下沉浸在领土失而复得的欢乐中。为了这一天，萨达特在当总统的11年中，把人民带入了战争，也主动地把国家带入了和平，无论他的人民对他是否理解，无论国内外各界对他本人的评价如何，他都始终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就是要洗刷耻辱，要让埃及这个古老国家扬眉吐气。然而，他去了，再也看不到埃及人民为庆祝收复失地而举行的盛大壮观场面了。他已不能分享这胜利的喜悦，但他毕竟可以瞑目、含笑九泉了，因为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在举国同庆的时刻，萨达特总统长眠在胜利广场，他的墓地与无名战士墓紧紧相依。他应当和他的战士在一起，因为，在埃及人民的眼里，他毕竟是一位有名字的伟大战士。

用生命赌一场危险的游戏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被刺案

用砍掉脑袋的办法治头痛

1977年3月22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领导的国大党在大选中选票远远低于人民党，面对残酷的现实，她痛苦地宣布“尊重人民的裁决”，正式提出了辞呈。人们评论：“英迪拉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华盖当头，次年底，英·甘地刚获得议员席位，便被人民党控制的议会开除，等待她的是冰凉的手铐。面对逆境，她向一群哭哭啼啼的国大党的妇女党员平静地朗诵道：

同我告别的时候，请祝我好运，
高高兴兴，眼中不藏一小滴泪，
留给我一个微笑，
我能挺过
所有我离开的日子。

时隔两年，1980年1月，又到了全国大选的日子，“前度刘郎今又来”，英迪拉在选民的欢呼和笑脸中，像年轻人一样，迈着轻盈的步伐，走上台去。她身着白色的纱丽，额前一缕白发，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英迪拉的“商标”。她再一次执掌大权，登上南亚次大陆最大国家的总理的宝座。为了这梦寐以求的一刻，她甘冒风险，去与锡克教极端派首领、被锡克教徒称为“旁遮普邦的霍梅尼”的宗教首领宾德兰瓦勒会面。

宾德兰瓦勒是锡克教的一名普通传教士，有信仰，有激情，像一切宗教首领一样，他对教徒有着独特的魅力。他用一种有魔力的声音描述锡克教理想中的天堂，使教徒们如痴如醉，甘愿赴死。他的信徒越来越多，几年间，他便成了一个能左右旁遮普邦局势的关键人物。他的话，被当地的锡克教农民奉为“圣谕”。

锡克教内部有阿卡利党、锡克教极端派和“卡利斯坦独立国运动”等组织，斗争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主张和平斗争、有的主张武装斗争，有的在外国建立“卡利斯坦流亡政府”。他们之间也有很深的矛盾，但要求独立的大目标是一致的。

为了重新在大选中获胜、与锡克人的阿卡利党抗衡，也为了获得在旁遮普邦选举的胜利、击败人民党，英·甘地违背了父亲尼赫鲁生前的至理名言——教派主义是威胁印度生存的最大危险之一——转而依赖于教派。

这条寓意深刻的名言，是在鲜血和惨痛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是印度独立以来一直困扰其统治者的问题。稍有不慎，民族和宗教问题便可能变成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从而炸毁这个国家。

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国家。人口在千万以上的民族有10个以上，独立后宪法上承认的语言便有15种；国内宗教有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等，居民中有83%信印度教、11%信伊斯兰教、6%信锡克教。

印度独立前，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尤为激烈。穆斯林要求在穆斯林人口占80%的西北印度建立巴基斯坦国，但是，这个主张遭到圣雄甘地和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的反对，他们坚持“一党制的民族主义政策”。

1946年8月16日，穆斯林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宣布：这一天是穆斯林建立巴基斯坦国的“直接行动日”。真纳发出了恐怖的誓言：“要么我们挑起分治，要么我们使其毁坏殆尽。”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宗教仇杀在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中展开。在加尔各答，三天之中便有5000人丧生，2万人受伤，10万人逃离家园。动乱和暴力迅速在印度各地蔓延，达卡、东孟加拉、比哈尔、孟买各地，大规模的民族仇杀使双方拿起武器，毁灭国家、民族的战争一触即发。

英国新任总督蒙巴顿在给英国首相艾德礼的报告中说：“如果我不迅速采取行动，一场内战将在我任职期间爆发。”他提出的方案是印巴分治。即：

（一）印度分为印度教徒的印度斯坦和伊斯兰教徒的巴基斯坦，两国都获得自治地位；

（二）在印巴分治前，解决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划界问题；

（三）印度立宪会议也一分为二，归属各自国家；

（四）授予土邦自由选择加入两个自治领中任何一个的权利，如果不愿加入，可以保持与英国的原有关系，但得不到建立自治领的权利。

蒙巴顿决定：1947年8月14日午夜时分印度独立；8月15

日午夜巴基斯坦独立。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做法，引起了印度教极端分子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印度驱逐和屠杀伊斯兰教徒；在达卡等地，伊斯兰教徒也以同样的手段对待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

由于印巴分治，两国难民一支向东流，一支向西流，而边界地区匪徒出没，到处截杀，恰逢天降大雨、瘟疫四起，两国边界成

为人间地狱。从1947年8月至1948年5月，因教派仇杀而死亡的人数将近60万，约有1400万难民进行了离乡背井的大迁徙。

圣雄甘地震惊了，为了平息、停止两个民族和宗教的大屠

杀，78岁的甘地宣布：如果印度教徒不停止暴行，不退出清真寺，他将绝食而死。甘地又说，“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罪恶同样是巨大的”，“他们甚至在印度教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殿堂中诵读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甘地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巨大威望，终

于使首都新德里恢复了平静，印度教徒退出清真寺。但是，他惹恼了印度教极端主义分子，他们咒骂甘地是印度教的“叛徒”，咬牙切齿地发誓要除掉他。

1948年1月30日下午，一个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民族服务团”成员纳图拉姆·戈森用枪顶住骨瘦如柴的甘地的赤裸的胸膛，连开三枪，甘地倒下了，口中仍呼：“罗摩！罗摩！”这是印度教的神名，印度教中罗摩派认为，只要对罗摩表示虔诚，并默念他的名字，即可获得解脱。

甘地被害，举世震惊。印度政府把矛头对准极端主义分子及其组织，尼赫鲁总理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取缔了“民族服务

团”等极端组织。印度教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仇杀终于平息。

尼赫鲁痛心疾首，指出：“教派主义是因甘地的牺牲而威胁印度生存的最大危险之一。”

英·甘地为了获取锡克教在旁遮普对她的支持，竟打出了宗教牌。她向宾德兰瓦勒妥协，保证一旦掌权，便将全印度最富庶的旁遮普邦的行政管理权交给锡克人，并撤走印度中央政府委派到该邦的所有印度教的官员。

宾德兰瓦勒有自己的野心和目的，他表面支持英·甘地上台，暗地乘机扩大、发展自己的宗教势力。

英·甘地是世界上少数有魄力、果断、精明强干的女政治家之一。但是这一次，她在做割肉饲虎的买卖，用自己的生命在赌一场危险的游戏。

英·甘地曾是锡克人的女皇

锡克教是 16 世纪以来流行于南亚次大陆的宗教，是从印度教衍生出来的一个教派。“锡克”一词，源于梵文 Sikha，意为“门徒”，因教徒自称为教祖的门徒而得名。该教 1469 年由那纳克创立，教徒尊教祖那纳克是真正的祖师，奉《格兰特·沙哈》为主要经典。其教义在印度教虔诚派的基础上，汲取伊斯兰教苏菲派的秘密主义因素，主张业报轮回；提倡修行，反对祭司制度、崇拜偶像和繁琐祭仪，提倡苦行和消极遁世的态度；认为世上任何现象都是神力的最高表现，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种姓分立和歧视妇女违背神意；个人只有将灵魂和神结合起来才能得到解脱。锡克教传至第五祖古鲁（意为宗师）阿尔朱·马尔时，以阿姆利则为中心，将锡克人组成了一个宗教团体。到了第十祖古鲁时，规定锡克教徒必须蓄长发、加发梳，上衣至膝，右手戴手镯、佩剑，下着短裤。男教徒名字加“辛格”（Singh），意为“狮子”；女教徒名字加“考儿”（Kaur），意为“公主”。19 世纪英国人占领全印度后，锡克教受到很大的破坏。

锡克教徒主要分布在印度的旁遮普邦等地，近百年来，还传播到英、美、加拿大、泰国和东非诸国。

印变的锡克教徒大多是旁遮普人，一般身材高大，剽悍好斗。英国人占领印度后，印度军队中多是锡克人，被英国人称做“尚武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印度军中 22% 为锡克人。

随着二战后印度独立运动的兴起，锡克教中有人提出建立锡克人自己的国家“卡利斯坦国”的要求。1947 年 6 月，英国公布了《蒙巴顿方案》，宣布实行印巴分治。穆斯林国家的独立，无疑给锡克人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他们中虽然也有众多的组织和利益，但分离主义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主张锡克教成立卡利斯坦国，但根据宪法，锡克教隶属印度教，法律不承认它为独立宗教，其教徒被称为“带胡子的印度教徒”，因而独立的要求未能实现。

锡克人要求将他们所居住的旁遮普邦一分为二，即一个是锡克教为主的邦，另一个是印度教为主的邦，遭到尼赫鲁总理的拒绝。

1966 年，英·甘地上台不久，锡克教阿卡利党首领法泰赫·辛格宣布，如果政府不同意把旁遮普邦分成两个邦，他将像甘地一样，进行和平抗议，并绝食而死。英迪拉在锡克教的压力下被迫屈服了，同意以语言为基础，将旁遮普邦分为锡克教为主的旁遮普和印度教为主的哈里亚纳两个邦，另将双方都想争取的原首府迪巴尔划归中央管辖。

英迪拉的政策，引起了居住在旁遮普邦的极少数印度教极端分子的愤怒，他们决心给尼赫鲁的女儿、49 岁的英迪拉·甘地一个下马威。极端分子放火活活烧死了三名支持英迪拉的国大党党员，要制造一场大的动乱。

就在这个当口，南斯拉夫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到达新德里。英·甘地在为贵宾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时，便说到极端分子的暴行，她警告：“我眼里没有泪水，但心中充满了愤怒……难道这一切就是千百万自由战士和烈士们为之奋斗的结果吗？当暴力和教派纷争污染着整个气氛时，我怎能在会见外国贵宾时，高昂着头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呢？我虽然有很大的忍

耐性和宽容性，但不是没有限度的，我们必须动用一切力量来制止互相残杀。那些醉心于暴力的狂热教派、政党，正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他们不是真正的印度人，他们该受惩罚……”

英·甘地的讲话，赢得了数十万人的热烈欢呼。她得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下令出动军队，逮捕了宗教狂热分子，使锡克教与印度教的矛盾得到缓解，并获得锡克教人的支持。

1980年，英·甘地在宾德兰瓦勒的支持下，取得了在旁遮普邦的胜利。宾德兰瓦勒的势力大大扩充后，便招兵买马，在锡克族青年中招募失业者和对政府不满者，组织成一支反政府的武装，并在阿姆利则的金庙中建立总部。

对于宾德兰瓦勒的得寸进尺的分离主义做法，英·甘地绞尽脑汁进行安抚。1982年，在锡克教闹得很凶时，她宣布：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为“圣城”，禁止在金庙一带出售酒、烟和肉。她要求军队和警察严守其父尼赫鲁的训令：“绝对禁止进入金庙。”她还根据锡克人的要求，在电台增加宣传锡克教的内容，下令释放锡克教政治犯。

但是英·甘地的每一次让步，只能换来宾德兰瓦勒更嚣张的气焰，使他变得愈来愈桀骜不驯。1983年4月4日，宾德兰瓦勒的锡克教志愿军与警察发生冲突，共有2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4月25日，一名在金庙外执行任务的高级警察被庙内飞出的枪弹打死；10月6日，一群锡克教极端分子将六名印度教徒从公共汽车中拖出，殴打致死，锡克人还纵火焚车。冲突的规模开始升级：1984年1月，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发生大规模冲突，有294人死亡，伤者不计其数。

5月，有两名印度教政治家和一名新闻记者被锡克教徒殴打致死，凶手逃入金庙；6月1日，一群锡克教徒冲出金庙，向在街上巡逻执勤的警察开枪，11名警察当场毙命。警察缉凶时，凶手又逃进了金庙。金庙已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难所和罪恶的渊藪。

印度八个党派组成的反对联合阵线对英·甘地的政府施加压力，宣布说：如果英·甘地不采取行动制止旁遮普邦锡克教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八个党派将一致坚决要求她辞去总理的职务。

血洗金庙的“蓝星”行动

英·甘地忍无可忍，终于采取了第一步行动。她秘密召见西部军区司令拉吉尼·辛格·达亚乐。用锡克族的将军，制定了一个代号为“蓝星”行动的血洗金庙的计划。英·甘地最为头痛的，不是宾德兰瓦勒手下的千余名武装分子，而是金庙内万余名锡克教徒，一旦行动开始，这些人也难逃厄运，但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不容许她再犹豫了。

5月下旬，七万名政府军士兵包围了阿姆利则的金庙，坦克、大炮全对准金庙，直升机终日在上空盘旋，军队调动频繁。一切举动，都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让金庙内的锡克人放下武器，自觉地走出来。

宾德兰瓦勒和他的教徒们仿佛吃了迷魂药，除吟诵经书之外，便是修筑工事，垒起沙包，在各制高点、要隘设置机枪阵地，大量的火箭筒、手榴弹、子弹源源不断运送到各火力点，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

英·甘地政府努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绝不屈服！除非印度政府同意锡克教独立，建立卡利斯坦国，否则战斗永不停止。”

从5月30日到6月5日，整整七天了，双方剑拔弩张地僵持着。大家心里都清楚，总爆发的最后时刻不会太远了。金庙顶上安放的四只大喇叭和政

府军布置在金庙四周的大喇叭声嘶力竭地对嚷了一天之后，终于安静下来。

太阳将要落山时，彩霞满天，金光万道，洒在阿姆利则市的金庙上面，光灿灿的，令人眼花缭乱。

黄昏是那样的辉煌壮丽，天边一片血红。

横亘在阿姆利则市区阿里木查湖畔的金庙建筑群是锡克教最大的寺庙，由锡克教第五代宗师阿尔朱创建，1589年奠基，1601年落成，寺顶和大门都是用金箔或镏金装修而成，所以被人们称为金庙。庙里供奉着1604年收藏的锡克教经典《格兰特·沙哈卜》。在几百年的沧桑岁月中，金庙几经毁废，又几经振

兴。

教主宾德兰瓦勒留着整齐的须发，头上裹着十几英尺长的蓝色包布，身穿洁白的道袍，像一头白色的猛狮。他用神的启示、用锡克教教义，召唤着聚在金庙内的上万名和他的装束相同的勇猛无比的信徒和锡克教斗士。宾德兰瓦勒站在高处，双手平张着，用他带有共鸣的声音在神殿中呼唤着：“锡克教的信徒们——我们都是神的选民！”台下便发出地动山摇的吼声：“——神是战无不胜的——”

宾德兰瓦勒在这巨大的回响中陶醉，飘飘然，认为自己 and 神在一起，自己就是神，神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锡克教人几十年来前仆后继，理想就要在他的身上实现了，一个锡克教的独立国家和天堂即将成为现实。

他从5月中旬便获得了可靠的情报：印度西部军区司令拉吉尼·辛格·达亚乐将率七万大军包围神庙。

“军队不敢进入金庙。这是英·甘地父亲的遗训，作为女儿，她敢公然违反吗？”宾德兰瓦勒摇摇头，自认为不可能。他藐视英·甘地这个老太婆，他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也不是一天了，他十分熟悉对手的性格、手段和谋略：她的一只手向他摇动着胡萝卜，另一只手则挥舞着大棒，伺机猛击对方。

1981年9月21日，宾德兰瓦勒刚刚走出金庙，早已守候在金庙外的警察一拥而上，捉小鸡般将他塞进警车。锡克教徒们见他们的教主被捕，疯狂地叫喊着，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将街道拥塞得水泄不通。双方推推搡搡，冲突起来，警察用警棍、催泪瓦斯驱赶群众；锡克人使用石块、棍棒、弯弓进行还击。搏斗越来越激烈，警察的人数增至3500余名，向愤怒而失去理智的人群开枪射击。大规模流血冲突结束后，马路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和小溪一样流淌的鲜血。锡克人的包围终于被打破了，宾德兰瓦勒被关进了监狱。警察们将锡克人的尸体抛上卡车，一车车拉到城外去焚化。当局还调来十多辆消防车，用强大的高压水龙头拼命冲刷马路上的血迹，折腾了好几天。

政府逮捕宾德兰瓦勒的罪名是“随意开枪，杀死一名外国记者。”

在法庭上，宾德兰瓦勒为自己辩护说：那位外国记者违反锡克人的教规，用脚踩了金庙的门槛。他说：“金庙的门槛是神圣的，任何人不能践踏，违反的人必须死。用他的鲜血涂在金庙的门槛上，才能得到神灵的宽恕。”

法官宣布：宾德兰瓦勒犯有“杀人罪”，并宣布取缔锡克教暴力组织“全印锡克教学生联合会”；锡克人居住的旁遮普邦宵禁两年；政府不经审讯，即可监禁锡克教可疑的极端分子，监禁期可达两年；限制锡克人的新闻、言论自由。

第一个回合斗下来，宾德兰瓦勒好像处于下风。他高呼“神和锡克人在一起”的口号，被押进阴森森的黑牢。但是，他只蹲了九天，便带着胜利者

的微笑迈步出狱。原来，他手下的五名极端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劫持了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波音 707 客机，机上有 170 多名印度本国及外国乘客。劫机者以此要挟政府，要求无条件释放宾德兰瓦勒。

英·甘地想尽了各种营救旅客的方法，决定满足劫机者的要求：无罪释放宾德兰瓦勒。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胜利者，教徒们载歌载舞，像盛大的节日一样，抬着他游行。宾德兰瓦勒重回金庙之后，立即着手购买各种武器，组织锡克人武装力量，亲自进行严格挑选，将千余名有战斗经验和勇敢善斗的大胡子兵组织起来，进行各种训练，准备用战斗的方式争取建立锡克人的国家。

英·甘地又笑容可掬了。经锡克教阿卡利党的领袖龙哥瓦尔从中斡旋，英·甘地同意遵守从前的诺言：将印度的粮仓——旁遮普邦的全部行政管理权交给锡克人，承认他们的半独立地位，并撤走印度教的所有官员。

反对党和印度教徒都抱怨英·甘地政府软弱无能，他们嘲笑地说：“英迪拉·甘地总理老了，犹豫不决便是她衰老的标志，应拿出对付巴基斯坦的魄力来对付锡克族极端分子。”

但是，英·甘地心里很明白，她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宾德兰瓦勒和一个金庙，这后面站着——一个优秀的民族。虽然这个民族只是众多民族中的一个，只有 1500 多万人，在七亿多印度人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还不到 2%，但是锡克人英勇善战，在印度的 120 万军队中，锡克人便占了 15.6 万，有十几名优秀的将领。他们几乎完全控制了国家安全部门、机场、交通运输部门。政府中的高级官员，甚至现任总统宰尔·辛格也是锡克人。

攻打金庙，意味着向锡克人开战，后果是什么？她投鼠忌器。尽管印度议会已赋予她特权，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她可以在认为最合适的时机，命令军队迅速行动。然而，她还在等待，希望宾德兰瓦勒能让步。

这是一个新的回合的较量。宾德兰瓦勒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让人转告英·甘地：“政府必须同意锡克教成立独立的卡利斯坦国，将首都定在昌迪加尔，圣城为阿姆利则。否则，从 6 月 5 日起，我将命令锡克人烧毁多余的粮库，禁止将一粒粮食运出旁遮普邦，并且每天暗杀一位知名人士，直到政府让步为止。”

英·甘地拒绝咽下这杯苦酒。6 月 2 日，她走进印度全国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她警告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容忍分离主义分裂国家的行为，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容忍恐怖分子杀害无辜人士的暴行。除非宾德兰瓦勒和叛乱分子放下武器，走出金庙与政府谈判，否则，政府将对金庙内的武装分子实行毫不手软的打击！”

印度洋的海风是吹不到内陆的西北高原上的，英·甘地的讲话，同样被金庙内的极端分子当成了耳边风。金庙外，政府军的大喇叭一次次反复播送政府的最后警告与通牒。金庙里，宾德兰瓦勒却自信地认为：神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9000 余名锡克教徒和 1000 多名武装分子，同仇敌忾，决心抵抗到胜利为止。

宾德兰瓦勒缓缓地登上了金庙的最高处，在绚丽的晚霞中，他的白袍被映得血红血红的，在晚风中飘动着。望着湖对面的政府军的坦克和大炮，他的嘴角上分明泛起一丝嘲笑。他俯瞰金庙内外的沙包、工事，认为只要再坚持两天，英·甘地必会屈服。

6 月 6 日凌晨，当残月挂在天边，东方泛起一丝鱼肚白时，阿里木查湖

的对岸火光一闪，一发炮弹凄厉地呼啸而来，在金庙大门前爆炸。

宾德兰瓦勒仇恨的脸愤怒地扭曲着，他高呼：“圣战开始了，锡克族男女老少都要拿起武器，向异教徒们复仇，在血泊中建立一个全新的卡利斯坦国。神和我们在一起。”

锡克教徒慌乱了一阵，终于各就各位，严阵以待。大地像地震般抖动着，政府军的野战炮弹不断飞来，通往金庙的各个路口，都有匍匐前进的士兵，他们利用黎明前的黑暗，努力朝金庙靠近。

双方激烈地交战着，各种曳光弹成串飞向对方，交织成网，像流星，如飞蝗，枪声、炮声震耳欲聋。

天渐渐亮了，士兵们呐喊着冲向金庙，冲到了金庙外的广场上。庙里的锡克族战士也不含糊，从沙包中、堡垒里和掩蔽所中猛烈地开火，政府军的士兵成了他们的靶子，冲锋不久便像潮水一样退了回去，金庙前的广场上留下了十几具政府军士兵的尸体。

坦克开始行动，炮塔转动开火，金庙墙上被打穿几个窟窿，机枪在疯狂地扫射着，新的进攻又开始了。

宾德兰瓦勒好不后悔，有人曾劝他购买大炮，以对付政府军可能的进攻，但他拒绝了。坦克的威力，使锡克人的抵抗显得无力。宾德兰瓦勒命令锡克战士扛出几个火箭筒，瞄准坦克开火。一辆坦克的履带被击中起火，无法动弹，金庙内一片欢呼。一次新的进攻，又被打退了。

宾德兰瓦勒巡视金庙各处，只见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妇女们在紧急抢救伤员，老人和孩子们忙于运送子弹和手榴弹。库存的轻、重机枪、火箭筒都抬了出来。工事里、沙包上都有被打死的兄弟，他们被抬到圣殿内，身上、脸上的血迹被擦去。宾德兰瓦勒为死去的人诵经祈祷。

火辣辣的太阳照耀着阿姆利则，金庙内外到处是血和火，隆隆的炮声中，新的进攻又开始了。形势渐渐有利于政府军，政府军的攻势更加猛烈。锡克人抵抗逐渐减弱，教徒的血淌到庙外，

旧旧地流着，像一条条小溪。金庙内更多的教徒的尸体相互叠压着，活着的人都捡起了枪，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为神、为卡利斯坦国而献身。

开阔地的政府军士兵的尸体也在增多。活着的人躲到坦克后面，坦克终于“嘎嘎”开动了，进入到广场前，几辆坦克交替开火，终于压住了对方的火力。

政府军的大喇叭也响了，一遍又一遍敦促庙里的锡克教徒和宾德兰瓦勒向政府投降。

宾德兰瓦勒的回答是：“不……决不放下武器，要么战死，要么复活！”他操起一支AK47型冲锋枪，全身疯狂愤怒地抖动着，对准政府军的坦克，叫着射出一梭子弹。

锡克教1000多名训练有素的战士终于抵挡不住数十倍于自己的政府军士兵的猛烈进攻，死伤殆尽。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傍晚时分，政府军的坦克终于冲垮了金庙大院的围墙。士兵

们冲进金庙，与躲藏在各隐蔽处的锡克教徒逐点展开枪战，手榴弹到处乱飞，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坦克喷着火，野战炮还在射击。庙内的尸体一层又一层，锡克人的抵抗越来越微弱。

宾德兰瓦勒是锡克族的英雄，他是在激战中被打死的。当政府军士兵发

现圣殿中一个端着冲锋枪像发疯一样的人正是锡克教的教主时，十几枝枪不约而同瞄准了他。他的身躯在密集的弹雨中猛然抽搐着，扔下了手中的枪。他死得很勇敢，有人数过，他身上有72处伤口在冒血，手中还紧紧抓着《圣经》。

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政府军终于冲进了金庙，250名锡克教徒死亡，90余人受伤，458人被俘；政府军阵亡59人，伤110余人。锡克人的尸体被一卡车一卡车拉到城外，在大火中焚烧。一切归于寂静时，锡克人的心被仇恨笼罩着。这是一个永远难消的仇恨。

冲锋枪声，从总理府传出1972年1月26日，英·甘地在国庆阅兵式上，乘坐苏制军用吉普车，检阅印度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在人民的眼中，她俨然是威风凛凛的女神杜尔加。（杜尔加是位长着10只手臂，每只手上都挥舞着刀剑的女神，她骑着一只猛虎，所向无敌。）

1984年6月的一天，英·甘地依然坐着一辆苏制吉普车，来到了金庙前。硝烟尚未散尽，空气中还弥漫着血腥味，断垣残壁，弹洞犹存，圣殿之中，血迹斑斑。

身穿洁白纱丽的甘地夫人缓缓走下吉普车，努力收敛战神的形象，小心翼翼来到金庙前，脱掉脚上的鞋，用一条白绸巾包任头，俯下身去，用右手掌心轻轻拂过门槛，抹向额头。随后，她立起身，赤足迈过门槛，向圣殿走去。

她走到放着《圣经》的桌前，双手合十，深深地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对军队进攻金庙时死去的锡克族战士表示哀悼。甘地夫人的脸上挂着泪水，用哽咽的声音说：“我们并不反对任何宗教，相反，我们尊重一切宗教。但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我们必须打击教派至上主义……”她说完下跪叩头，倒退着出了圣殿。

从电视转播中看甘地夫人谒庙的情形，的确令人感动，很多人表示理解和支持。英·甘地也发表讲话说：“军队进入金庙，不应当作为胜利来庆祝。”

金庙事件发生以后，印度各地的锡克教徒都披上了黑巾，以示哀悼。他们袭击警察和印度教徒，聚众闹事，焚毁公共汽车。更多的锡克教寺庙中，挂起了建立“卡利斯坦国”的标语和旗帜。紧接着是锡克族士兵开始叛乱，并有人要求印度总统宰尔·辛格辞职。

目标渐渐对准了英·甘地。

6月16日，英·甘地的亲信与合作者、旁遮普邦贾朗达尔区国大党主席那尔·辛格在大街上的一家商店中被三名锡克族男子开枪打死。尸体旁用血写着“叛徒”二字。

6月29日，锡克教“流亡政府”主席贾格吉特·辛格·乔汉在英国伦敦一家电台中公然要求锡克人消灭英·甘地及其家人。

在比哈尔邦和其他四个邦，锡克族士兵发生兵变。愤怒的锡克族士兵冲进司令官普里将军的住宅，开枪打死了将军，随即冲进军火库，抢劫了军械，驾驶几十辆军车向阿姆利则进发。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锡克族士兵企图冲进圣克鲁斯机场，劫持飞机前往阿姆利则。

国家情报部门报告：有不少锡克人在国外组织敢死队，秘密潜入国内。一些锡克族士兵也携枪支潜往首都，企图进行暗杀与恐怖活动。

血洗金庙的军队撤出后，锡克教极端分子又重新占领金庙，他们叫嚷着：

“一个宾德兰瓦勒倒下去，千万个宾德兰瓦勒站起来！”政府军不得不重新占领金庙，驱逐锡克族极端分子，后又将金庙还给五名专管锡克族庙宇的长老。

英·甘地总理到处“灭火”：她派军队包围和堵截叛乱的锡克士兵；前往各地演讲，以求锡克族和印度教徒之间达成谅解。她还经常面对气势汹汹的锡克人的质问和威胁。在奥立河邦的集会上，她正苦口婆心劝说锡克教与印度教和平共处时，被台下乱哄哄的叫骂声打断。一块石头迎面飞来，正打在英迪拉的脸上，顿时鲜血流了下来，她忍住痛，艰难而又坚定地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印度的统一与国家利益，纵使我因为国效劳而死，我也感到光荣，我的每一滴血会使这个国家更加茁壮。”这句话在不久后得到验证。

英·甘地总理讲到鲜血与死亡，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军队和警察加强了首都新德里的警卫，通往总理府的赛夫琴路上布满了保安人员，并禁止汽车从那里通行。

总理府外面的警卫工作是严密的，而阴谋往往从内部发生，令人防不胜防。

锡克教极端分子盯上了总理府内的卫队，他们当中有长满络腮胡子的锡克族士兵。

印度前驻挪威大使馆代办哈林德·辛格秘密主持了谋杀甘地总理的行动。英·甘地命令军队血洗金庙后，哈林德愤而辞职。在挪威寻求政治避难时，他将10万美元的支票转交给了总理府卫队中的巡官本特·辛格。此人在总理府已干了10年，由一名普通的卫兵，逐渐提升为巡官，深受英·甘地总理的信任。有人曾劝过总理，在血洗金庙后，应撤换总理府卫队中的锡克兵，但被她拒绝了。她说：“没有理由因为别的原因换掉这些忠心耿耿的人。”

本特·辛格又在卫队中找了一名锡克族的年轻士兵萨达万特·辛格，此人21岁，进入总理府卫队才几个月，两人为了共同的复仇目标，充当了这起政治阴谋的杀手。他们秘密谋划，找一个两人都值班的时机共同动手，做到万无一失。

1984年10月31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空气清新，朝霞透过浓密的菩提树叶，将朝晖洒向总理府大院中。

6时整，英·甘地总理起床，梳洗后开始专心致志地做瑜伽，然后开始看当天的报纸，仔细阅读主要新闻，特别注意她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在西部的活动。这一年是英·甘地总理五年任期的最后一年，很快便要开始举行大选。为了争取连任，拉吉夫正在西孟加拉邦视察，与那里的国大党选民见面，为他的母亲进行竞选活动。

英·甘地总理没有和往常一样，去总理府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却不能不和一位早已约好的英国客人会见，这位客人便是著名记者、作家和导演彼得·乌斯丁诺夫。约好的会见时间是9时30分。英·甘地微笑着看着孙儿、孙女吃完早饭，去他们的母亲那儿，此时已到了9时18分了。她在镜子前略一修饰，镜里的容颜衰老而憔悴，只有额前白发依然洁白、挺拔。

门开了，英·甘地安详地走了出来，走下台阶，沿着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小径，向总理府的花园走去，她将在花园中会见英国客人。这条小径不长，她天天在这时来回，却没有想到，今天，在小径未到尽头时，她的生命却已走到尽头。

死神已降临在英迪拉身旁。

本特·辛格跟在英迪拉身后，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内心还是一阵阵哆嗦，血压升高，心脏猛烈地跳动着。他就要下手杀害一位与他朝夕相处的、深受人民尊敬的人，心里很紧张、很矛盾，但是，为了锡克族的利益，又必须杀死眼前这位弱不禁风的老人。他很希望这位老太太突然得急病死去，但这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用自己的“复仇之剑”将她除掉。此时，他的帮手，萨达万特·辛格，正站在离小径不远的拱门前。看到甘地总理一步步走近，他紧张地浑身是汗，手脚都不听使唤了。

本特·辛格突然发出了口令，按规定，拱门前的卫兵必须向总理行举枪礼。萨达万特·辛格机械地举起冲锋枪，但并没有伸直胳膊平举，却端枪到胸前，英迪拉像平常一样，带着笑，向哨兵问好，在她的目光与萨达万特的目光相接的刹那，后者心虚地垂下了双眼。这时，甘地夫人身后的本特·辛格狠狠地瞪了萨达万特一眼，暗暗骂道：“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说时迟，那时快，本特·辛格跃到英迪拉的面前，从头巾中抽出一把左轮手枪，猛扣扳机。英迪拉只来得及说一句话：“你疯了吗？”话音未落，英迪拉便倒在了地上。

正在犹豫不决的萨达万特手中的冲锋枪也响了，向着倒在地上的英迪拉弱小的身躯猛烈开火：“哒哒哒……”不过数十秒钟，很快，两人枪里的子弹都打完了。

本特·辛格向闻声赶来的卫兵们大喊：“该干的我已干完了，来干你们所要干的吧！”

卫兵们一拥而上，夺下了两名凶手的枪。但是，本特·辛格又扑向另一名士兵企图夺枪，萨达万特·辛格也拔出匕首。枪声又响了，本特·辛格被乱枪打死，萨达万特·辛格被打成重伤，再次被擒。

英·甘地躺在血泊之中，两眼无神地看着天空，再也听不见枪声和儿媳索尼娅撕心裂肺的呼喊。一切的一切都像一片云，离她越来越远，她身上十几处伤口在向外喷涌鲜血。

总理特别助理库马尔·达万命令四名警卫托起了英·甘地总理，把血流如注的身躯抬进一辆总理专用的白色防弹轿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往数公里之外的全印医学科学院。车内的索尼娅抱着婆婆的头，拼命呼唤着，英·甘地却没有任何反应。

急救室的大门打开了，十几名专家从四面八方跑向急救室，各种仪器设备陆续到位，输氧、止血、输血、开刀。经检查，英·甘地全身共被击中16颗子弹，有7颗击中腹部并穿透，一颗擦着心脏，肺、肝、肾、肠都被打破。医生们发现，总理在到急救室前已经死亡，诊断书上留下了这样的字迹：“无知觉、无脉搏，四肢冰冷，无血压，瞳孔放大，无光感，呼吸停止，未听到心音。”

医生们还在努力，他们继续输血，从英·甘地的胸部和腹部取出剩余的子弹。下午2时23分，医生们终于摘下了沾满鲜血的手套，宣布甘地总理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下午，全印广播电台、电视台中断了所有节目，播音员沉痛地向全国、全世界宣布：“英迪拉·甘地总理于10月31日上午9时20分在总理府遇刺；下午14时30分逝世。”

甘地夫人被刺三小时后，便有人打匿名电话给美联社驻新德里办事处，

声称：“这是整个锡克族的行动，我们已经报了大仇，锡克族万岁。”

英·甘地的遗体，静静地躺在尼赫鲁纪念馆中。从11月1日上午7时开始，前来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拉吉夫·甘地万分悲伤地从外地赶回，与内阁部长们轮流为英迪拉守灵。

全印度笼罩在悲痛之中。印度教、伊斯兰教等教徒都为失去了英·甘地总理而哭泣。

甘地夫人之死，震惊了世界。各国驻印度使馆官员、印度各界人士、甘地夫人生前好友，纷纷前往尼赫鲁纪念馆的灵堂、沉痛吊唁这位世界上优秀的女政治家、伟大女性的不幸逝世。

世界各国纷纷派出代表团前往新德里，参加英·甘地总理的葬礼。14位总统、7位副总统、25位总理、副总理、1位国务卿、8位外交部长、1位王储不约而同地到达印度。他们中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不丹国王旺楚克等。

11月3日，这是一个值得印度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上午11时20分，各国领导人，印度总统宰尔·辛格，内阁部长们，各邦邦长和首席部长，国大党、人民党等政党领袖，陆海空三军最高长官，尼赫鲁家族的至亲好友等，齐集尼赫鲁纪念馆为英·甘地总理送行。英·甘地的遗体被抬上门口停放的一辆苏制白色炮车。她的身上覆盖着红、白、橙三色的印度国旗，周围还撒满了白色的花。英·甘地生于1917年11月19日，遇害时离她67周岁的生日只差19天。她的遗容并不安祥，眼圈青黑，尽管化了妆，还是未能掩饰被刺时面部的伤痕。

12时30分，90名三军仪仗队队员将灵车牵引至大门口，再用军用大卡车牵引，在3000名军官组成的护灵队的护送下，开往贾穆纳河畔的尚蒂瓦纳火葬场。印度总统、各国参加葬礼的贵宾和英·甘地的亲属们分乘100多辆国产的大使牌小轿车，缓缓行驶在12公里长的马路上，路旁自发聚集着100万人，为英·甘地送行。他们悲痛欲绝，哭泣着，呼喊声，将一把把的玫瑰瓣撒向灵车。

下午3时整，灵车缓缓开进了火葬场。这里曾是英·甘地的父亲尼赫鲁火葬的地方，也是她心爱的小儿子桑贾伊火葬之处。

用砖垒成的长方形台子周围摆满了鲜花，高高的檀香木堆上，放置着英·甘地的遗体。檀香木、奶油和香料，使尸体在焚烧时发出特殊的香味。下午3时57分，拉吉夫·甘地手持火把，法师开始诵经，他围着母亲的遗体绕了7圈，用火把点燃了母亲口中含着的檀香木球，火燃烧起来了，熊熊烈焰中，英·甘地渐渐身化青烟，飞向天空。

拉吉夫·甘地泪如雨下，随着母亲的逝去，拉吉夫·甘地执政的时代开始了。英迪拉·甘地的死，阻遏了锡克族人公开宣扬的种族独立运动的进程。印度教和锡克教都不希望再有仇杀，不希望社会动乱，盼望有个安定团结、各种族和睦相处的大家庭，拉吉夫·甘地成了安定、团结的象征。

鲜花掩盖下的阴谋 ——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被刺案

迫改初衷

1980年6月20日，印度首都新德里上空白云碧天，一架崭新的单引擎双座红色滑翔机在长空翱翔，忽而翻滚，忽而直刺蓝天，地面上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帽子、手巾向蓝天欢呼。这时，飞机急转直下，人们以为这是飞机在进行特技表演，没等他们清醒过来，滑翔机便轰然一声栽到地上，机上两人活活摔死，其中一人便是英迪拉·甘地的次子桑贾伊·甘地。英迪拉·甘地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拉吉夫·甘地，次子桑贾伊·甘地。拉吉夫自幼性格内向，言语不多，甚至有些腼腆。其弟桑贾伊与拉吉夫遇然不同，性格外露，比较任性，也很淘气。入学后，拉吉夫学习勤奋，尊重老师；而桑贾伊则以淘气和不服从老师的管教而闻名。学校的老师对桑贾伊束手无策，不得不把他送回家，但他在家里也是桀骜不驯，整天和一些高级官员的公子哥们一起开车兜风，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拉吉夫在国内学成之后，被英迪拉送往英国留学，先是就读于伦敦帝国学院，后转入剑桥大学。学习期间，拉吉夫与来自意大利的同校同学索尼亚相爱，后结为夫妻。

1965年，拉吉夫结束了在剑桥的学业，回到印度，考入了印度飞行俱乐部，接受正规的飞行训练，并于1966年11月获得了飞行资格证书。1968年12月，拉吉夫正式担任了印度民航公司国内航线的飞行员，后来又升为机长。他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热爱，把飞行事业当作终身事业。他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对于政治漠不关心，不求闻达。如果说他有梦想，那就是他一心想驾驶一架最先进的飞机。

桑贾伊自英国回国后便开办了汽车公司，继而利用父母的权力从事房地产开发业，他还倒卖建筑材料，从中牟取暴利。

实事求是地说，英迪拉的两个儿子都不是从事政治的料，但英迪拉为了尼赫鲁家族在政治上的香火延续下去，一定要在两个儿子中选取政治上的接班人。通过长期观察，英迪拉得出结论：拉吉夫对政治不感兴趣，也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桑贾伊有政治头脑，有领导能力，敢作敢为，是尼赫鲁家族未来的希望。于是，她便着意在各方面培植桑贾伊。

1976年伊始，桑贾伊正式加入了青年国大党并控制了这一组织的实权，旋即又借国大党召开年会之机，公开登上了印度的政治舞台。虽然他在国大党中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但其权力急剧膨胀，很快便成为印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桑贾伊是靠其母提携上来的，他拉帮结派，飞扬跋扈。这时英迪拉执政十年，权力也已达到顶峰。

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做“好了”，一切都“好”便要“了”。这句话在英迪拉身上应验了。1977年3月，英迪拉在大选中失败，从峰颠跌入谷底，英迪拉辞去总理的职务。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1978年11月，英迪拉以参加人民院补缺选举为契机重返政坛，并于1980年1月通过选举重握总理大权。桑贾伊在母亲的政治起落中也遭到厄运。他被投入监狱，吃了苦头。英迪拉重返政坛，桑贾伊卷土重来。在英迪拉上台的5个月后，桑贾伊当上了国大党总书记。

命运好像在戏弄英迪拉，正在她踌躇满志的时候，祸从天降，桑贾伊死了。对桑贾伊的死，一部分人表示悲哀，大多数的人为此庆幸，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上帝拯救了国家。”他们认为，随着尼赫鲁这个外孙的横死，尼赫鲁家族的统治很快要结束了。他们知道：即使那个老太婆雄心不死，但毕竟是夕阳西下，力不从心了，她不可能长期统治这个国家；而她那个大儿子则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民航驾驶员，他会、他能驾驭印度这个大国吗？

然而，英迪拉偏偏做出别人认为不可能的决定。桑贾伊尸骨未寒，她就让人去做拉吉夫的工作，拉他从政。

拉吉夫对母亲的召唤犹豫不定，他愿给母亲一点帮助，但又实在不想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的妻子也十分反对丈夫从政。为此索尼娅曾苦苦哀求婆婆放过她的丈夫，甚至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哭过好几天。她曾对人说，宁愿孩子们沿街乞讨，也不愿拉吉夫·甘地走上政坛。

人们说政治人物心黑脸皮厚，心硬如铁，这三条英迪拉几乎占全了，她铁石心肠，决定的事，不容改变。拉吉夫母命难违，不得不脱下他喜欢的航空夹克衫，摘去常系在脖子上的领带，换上了国大党人的传统装束——宽松式无领衬衫长袍，戴上一顶白色甘地帽。从此拉吉夫离开了飞机驾驶舱，踏上了母亲给他准备的政治航船的甲板。

受命危难

英迪拉是政治舞台上的老手，她不可能让拉吉夫一踏上政治的航船就去掌舵。她要按已设计好的蓝图去调教这个对政治兴味索然甚至有些木讷的儿子。

起初，她为拉吉夫安排了一个非正式的职务，在总理府自己办公室的旁边为拉吉夫设了一个办公室，让他帮助处理一些日常政务，代她接见一些党政要人，有时也安排拉吉夫代她外出视察，使其获得了从政的初步经验。拉吉夫深知对母亲的事必须全心全意。印度报刊称拉吉夫为“勉为其难的新郎”，说他“政治要从ABC学起”。

1981年6月，在英迪拉安排下，拉吉夫参加了胞弟桑贾伊原来选区的补选竞选。拉吉夫初出茅庐便身手不凡。在阿梅提，拉吉夫跑遍了城市各个角落，接触了近40万人，脸上始终挂着尼赫鲁式的微笑。他在演讲时以“母亲们，兄弟们，姐妹们”开头，结束时喊一句“印度万岁”的口号，语言朴实无华，博得了民众的好感。这样他赢得了从政后的竞选胜利。

初入政坛便取得胜利，使拉吉夫对政治的兴趣有所增加。此后，他常到民间去，口碑日见看好。1982年1月，拉吉夫出任青年国大党的全国委员会委员。1983年2月，在母亲的提携下，拉吉夫又登上了国大党总书记的宝座，实际上成了印度第二号人物。

1984年10月31日，英迪拉被锡克族卫兵乱枪射杀，不治身亡。就在英迪拉还躺在手术台上接受无望的抢救时，印度的军政要人已在医院里讨论接班人的问题了。

按照印度的宪法，政府总理应由总统指定，但总统宰尔·辛格正在国外访问，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在讨论何人继任总理时，达万人曾建议援用旧例，让内阁第二把手、财政部长穆克吉当代总理，待国大党（英）选出新的议会党团领袖后再组织新政府，但穆克吉还未从西孟加拉邦回来，在场的多数人不同意这一建议。这时又有人提议由比穆克吉资历更深的内政部长纳拉西姆哈·拉奥担任总理，但拉奥不是人民院议员而是联邦院议员，按惯例不能担

任总理一职。还有人指出，拉奥作为内政部长没有保护好总理已属失职，怎么能让其当总理？参加讨论的石油部长瓦森特·塞蒂说：“英迪拉生前要儿子接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为了稳定局势，应按她的意愿办。”为了证明自己的提议有法律根据，他还引用了宪法条文。法律和司法部长希夫·尚卡尔对此方案表示支持，话说到这里，大家不再提出异议。这样，临时过渡的方案被推翻，国大党准备按照英迪拉久有的安排，由拉吉夫·甘地出任总理，组织新的内阁。

英迪拉遇刺时，拉吉夫正在西孟加拉邦视察，并为母亲进行竞选活动。拉吉夫驱车出席一个群众集会途中，一辆警方的吉普车拦住了他，说是总理府出了事，要他立即返回。拉吉夫预感情况不妙，在去新德里的飞机上，他从英国 BBC 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听到了母亲遇刺但生死不明的消息。

拉吉夫在严密的保护下来到医院，他抑制住悲伤同大家打招呼，然后看望死去的母亲。站在婆婆遗体一旁的索尼娅一见到自己的丈夫，就紧紧地抱住他，泪如雨下。这时索尼娅已知道新德里高级军政人员讨论的结果。她苦苦哀求丈夫不要接受那顶带荆棘的“王冠”，她实在害怕自己的丈夫步婆婆的后尘。但此时拉吉夫主意已定，他双手拥抱自己的妻子，吻着她的前额，低声同她细谈，试图说服她同意自己的决定。首席秘书亚历山大走进房间，对拉吉夫说有事相商。拉吉夫会意地对索尼娅说，他以后也许会被杀害，但别无选择。

在英迪拉被刺九个小时之后，即当日下午 6 时 55 分，拉吉夫·甘地在印度总统府阿育王大厅宣誓就任总理。他是尼赫鲁家族中的第四代，第三位总理，也是印度历史上的第六任总理。

崭露头角

拉吉夫就任总理时，由英迪拉被刺造成的纷繁芜杂的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局面更加危险和复杂。英迪拉被刺是锡克教徒对政府镇压锡克教极端主义分子的报复行动，而锡克教的这一报复行动又直接导致了印度教徒对锡克教徒的过激反应。在英迪拉被刺当天，印度教徒便在全国开始了报复性仇杀活动，他们焚烧锡克族驾驶的公共汽车和电车，袭击和破坏锡克族的寺庙，在锡克教徒居住区发生了混战，甚至对锡克族的总统宰尔·辛格也进行了袭击。拉吉夫宣誓就任总理后，强忍心头的悲痛，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国民克制，不要让感情蒙蔽理智。他说：“我们不能让自己冲动起来，因为愤怒只会导致犯错误。”

继而他又提出要不惜一切维护国家的完整和国人的生命财产。与此同时，拉吉夫成立了中央控制中心并采取了严厉措施，下达了就地枪决制造混乱分子等命令。

11 月 3 日后，首都新德里恢复了平静，各邦也很少再出现骚乱。

11 月 12 日，拉吉夫在就任总理后第一次向全国发表施政演说，表示自己要继续继承英迪拉·甘地的政策，以迅速消除贫困为

目标，和中国等周边国家改善关系，迎接挑战，克服前进中的困难。

对拉吉夫的施政演说，印度报界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这是“一篇谨慎而又积极的讲话”，是一声“响亮的号角”，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12 月 24 日，印度实行第八次大选，拉吉夫利用先辈留下的有利条件参加竞选。他意识到印度经过这次大骚乱之后，百姓十分渴望稳定，将稳定作为竞选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选民们看到拉吉夫在母亲被杀之后，以国家

利益为重，果断地平息了全国骚乱，使国家稳定下来，对这位年轻人的信任大大增强了。选举结果，在 508 个席位中，以拉吉夫为首的国大党（英）获得了 403 个席位，占总数的五分之四，大大超过尼赫鲁和英迪拉领导国大党时历届竞选中的最高席数（366 席），也大大高于印度国内外的各种预测。1984 年 12 月 31 日 17 时，拉吉夫·甘地宣誓就任印度总理。

拉吉夫就任后，为部长们制定了“有效率、廉正、出成果”三条标准。他一上台就制定了新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减少国家的干预、扩大市场的作用，吸收外国技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生产。

为了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拉吉夫在上台的头三年中访问了 52 个国家，平均每九天就有一天在国外。1988 年 12 月，拉吉夫访问中国，邓小平同志接见了。这次访问使中印关系有了新进展。

危险在向他靠近

拉吉夫·甘地上台之初可谓春风得意，但好景不长，很快便出现了危机。

1987 年，拉吉夫政府中出现了在军火交易中拿回扣的“博福斯”风波，严重损害了拉吉夫“廉洁先生”的形象。刚刚平定的骚乱又开始抬头，民族矛盾再次激化。拉吉夫与总统宰尔·辛格之间也出现了裂痕。拉吉夫当上总理后，提拔了表兄阿兰·尼赫鲁，使其担任了国大党（英）的总书记、电力国务部长、内政国务部长等职，大有政府第二把手的架势。尔后拉吉夫为了减少反

对派攻击的口实，便动手削减这位表兄的权力。但这位表兄不理解他，联络政府中的要员从事反对拉吉夫的活动，拉吉夫不得不于 1987 年 7 月将其开除出国大党（英）。在此前后被迫辞职的还有不少政府部长及其他官员。拉吉夫虽清除了反对派，但也削弱了自己的统治力量。

反对党趁国大党（英）发生内讧之际也加紧了反对拉吉夫的活动。1987 年反对党由“博福斯”案发难，要求拉吉夫辞职，拉吉夫对此不予理会。接着 12 个反对党的 104 名议员集体辞职

以示抗议。8 月 30 日，反对党还发动了要求甘地总理辞职的总罢工。1989 年 10 月 13 日，国大党（英）提出的两项乡村和城市地方自治的宪法修正案，在联邦院因赞成的人数未能达到三分之一而被否决。

在这种形势下，国大党（英）政府于 1989 年 10 月 17 日决定提前举行第九届大选。11 月 22 日大选开始，26 日大选结束。结果，国大党（英）仅获得 193 席，虽是人民院中的最大党，但席位不到半数。拉吉夫在这种情况下表示，不愿在国大党（英）在人民院的席位不到半数的情况下去组织联合政府，并于 11 月 29 日正式提出辞呈。

12 月 1 日，维·普·辛格当选人民党议会党团领袖，次日就任总理。拉吉夫担任了第九届人民院的反对党领袖。

拉吉夫在总理任上，危险也时刻伴随着他。他是靠母亲的荫护上任的，其母造成的民族对立、特别是对锡克族的屠杀并不因英迪拉·甘地被刺而一笔勾销。拉吉夫作为英迪拉的儿子，锡克族必然将对英迪拉的余恨发泄到他身上，尽管他做出了民族和解的姿态，也不能完全化解锡克族对他的仇恨。

1986 年 10 月 2 日是印度圣雄甘地诞辰 117 周年纪念日，每年印度的总理都要来甘地墓地扫墓。为了暗杀拉吉夫，一个锡克族青年早早地查看了地

形，并于半个月前隐藏起来，等待拉吉夫的到来。

10月2日上午，拉吉夫在保安人员的严密保卫下来到甘地的墓地，在经过一片草地和灌木丛时，警卫人员似乎听到“叭”的一声响。由于附近十分嘈杂，警卫人员误以为是摩托车排放废气的声音，因而未引起重视。但当拉吉夫参加完纪念仪式再次经过那片灌木丛时，警卫人员又听见“叭”的一声。这次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得十分清楚，是手枪射击的声音。训练有素的警卫人员立刻在拉吉夫·甘地身边围成一个圈，簇拥着他上了防弹车，迅速离开了现场，其余的警卫人员在现场搜查。警卫人员在灌木丛中抓到了这位锡克族青年。这位青年使用的是自制的土枪，装填子弹比较麻烦，而且枪法也不准，才使拉吉夫·甘地免遭枪杀。

鉴于拉吉夫·甘地成为恐怖主义攻击的目标，以及英迪拉被刺身亡的教训，印度政府加强了对拉吉夫·甘地的保护措施。政府成立了拥有1500人的特别卫队，他们大都忠心耿耿，年轻力壮，技艺高超。每当拉吉夫·甘地出现在公开场合时，特别卫队都要围成一个严密的警戒圈，以确保拉吉夫·甘地的安全。

尽管对拉吉夫警卫措施相当严密，拉吉夫仍难免遭到心怀不满者的暗算。

1987年，拉吉夫·甘地政府与斯里兰卡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派军队监督斯里兰卡政府和泰米尔猛虎组织停火。其间印度军队卷入双方武装冲突，帮助斯里兰卡政府镇压泰米尔人。印度自70年代起推行武装援助泰米尔分裂主义政策，此次调转了枪口，对付泰米尔人，泰米尔人对此怀恨在心。

1987年7月底，拉吉夫·甘地出访斯里兰卡，在同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签署印斯和平协议后，准备在机场检阅斯里兰卡三军仪仗队。在检阅过程中，一名仪仗队员突然从队伍中冲出来，举起枪托向拉吉夫头部击去。拉吉夫·甘地反应很快，他下意识地举直左手，挡住了砸往头上的枪托，再次幸免于难。中国有句话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对拉吉夫·甘地适用不适用呢？事实作了回答。

周密的暗杀计划

拉吉夫·甘地于1989年底成为在野之人，但他与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结下的仇恨却不容易化解。1990年11月底，猛虎组织领导人帕拉巴卡在斯里兰卡北部贾夫纳丛林的一个秘密指挥部里召集领导成员开会，分析印度的发展趋势。经过讨论，他们认为印度现任的以钱德拉·谢卡尔为首的社会主义人民党政府将是短命的，拉吉夫·甘地极有可能在1991年重新上台执政。而他一上台，极有可能再次向斯里兰卡派驻维持和平部队，镇压猛虎组织，甚至捣毁猛虎组织设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活动基地。会议决定，必须在拉吉夫·甘地上台之前将其暗杀掉，否则，他一旦上台，就很难对他下手。

会后，暗杀的准备工作的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帕拉巴卡亲自指定了四名精明强干的中层指挥官并进行了分工：巴比负责组织人员和安排庇护所；穆苏拉贾负责通讯联络和财政；穆鲁根兼管上述人离开印度后的工作；西瓦拉桑负责领导整个暗杀行动小组。会议结束后不久，巴比便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马德拉斯的舒巴新闻照像馆和一个印刷所建立了暗杀小组的活动据点。

采用什么方法暗杀拉吉夫·甘地？对此猛虎组织也考虑了很久。鉴于拉吉夫·甘地警卫比较严密，警惕性高，采用定时炸弹和枪击的办法不容易奏

效。经过反复考虑、论证，猛虎组织决定采用其惯用的“人体炸弹”的做法。前不久，他们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炸死了斯里兰卡国防部长韦杰拉通。

制造炸弹的任务交给了猛虎组织的忠实成员、电子专家帕鲁里巴。帕鲁里巴接受任务后精心设计制造了一种腰带炸弹，他在腰带上安装了六枚炸弹，每枚重 80 克，炸弹中共安放了 2800 个碎片，杀伤力极强。炸弹间用银丝与电路相连，装有保险引爆两个套环开关，用 9 伏电池引爆，以做到万无一失。制成的腰带炸弹最后安装在特别的绿粗背心上。这一“人体炸弹”经西瓦拉桑亲自检查，定为完全合格。

1991 年 3 月，随着印度大选的展开，猛虎组织暗杀拉吉夫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充当人体炸弹的人选是完成暗杀任务的关键，炸弹的设计和制造几乎是完美无缺，作为炸弹载体的人必须沉着、冷静、富有献身精神。经过帕拉巴卡兰的亲自选定，决定由西瓦拉桑的表妹达努和一名叫苏帕的妇女组成自杀敢死队。达努负责行刺，苏帕担任替补杀手。

达努的真名叫佳达丽，长得十分漂亮，曾遭印度军队的污辱。她曾发誓不雪耻辱决不为人，杀死拉吉夫·甘地以雪心头之恨是她的夙愿。因此，西瓦拉桑一把任务讲明，达努立即十分乐意地接受下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帕拉巴卡兰要求在采取行动前必须实施演习，并把整个过程用摄像机拍下来供他审查批准。于是暗杀小组于 4 月 18 日和 5 月 12 日进行了两次模拟演习。第一次演习在马达拉斯的马德纳海滩上进行。拉吉夫·甘地正在那里参与集会，四名猛虎组织成员混在群众当中参加了集会。为了不引起警卫人员的注意，他们没有强行接近拉吉夫·甘地。

第二次模拟演习是在离马达拉斯 40 公里的一个小城进行的。当时拉吉夫·甘地同印度前总理辛格正出席一次集会。此次演习十分成功，担任杀手的达努挤到了与拉吉夫·甘地十分接近的地方，甚至已触到站在拉吉夫·甘地身旁的前总理辛格的脚，完全可以向他们行吻足礼，而这正是暗杀拉吉夫·甘地计划中的关键步骤。这次重要演习过程被猛虎组织的成员拍摄下来，达努在这次演习中的表现几乎是尽善尽美。帕拉巴卡兰看过录像后十分满意，认为执行预定的暗杀计划的时机已成熟。

粉身碎骨

从 1991 年年年初起，印度政局就动荡不安。由于教派冲突和种族矛盾造成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以钱德拉·谢卡尔为首的人民党少数派政府政绩不佳，威信下降，上台四个月便被迫辞职。这时在野两年、蛰伏已久的拉吉夫·甘地敏锐地感到：国大党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

1991 年 3 月 13 日，文卡塔拉曼总统宣布解散议会，第十届人民院的大选序幕就此拉开。

竞选一开始，作为国大党主席的拉吉夫·甘地便精神百倍，信心十足，志在必得。国大党是印度第一大党，实力雄厚。拉吉夫·甘地利用上两届政府政绩平平、威望下降的事实，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团结、统一和建立稳定政府、降低通货膨胀”的口号，迎合了广大选民渴望安定的心理，颇得民心。

形势对国大党有利，但拉吉夫·甘地仍不敢掉以轻心。他认为其他党派仍有优势，国大党要取得胜利，仍要花大力气去争取选票。

4 月，印度已进入夏季，骄阳似火。拉吉夫·甘地为赢得大选不辞劳苦地奔波。他从南到北，从荒村僻壤到繁华的城市，宣传本党的立场，指责其他党的弊端。

这次选举是在国内各类矛盾十分尖锐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大选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暴力色彩。竞选开始不久，就有上百人在与选举有关的暴力事件中丧生，舆论认为这是印度独立以来的历次大选中所没有的。

暴力事件并未引起拉吉夫·甘地对自身安全的重视。身边的人曾提醒他，但他认为1989年国大党在大选中失利的原因是脱离群众，为了体察民情、与选民交流思想，他改变了防弹衣不离身、保镖前呼后拥的做法。每到一地他都深入到选民中去，与他们握手谈心，倾听选民的意见。在比哈尔邦竞选时，他甚至没收了保镖的汽车钥匙。

拉吉夫·甘地疏于防范的举动引起保安人员的担忧和外国记者的注意。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他时提到了安全问题，他十分自信地告诉记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自己现在不是总理，因而无所畏惧。

但是，危险正在一步步地向他靠近。

5月20日，是印度大选投票的第一天，拉吉夫·甘地偕同妻子索尼娅在自己的选区投票。闻讯赶来的大批记者挤满了投票站。人们看到拉吉夫·甘地在投票时神采飞扬，脸上充满了喜悦与自信。

就在拉吉夫·甘地投票的时候，猛虎组织暗杀计划的准备工作也在严密地实施着。负责暗杀行动的西瓦拉桑在猛虎组织的成员娜丽妮设在印刷所的家中，分析从各方面搜集来的有关拉吉夫·甘地的情报。他注意到拉吉夫·甘地在竞选中经常接过群众所献的鲜花，尤其喜欢妇女献的鲜花。他不时也会把群众献给他的鲜花再转送给妇女，以争取选票。拉吉夫·甘地的这个举动正好有利于达努去接近杀害他。这个消息使西瓦拉桑兴奋异常。

就在这时，西瓦拉桑从一份剪报上得知，拉吉夫·甘地将于5月21日参加在泰米尔纳德邦斯里佩隆布杜尔镇举行的竞选集会，他立即通知达努和苏帕做好最后准备。

5月21日，拉吉夫·甘地为了迎接5月23日、26日两轮投票，风尘仆仆地赶到安得拉邦的维沙卡帕特南参加竞选集会。集会一结束，拉吉夫·甘地又马不停蹄地按计划前往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马德拉斯继续进行竞选。

拉吉夫·甘地一下飞机就立即准备前往距机场45公里远的斯里佩隆布杜尔镇，参加那里的预选集会，由于飞机故障，拉吉夫·甘地晚上9时才到达目的地。当地的警察首领以时间太晚为由，劝他取消这一计划。警方报告说，有情报表明泰米尔猛虎组织已渗透到这一地区，但拉吉夫·甘地不听劝告，坚持前往。

斯里佩隆布杜尔是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小镇。拉吉夫·甘地来此参加竞选活动的消息早已不腔而走，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儿，争睹拉吉夫·甘地的风采。

早在拉吉夫·甘地到来之前，当地国大党（英）的工作人员已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布置好了会场。他们用金盏花装饰了讲台，在通往讲台的道路上铺上了红地毯。

几乎是在拉吉夫·甘地抵达斯里佩隆布杜尔镇的同时，猛虎组织暗杀小组的成员西瓦拉桑、达努、苏帕、哈里巴布和娜丽妮也乘汽车来到了会场。杀手达努已穿好了那件炸弹背心，打扮得楚楚动人。为了掩饰面部的表情，她戴上了一副眼镜。达努手拿着一个檀香木花环，以便接近拉吉夫·甘地。舒巴照像馆的摄影师哈里巴布则带来了一部照像机，准备记录下这震惊世界的时刻。他们来到会场后，便按照演习时的安排各就各位。达努手持花环与

欢迎的群众一起站在主席台旁，哈里巴布站在记者区，西瓦拉桑则挤在主席台附近遥控暗杀行动。

晚上 10 时 10 分，拉吉夫·甘地乘车来到会场，此时会场上聚集了万余名群众，而警卫人员则寥寥无几。拉吉夫·甘地走下汽车，一边微笑着向欢呼的群众挥手致意，一边踏上了通往讲台的红地毯。

人们纷纷拥上前来向拉吉夫·甘地献花。拉吉夫·甘地笑容可掬，接受人们对他的欢呼。达努混在人群中，手捧花环一步一步向拉吉夫·甘地靠近，一切都在按照预想方案进行，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此时，达努内心只有一个念头：靠近他，再靠近他。对达努来说，靠拉吉夫·甘地越近，炸死他的把握越大。据事后在现场值勤的女警官回忆：她看到一个穿桔黄色和绿色相间衣服的妇女手捧花环挤向拉吉夫·甘地。她曾试图阻挡这个妇女，并几乎抓到了她，但拉吉夫·甘地对女警官说：“给每人一次机会吧。”于是她松开了手。

达努终于挤到了拉吉夫·甘地的身边，献上了花环，随即跪下来向拉吉夫·甘地行吻足礼。拉吉夫·甘地则弯下腰伸出手来，试图将达努扶起来，两人靠得不能再近了，时机再好不过了，达努用手扣动了引爆炸弹的开关。

人群中火光一闪，接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将人群的喧闹声打断，一股浓烟升了起来。最初几秒钟，人们被突如其来的巨响惊呆了，一些记者还以为这是欢迎拉吉夫·甘地活动的一部分。但人们很快醒悟过来，他们惊叫着寻找自己的亲人，有的连推带搡地夺路而逃，会场上乱成一团。紧接着有人发出惊呼：“我们的拉吉夫在哪里？”此时的拉吉夫已听不到呼喊了。

爆炸现场一片狼藉，到处是血、肉和断肢残臂，18 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人们已无法辨认哪一个是拉吉夫·甘地，后来，保安人员根据拉吉夫·甘地生前穿的一双运动鞋，才找到他的两条腿。拉吉夫·甘地的上身几乎被炸得粉碎，仅头余下一大半，被抛到几米远的地方。人们在爆炸现场捡到一只手表，表针正好指向 10 时 20 分。拉吉夫·甘地步其母后尘而去了。

死后余波

拉吉夫·甘地被刺的消息像晴天霹雳，惊呆了他的家人。

自拉吉夫·甘地七年前担任总理以来，索尼娅一直在担惊受怕地生活着，生怕丈夫遭到与婆婆同样的命运，现在噩梦变成了现实。索尼娅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叫。女儿普里扬卡陪伴在母亲身边，儿子拉胡尔中断了在哈佛大学的学习匆匆赶回国内。一家人沉浸在极度的悲伤之中。

拉吉夫·甘地被害，使得雄踞印度政坛 40 余年的尼赫鲁家族塌了大半个天。国大党（英）失去了最具影响和凝聚力的领导人，印度政坛失去了杰出的政治家。印度报纸称这是“民族的不幸”，“国家的悲剧”。印度一时失去了维系稳定的领导人。

拉吉夫·甘地的死讯传遍了世界，各国政要纷纷发表谈话表示哀悼，唁电像雪片似的从世界各地飞往印度。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梅杰、巴基斯坦总统谢里夫对拉吉夫·甘地的不幸逝世表示哀悼。在北京，中国总理李鹏代表中国人民对拉吉夫·甘地之死表示哀悼，称他为印度杰出的政治家、中国人民熟知的朋友，生前为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拉吉夫·甘地遇害时仅是国大党主席，未担任政府职务，但以钱德拉·谢卡尔为首的看守政府还是决定为拉吉夫·甘地举行隆重的国葬，全国放假一天，下半旗致哀。

拉吉夫·甘地被害后，为追查肇事者、缉拿元凶，印度中央调查局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负责侦破此案，同时悬赏 100 万卢比（约合 5 万美元），奖励帮助辨认刺客的人。

特别调查小组经过现场调查发现，在现场死亡的 18 人中有两人炸得最厉害，一个是拉吉夫·甘地，另一个是一名妇女，她上身被炸得粉碎，但头部完好，被抛到四米以外的地方。调查人员认为这名妇女是将炸弹绑在腰上引爆的，而这正是泰米尔猛虎组织惯用的手法。从对炸药的化验和对刺杀方式的分析判断，泰米尔猛虎组织有极大的嫌疑。

5 月 25 日，印度警方逮捕了猛虎组织的一名成员，接着顺藤摸瓜查获了在刺杀拉吉夫·甘地现场拍摄的录像带，尔后又捕获了穆鲁根、制造人体炸弹的帕鲁里巴和娜丽妮等人。穆鲁根供认了刺杀拉吉夫·甘地的经过，使得扑朔迷离的疑案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

印度警方乘胜追击，于 8 月 20 日发现了西瓦拉桑等人的踪迹，并将他们包围在班加罗尔以南某村庄的一幢房子里。经过 20 多分钟激烈的枪战，警察冲进了房屋，发现西瓦拉桑、苏帕及其他五名嫌疑犯已服用氰化物自杀。至此拉吉夫·甘地被刺案告破。

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英迪拉和拉吉夫母子二人手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双双死于非命，在印度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了罕见而令人震惊的一页。拉吉夫·甘地之死，很可能给在印度政坛上盘踞 40 年、处于显赫地位的尼赫鲁家族划上句号。

座机爆炸之谜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空中罹难

1988年8月17日下午3时50分左右，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在观看军事演习后，乘飞机返回拉瓦尔品第。飞机在空中起火爆炸，齐亚·哈克总统与29名随从全部遇难。消息传出，全世界为之震惊。齐亚·哈克总统罹难，标志着他对巴基斯坦11年统治的结束。

不流血的政变

1977年7月5日，巴基斯坦电台向全世界报道了一条重大新闻：在格林尼治时间2时30分，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接管了政权，并且对包括布托总理在内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全部政治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的领导人实行拘捕。军方发言人声称：巴基斯坦的局势正常，全国各地都很平静。

这次政变是在布托政府和反对党巴基斯坦全国联盟会谈失败之后不到24小时发生的。

军队成立了由三军司令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担任军政府的首脑，这表明从1971年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巴基斯坦文官统治宣告结束。

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1924年生于旁遮普，参军后一帆风顺。1972年3月1日，布托总理越过四名军阶比他高的将领，将他破格提升为上将陆军总参谋长，使他成了军队中的第二号人物。

对于这次政变，齐亚·哈克说，他原先并未打算介入布托总理和反对派长达四个月的纠纷，但作为最后手段，他采取了行动。他在伊斯兰堡向200名官员发表讲话，表示军事接管只保持三个月，目的是要在今后三个月里为选举奠定应有的基础。

齐亚·哈克在政变后到卡拉奇视察，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他向国父真纳的墓地献花圈时，聚集在那里的几百人中有人喊出了“哈克将军万岁”的口号。齐亚·哈克说他将鼓励被废黜的布托参加10月份的竞选。有人问他：“如果布托参加竞选并且获胜，你对他会怎样？”齐亚·哈克回答说：“他就当总理，我当陆军参谋长。我将比以前更利索地向他敬礼。”齐亚·哈克在会见合众国际社记者时还谈到过去他曾多次警告布托，除非同反对党达成协议、结束暴力冲突，否则军队将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他认为布托的代理人3月份操纵全国选举造成了历时四个月的政党间的暴力冲突。他说：“操纵选举并不是布托搞的，而是布托的部下和行政人员搞的，他们渴望以此来表明他们对布托的忠诚，真是太多余了。”

齐亚·哈克将军首先会见了反对党巴基斯坦全国联盟主席马哈茂德，后来又会见了布托，主要讨论了这个国家的政局和预定在10月份举行的大选。事后，哈克对记者说：“军队对执政党和反对党双方的政治活动家是同样尊重的。”

接着，两派领导人获准在拘留地会见各自的人员。

清除政敌布托

7月28日，布托和其他15名政治家在被关押20多天后获释。齐亚·哈克分别同他们举行了会谈。他把已颁布的在竞选期间各政党必须遵守的一些条例告诉了它们。条例中规定，凡是阻挠、妨碍或宣传反对举行大选的人，都要被判处七年徒刑。

布托的人民党是巴基斯坦的一个大党，布托出狱后对竞选充满了信心。他对记者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可以看出，不管怎样用不正当的手段对付我，人民是支持我的。”

有的记者问布托，如果他重新当选总理，对赶他下台的将领将采取什么态度？布托回答说，他没有报复心，不想改组武装部队。

从布托的家乡拉卡纳到卡拉奇，布托沿途受到成千上万群众的欢迎，他一路进行竞选演说，对选举充满了信心。

在布托进行竞选活动时，有两名政界反对派领导人曾要求审讯布托“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犯下的罪行”。由军方组成的调查班子也在进行着调查工作，重点调查传闻中的布托在执政五年半期间的贪污、政治谋杀和其他的营私舞弊行为。

显然，齐亚·哈克要阻止布托参加竞选是不可能的，甚至阻挡布托当选也是不可能的。因而，齐亚·哈克在会见布托时，在公众场合，都对布托及其人民党参加竞选表示欢迎。但与此同时，军方亦在抓紧调查布托的上述“罪行”。布托明白齐亚·哈克的用意，他说：“军管当局要我们参加竞选，但是希望我们落选。”布托也曾当面对齐亚·哈克说：“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名誉和尊严比选举结果更重要。”他希望到法庭去为自己辩护。

但是，现在齐亚·哈克掌权，布托在野，他有足够的权力对付布托。他曾在公开场合说，布托政府的错误已经开始被揭露出来，军队正在调查。齐亚·哈克又说，军管政府采取不对政治领导人起诉的政策、因为“那样的话可能被误解为我们支持一方”，“我们将把足够的材料——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留给新政府去处理。”齐亚·哈克接着把讲话的重点转移到布托身上，他说，拉合尔有些人已经控告前总理和其他已下台的官员授意制造政治性谋杀和绑架。如果非军事法庭对布托起诉，布托“应该作为一个公民承担其事”，如果布托觉得冤枉，他有权申诉。

齐亚·哈克还就布托抱怨军政府逮捕人民党工作人员一事说：“有些反社会分子使百姓提心吊胆，我们把他叫作匪徒。巴基斯坦人民党内不幸有许多匪徒，是匪徒就要抓。”于是军政府大肆逮捕人民党的要人，仅在8月7日便有100多人被捕。

8月8日，布托乘飞机自穆尔坦飞往拉合尔，大约有1万名群众集会欢迎。军政府派出警察阻挡人群，说这种集会违反了军政府不准举行政治集会的禁令，集会群众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这期间，在军政府掌握的报纸上天天都载有布托的“劣迹”，而且把公众团体和布托政敌提出的审判布托的要求都登在报上。言论亦能杀人，舆论的导向是很厉害的，在舆论的攻击、瓦解下，大批人要求退出人民党。

1977年9月上、中旬是巴基斯坦动荡不安、也最有戏剧性的时期，齐亚·哈克等对布托再捕——再放——再捕，观察家评论道：军政府对布托提出的刑事罪和政治罪种类很多、内容模糊。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其中一条罪名还打不倒他的话，另外一条罪名就可以把他打倒。总之，军政府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一定要打倒布托。与此同时，齐亚·哈克宣布了与法律相矛盾的决定，禁止定了罪的候选人参加竞选。

9月19日，巴基斯坦人民党在拉瓦尔品第举行竞选集会，这次集会大约有10万人参加，布托夫人代表丈夫出席了集会并讲话，集会给予布托有力支持，并要求释放布托。与此同时，布托的律师依据法律认为，军事法庭审判

布托是侵犯了布托按照法律所应享受的权利，并要求准许他保释布托。

9月20日，法院开庭审理布托案件。布托的律师指责齐亚·哈克为了不让布托参加竞选而把他逮捕，并说军政府偏爱反布托的巴基斯坦全国联盟，要求军政府于9月24日再次开庭审理布托案件、并让布托出庭。

军政府驳回了上述要求，并宣布：布托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其中包括叛国罪。齐亚·哈克撤了首席法官的职。10月1日，齐亚·哈克在电台和电视台广播中宣布，原定10月18日举行的大选推迟进行，并且下令禁止政治活动。

多数观察家认为，齐亚·哈克取消这次大选，就是第二次政变。不仅如此，在对布托案件审理了半年之后，1978年3月18日，巴基斯坦高等法院指控布托策划了1974年政治谋杀案，而以政治谋杀罪判处布托绞刑，另外四个同谋者被判处死刑。

此后，齐亚·哈克不仅镇压了布托的支持者，还驳回了布托的上诉。观察家认为，齐亚·哈克的想法是：如果让布托活下去，他就会成为现政权的一切反对派重返政坛的旗帜。为此，必须除掉布托，即使激起布托支持者的反抗和一些强有力的邻国的愤怒也在所不惜。

事实正是如此。巴基斯坦军政府宣布绞死布托的决定之后，世界舆论大哗，各国政要深表震惊，纷纷致电或发表声明、呼吁，要求齐亚·哈克重新考虑对布托的判决。

对此作出反应的包括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美国总统卡特等20多个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及代表。但齐亚·哈克心硬如铁，他不止一次地对记者说，一些国家元首和世界领导人发出的为布托减刑的呼吁，大部分是出于私人关系。他说，有些是诚心诚意的，有些“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我们不能接受这些劝告，如果接受，我们最好下台。”

1979年4月4日凌晨，布托在拉瓦尔品第地方监狱被绞死。

政绩斐然

清除政敌布托只是齐亚·哈克执政期间的一件事，评判其功过光凭一件事是不公正的。齐亚·哈克当政的11年中，大力发展国内生产，促进国际贸易。在其治理下，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为6.3%，年人均收入达390美元，居南亚各国之首。

在国际事务中，齐亚·哈克奉行独立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伊斯兰世界，在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讲坛上，巴基斯坦主持公道，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好评。

70年代，苏联出兵占领了阿富汗，阿富汗是巴基斯坦的北方邻国，齐亚·哈克在发展中国家里较早提出和坚持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的主张。巴基斯坦要求按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公正、合理地解决阿富汗问题，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望。国际社会为了表彰齐亚·哈克和巴基斯坦对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所作的贡献，授予他国际和平和合作金奖。

但齐亚·哈克执政期间，成功和失误并行，功名和危险同在。由于齐亚·哈克在巴基斯坦实行的是军人独裁统治，他的政敌无时不在暗算他。

1982年秋，齐亚·哈克从外地视察返回拉瓦尔品第，正当齐亚·哈克的座机在首都上空盘旋降落时，一枚导弹向飞机射来，擦着飞机飞过。导弹是从拉瓦尔品第的郊区发射的，由于发射比较匆忙，没有雷达、通讯等方面的配合而偏离了方向。

由于齐亚·哈克坚持苏联军队必须撤出阿富汗的主张，采取支持阿富汗游击队的政策，阿富汗当局的情报机关在巴基斯坦策划了127起案件，大部分都是针对巴基斯坦民用目标的，有的也针对齐亚·哈克总统。由于齐亚·哈克的警卫严密，这些活动都没有达到目的，但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通过破坏活动搞乱巴基斯坦，通过暗杀除掉齐亚·哈克，阻止他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武器。

齐亚·哈克是军人出身，自然在军中有很高的声望，但由于巴基斯坦援助阿富汗游击队的武器太多，在军队里，特别是中级军官中怨声迭起。

爆炸遇难

1988年8月17日，齐亚·哈克从伊斯兰堡机场乘坐C-130座机，前往巴基斯坦靠近印度的巴哈瓦尔普尔，视察驻守在那里的部队，并观看了美国提供的新式坦克在沙漠中的作战演习。随行的有巴基斯坦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赫塔尔·阿卜杜勒·拉赫曼上将等高级军官和总统新闻秘书沙利克等高级官员，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阿诺德·拉斐尔先生和美国驻巴基斯坦国防代表处主任赫伯特·沃森准将也同机前往。齐亚·哈克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这场军事演习，并对参加演习的将士发表了讲话。下午3时30分，齐亚·哈克一行又登上C-130座机，准备返回拉瓦尔品第。3时47分，飞机从巴哈瓦尔普尔的机场起飞，同时起飞的还有两架护航的飞机。机队起飞后仅几分钟，护航机上的驾驶员突然向地面报告说，总统座机冒出烟雾和火花。报告话音刚落，紧接着又传来护航机驾驶员惊慌失措的呼叫声：“总统座机起火爆炸！”事后，据地面的目击者说，他们看见总统座机在该地区上空盘旋了两周，接着就听见两声爆炸声，其间相隔约5秒钟。一位当时正在茶馆喝茶的当地村民事后说，他相信其中一声爆炸是在半空中，而另一声则是在飞机坠地撞毁时。两架直升机赶到出事地点，但由于火势猛烈，他们无法进入坠毁飞机周围200公尺内。大部分残骸散落在直径不到40米的小地带里，而且完全被大火吞噬。可以辨认的最大部件是一个机翼。另一个机翼跌落在离飞机坠毁地点一公里远的地方。齐亚·哈克和他的29位随行人员全部遇难，他们的遗骸与飞机残片散落在一片空地上，其中一些人、包括齐亚·哈克总统的遗体是靠他们身上佩带的勋章才被辨认出来的。

身后褒贬

齐亚·哈克遇难的消息传到巴基斯坦，举国沉浸在震惊和悲痛之中。

齐亚·哈克掌权11年，这些年中也有动乱也有稳定和发展，动乱是短期的，稳定和发展是长时间的。齐亚·哈克处死了布托，人民党负责人、布托遗孀和布托的女儿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攻击。现在随着一声爆炸，齐亚·哈克与贝·布托之间的杀父之仇一笔勾销了，但布托小姐表示，齐亚·哈克以暴力开始，也以暴力终结，在布托家族的眼里、齐亚·哈克是一代暴君。

布托家族对齐亚·哈克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人们对齐亚·哈克褒大于贬，毕竟在他执政期间，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8月20日，巴基斯坦政府和军民为齐亚·哈克总统举行了

隆重的国葬仪式，70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参加了葬礼。

葬礼在伊斯兰堡费萨尔大清真寺举行。哈克总统曾为这座世界闻名的伊斯兰建筑主持了奠基仪式，他的遗体将安葬在这

座清真寺的南侧。

从这天的上午开始，就有络绎不绝的人群和车辆自发涌向费萨尔大清真寺。许多人手举齐亚·哈克总统的画像，还有人打着悼念的横幅，以至于费萨尔清真寺附近的道路水泄不通，人难走，车难行。

齐亚·哈克的遗体从空难现场运回伊斯兰堡后，一直保存在拉瓦尔品第的陆军总部。早晨，军队将他的遗体护送到空军总部，再从那儿用直升机运到伊斯兰堡新总统府。

12时50分，哈克总统的灵车由新总统府徐徐开出，车上覆盖着巨幅的巴基斯坦国旗，前有摩托车开道，后有新总统伊沙克·汗等政府官员的车辆护送。车队沿宪法大道向清真寺前进，路两边站满了为总统遗体送行的群众。当灵车行至宪法大道第二路口时，许多群众加入了送葬的队伍。随行的人群跑步紧跟车队前进，挥泪为总统诵读经文。

车队到达费萨尔大清真寺时，总统的灵车改成炮车，由两队士兵用手牵引前进。到达灵堂时，已到下午2时，安葬仪式正式开始。哈克总统的灵柩再改为由八名士兵抬着前进。巴基斯坦的高级官员和前来参加葬礼的外国官员步行随灵柩前进，三军仪仗队肃立致敬，整个送葬队伍在哀乐声中缓缓行至墓穴处，两旁的群众不断将鲜花和彩带撒向总统的灵柩。

千余名阿訇齐声诵起下葬经，在礼炮的轰鸣声中，齐亚·哈克总统的灵柩被安放在墓穴中。伊沙克·汗总统为墓穴填了第一铲土，其他巴基斯坦高级官员相继填土，巴基斯坦三军将领也为总统墓穴填土。

填土仪式完毕后，巴基斯坦高级官员、三军将领和各国代表团依次敬献花圈，百余个花圈将坟墓堆成一座五彩斑斓的小山。

齐亚·哈克遇难后，许多国家表示震惊和悲痛。近邻印度宣布哀悼三天，美国总统、日本天皇、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等致电表示哀悼。联合国大会在哈克遇难的当天下午举行特别仪式，悼念齐亚·哈克总统。联合国大会秘书长在致联大的声明中，赞扬齐亚·哈克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敬。

扑朔迷离的事故原因

齐亚·哈克的葬礼结束后，人们满腹狐疑。

首先，齐亚·哈克座机的爆炸原因，是飞机的技术故障还是人为的破坏？齐亚·哈克遇难的次日，由空军司令员率领调查小组前往巴哈瓦尔普尔进行调查，美国也派了八名专家，其中有C-130型飞机制造厂家洛克希德公司的专家，共同分析事故原因。

调查小组调查了巴哈瓦尔普尔、木尔坦、伊斯兰堡附近的查克拉拉空军基地及中部城市拉合尔等地的500多人，并于8月21日拘留了与齐亚·哈克总统座机爆炸事件有关的80多人，其中包括空军保安人员、空军地勤人员、行李理货员、在座机起飞前曾向齐亚·哈克总统赠送芒果的人。此外，调查人员还在座机坠毁地点周围六公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收集C-130座机的各种残存部件，以便确定定时炸弹爆炸的可能性，并将其中一些关键部件运往美国，请美国专家进一步鉴定。而美国派来的专家则在死者的遗体中寻找可能存在的爆炸碎片，以便进一步分析。

调查小组首先排除了技术故障和与另一架直升机相撞的可能性。巴基斯坦国防部的官员说：

“这架C-130型运输机有四只引擎，是目前最稳定的运输机。即使有三只引擎因故停止工作，只有一只引擎在运转，它也能继续飞行。并且只要有

陆地，它就能降落。在座机坠毁地区有许多空地，如果发生了技术故障，驾驶员肯定会用无线电先通知地面，然后再设法降落的，但驾驶人员没有这样做。”

由上述分析引起的话题是总统座机飞行的保障问题。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哈基穆拉·汗中将干事发第二天说：“齐亚·哈克总统的座机是很安全的飞机，我们向来都对重要人物乘坐的飞机的飞行采取可靠的措施。”

他还说：“8月17日，齐亚·哈克总统前往巴哈瓦尔普尔观看装甲部队演习时，所有空军基地都采取了超常规的安全措施，其中包括飞行控制和地面指挥。”

巴基斯坦驻联合国大使在谈到座机与另一架飞机相撞的可能性时，说：“不会的，因为在齐亚·哈克总统座机飞行时，附近不会有其他飞机。”排除了飞机发生飞行故障的可能性后，接下来是对人为破坏的可能性的分析。关于破坏手段，调查组人员经过初步调查，否定了原来持有的看法，即齐亚·哈克总统座机可能受到了地对空导弹的袭击，因为这架C-130型座机的四只引擎在失事后都完好无损。经过分析，调查人员认为，可能是一枚遥控炸弹造成了这起爆炸事件。巴基斯坦国防部的官员说，这架C-130型军用运输机被改装成总统座机时，内部曾作了特殊的改造，包括安装座椅和桌子，炸弹有可能被放在这些地方。齐亚·哈克总统座机每次出动前都要在机场的飞机库里装上集装箱，箱内装有椅子、桌子和其他设备。因此，有的专家认为，爆炸物极有可能就放在这个集装箱里。

也有的专家认为在齐亚·哈克总统座机起飞前最后一分钟搬上飞机的、由地方知名人士向总统赠送的20箱芒果里可能藏有炸弹，因为在飞机的残骸里找到了被焚毁的芒果箱。

还有一个值得调查的问题是：在飞机起飞之前，控制系统是否被人安装了破坏物件？据了解调查小组内情的人说，美国专家正在研究驾驶舱发生爆炸的可能性。

最后，在飞机爆炸起火时，座机机组人员无声无息。调查小组据此怀疑：驾驶舱里某个地方曾经释放出一种毒气，致使驾驶员和副驾驶失去了驾驶能力，从而造成了这场灾祸。

捉摸不定的凶手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的话，那么谁是杀害齐亚·哈克的凶手？他们又是用什么手段制造这起爆炸事件的？调查组经过反复调查，仍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根据调查，爆炸的各种可能原因均被排除。

关于谁是凶手的问题，一位西方分析家说，齐亚·哈克总统树立了众多的敌人，在巴基斯坦有几十个反对他的组织，其中任何一个组织都可能这么干。在齐亚·哈克执政的11年中，暗杀他的行动时常发生，只是没有成功罢了。

齐亚·哈克总统遇难后第三天，新总统伊沙克·汗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调查小组已排出了可能卷入爆炸事件的六种势力。他们认为，齐亚·哈克总统最危险的敌人也许是阿布·尼达尔领导的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因为巴基斯坦曾指控它的五名枪手参与了1986年在卡拉奇劫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客机的事件，并缺席判处他们死刑。这个恐怖组织发誓要杀死齐亚·哈克总统。

经过分析，调查小组认为，极有可能暗杀齐亚·哈克的凶手是阿富汗情报机关“卡哈德”。1988年8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题为《1987年全球恐怖主义类型》的报告中说，1987年全球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为189起，而阿富汗在巴基斯坦就策划了127起。

美国官员在分析了齐亚·哈克被暗杀的细节后说，齐亚·哈克座机爆炸事件是一次高明的行动，根据其手段分析，只有阿富汗情报机关才有动机和能力来实施这样的行动。

另外，在巴基斯坦内部也有一些势力想置齐亚·哈克总统于死地，其中危险最大的是伊斯兰中亲伊朗的什叶教派。巴基斯坦1亿穆斯林中有20%的人属于这个教派，他们十分嫉恨齐亚·哈克与美国亲近，也因齐亚·哈克把巴基斯坦穆斯林中的逊尼教派树为正统而倍加仇视，甚至认为属于逊尼派的齐亚·哈克总统是8月5日什叶派著名的宗教和政党领袖胡申尼在白沙瓦遇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发誓要对齐亚·哈克总统实行报复。

调查人员也没有排除巴基斯坦军队中心怀不满的军人进行破坏的可能性。任何外部的暗杀遇到的最大障碍便是齐亚·哈克周围严密的保卫工作。他们认为，在这起暗杀齐亚·哈克的爆炸案中，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需要在军队中安插一只“鼯鼠”。政府关押与此事有牵连的80名军人，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调查组就有关齐亚·哈克总统座机事件写出了许多调查报告。美国国务院收到这个报告后，对其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凭美国的先进技术，对此案进行研究并非难事，关键是掌握好公布的时机。据说巴基斯坦政府也要等到适当的时机才能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到那时，齐亚·哈克总统座机爆炸的疑云才能解开。

金边王宫里的爆炸声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遇刺案

登上宝座

位于印度支那地区的柬埔寨王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近现代以来，这个国家在西哈努克家族的领导下一直进行着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斗争。这个目标是宏伟而美好的，但对于夹在大国之间和地方强权势力之间的小国来说，道路是崎岖而又漫长的，外国人的干涉和内部的纷争，使这一过程充满了政变和暗杀。自1941年10月诺罗敦·西哈努克执政以来，柬埔寨加快了民主独立的步伐，坚持不结盟的政策，受到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嫉恨。自那以后暗杀和爆炸事件不断。

1941年，法西斯德国的铁骑蹂躏着欧洲，法国被德国占领了。法国的沦陷，使它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柬埔寨顿时失去了强大的保护国。泰国同柬埔寨在领土上早有纠纷，它一直伺机进攻柬埔寨，梦想夺取与泰国相邻的柬埔寨的几块富饶的土地。泰国认为这时是实现其领土要求的千载难得的良机。

与此同时，日本与希特勒德国东西呼应，正在谋划太平洋战争，妄图征服整个东南亚。为此需要首先在东南亚寻找一个合作的伙伴。日本看中了泰国，泰国也需要日本的支持，于是日泰一拍即合，达成了默契，在这个背景下，泰军入侵柬埔寨。

柬军、法军和越南军队对入侵泰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将泰军击退。在日本的干预下，法国殖民当局被迫派出代表，到东京同泰国代表签署了一个不平等的和平条约。条约要求柬埔寨承担这场战争的全部费用，并把被柬埔寨称为粮仓的马德望、暹粒、磅同等省及地区的一部分“归还”给泰国。这个条约使柬埔寨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国土。

这时柬埔寨的国王是莫尼旺（西哈努克的外祖父）。这个割让领土的条约使他蒙受了奇耻大辱，莫尼旺国王从此一蹶不振，不久便驾崩了。

在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主持下，柬埔寨开始选举国王继承人。按照柬埔寨的法律，莫尼旺国王的长子即西哈努克的舅舅莫尼勒本来是可以成为继承人的，但法国殖民主义者认为莫尼勒的民族主义思想强烈，如果继位将难以控制，且他还有口齿不清的毛病，所以决定由西哈努克继承王位。于是，西哈努克不得不中止他在西贡中学的学习生活，登上金銮殿接受加冕。柬埔寨佛教两大教派的僧王和婆罗门教僧王为他戴上了王冠。

就在西哈努克加冕的当天晚上，在高棉人看来，出现了不祥之兆。

按照高棉的传统，新国王在加冕的那天上午，要在佛教僧侣和宫廷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点燃象征胜利的蜡烛，这个蜡烛要连续燃烧三天三夜不能熄灭。但是，那天晚上，一场大风把烛火吹灭了。

王宫内外的人闻讯后都惊呆了。人们议论纷纷，他们私下说：新国王将会大难临头，国家和民族将蒙受大灾大难。西哈努克却不以为然。然而，不幸的是这些猜测应验了：西哈努克刚刚登基，柬埔寨便遭到日本的占领。17年后，美国人将炸弹邮寄到王宫，企图炸死他。22年后，敌对势力又要对他的中国好朋友下毒手。1970年后他被废黜，柬埔寨被越南占领，不久陷入混乱，他在国外逃亡多年……

西哈努克似乎命里注定是一位不幸的君主。

在法日之间

在迫使法国殖民当局达成一系列协议之后，慑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威力，日本仍未占领印度支那。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空军成功地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这才放心大胆地推行其南下战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东南亚。

日本军队进占印度支那后，允许法国殖民统治机构继续存在，并迫使其为日本的战略目标服务。这样，在印度支那就形成了法国殖民当局和日本军事占领者双重统治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四年半，直到1945年3月，日本人认为法国殖民机构已属多余，才把它一脚踢开。

日本的侵略和占领，是西哈努克一生中不幸的开端。当时柬埔寨首要的损失就是失去了最富庶的省份。尔后，柬埔寨便成了日本侵略东南亚的军事基地，大批军人的耗费给柬埔寨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学校成了军营，农田成了飞机跑道，到处是军事工事，穿着木履的日本人像苍蝇一样无处不在。

在日本的占领下，西哈努克成了傀儡的傀儡。本来，在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之下，他已经无所作为了；现在又来了一个更大的主人，他不仅要服从二主人，更要服从大主人。

作为一国之君，西哈努克对于法日殖民占领者的横征暴敛未作丝毫的反对，反而低声下气地做一个奴气十足的君王，人民对他产生不满情绪是很自然的事情。对此，西哈努克心中是十分清楚的。他在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在法国人和日本人面前的无能为力，并没引起我国那些好心人的同情。”对于老百姓的怨气，他说：“我不能生气，但又让我怎么回答呢？我答应向菩萨祈祷，请菩萨和神灵加速这些战争的结束。”

1943年，盟军开始筹划对日本本土实施大规模的进攻，对收复东南亚也做了周密的计划。日军已感到自己颓势的来临，采取各种手段准备作垂死挣扎，消灭法国殖民统治者在柬埔寨的最后势力，扶植代理人，建立日本当局一统天下的局面。

这时在柬埔寨的法国人也认识到日本的末日不远，听从戴高乐临时政府的指挥，抵抗日本，并向西哈努克作了通报。西哈努克说：“在法国和日本之间，我一定选择法国。”

1945年3月9日，日本人率先动手，法国人遭到惨败，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投入监狱。西哈努克在日本人的刺刀下仍然做着国王，一切依然照旧，所不同的是他由一仆二主变为一仆一主。日本的“高级顾问”一直履行着前法国高级官员的职责。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一不幸，他说：“我国和我自己才脱龙潭又入虎穴，但是‘法国龙潭’比‘日本虎穴’要好得多。”然而不幸的事接踵而至。

正像西哈努克不相信日本人一样，日本人也从未真正依赖和信任过西哈努克。不久，日本人便在西哈努克身边安插了一个代理人，此人便是柬埔寨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之一——山玉成。

山玉成出生在交趾支那，在法国完成了中学和大学学业，回国后创办了第一份柬埔寨语的报纸《安哥瓦》（即《吴哥窟》）。日本侵占柬埔寨后，他亲日反法，曾受日本人的庇护，1942年后到日本，在“大东亚学校”学习了两年，最后获得了日本陆军上尉的军衔。1945年3月中旬，日本人驱逐并

代替法国人之后，山玉成乘一架日本轰炸机由东京回到柬埔寨。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西哈努克任命山玉成为柬埔寨王国政府外交部长。但日本人和山玉成的支持者对此不满足，他们以写匿名信等形式，要求西哈努克亲王任命山玉成为副首相。山玉成与西哈努克父母的私人关系很好，但与西哈努克的分歧很大，主要分歧点是在对待法国的态度上。西哈努克希望柬埔寨独立，但无论如何，他不愿意利用日本人来反对法国，主张以温和的手段从法国那里获得独立，同时与法国保持着某种关系；而山玉成则相反，为了反对法国人，实现民族独立，他支持日本人，不惜使柬埔寨遭到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后果。这一分歧导致了两人在柬埔寨政坛上的长期对立。

山玉成虽然只是外交部长，但有日本人撑腰，根本不把西哈努克放在眼里，他逐步控制了内阁。1945年8月初，日本败局已定，为了垂死挣扎，日本迫不及待地要把柬埔寨王国变成赤裸裸的亲日政权。8月9日深夜，日本出动装甲车包围了王宫，以山玉成为首的亲日分子举行了政变。政变后，山玉成任柬埔寨政府首相。就在山玉成正式宣布就任首相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投降了。盟军在印度支那登陆，山玉成被盟军中的法国远东军总司令勒克莱尔将军逮捕。1947年初，经过长时间审问，山玉成被判处20年监禁。1947年11月，柬埔寨收回了被泰国霸占去的、被西哈努克称为“柬埔寨的阿尔萨斯—洛林”的马德望、暹粒等领土，但柬埔寨仍处于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扔进民主党总部的手榴弹日本人被赶走，柬埔寨国内的一批知识分子和皇族内部的亲王们掀起了一股民主风潮，他们向国王的权力提出挑战。

“民主”这个词对柬埔寨平民及西哈努克本人来说都很陌生。因此，西哈努克并不像许多即将垮台的君主那样负隅顽抗。法国人为了避免这股民主风潮对法国的殖民统治构成威胁，也摆出民主的架势，建议国王搞一点民主的游戏。国王表示同意后，便由法国驻柬当局与莫尼勒首相共同起草了一部王国宪法。同时，国王宣布各派政治势力可以组成政党，准备进行国民议会选举。此后，柬埔寨出现了三个主要的政党。

最早产生的是自由党。它是由法国策划成立的一个秘密政党，领导人是皇族诺罗敦·诺林德，其纲领是加强法柬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其成员多为皇族和商业阶层及资产阶级上层。

另一个政党是1946年4月成立的民主党，其领袖是西索瓦·尤德旺。该党仿效法国社会党，其成员在法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在法国政界有许多朋友，但在柬埔寨影响不大，缺乏追随者，对大多数好奇的青年人有吸引力。

第三个政党是以诺罗敦·蒙达那为首的进步民主党。该党的追随者不多，其成员多为同蒙达那有联系的少数高级官僚。

这三个政党中数民主党的前景最好，因为它的成员包括了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法国的学生。另外它在寺院、学校、政府部门中形成了一个联络网，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特别是西哈努克的父亲的支持。法国统治当局曾设置层层障碍，但都无济于事。

1947年选举后，民主党获得了67席中的50席，按规定应由民主党领袖西索瓦·尤德旺担任首相，但现任首相莫尼勒拒绝交出职位。最后在西哈努克的干预下，莫尼勒辞去首相职务，尤德旺上任组阁。

民主党执政后，支持反法的武装力量，法国殖民当局对此极其不满。恰在此时，刚当上首相不久的尤德旺病逝，民主党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法国人和西哈努克趁机削弱民主党，首先采取的措施是于1947年10月重新

进行大选。结果又是民主党获胜，该党获得了 73% 的选票，夺得了 54 个议席。

1948 年 1 月，新一届国民议会组成，民主党的议员游格任议长，姜万任首相。但这个民主党政府仍然得不到法国的支持，该党刚刚执政就面临着财政上的困难。同年 6 月，由于发生民主党议员非法盗卖棉线的丑闻，党内出现危机。8 月，姜万辞去首相职务，由民主党人宾努接任首相。

这时，担任警察总监的严森波同民主党的 11 名议员背叛了民主党，这一行动得到了西哈努克的支持，严森波及其追随者于 1949 年 1 月搞垮了宾努政府，严森波在西哈努克的支持下当上了首相。严森波上任组阁后，民主党人拒绝在其手下任职，于是西哈努克宣布解散议会。西哈努克和严森波害怕民主党再次上台，以社会安定为理由，无限期推迟大选。

大选的无限期推迟对民主党十分不利，民主党开会研究对策。1950 年 1 月 14 日，前议会议长游格在民主党总部大楼里召集会议，会议正在进行时，一个袭击者将一枚手榴弹扔进了会场，许多人受伤，游格的伤势最重，不久就死了。袭击者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高棉人，他先承认自己是自由党人，后又推翻否认。自由党的领袖诺林德担心民主党报复，匆忙逃往巴黎。诺林德逃跑时，警察首脑朗诺和法国殖民当局不但没有阻止他的逃离，而且还让他放心地走。

究竟是什么组织主使杀害了游格，众说纷纭。法国殖民者指责伊沙拉分子杀害了游格。伊沙拉意为“勇猛”，是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的运动，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众多抵抗运动的总称。但更多的传闻是法国殖民当局主使杀害了游格。也有人猜测西哈努克或者严森波杀害了他，或了解内幕。

游格的死亡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广大群众感到十分惋惜和悲痛。五万多人为游格送葬，其中有学生、政府官员、僧侣和老百姓，他们身穿白色的孝服，臂带黑纱。据说这是柬埔寨有史以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自发政治游行，西哈努克也加入了送葬的行列。

柬埔寨大选的无限期推迟，议长的被暗杀，表明了柬埔寨运用西方民主模式运动的失败。

东瀛遭辱

柬埔寨仿效西方民主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西哈努克领导柬埔寨争取独立的斗争方兴未艾。1953 年初，为了寻求柬埔寨的独立，西哈努克亲王率宾努亲王等访问法国，向法国总统樊高·奥里奥尔表达了柬埔寨人民强烈要求独立的愿望。法国对西哈努克的要求采取敷衍的态度。西哈努克为了施加压力，委托宾努首相在巴黎进行谈判，他本人则前往加拿大、美国、日本、泰国游说、寻求国际的同情和支持。

在加拿大，西哈努克利用电台向世界说明他争取独立的理由，让世界听到了柬埔寨人的声音。

来到美国前，西哈努克对美国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能得到这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和理解。但事与愿违。美国根本没把这位国王作为尊贵的国宾看待，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没有举行国宴招待这位客人，只是安排这位马术爱好者去看马术表演。美国这种歧视性的失礼行为刺伤了西哈努克。

使西哈努克更加沮丧和恼火的是他与国务卿杜勒斯的会谈。杜勒斯不顾西哈努克要求法国撤出柬埔寨的要求，反而以抵挡共产主义的进攻为理由，

要法国殖民者留在柬埔寨。在对美国官方失望之后，西哈努克利用会见记者的机会向美国公众阐述了柬埔寨人民要求独立的立场和要求，发动了一场舆论攻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西哈努克怀着十分不快的心情离开美国到日本，他并不希望这个战败国会给他任何援助，只想让日本人了解柬埔寨的独立愿望和要求。然而在这里西哈努克同样遇到了不快。一天晚上，西哈努克打算到美国士兵举办的夜总会稍微松弛一下，他与随从到了夜总会门口，一个美国大兵蛮横地不让他进门。西哈努克用英语问他原因，那位美国兵出言不逊，说他是一个行为有欠检点的花花公子。国王无端受辱，这更增加了他对美国的憎

恶。

尽管这样，西哈努克的外交攻势没有白费，国际上对柬埔寨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有了更深的了解。回到金边时，人们像欢迎一位凯旋的将军一样迎接他，他的信心更足了。

回国之后，西哈努克继续对法国当局施加压力，他在军事自治区暹粒的吴哥窟建立起他的总部，决定进行军事动员。他的行动向法国表明，柬埔寨人为了国家的独立，要对法国施加军事上的压力，甚至发展到军事对抗。

法国驻柬军事总指挥朗格拉德将军意识到形势不妙，惊呼：“西哈努克是疯子，不过是个天才的疯子。”

然而这时不仅仅是柬埔寨，来自越南的消息也使法国殖民主义者不得不考虑当前的形势。到1953年，越南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战争已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在中国顾问团的支持下，越南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法国侵略军完全丧失了主动权。在此情势下，法国国内的舆论也强烈要求政府尽快结束这“肮脏的战争”。这一系列因素，迫使法国同西哈努克谈判，打算移交权力，承认柬埔寨的独立。

1953年10月17日，法柬两国签署协议，协议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将一切军事方面的权力移交给柬埔寨王国政府，西哈努克亲王可在王国领土上完全自主地行使一切军事方面的权力。独立文件签署后，西哈努克决定返回金边。

1953年10月8日，是柬埔寨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为了欢迎西哈努克国王返回金边，从暹粒到金边，沿途300公里所有的村镇都装扮一新，张灯结彩。成千上万的人在道路两侧向西哈努克亲王高呼：“国王万岁！”国王返回金边后，以朗格拉德为司令的驻柬法军离开柬埔寨开赴越南。一周后，由前议员组成的立法机构通过一个议案，宣布诺罗敦·西哈努克为“民族英雄”，以表彰他在高棉民族独立中的卓著功勋。

法国殖民者军事上撤出并不表明柬埔寨完全独立，法国仍旧控制着柬埔寨的经济。1954年5月7日17时，盘踞在奠边府的法国军队停止抵抗，宣告了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结束。奠边府大捷的第二天，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中、苏、英、美、法五国外，还有越南、老挝、柬埔寨和南越西贡政权的代表，会议协议规定，越南及其势力撤出柬埔寨，柬埔寨必须严守中立。因而在柬埔寨和平问题上，没有出现像越南那样把国家分裂成两部分的情况。人们评论说，柬埔寨是日内瓦会议的大赢家。

华盛顿决定：对西哈努克下手把柬埔寨建成亚洲的瑞士——永久中立之国是西哈努克亲王追求的目标。1954年，日内瓦会议又规定了柬埔寨不得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得为他国提供任何军事基地的中立化条款，这也是同西

哈努克亲王的中立化政策相吻合的。

在 1955 年 4 月举行的万隆会议上，29 个亚非独立国家的元首汇集于此，讨论他们共同关心的社会、经济、文化合作问题，大会成功地通过了反映亚非国家共同立场的以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十项原则，形成了以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要求友好、团结、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心的万隆精神。

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恰好与会议的主旨相吻合，因此，他在这次会议上异常活跃。在会议上他发表了《关于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的声明》，表示柬埔寨将始终坚持中立，决不作别国的侵略基地。他的讲话博得了周恩来的高度赞赏。周恩来对他及柬埔寨与法国的密切关系也表示称赞，周劝西哈努克要当心美国。因为它“比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并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

西哈努克与周恩来一见如故，从此结下了伟大的友谊，直到 1976 年周恩来去世。周恩来的伟大魅力令西哈努克倾倒，西哈努克在描述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感受时说：“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明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邀请西哈努克访问中国，西哈努克向周恩来发出了同样的邀请，一年后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互访。

在万隆会议期间，西哈努克与印度的尼赫鲁也建立了友谊。会后他访问了印度、南斯拉夫、苏联等国，同中国及上述国家建立了友谊。

西哈努克的中立、不结盟政策遭到美国的嫉恨，美国及其追随者将他的和平中立政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向他施加压力。

1954 年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美国从其冷战战略出发，为防止所谓“共产主义的扩张”，于同年 9 月纠集了它的一些盟友在马尼拉签订了一个军事同盟条约。第二年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曼谷正式成立，该组织以协定的形式，将柬埔寨私自划入它的“保护区”。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访问金边，试图劝说西哈努克接受这种“保护”，但被西哈努克拒绝了，因为这是同柬埔寨在日内瓦会议上作出的中立保证相违背的，而且也不符合他在万隆会议上宣布的立场。西哈努克对杜勒斯说：“柬埔寨对东南亚条约组织一点都不感兴趣。作为中立国和佛教徒，我们会照顾自己。”

杜勒斯无可奈何，只好夹起皮包离开柬埔寨。

但是美国并不罢休，驻金边大使罗伯特·麦克林托克在金边向西哈努克的父母施加影响。这位大使唠唠叨叨地散布“中国会把柬埔寨一口吞掉”、“柬埔寨没法成为亚洲的瑞士，您没法保持中立”等言论，此举失败后，美国便利用它在亚洲的盟国如菲律宾等继续做西哈努克的工作。

这一招又失败了。

美国见文的不行，便动起武来，指使泰国在泰柬边境制造麻烦，进行武装挑衅，并对柬埔寨进行经济封锁。

美国为了在柬埔寨建立反对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的基础，用美援来拉拢、腐蚀国民会议员。最初，柬埔寨由于经济上的

困难，接受了美国的援助，这部分援助除了一部分用于军事外，主要用于进口消费品。不久，海关和进口商便被美国收买了。由于美援的分配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被分配的对象往往是议会中有影响的议员，结果不仅造成了政府的腐败，而且在政府机构中产生了一个买办阶层，许多议员属于这个阶层。

政府腐败的恶性膨胀，使政府和议会的矛盾日益激化，导致了政府的垮台。西哈努克又成了首相，他以各种办法抵制美国的渗透和侵蚀，美国人恼恨交加，策动政变，以期推翻西哈努克。

流产的政变

1958年，柬埔寨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外来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南越的吴庭艳军队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东北部的上丁省，向纵深渗透了九公里。

西哈努克要求美国以其影响劝告吴庭艳撤军，但美国驻柬埔寨大使卡尔·斯特罗姆以不能干涉两个邻国的争端为由，拒绝了西哈努克的要求。

对此，西哈努克毫不退让，他说，如果这样，我们不得不使军队处于戒务状态，准备打仗。卡尔·斯特罗姆反驳说，如果有人由于愤怒而向受美国保护的一方发射子弹的话，美国就中止对他的援助。西哈努克反唇相讥，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柬埔寨不得不考虑其他援助来源。美大使声称要停止美国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西哈努克只得再一次向中国寻求支持和援助。1958年8月，西哈努克访问了北京，他同毛泽东进行了几次长谈，中国同意帮助柬埔寨重建一些工厂。这一次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建立了外交关系。

西哈努克的这一举动激怒了美国及其两个盟友——南越西贡和曼谷政权，他们认为西哈努克倒向中国是大逆不道，不可救药，必须想办法除掉他。接着，旨在推翻西哈努克的阴谋活动悄然展开了。

1958年10月，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美国的支持下在曼谷开会，其中一议题是如何对付西哈努克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会议决定要采取“某种措施”来制裁西哈努克，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会后再由泰国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曼谷的人员去考虑安排。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计划出笼。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曼谷召开了理事会的碰头会。会议由泰国总理沙立主持。会议根据事先的计划，作出了三项决议：（一）出钱支持以推翻西哈努克中立政府为目标的柬埔寨反对党；（二）通过绑架、武装抢劫和散布共产党即将接管的谣言来制造柬埔寨动乱的气氛，搞乱柬埔寨的社会生活秩序；（三）在柬埔寨境内组织武装集团，为发动政变做好准备。

随后，他们便在柬埔寨寻找代理人和依靠力量。他们的依靠力量主要是山玉成、桑·萨里和达春。

日本投降后，山玉成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并判20年劳役，在越南服刑。后来应西哈努克要求，法国政府把他引渡到法国，减刑改为软禁。

在西哈努克看来，山玉成毕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尽管山玉成做了不少反对他本人的事，但作为国王，作为民族主义的最高代表，应该原谅他的子民。另一方面，西哈努克认为，如果在他的努力下山玉成获得了自由，山玉成会感激国王的宽宏大量，会使更多的人前来归顺。

为此，西哈努克早在1949年就开始游说，法国因担心山玉成归国后会造成更多的麻烦而迟迟未予答复。山玉成得知此事后对国王感激得五体投地，他在给西哈努克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将忠于陛下，恳请陛下在我获释之后，准许我返回柬埔寨与亲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我将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这一年，西哈努克访问法国，在同法国政府交涉之后，法国解除了对山

玉成的软禁。此后不久，西哈努克又写信给法国政府，要求彻底撤销对山玉成的判决，后来又两次致信法国政府，信中说：

我最近从山玉成那里获悉，他保证对我效忠。他的保证使我相信，他回到柬埔寨不会产生混乱、反而会再次证明法国最高当局是宽宏大度和言而有信的，这必将在我国引起极好的反响。

但是，实践证明山玉成食言了。

1951年10月29日，山玉成回到金边时受到追随者的热烈欢迎，随后他便到各地巡回演讲，进行反对西哈努克亲王的的活动，美国人为他的活动提供了经费。后来他到柬泰边界招募青年，建立了训练基地。

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召开后，美国人决定扶植山玉成。美国将山玉成的自由高棉部队集结于柬泰边境，由两名泰国军官协助，由中央情报局提供100万美元的援助，作为推翻西哈努克的国内武装活动的外部力量。

桑·萨里原为西哈努克的主要顾问之一，曾随国王参加过日内瓦会议，担任过柬政府的副首相。1956年，桑·萨里访问美国之后，便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联系，回国后便疏远了与西哈努克的关系，成了“美国在柬埔寨的忠诚朋友”。

桑·萨里办了一份《民主人民》报，在报纸上发表攻击中国的社论，批评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西哈努克对该报的言论进行了谴责。此后，他又顽固地要求西哈努克同意他建立一个反对党，遭到拒绝后，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三个强有力的人物是达春将军。此人早在40年代就与泰国关系密切，后来归顺了西哈努克，尔后成了靠近泰国的暹粒省省长和西北军区的指挥官。他拥有一支装备优良的军队，是该地的一个土皇帝，对西哈努克有尾大不掉之势。由于他公开反共而和西贡沆瀣一气，南越的吴庭艳曾向美国建议，开进柬泰边境和达春联合起来剿共。由于美国认为该做法会干扰它推翻西哈努克的计划，这一建议被否决。

西哈努克觉察到了达春的活动和意图，便采取措施削弱达春的权力。他任命布山为达春管理范围内的磅同省的军事总指挥，这春马上背叛了西哈努克，倒向西贡。

除了上述三人外，还有两个人在中间起联络作用，一个是斯松波，另一个是松井文雄。

斯松波是达春的弟弟，他在印度学英语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回到柬埔寨后利用达春的关系当上了暹粒省的国民议会议员和全国的国民议会议员。1958年秋，斯松波利用随西哈努克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的机会，避开西哈努克，私下同美国人接触。

松井文雄是日裔美国人，是美驻金边大使馆的中央情报局特务，他同西贡驻金边的外交代表吴同友关系十分密切。

美国人通过上述两人及吴同友与在柬埔寨的山玉成、桑·萨里和达春三人进行联络，很快便成了气候。

1958年12月，吴庭艳曾指使吴同友去游说西哈努克，要他改变中立、亲共的政策，特别是改变与北越的关系，但是被西哈努克拒绝了。于是吴同友便向吴庭艳建议，在柬埔寨发动一场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吴庭艳表示同意。

1959年1月，政变集团开始行动。山玉成集中了三个营的兵力，准备进攻马德望省，达春也偷偷地将他的部队集结在暹粒和磅同省的战略要地。为了探听王宫里的消息，他们在王宫里面安插了密探。

西哈努克从各方面传来的情报中了解了政变分子的阴谋。接着他到达春控制的磅同地区巡视，并发表了一个警告性的讲话。他旁敲侧击地说，他发现了一个阴谋，目的是要搞掉他，夺取国家最高权力，成立一个亲美的傀儡政权。他不点名地警告泰国和南越，这个政变计划是同柬埔寨毗邻的某个王国的元帅兼政府首脑和某个邻国的使节与山玉成一道制定的。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之后，西哈努克首先指挥王宫卫队对桑·萨里家发动突然袭击。桑·萨里事先听到风声，已经逃跑，军队对他的家进行搜查，抄出了他同泰国政府勾结的文件证据。据西哈努克事后回忆，桑·萨里之所以事先能够逃脱，是因为当时负责此事的朗诺走漏了风声。桑·萨里逃到了泰国，后加入了山玉成的队伍，被任命为副首领。

桑·萨里暴露之后，达春加紧活动，打算实施他的第二套计划，即宣布北部各省独立。

1959年2月，西哈努克的女儿结婚，国王想趁机同达春谈谈，摸摸他们的底，于是向达春发出邀请信，但达春对此不予理睬。达春在暹粒机场迎接吴同友的到来，陪同吴同友来访的好几架飞机从泰国运来100公斤黄金和武器弹药。不久南越人又运来了无线电发报机。这些情况很快被西哈努克掌握。

2月21日，西哈努克决定对达春动手。他派武装部队参谋长朗诺和空军司令到暹粒逮捕达春。由于亲西哈努克的士兵提供了情报，政府军未放一枪便占领了达春的指挥部，达春的卫兵也被解除了武装。

这时达春正在健身房里练健身操，突然遭到两个政府军士兵的袭击。行动前西哈努克要求朗诺活捉达春，以便获得口供。达春被捕后要求见一位高级军官，发表一个声明，朗诺因与达春等有牵连，便把达春枪毙了，事后朗诺骗西哈努克说达春因为受了致命伤而死。

这一阴谋被粉碎后，政府军还捕获两名持有南越护照的无线电报务员。参与政变活动的斯松波被逮捕，松井文雄和吴同友被驱逐出境，此外还缴获了270公斤金条。

为了将达春及其同伙的罪行公布于众，西哈努克在达春的别墅里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并展示了阴谋活动的一切证据，如无线电发报机、美制武器，达春与吴同友来往的信件以及两名南越俘虏。西哈努克邀请了美、苏、中、英、法等国家的外交官前去参观，使政变分子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王宫里的爆炸声

这次流产的政变由美国操纵，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西哈努克在没有直接拿到美国参与策划的证据的情况下，只是对美国表示了一般性的抗议。西哈努克在写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只是旁敲侧击地提到它的两个盟友卷入了政变的阴谋活动。但随着对斯松波和南越俘虏的审讯，美国后台老板的嘴脸渐渐暴露。美国驻金边大使斯特罗姆承认，并通过吴同友告诉达春，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做了保证，政变一旦发生，美国的援助就会到位。美国的丑恶行径在柬埔寨彻底暴露了，斯特罗姆大使呆不下去了，只好卷起铺盖走路，接替他的是特林布尔大使。

这起阴谋破产之后，美国及其盟友泰国和南越并不甘心，于是又策划了旨在暗杀西哈努克的阴谋。

山玉成和桑·萨里逃到西贡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使下，买了一只装饰非常精美的漆匣子，将一只一拆即炸的炸弹装进匣子里，然后让人带到香港，以向国王邮寄贡品的名义寄给西哈努克。

1959年8月31日，按照惯例，西哈努克到王宫的御座大厅去拜见父王和母后，尔后国王和父王、母后一道，亲自拆开当天早上收到的邮件。正在这时，首相宋双要出席联合国会议，前来向西哈努克国王和王后辞行，于是国王命人将邮件先拿到前厅，并将其打开。国王和首相刚进入御座大厅，前厅就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着刺鼻的浓烟向王宫四处蔓延，王宫卫队迅速前来抢救并封锁现场。他们发现正在拆邮包的王宫礼宾局长瓦克利旺亲王倒在血泊中，国王的贴身男仆被当场炸死，另外两人被炸成重伤。王后由于在另一个房间里，因而安然无恙。这是一个威力很大的炸弹，炸药和引信是美国制造的。

案发后，柬埔寨安全部门对王宫的人员进行了审查，他们发现桑·萨里的几个亲属混入了王宫。经过审问，他们供认，他们的任务是不断将王宫里的情况向桑·萨里等人报告，因此，他们每天从早到晚认真观察王宫里、特别是国王的生活规律，桑·萨里等根据他们的报告策划了这起爆炸事件。

1961年初，报界披露了桑·萨里于暗杀西哈努克国王失败后从西贡写给美国驻金边的政务参赞（中央情报局特务）的信，信中对该次暗杀的失败表示遗憾，他说：“只有最有效的措施才能帮助我们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桑·萨里不甘心于失败，他说，今后还要继续依靠美国驻金边的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在驻金边大使馆内）的合作与帮助。

柬美双方在较劲对西哈努克来说，1959年是不轻松的一年，这一年他粉碎了达春等人的政变阴谋，又在桑·萨里的暗杀中大难不死。尽管这样，他的心情仍十分沉重，他清楚自己的处境：身边的两个宿敌——南越和泰国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随时可能破坏他的中立立场；他的同胞山玉成组织的自由高棉随时可能进攻；美国也不能容忍柬埔寨的中立立场。

在粉碎了美国制造的两个阴谋之后，让西哈努克头疼的另一个问题是美援造成的恶果。尽管西哈努克努力遏制美援对柬埔寨的腐蚀，但在美国人的操纵下，美援如同瘟疫，在柬埔寨的肌体上传染蔓延。比如，美援的分配并不是按照国王的意旨、根据各个部门的情况进行的，而是按照美国人的旨意在各个部门分配，结果引起了政府官员间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贪污受贿，有的官员为了得到援助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与美国人勾结，严重动摇了柬埔寨的政治基础。另外，美援即使用于柬埔寨的经济建设，也只能用于私有企业，而不能援助国有企业，柬埔寨国有的公路和桥梁的建设就无法得到援助。还有美国的援助是以成品折算的，而成品的价格往往又定得很高。

西哈努克看到了美国援助带来的危害，他指出，这种有条件的援助只能有利于商人，美国并不愿意引导高棉成为一个真正经济独立的国家。

相比之下，西哈努克看到了中国援助的真诚。中国的援助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而且是为柬埔寨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的。西哈努克由此产生了放弃美援寻找新的援助途径的打算，但要把打算变成实际的行动还需要时日，尤其是要得到柬埔寨广大老百姓的拥护。于是他向老百姓发表讲话，指出美国的援助正把柬埔寨引向贪污腐化，从而最终使柬埔寨处于依赖别国才能

生存的境地，要避免这种结果，就要毫不犹豫地施行“外科手术”，把援助“切掉”。他的呼吁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响应，然而那些美援的直接受

患者，却采取明从暗抗的态度，这些人成了 1970 年政变的政治基础。

西哈努克在中止美援之前先对私人经营的银行、酒厂等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公私合营，对奢侈品的进口加以限制，对用来进口商品的外汇的分配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这样便有效地堵塞了中饱私囊的各种渠道。

西哈努克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将求援的目光转向了中国。他的这些行动引起了美国的嫉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下，台湾特务向柬埔寨伸出了暗杀之手。

“秋风”行动

从 1959 年至 1962 年，西哈努克度过了一段相对平安的日子，他调整了内外政策，确立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共处的政策。但这三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柬埔寨的阴谋破坏一刻也未停止。

1962 年，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台湾的特务机构在美国和南越情报机关的配合下，策划了一个暗杀中柬两国国家元首的行动，这个行动定名为“秋风”。

1962 年 4 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应缅甸、老挝、柬埔寨三国元首的邀请，计划对这三国进行友好访问。美蒋特务认为，从地理人事关系上看，在柬埔寨暗杀刘少奇主席比在缅甸和老挝下手更有利，如果能将西哈努克和刘少奇一起杀掉，那是最理想的结果，即使只杀死其中一人，也破坏了中柬两国的关系。于是，台湾特务机关将以金边站站长张霁芝和副站长为首的行动小组一行 46 人派到了金边。

在柬埔寨居住着许多华侨，他们世代与柬埔寨人民友好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中的许多人与柬埔寨的党、政、军上层人员有着广泛的联系，绝大部分人心向祖国大陆；但由于柬埔寨的特殊地位，特别是美蒋特务的欺骗宣传，也有一部分人为台湾特务所利用，干出了一些危害中柬两国关系的事。

张霁芝等接受任务后马上在柬埔寨的华侨中收买人员，进行策划。张霁芝首先收买了贫苦侨民萧成作为特务间的情报传递员，接着又通过柬埔寨的军方、警方等多方的关系，买下了波成东国际机场——金边沿河公路边上的一所高脚楼房，开始了紧张的暗杀准备工作。

访问柬埔寨的贵宾的座机一般在波成东机场降落，然后贵宾们再乘车沿 15 公里长的沿河公路到达金边市区。这座两层的高脚楼房临河而筑，绿荫环抱，楼房对面是一座加油站，乍一看并无特殊之处。张霁芝等人的计划是由楼房挖一个洞至公路中央，埋下高强度的炸药，以电雷管连接，待到刘少奇主席的车队经过时马上引爆，并导致高脚楼房对面的油库起火爆炸，车队的人员即使能在公路的爆炸中幸免于难，也没法从油库爆炸中逃生。如果这个方案失败，比如发生了电线短路、雷管失灵的意外事件，则在刘少奇游览市区时制造混乱，趁机向他投掷杀伤力极大的“牛屎炸弹”，这是特务们安排的第二套暗杀方案。总之，暗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由于台湾特务收买了柬方的一些军政人员，加之柬埔寨的上层也有一些亲台人员，“秋风”计划在策划和准备阶段，西哈努克等柬埔寨国家领导人员竟一无所知。

粉碎阴谋 4 月上旬，中国有关部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美蒋特务的暗杀阴谋，当即向柬埔寨通报这一情报。西哈努克听说后大吃一惊，出于安全

考虑，西哈努克向中方提出将刘主席的访问延期。中国方面考虑中柬两国建交不久，中国国家元首又是首次访问，因此事而延期将产生不利影响，于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批示“按期访问”，同时国内最高领导机关下达了限期破案的指示。

中国有关机关经过认真分析、仔细研究，决定动用在柬的爱国华侨力量，让他们以个人身份出面联系军队，配合中方人员破案。中方临时抽调罗青长、袁庚、吴济生和杨世瑞组成先遣小组，负责刘主席访柬的前期安全保卫工作。

杨世瑞是出生于柬埔寨的华侨，曾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和抗日战争，是一位学识丰富、立场坚定、熟悉柬埔寨各方面情况的同志。

临时小组的同志一到金边，杨世瑞就找到了他的两个胞弟，向他们讲明重任，要他们协助工作。杨家兄弟扔下手头的工作，奔走于柬埔寨的华侨和中、高层军官间。与此同时，杨世瑞和袁庚又找到了当地爱国华侨领袖杨佳及印度支那人民党柬埔寨事务负责人阿明，布置许多华侨跟踪一些形迹可疑的亲敌特分子，没几天果然得到了重要线索，擒获了敌特的交通员萧成。

中柬双方人员对萧成展开思想教育和心理攻势，劝他不要做有损于国家民族、败坏侨民声誉的事。对于其所顾及的家庭问题，则在经济上由中国给予补偿，并负责他的亲人的安全。经过工作，萧成同意提供敌特在西贡与金边来往的情报。以后，萧成负责递送的所有物品、情报都先交给华侨组织查阅，然后再交给敌特。由于萧成的积极配合，使得破案工作有了较快的进展，但是爆破的地点和执行人员仍未查明。

4月23日，距离刘主席访问的日期只有一个星期了，中国政府十分焦急，周恩来总理亲自将从柬埔寨离任回国的河南省南阳地区第二书记、中国第一任驻柬埔寨大使王幼平召进北京，命他重返金边领导破案工作。

4月27日，王幼平到达金边，这时西哈努克因破案工作没有头绪，已多日未睡好觉。王幼平到柬后，西哈努克和宾努亲王都表示柬方将尽全力配合破案。

几乎在王幼平到达柬埔寨的同时，阿明负责的那一组爱国华侨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一个叫张达昌的人有重大嫌疑。经过查证，张达昌正是谋杀案中炸药和雷管的保管者。

中国先遣小组准备请柬方军队配合，杨世瑞兄弟找到他们的邻居——从小一起长大的柬埔寨参谋总部第二办公厅副厅长金花古鲁烈，要他为保卫中柬两国国家元首、为中柬友谊作贡献。金花古鲁烈指定一个叫哒庄的上尉去抓张达昌，并邀杨氏兄弟配合。

4月28日晚，哒庄在杨世瑞兄弟的配合下，一举将张达昌抓获，在其驻地搜出六枚炸弹和雷管炸药。哒庄一面让人将搜出的爆炸物送往王宫，一面按照张达昌供出的名单去抓人。

当夜，柬安全部长古伦和参谋长龙奈经过协商，决定由金花古鲁烈亲自提审张达昌。根据张达昌的交代，柬埔寨军队和保安人员又封锁了从波成东国际机场到金边的公路，围剿了特务租赁的高脚楼房和对面的油库。在高脚楼房下面的储藏室里，军警在靠墙的柜子后面发现了一个大洞，从洞里一直能走到公路中央，里面已放好两箱TNT炸药，还有一大卷电雷管。此时距刘少奇主席来访只有48个小时，人们无不为在关键时刻破获这一重大案件而庆幸。

抓到敌特分子、缴获爆炸物品的消息使西哈努克又惊又喜，但他还是对

刘主席来访的安全问题心有余悸。4月30日，柬埔寨国防大臣朗诺中将紧急约见中国大使陈叔亮，向中方通报了破案情况，并请陈大使和王幼平等参观了缴获的爆炸物及作案工具。朗诺向陈叔亮大使等表示，鉴于敌情十分复杂，建议中方考虑推迟刘主席的访问日期。此时，离预定访柬的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刘主席在接到驻柬大使馆的请示后明确指示：通知柬方，仍按原定日期访问。

5月1日凌晨，陈叔亮大使和王幼平紧急约见朗诺将军和宾努亲王，传达了中方的决定。西哈努克听到这一报告时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

为了加强保安措施，柬埔寨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全国的陆海空港口都严阵以待，盘查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西哈努克亲王亲自检查刘主席将要下榻的王宫卧室，还指定了专人品尝代表团的膳食。先遣小组和杨氏兄弟不顾连日疲劳，发动爱国华侨守卫在刘主席将要经过的地方，对一草一木都严加检查。

5月1日上午11时整，刘少奇主席乘坐的专机平稳地降落在波成东国际机场，金边市万人空巷，20万柬埔寨人民高举着中、柬两国国旗和刘主席的大幅照片载歌载舞热烈欢迎刘主席来访。刘主席这次访柬，获得了柬埔寨有史以来最隆重、最盛大的一次接待。

参与暗杀活动的特务张霏芝、农稔祥事后被依法判处死刑，但未执行枪决。1970年，朗诺伙同斯里玛达举行了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将两人释放，送还给美国中央情报局。

斯韦亚瓦根大街血案 ——瑞典首相帕尔梅被刺案

“谁也不知道窗外会有什么危险”

1986年2月28日，星期五，北欧的瑞典春天姗姗来迟，斯德哥尔摩郊外依然是冰冻雪封，国外的旅游者纷纷来到这个冰雪之国滑雪溜冰。瑞典面积不大，人口稀少、街道整洁。

瑞典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星期五是周末。帕尔梅每日的生活极有规律。早晨，他前往皇家网球馆，同他的20多年的老网球迷——瑞典投资银行行长哈里·沙因打网球。

8时55分，他像往常一样准时进入办公室。他坐下来，看了看办公桌上的日程记事簿，发现下个星期一之前，没有大的外事活动，于是便让警卫人员和助手们回家度周末去了，接着开始批阅国内各类公文。

帕尔梅批阅了一个又一个文件，其中有一份是即将与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希腊和坦桑尼亚联合发表的六国声明。这项声明呼吁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举行下次首脑会谈之前，暂时停止进行地下核实验。

尔后，他在办公室里接见了当地一家工会报纸的记者英格瓦和约格贝尔格，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帕尔梅显得非常轻松，兴致很高，在谈到世界形势时，他满怀信心地对约格贝尔格说：“今年是实现和平大有可能的一年。”

这位记者为坐在窗前的帕尔梅拍照时，半开玩笑地说：“坐在窗前不危险吗？”帕尔梅望了望窗外，满不在乎地答道：“谁也不知道窗外会有什么危险。”

帕尔梅一家早在20多年前就在波罗的海的费罗群岛租了一幢别墅，他经常带着他的三个孩子前往那里休假和度周末。但是这一天，帕尔梅决定同妻子一起去看电影。

晚上8时40分，帕尔梅夫妇乘地铁前往格兰德电影院。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为帕尔梅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项活动。

深夜的枪声

1986年2月28日夜，这是和往常一样和平、宁静的夜晚，大街上行人稀少、灯火如昼，小巷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点与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没有什么区别。格兰德电影院中正放映新影片《莫扎特兄弟》，影片中优美的音乐、动人的情节，将人们带入了电影故事的世界，使人忘掉了一周工作的劳累，忘掉了心中的烦恼，更无暇去想将会发生什么事。

11时许，电影院散场，年轻的情侣们亲昵地搂抱、搀扶着走向自己的汽车，距家近者则一边走一边窃窃私语。

帕尔梅首相和夫人随其他观众一起走出电影院。他们边走边与瑞典白领工会的领导人罗森格林夫妇交谈，不一会儿，罗森格林夫妇与帕尔梅夫妇握手道别乘车走了，跟随帕尔梅夫妇的

次子马尔腾和他的女友同父母互道晚安后也走了。帕尔梅夫妇按习惯的做法，没有带保镖，没有乘车，漫步沿着大街朝家走去。他们经过几个街区，偶有行人迎面而来擦肩而过。在他们刚刚踏上斯德哥尔摩中心区斯韦亚瓦根

大街时，突然从暗处闪出一个人影，在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连开了两枪。帕尔梅和夫人莉斯贝特当即倒地，凶手消失在夜幕中。此时已近午夜，时针指向 11 时 30 分。

驾车从这里经过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听到枪声立即停车，司机代尔斯博恩发现帕尔梅倒在积雪覆盖的大道上，鲜血染红了大片的雪。他立即通过车上的报话器向警方报了案，并向医院要了救护车。另外一辆过路车上两名 17 岁的女孩听到枪声，也跳下车来，她们看到遇害者呼吸微弱，就施行心脏按摩。三四分钟后，警车和救护车相继赶到。帕尔梅夫妇被送进附近的茨巴茨贝里医院。帕尔梅的胸部和下腹部中弹，莉斯贝特的背部被子弹擦伤。

半个小时后，帕尔梅因一颗直径 9 毫米的子弹打断了心脏边上的一根主动脉，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而停止了呼吸，终年 59 岁。

第二天一大早，瑞典的新闻媒体报道了帕尔梅遇难的消息。人们惊呆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在瑞典这样平静、安宁的社会里，国家的首相会遭此厄运。帕尔梅首相的遇难，顿时使瑞典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首相府门前，人们自发地排成长队，来表达深切的哀思。在帕尔梅遇害现场，川流不息的群众献上一束束鲜花，有的献上一盏长命灯，有的则全家围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

瑞典人民以特有的方式自发地举行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群众在帕尔梅生前演讲和经常活动的地方举行火炬晚会，悼念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瑞典官方还及时作出决定，成立帕尔梅纪念基金会，并把他遇害的那条街命名为奥洛夫·帕尔梅大街。

悼念帕尔梅的活动持续了半个多月。3 月 15 日，是帕尔梅的送葬日，悼念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政府官员、各党派领袖和各阶层人士以及帕尔梅的亲属和生前友好 1000 多人参加了葬礼。

葬礼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打破惯例，第一次参加了本国首相的葬礼，并发表了沉痛的讲话。他说，瑞典失去了“一个大家都听从的声音、一个热情地公开反对暴力和压迫的声音”。全世界 132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葬礼，其中有法国总统密特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等 23 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葬礼之后，在灵柩移往距帕尔梅遇刺处仅一箭之地的阿道夫·费雷德克教堂时，灵车通过的道路两旁聚集着数十万市民，他们不顾严寒，自发地站在冰雪覆盖的街道两旁，默默地为帕尔梅送行。

送葬当日的夜间，成千上万的市民穿着黑色的丧服，顶着寒风来到墓地，向帕尔梅致以最后的敬意。群众的自发悼念活动通宵达旦。

丧事结束之后，瑞典人民对帕尔梅的思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他遇难的地方，人们经常献上一束鲜艳的红玫瑰，或点上长明灯来寄托哀思。1987 年 2 月 28 日，在帕尔梅遇难一周年的时候，瑞典全国各地又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人们之所以这样悼念、怀念帕尔梅，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在为社会的进步、为和平的正义事业奋斗，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艰难的调查

斯德哥尔摩警察局接到帕尔梅被暗杀的报警电话后，迅速派人赶到现场。警察们发现首相被枪击中，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他们在把帕尔梅夫妇送

往医院的同时，立即封锁了出事现场，向瑞典警察总部作了报告。

斯德哥尔摩的警察立即分头行动起来，他们封锁了出事现场周围的一些街区，控制了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严格检查过往的旅客。正在外地度假的斯德哥尔摩警察局长汉斯·霍尔默在四小时之内赶回首都，连夜分析案情。

经过严密的侦察分析，警察们认为刺客很可能是一名“老练的职业杀手”。整个作案过程只用了几秒钟，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唯一的实物罪证是两颗直径9毫米的穿甲子弹。警方在瑞典的武器库中还没发现这一型号的子弹，只得把子弹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联邦德国的侦察机构进行鉴定。

据首相夫人回忆，当她听到第一声枪响时，还以为是小孩放爆竹，当她回过头来看时，第二声枪声响了。她在惊慌中没来得及看清刺客的面孔。

第一个目击者是出租车司机代尔斯博恩，他提供的情况是，枪响后他曾看到开枪者跑向停在几百米外的一辆大众牌“帕萨特”型蓝色小轿车，车上似乎还坐着一个人。凶手上车后，车子立即开走了。他看到了车牌号，但没有记全。

较早到达现场的两名17岁的女孩说，她们看到的凶手身高1.80米左右，大约30多岁，身穿一件深色的长大衣，头戴一顶带帽沿的帽子。但她们只是看到侧面，没有看到面容。

一位22岁的女画家作证说，出事时她正沿着内加尔坦胡同朝斯韦亚瓦根大街方向走去，同一个迎面跑来的男子相遇。女画家还根据回忆画了一张模拟像。

瑞典警方和联邦德国的两名专家对这幅画像进行修改和鉴

定后，于3月6日公布于众。从画面上看，嫌疑犯的面部特征是：脸为长型，黑头发、高鼻子、黑眼珠、深眼窝，年龄约在32~33岁之间，其长相像是中东人或拉丁美洲人。

瑞典警方从全国调集了300名警察，根据已有的线索展开搜捕。他们检查了一切形迹可疑的人，对各种恐怖组织严加注意，侦察机构也进行了改组，充实了有办案经验的人员。

瑞典警方广泛散发所绘制的案犯肖像，在全国悬赏捉拿案犯，悬赏金额由开始的50万瑞典克朗增加到500万克朗（合85

万美元）。在警察总部的大楼里，办案人员日夜值班，接受人们提供的他们认为同案情有关的线索。

瑞典警方为了尽快破案，使用计算机数据系统搜索凶犯。这种系统根据为在瑞典出生的所有瑞典人和在这个国家定居的所有外国人确定的十位数身份证号码，可以很快查到他们的一切资料，其中包括以往犯罪情况、健康情况、文化程度、纳税申报单等。对外来和侨居的人员，警方通过移民局和海关当局可以查到他们进入这个国家的情况。

斯德哥尔摩市的出租车司机也是警方的助手，司机们随身都带有与计算机相连接的电传打字机，警方还把对凶手的初步描绘输入了出租汽车司机的电传打字机中。

从帕尔梅被害到1987年3月的一年中，瑞典警方一直在运用各种手段紧张地搜寻罪犯。一年中，他们已经审查了1.7万

名有嫌疑的人，侦察记录多达2.9万份，曾向1.05万名证人作过调查。凶手之谜

帕尔梅被谋杀的当晚，有人给瑞典《快报》打匿名电话说，谋杀案是一个叫“PNK”的组织策划实施的；瑞典驻联邦德国的使馆接到电话，来电者称：“我们是赤军派，我们已经杀死了帕尔梅。”

3月1日，又有一位匿名者打电话给驻伦敦的一家国际通讯社，声称是一个叫做霍尔格·迈因斯突击队的组织打死了帕尔梅。这个组织同联邦德国左翼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后来改称红军派）有联系。这个打电话的男子讲英语时带有北欧口音。他说：“你们可以从历史书上查到进行这次袭击的理由，我不准备通过电话告诉你们。”

瑞典警方对两个匿名电话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这起谋杀事件不像赤军派的惯常做法。赤军派通常在行动之后，总要发表一个详细的书面公报，说明他们的行动动机，而且在他们的地下刊物中也可以看到有关报道，而这次却不是这样。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凶手，瑞典和联邦德国警方都没有予以证实。

土耳其的一家报纸曾推测说，总部设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库尔德工人党可能与此事有关，因为帕尔梅曾拒绝接纳它的一位领导人到瑞典避难，该组织可能以杀害帕尔梅作为报复。但是该组织出面否认了这一消息，瑞典警方本身也认为这一说法没有根据。

瑞典警方还曾怀疑过克罗地亚分裂分子，但后来因为无证据，又推翻了这种猜测。

帕尔梅遇刺后，瑞典警方受到了公众的关注，也受到了来自大众的压力，尽管他们绞尽了脑汁，使尽了解数，广大瑞典群众还是不能理解，不时有群众打电话责问。他们假设，猜想，细心求证，然后再推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忙碌着。

在帕尔梅首相被刺后不久，瑞通社收到一封匿名信，声称“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联盟已于2月28日成功地处死了帕尔梅，下一个该轮到维利·勃兰特了”，还说这一决定是上一年9月在希特勒当年的活动据点——联邦德国的贝希特斯加登举行的一次年会上作出的，信的落款是“希尔·希特勒，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联盟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领导人”。后据联邦德国警方提供的材料，这是一个新纳粹组织，该组织早在1972年就扬言要杀死帕尔梅的好友、当时的德国总理勃兰特。

1986年4月，还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恐吓事件。斯德哥尔摩警察局局长汉斯·霍尔默的夫人，晚上正在街上行走，一个高个子年轻男子走上前，用瑞典语对她说：“小心你和你丈夫的脑袋。”说完便匆匆消失在夜色之中了。据霍尔默夫人回忆，此人同模拟像上的凶手十分相似。一周之后，霍尔默夫人晚饭后在住处附近散步，突然从黑暗中跳出两个蒙面人来，手持匕首，几下就撕烂了她的衣服，并把她推到路边的沟里，厉声说：“这是对你丈夫的最后警告！”随后两人跳上停在不远处的一辆小轿车逃跑了。事后据警方分析，两次恐吓为同一人所为，而且此人很可能就是暗杀帕尔梅的凶手。警方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倾向于认为凶手是外国人。

有人声称是凶手，有人被怀疑是凶手，那么真正的凶手是谁呢？至今仍是一个谜。

种种猜测

时针指向1988年，警方的调查仍无头绪，瑞典国内怨声四起，政府和民众对警方失去了信任。由于舆论压力大，调查工作茫然无绪，斯德哥尔摩警

察局局长汉斯·霍尔默只得引咎辞职。新任司法大臣安娜·格蕾塔决定另辟溪径，进行一场特别的秘密调查。她上任伊始，决心在帕尔梅被刺案中找出一点线索。

安娜·格蕾塔瞒过情报机构、警方和其他内阁部长，委派帕尔梅首相密友卡尔松携带司法大臣的介绍信于1988年5月前往伦敦，会见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的官员，并查阅有关的秘密情报资料，特别要求查阅有关1985年8月库尔德工人党（PPK）在大马士革召开的一次会议的记录。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曾成功地窃听了这次会议。

伊朗决定要采取行动的原因，是帕尔梅首相多次重申要阻止瑞典向伊朗出口武器。在瑞典的库尔德人的极端组织的自相残杀，影响了瑞典的安定，帕尔梅首相下令将其驱逐出境，他们怀恨在心，因而伺机报复。

在查询中，卡尔松获悉军情六处早在1985年秋季就已警告瑞典的情报机构：瑞典将发生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事件，帕尔梅首相是袭击的首要目标，其处境十分危险。但是瑞典情报机构对此置若罔闻，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但是令卡尔松感到遗憾的是，他想要查阅有关资料，未能如愿。据说瑞典情报机构的头目已抢先一步，于4月10日访问了军情六处，内情不得而知。

尽管卡尔松行踪诡秘，但是瑞典《快报》在6月初仍首先披露：他正在一名警察的保护下，在欧洲执行神秘的使命。报上说他在巴黎还会见了伊朗前总统巴尼萨德尔，巴尼萨德尔还告诉记者，卡尔松持有一封瑞典司法大臣的介绍信。这篇报道在瑞典政坛引起强烈反响。执政的社民党、情报机构、国家警察局和司法部都围绕着帕尔梅之死的责任问题及调查问题，开始相互指责和攻击。瑞典国家机关的大多数部门都认为情报部门在帕尔梅被害的问题上渎职。据说，关于情报部门的渎职问题，一度曾在瑞典驻法国大使的负责下着手进行调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还发现了帕尔梅最后日子里的秘密活动情况。

在帕尔梅遇刺前的日子里，瑞典和伊朗的关系已经恶化。就在帕尔梅遇害的当日，帕尔梅接见了伊拉克大使，大使告诉他，巴格达对瑞典向伊朗出售武器深感不安。帕尔梅回答说，他准备阻止这样的交易，停止对伊朗出售武器。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采取措施，阻止瑞典的博福斯公司经新加坡出售武器给伊朗。帕尔梅与伊拉克大使的会面，在帕尔梅遇刺后的新闻报道中一点也未提及，这说明伊拉克大使的来访是极端秘密的。据事后透露的消息，帕尔梅在遇刺的那一周内还接见了伊朗大使，由于没有新闻报道，此事同样鲜为人知。

帕尔梅是在黑夜被人刺杀的，由于事实不足，种种猜测都有，但由于证据不足，谁也不敢肯定是什么人出于什么政治动机于了这件见不得人的事。时间是无情的法官，随着岁月的流逝，终究会冲刷掉裹在事实上的泥沙，使事实大白于天下。人们，尤其是瑞典人民盼望着这一天。

死水微澜

时针指向1996年。帕尔梅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被人忘记，但对其死因及凶手，人们似乎不再给予关注，只有秘密警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仍在认真搜寻世界上任何一个与该案有关的线索，哪怕是一个微小的线索。

谁知就在这年9月，与瑞典相隔千山万水的非洲大陆最南端却传来了与帕尔梅遇刺案有关的内幕新闻，而且这个新闻并不像以往那些疑点那样空穴来风。

原来自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以纳尔逊·曼德拉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了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特·图图大主教为主任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清算种族隔离时代白种人种族主义当局犯下的罪行，其主要方式是请前政府时期有关证人出庭作证。

1996年9月28日，在审讯南非前秘密警察头目库切时，库切语出惊人。在法庭审理中，库切承认前南非秘密警察曾经残酷迫害黑人自由志士，同时披露了令人震惊的内幕：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参与了暗杀帕尔梅的案件。而在此之前，库切的继任者科克上校已于几天前作过同样的证词。

据当天法庭的证词，库切称杀害帕尔梅的凶手名叫安东尼·怀特，此人至今仍生活在希腊或塞浦路斯。库切证实，科克上校关于南非前政府参与暗杀帕尔梅的证词是确实的。库切说，由于帕尔梅强烈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给予南非非国大以有力的支持，因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

库切的这一指控公布之后，正在莫桑比克经营一家锯木厂的安东尼·怀特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声称他没有参与刺杀帕尔梅事件，是无辜的。与此同时，瑞典负责对帕尔梅遇刺案进行调查的官员们说，早在1987年他们就获悉南非可能与帕尔梅被刺有关。但是瑞典国家检察官尼尔森和帕尔梅的儿子对于库切和科克上校的证词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帕尔梅不可能是由南非前政权派人杀害的，库切等人提供证词是想借此减轻罪行，逃避惩罚。

在这之后，库切和科克上校在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证时，又指控南非前政权超级间谍威廉逊为刺杀帕尔梅的凶手。对此，正在狱中服刑的威廉逊又于1996年10月21日断然否认，同时他承认当时南非秘密警察确实有刺杀帕尔梅的计划，但不是由他领导，而且该计划直到帕尔梅死时都未执行。

南非关于帕尔梅被刺案的线索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经过媒介渲染，一时炒得沸沸扬扬。由于该风无源，不久又归于平静，案件何时能大白于天下，实难预料。

血溅宫井洞 ——韩国总统朴正熙之死

危机四伏

南朝鲜实行军人独裁统治，自朴正熙上台以来，这种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独裁统治，顾名思义，是指一切问题均由一人裁决，权力绝对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权力越集中，责任也就愈大，各种矛盾必然聚焦在独裁者一个人身上。为了巩固独裁统治，独裁者豢养了一批争权夺利之徒，其中大部分是军人，他们手中握有武器，为了各自的权力，不惜兵戎相见，火并争雄，直至向朴正熙动手。因而在朴正熙执政的几年中，军政内部动荡不安，多次发生刺杀朴正熙的活动。

1975年10月1日，是南朝鲜的“国军日”，陆海空三军的首领们都想在这一天露一手，向朴正熙邀宠。军队从春到夏，冒酷暑、顶大风日夜操练。“国军日”的前两天，受阅的军队集中在汝矣岛的“五一六”广场等候朴正熙的检阅，以表现军队的“铁壁伟容”。万事俱备，只等朴正熙前来检阅。不料朴正熙临时变卦，原因是有人暗中密报陆军将领、“革命主体势力”的要员、检察院院长李周一联络咸镜南北道的军人，准备在朴正熙前来检阅时起事，将其杀死。李周一等人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凡与此事有牵连的无一不被清洗、镇压。

1976年6月，朴正熙乘直升机前往前线视察。直升机掠过山岭，飞越江河，快到前线时，突然一阵密集的炮火劈头盖脸打将下来，两架直升机顿时被火团包围，栽到地面，朴正熙乘坐的这架居然冲出火网，安然无恙。原来朴正熙生性多疑，他在登机时临时改乘另一架飞机，让两架直升机在前面开路，当了炮灰。

由于刺杀朴正熙的事件屡屡发生，朴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1979年1月19日，朴对中央各官厅进行年初视察，竟对政府官员们逐一搜身，原因是有人情报说这些人中有人企图暗杀他。

1979年是朴正熙独裁统治达到顶峰的时期，也是南朝鲜各类社会矛盾全面暴露、激化的时期。

是年4月，在第二次能源危机的冲击下，南朝鲜破产的中小企业达3000多家，大批工人失业，国内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YH贸易公司200多名女职工举行了反对解雇、保障生存权利的斗争。这次斗争成了反对朴正熙独裁统治的导火索。8月初，反对党新民党总裁金泳三让200名示威的女职工搬进新民党总部四层大礼堂内，金泳三几次带领该党国会议员和干部到现场进行鼓动。在新民党的支持下，示威女工于8月11日与前来镇压的军警发生冲突，新民党立即利用这一事件，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对朴正熙的浪潮，南朝鲜政局剧烈动荡。朴正熙为镇压反对党，派出数百名军警包围国会，强行通过对金泳三的“惩戒动议案”，剥夺金泳三的议员资格。朴正熙的倒行逆施如火上浇油，新民党和民主统一党的69名议员集体向国会辞职，并公开提出要朴正熙废除“维新宪法”，废除总统终身制，并警告说：“要下决心为和平移交政权铺平道路，否则将难免用不幸的方式移交政权。”这是对朴正熙独裁统治的公开宣战。

不仅如此，朴正熙还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朴在私生活方面声名狼藉。此前，朴的女招待怀着孩子倒在汉城的街头。据说女招待的弟弟发现自己的姐姐竟怀着朴正熙的孩子，认为是奇耻大辱，一怒之下，趁黑夜将其杀死，暴尸街头，并发誓要手刃朴正熙，以雪心头之恨。有情报证实，女招待的弟弟正在汉城活动，并带有一支手枪，一度冒充空降伞兵，出现在青瓦台总统府附近。

南朝鲜内部的情况如此，国际的情况也十分不妙。朴正熙是山姆大叔扶植起来的人，随着朴羽翼的丰满和权力的膨胀，他越来越不把美国人放在眼里。美国人当然不能容忍朴正熙的作为，曾几次予以警告，朴却置若罔闻。1978年，美国总统卡特到汉城与朴会谈，闹得不欢而散。嗣后，有情报说美国CTA（中央情报局）韩国站站长布赖特四处活动，和军队中的将领私下密谈，又与反对党新民党的党魁金泳三以及在野人士金大中、尹谱善、咸锡宪等频频会面。朴正熙不是傻瓜，他当然知道美国人要干什么，他知道只要美国佬不满意，下一步便是换马。

10月17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布朗给朴正熙带来了卡特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警告朴必须停止“高压政策”，要维护人权。朴正熙也明白，美国人向他下最后通牒了。

萧墙生变

围着朴正熙屁股转的是几个握有重权的军人：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陆军总参谋长郑升和、总统府侍卫长车智澈等。独裁者都是权力欲极度膨胀的人，朴正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南朝鲜的权力中心，一切人事变动都随着朴的喜怒变化而变化。朴生性多疑，对谁也不相信，任何被人们认为和他关系密切、从而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总是被他不动声色地搞掉了。在他执政的18年里，换了8个总理、13个内务部长、8个中央情报部部长、10个陆军总参谋长。有人说他撤换一个政府官员像换一双鞋子一样，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朴正熙的独裁统治经验是用没有什么基础的新人，来替换掉根深蒂固的老部下，当被提拔的人羽翼渐丰的时候，他的任期也就快结束了。因此，无论老的还是新的，在朴正熙的面前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这就是朴正熙的统治术。他的目的是要当一个终身的总统，只要他还在呼吸，就不会容忍任何人对他说“不”字，更绝对不许他人凌驾于自己之上。

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是朴正熙庆尚北道善山郡的同乡，又是陆军士官学校二期的同班同学。年满54岁的金载圭精明干练，他自军校毕业后大部以军职或文职的身份从事情报工作。他对情报有着警犬般的嗅觉，被人认为是南朝鲜搜集、分析情报的专家。金载圭从事情报工作后，始终追随着朴正熙，破获了数不清的大小案件，使朴正熙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同时也获得了无数军中或政府中的高位。1973年金载圭以中将军衔退役，1974年入阁任建设部部长，1976年朴正熙任命其为中央情报部部长。

1979年以来，南朝鲜局势严重动荡，处在朴正熙独裁统治中心的人也随着局势的变化在政治的漩涡中沉浮。

10月中旬，南朝鲜反对朴正熙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深夜，中央情报部所在地宫井洞前停满了小汽车，一辆辆汽车像伏在地上的黑甲虫，几乎到处都埋伏着人，每一个黑暗的地方都暗藏枪口。尽管黑着灯，可是连一只耗子也休想进入宫井洞，如果说青瓦台总统府是南朝鲜的大脑，那么宫井洞则是南朝鲜的神经中枢、南朝鲜每天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世界上的

风云变化，都通过各种途径及时、快速地反映到这里来。

中央情报部的小礼堂门前站着两个警卫，礼堂内是大屏幕的电视，电视机对面是稀稀落落的几只沙发。朴正熙坐在中间，两边分坐着金桂元和总统府秘书长。侍卫长车智澈屁股上像长了刺一样，一会儿看大屏幕上的录像，一会儿看朴正熙的脸，一会儿又出去看看保卫情况，出出进进心神不定。

大屏幕上放映的是南朝鲜自 10 月中旬以来各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和市民反对朴正熙独裁统治的录像，片子是金载圭手下的人录制的。屏幕上出现了“1979 年 10 月 16 日”字样，釜山大学和东南亚大学 3000 多名学生涌向市中心的光复洞和东浦洞，举行游行示威，屏幕上的横幅在晃动，几千只手臂高举着，“独裁政权滚下台”、“废除维新宪法”、“停止对在野党的镇压”的口号震耳欲聋。面对这种场面，朴正熙眉头紧蹙，双眼圆睁，两道扫帚眉倒竖，显然怒火满腔。金载圭看着屏幕，又悄悄瞟了朴正熙一眼，好像在说：“这种局面，你还有什么高招去收拾？”车智澈与朴似乎心有灵犀，看了一会儿后，他突然站起来，恨不得把屏幕上举起的手臂全部用刀砍下来，然后又以严厉的目光扫视着金载圭的脸，好像在责问：“为什么保留这么多反朴正熙的镜头，让总统不开心？”

录像继续往下放。怒不可遏的反暴政队伍袭击了庆尚南道政府大厦、市政厅和执政的民主党党部……车智澈再也忍不住了，他也想趁机在朴正熙面前露一手，便跳将起来，指着金载圭的鼻子指责：“你们情报部不可以开枪镇压吗？”

朴正熙一声不吭，任凭车智澈发作。论资历，车智澈无法和金载圭比，当金载圭戴上将星的时候，车智澈不过是一个羽翼未丰的尉官，仗着朴正熙的青睐才飞黄腾达。金载圭几次想还击，但都克制住了。他想起了“小不忍乱大谋”的古训，担心弄不好会落得同他的前任金钟泌一样的下场。

金钟泌曾协助朴正熙组织过民主共和党，为朴正熙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担任了中央情报部部长，被认为是朴正熙集团的第二号人物、朴正熙的接班人。1971 年 6 月，金钟泌出任韩国总理，1975 年 12 月，不明不白地被朴正熙免职。

金载圭自忖自己无论才能、资历都无法与金钟泌相比，朴正熙要清除自己当然要比除去金钟泌容易得多，说不定哪天朴正熙不高兴时会像扔掉一只旧鞋一样抛弃自己。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干掉朴正熙，不仅可能会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就连那些闹事的老百姓也会支持。军队里嘛，有郑升和总参谋长在，也会支持自己的行动的。金载圭咬了咬牙，下定了决心。

金秋十月，南朝鲜的风光是美丽的。汉江静静地流淌，黄色渐染山岗。这些景色和南朝鲜的独裁统治极不协调，自然景色和人文思想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在风景如画的自然风光背后，是动乱，是暗算，乃至凶杀。

1979 年 10 月 26 日，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宫井洞依然是肃杀可怖。金载圭宽大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不同颜色的电话，这些电话通往中央各直属机关，从某一方面说，电话就是指挥、就是权力。

“嘀铃铃……”是总统府的电话。

金载圭拿起了电话，话筒里传来了车智澈的声音：“是金部长吗？今天晚上总统阁下要在宫井洞餐厅和您共进晚餐，望您准备。”语调干脆利落，像是上级对部属下命令。以前车智澈和金载圭通电话时，言语中还夹带着客气的词汇，现在可好，一点礼貌也没有，而且不容询问分辩，“喀嚓”一声，

把电话挂了。

金载圭放下电话筒，头上的青筋直跳，他咬了咬牙，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这条疯狗！”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手中的半截烟在烟灰缸中揷灭。他想，今天朴正熙来宫井洞吃饭是假，找事是真，一定是冲着釜山、马山的学生运动而来的，要么是要情报部派人镇压，要么将自己搞掉作为替罪羊。朴正熙这次来是凶多吉少。他咬咬牙，下了最后的决心：干掉朴正熙和车智澈。

下定了决心，金载圭觉得心头的热血向头上涌。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紧张地思考着行动方案。

“现在就布置人干吧！”他想了想，又否决了几秒钟之前的想法。刺杀朴正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人心叵测，万一选定的人背叛自己，画虎不成反类犬。求人不如求己，信任别人不如相信自己。几十年的军事生涯和情报工作经验使他选择了后者，他决定选择适当的机会自己动手。

金载圭在房内踱了几步，想了想，认为此事光自己干不行，干成后还得有人支持自己，不能做孤家寡人。他走到电话机旁，抓起电话：“喂！我要陆军参谋总长。”他的声音有点激昂。电话接通了。“啊，郑总长，您好？！”他急切地需要郑升和的支持，以至于他的语音有点颤抖，“您今晚有时间吗？我想请您到宫井洞来吃晚饭。”金载圭急切地要求郑升和赴约，在得到郑升和肯定的回答后，才满意地放下话筒。

然后，他又拨通了中央情报部次官金正燮的电话，金正燮比金载圭年轻许多，虽是副手，但在金载圭面前唯唯诺诺，像个办事员。金载圭向他交代说：“今晚我已约定与郑总参谋长在宫井洞办公室共进晚餐，可是由于总统阁下的光临，我不能相陪，望你代我陪郑总参谋长共进晚餐。待总统阁下离去后，我马上去相陪。”

打完两个电话，金载圭松了一口气，从军方讲他抓住了郑升和参谋总长，从身边人说他又拉拢了金正燮，对下一步的行事仿佛有了许多把握。16时30分，金载圭来到位于宫井洞二楼的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手枪。这是一支德制“尤尔塔”七连发8.2毫米口径的手枪，这种枪瞄准器良好，杀伤力强。他将子弹一颗一颗仔细检查并压进弹仓，拉开枪机推子弹上膛，又认真地检查下一遍，才将枪轻轻地藏到书架的后面，然后坐下来，点上一支烟，一边抽一边盘算着行动步骤。金载圭举事谨慎，暗杀朴正熙的计划正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着。

17时10分左右，总统府秘书长金桂元来到了宫井洞，金载圭与他寒暄后便谈起了国内外形势。金桂元是文官出身，办事老练，两人谈了半个小时，便一同向餐厅走去。走出办公室，金桂元便叹了口气，他可能是认为在办公室内说话不便，怕隔墙有耳，这时便向金载圭诉说：“车智澈太狂妄自大，除了总统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他滥用职权，真叫人头痛。”金载圭说：“就是有了这个家伙，才把事情闹得一团糟，今天晚上我要收拾他。”金桂元早就看出金载圭对车智澈窝了一肚子火，现火已被他燎起，便不讲话。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一边找其他话题聊着，一边等待着朴正熙的到来。

这时朴正熙正在青瓦台总统府休息，他紧锁双眉，焦躁不安。一天下来，事事不顺利。这天一大早，朴正熙就离开了青瓦台，驱车来到忠清南道唐津郡，出席了插桥湖落成典礼，为落成的防潮堤剪彩。朴正熙为插桥湖纪念塔揭幕时，全场几百人众目相向，凝视着他。他微笑着面对众人，可是当他拽动揭幕的绳索时，不知为什么，纪念塔上的罩布仅仅揭开了一半，就拽不动

了。朴正熙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下面的群众中出现了窃窃私语和躁动。朴正熙气得脸上发紫，与参加揭幕仪式的有关人员草草握手后便乘直升机离开现场，飞往高温泉宾馆，打算在那里吃午饭。

在朴正熙乘坐的直升飞机在宾馆前的院子里降落时，又出现了第二桩令他丧气的事。这个宾馆饲养的一只獐子，听到直升飞机的轰鸣声惊恐万状，狂蹦乱跳，竟跌撞而死。

午饭时，朴正熙想着上午的两件事，面对美味佳肴食欲全无，放下饭碗后他都不知吃了些什么。午饭后要离开的时候，直升飞机又出了故障。

接二连三的不祥之兆，使得他一下午闷闷不乐。抵达青瓦台总统府后，他的心情才好了点。

18时5分，薄暮降临，朴正熙在车智澈的陪同下来到宫井洞。金载圭和金桂元出迎，然后同到餐厅。

餐厅呈正方形，地面上是暖地板，下面可以加热。地板上按照朝鲜的风俗铺了五光十色的油纸，中间摆放着一张长方形的餐桌，桌上摆满了具有南朝鲜风味的食品，菜肴有20多种：红烧香菇、烤牛肉片、馅饼、生菜、豆芽凉菜、明太鱼干和鱿鱼干，另外还有一盘朴正熙最喜欢吃的生鱼片。餐厅门前的养鱼池中养着肥美的鲤鱼、鲫鱼，作为制作生鱼片的原料，这个鱼池是为朴正熙专门修建的。餐桌上还放着几瓶威士忌酒和两盒外国人旅游专用的高级“船”牌香烟。

在金载圭的陪同下，朴正熙和车智澈、金桂元脱下外衣和鞋子相继入座。朴正熙坐首席，面朝正门，背靠窗，在他与窗户之间有一道屏风。车智澈坐在朴正熙的右边，独据餐桌的一边，金载圭和金桂元并排坐在朴正熙的对面，金载圭在左，金桂元在右。朴正熙坐的是一个有靠背的黄色坐垫，其余的人坐的是有刺绣的紫色坐垫。

金载圭除了准备了适合朴正熙口味的菜点和朴正熙喜爱的歌曲外，还招来了两名年轻貌美的女子陪席。朴正熙落座后不久，两名女子拿着乐器飘然而入，伺候在朴正熙左右。

晚餐开始，酒过一巡。

朴正熙问金载圭：“国内治安和釜山戒严情况怎么样？”

“没有什么新情况。”金载圭回答说。

朴正熙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身子向前挪了挪，谈起了参加插桥湖落成典礼情况：“插桥湖防潮堤建得真不错，今晚电视是否转播呀？”

金桂元回答道：“可能转播。”

“到时间，我把电视打开。”讨好朴正熙，车智澈惟恐落后。

说完他们又频频举起杯来。

朴正熙和车智澈进入餐厅后，随行的五名警卫人员由中央情报部部长秘书朴兴柱接待，安排在会客室。通常警卫人员随同朴正熙到中央情报部赴宴，都由中央情报部负责招待，因职责所在，警卫人员要分班进餐。警卫人员金容太、朴相范和金镛燮三人先到和餐厅相连的厨房吃饭，厨房南边的会客室里，只剩下警卫处处长郑仁炯和副处长安载松两人听候差遣。朴兴柱按照金载圭事先的安排留在会客室和朴正熙的两个警卫人员聊天。

18时35分，参谋总长郑升和来到宫井洞，中央情报部次长金正燮接待了他，将他安排在距餐厅约50米远的办公室里。

郑升和问金正燮：“金载圭部长为什么不在？”

金正燮解释说总统阁下到这里进餐，金部长正在相陪，待总统离开后马上就来。于是两人一边交谈，一边吃喝起来。

中央情报部的餐厅里，宴会在继续进行着，在柔和的灯光下，杯光酒色，几巡过去，气氛便活跃起来。他们边喝边谈，话题不知不觉转到釜山和马山的学生运动上来。此事是朴正熙的心病，是金载圭的一壶不开的水，也是车智澈攻击金载圭的一把刀。话题一展开，车智澈便故伎重演，以尖刻的言辞数落金载圭一连串的过失，指责金载圭办事不力，并指出这些过失是导致政治危机的原因。金载圭像往常一样强压心头怒火，用眼瞥了瞥朴正熙，希望他来制止车智澈的放肆行为，没想到朴正熙不仅一言不发，反而不时点头表示同意车智澈的话。金载圭早已忍耐不住，出言反驳。朴正熙只是听着，并未劝解，也未示意金桂元劝解。两个人愈吵愈激烈。

就在这时，一直板着脸的朴正熙突然用责备的口吻质问金载圭：“马山局势搞成这样，难道不是因为中央情报部办事不力吗？”朴正熙的介入，使车智澈一脸得意。金载圭则拉长阴郁的脸，一副难堪相。朴正熙以前也责备过金载圭，但场合不同，也不如这次露骨。这次当着车智澈等人的面，特别是现场还有两名艺伎，将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推到他的身上，使金载圭神情异常激动。他咬了咬牙，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18时55分，金载圭以如厕为由离开了座位。他观察了周围的动静，5分钟后又返回餐厅。此时晚餐仍在继续进行着，朴正熙与车智澈、金桂元一边看电视，一边谈笑。

金载圭返回餐厅就座，车智澈又转回话题，针对金载圭再次发起攻击：“10月18日釜山地区的戒严令，不也是因为你们情报部无能吗？”金载圭在车智澈反复责难下，怒火中烧，对车恨之入骨，恨不得马上把车智澈撕烂。

血溅宫井洞

如果说金载圭已准备杀死朴正熙和车智澈的话，那么现在的念头只有一个，就是必须马上行动。由车智澈的疯狂劲判断，说不定朴正熙第二天就会把金载圭搞掉。机不可失。19时10分，金载圭借故再次离开餐厅。他快步来到距餐厅50米的办公室，见到了正在吃饭的总参谋长郑升和与中央情报部次官金正燮。此刻，金载圭的情绪已平静下来，他以抱歉的口吻对两人说：“我陪总统吃饭，望两位稍等片刻。”接着又补充说：“我吃完饭马上就来，望两位务必等候。”郑升和与金正燮点头表示同意。

金载圭返回餐厅途中，又召见了他的两个助手——中央情报部礼宾处处长朴善浩和自己的随从秘书朴兴柱。他将二人拉到僻静处说：“国家沦亡，我们已无法生存，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今天我要干掉他们，你们听见第一声枪响，便立即解决他们的警卫，明白了吗？”

刺杀总统的事非同小可，朴善浩和朴兴柱听后颇感突然，面面相觑。金载圭这时已是骑虎难下，又不能没有助手，只有为两人打气壮胆：“这里有郑升和总参谋长和金正燮次官，你们还怕什么？”朴善浩和朴兴柱知道郑、金两人在金载圭的办公室中，以为此事三人已策划好，既然手握军事指挥大权的郑升和也参与，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两人顿时壮起了胆，表示愿意死心塌地地执行计划。

朴善浩想到朴正熙的警卫问题，便问金载圭：“今晚，也将总统干掉吗？”

“当然喽。”金载圭肯定地回答。

“总统带来的警卫员有五名，另找机会干掉怎样？”朴善浩稍稍迟疑了

一下，提出了疑问。

金载圭果断地说：“不行！今天不干，等时间一久，恐怕就会泄露秘密，你我都得完蛋。”

他以命令的口气对朴善浩和朴兴柱说：“你们再挑选三名精明强干的人来支援我，今晚我要把他们全部干掉！”

“那么，请给我们30分钟的准备时间。”朴善浩提出了要求。

金载圭点头答应，叮嘱说：“准备完毕，马上通知我。”

朴善浩和朴兴柱领命，分别找随行警卫李基柱和司机柳成玉布置任务。朴善浩负责解决在接待室里的警卫处长郑仁炯和警卫处副处长安载松。朴兴柱带领李基柱和柳成玉来到厨房后，钻进停放在那里的轿车里，伺机干掉在厨房里的警卫室特别车辆处处长金容太和警卫员金镛燮、朴相范。

金载圭回到餐厅后，朴正熙等人已酒足饭饱，席上的气氛已变得轻松。朴正熙、车智澈、金桂元三人一边喝茶谈笑，一边看着电视。两名妖艳的艺妓坐在朴正熙的身旁弹着吉他，软绵绵的琴音，使餐厅里的一切显得柔和。他们谁也不会知道，靡靡之

音下面掩藏着杀机。金载圭压住心头的怒火，不动声色，内心却像拉开的弓，弦绷得紧紧的。

19时33分，餐厅厨房长南孝周端着盛满酒肴的盘子走出厨房，这时，朴善浩走上前来，说：“请你转达一下，我要见金部

长。

南孝周点头答应，走入餐厅，将酒肴放好之后，走近金载圭

说：“处长要见您。”

金载圭第三次离开席位来到餐厅旁的一个房间中，此时已

是19时35分，朴善浩望了望四周，低声向金载圭报告说：“都准备好了。”金载圭满意地点了点头，再次提醒朴善浩以厅内第一声枪响为信号。随后他来到二楼办公室，从书架后面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手枪，将枪插入腰间，以外衣掩盖好，返身走下楼来。

19时40分，金载圭返回座位，他用眼扫了扫四周，观察动静，把握出奇制胜的机会。

金载圭坐定后，冷眼扫了一下车智澈，又向朴正熙说：“阁下搞政治要顾全大局呀！”接着又背对车智澈用挑战和讥讽的口气对朴正熙说：“您带者这种废物搞政治，能搞得好吗？”朴正熙还没有回过神来，车智澈也正在发楞，金载圭突然发难，从腰间抽

出手枪向车智澈开了一枪，然后又站起来向朴正熙打了一枪。

金载圭向车智澈开第一枪时还坐着，由于距离较近没有瞄准，子弹穿透了车智澈的右手腕。车智澈到底是军人出身，这突如其来的一枪并未把他击倒，在右手腕中弹后，他下意识地就地一滚，乘金载圭向朴正熙开枪时，站起来逃到室内厕所躲避。

坐在首席的朴正熙被第一声枪响吓得目瞪口呆、惊慌失措，他还未来得及躲闪，便被金载圭的第二枪击中胸膛，子弹穿胸而过，朴正熙挣扎了几下便倒向左侧，伏在一艺妓的膝上。朴正熙“哎哟哎哟”地呻吟着，鲜血如涌泉般喷出。两名艺妓尖叫起来，慌忙放下吉他，企图扶起倒下来的朴正熙，但朴像一头肥猪，根本扶不住。她俩分别用手掌堵着前胸和后背的伤口，哭丧着脸问道：“阁下，怎么样？”朴正熙的脸痛苦地抽搐着，他闭着眼回答：

“我没关系。”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说完便垂下了脑袋。

此时，金桂元早已吓得屁滚尿流，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餐厅里枪声一响，在接待室里的郑仁炯和安载松不禁大叫一声，接着本能地把手伸向插枪的腰间。就在这时，朴善浩提着手枪一个箭步冲入接待室内：“不许动！动就开枪！”郑仁炯和安载松顿时惊得目瞪口呆，盯着朴善浩那黑洞洞的枪管，一步一步地向后退缩着。这时，朴善浩开口说：“还是让我们一起活着吧。”郑仁炯和安载松以不服气地望着朴善浩，安载松正要抽枪时，朴善浩已扣动扳机，安载松应声倒下。郑仁炯抽出手枪正要反抗，也被朴善浩击毙。

藏在轿车里等待行动的朴兴柱和李基柱、柳成玉，听到餐厅的枪声之后，便火速打开车门跳将下来，冲到厨房的玻璃窗下，高喊：“不许动，举起手来！”话音未落，就向厨房内射击。朴正熙的贴身警卫金容太和金镛燮当场毙命，朴相范身受重伤，跌倒在地。

金载圭将朴正熙击倒后，再次扣动扳机朝着逃向厕所的车智澈开枪，可是，手枪恰恰在这时卡壳了。这时，餐厅里的电灯全部熄灭，金载圭只好将手枪丢在地上，慌忙跑出餐厅，另找手枪。黑暗中，枪声、惨叫声、“开灯”的叫喊声乱成一片。突然，灯又亮了。原来锅炉房的工人听到枪声，以为是电线短路，将电闸拉下，但不久电闸又被合上了。

金载圭跑出餐厅，在花园里遇上朴兴柱，他对朴喊道：“快把枪给我！”可是朴兴柱的子弹也打光了，金载圭无奈，正要返回餐厅的时候，正好在走廊上遇到从会客室里跑出来的朴善浩，他上前夺过朴善浩手中的利布尔布左轮手枪，再次跑回餐厅。

这时，躲在厕所里的车智澈见餐厅里久无动静，以为金载圭已经离去，便从厕所里跑出来。他一边跑，一边叫喊：“警卫员！警卫员！”真是冤家路窄，他刚跑到餐桌前便与冲进餐厅的金载圭相遇，车智澈急忙窜进餐厅里的一个角落，躲在一个四方橱柜的后面。金载圭举枪射击，子弹穿透橱柜击中了车智澈的腹部，车智澈惨叫一声倒了下去。金载圭绕过餐桌，发现朴正熙躺在那里还没有咽气，便将手枪抵近朴的脑袋开了一枪，只见朴正熙的身体抽搐了一下，便一命呜呼了。

朴正熙 1961 年 5 月 16 日在美国人支持下靠军事政变上台，独裁统治达 18 年之久。朴正熙依靠暴力上台，以暴力结束，真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南朝鲜独裁未已

金载圭刺杀朴正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他虽然刺杀了朴正熙，但对刺朴之后怎样收拾南朝鲜的局面严重估计不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只“黄雀”便是全斗焕。

和朴正熙一样，全斗焕也是一个充满权欲和野心的军事独裁主义者。他在南朝鲜军队中很早就利用同学、同乡、同事和亲

信等关系拉拢了一部分军官，组织了一个“少壮派”军人集团。属于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卢泰愚（汉城警备司令）、郑镐溶

（特种兵司令）、金复东（陆军士官学校校长）、黄永时（陆军参谋次长）、车圭宪（首都军军长）、李焯性（陆军参谋长兼戒严司令）、俞学圣（国防部次官），等。其中全斗焕、卢泰愚、郑镐溶、车圭宪四人，曾被认为是 70 年代南朝鲜“少壮派”军人中的“四大金刚”。他们都是朴正

熙的亲信，是陆军军官学校十一期的校友。

全斗焕听到朴正熙被刺杀的消息后大吃一惊，他急忙召集“四大金刚”中的其他三人商议对策。四人如丧考妣。他们一致认为，金载圭这样无法无天，一定要把他收拾掉。同时认为，对金载圭，由于他手中握有武器，一定要智取诱捕，由于参谋总长郑升和没有直接参与刺杀朴正熙的活动，可以先放过他，待尔后有会再处理。

随后，全斗焕以陆军保安司令的名义，与汉城警备司令卢泰愚一道去找南朝鲜总理崔圭夏，让他通知在汉城的军政官员到陆军本部参加会议。金载圭、金桂元、金正燮等也被通知到会。

除少数军人外，在汉城的一些军政大员还被蒙在鼓里、对朴正熙的死茫然无知。当日 11 时多，他们被全斗焕用电话叫醒，带着睡意来到陆军本部。快到 12 时，会议才开始，崔圭夏首先讲话，他对朴正熙死的全过程并不太了解，崔圭夏讲了几句便没词了。接着全斗焕以主人的姿态说：“现总统已死，国不能一时无主，我们认为应让总理代理总统职务。”

他讲此话时看了看会场上的卢泰愚、郑镐溶、车圭宪等人。会场上其他人也认为总统已死，理应由总理代理总统职务，于是纷纷表示同意了。

会议开到第二天零时 40 分，崔圭夏宣布散会，政府中的文官打道回家，全斗焕随即将参与刺杀朴正熙的金载圭等十多人逮捕。

朴正熙死后，南朝鲜的局势更加动荡。外电将朴正熙之死说成是“强硬派”和“稳健派”之间权力之争的结果。他们将朴正熙说成是“强硬派”的代表，那“稳健派”的代表当然是金载圭了。“稳健派”虽失去了金载圭，但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崔圭夏就任代总统，郑升和担任参谋总长兼戒严司令，权力由“稳健派”掌握。崔圭夏宣誓就任代总统的第二天，即 12 月 7 日，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宣布废除“第 9 号总统紧急措施”，解除了对反对党领袖金大中的软禁，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并表示要进行政治改革。

崔圭夏是朴正熙的心腹，但是地道文官出身的官僚。由于他上任之后的所为违反了常规，引起了全斗焕等“强硬派”的强烈不满。全斗焕利用“稳健派”尚未完全控制政权的时机，于 1979 年 12 月 12 日伙同党羽调动 5 万军队，以“消除与刺杀朴正熙有牵连的人”为由，将郑升和等 40 余名高级军官逮捕，解除了同郑升和关系密切的国防部部长卢载铉的职务，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并控制了内务、法务等重要部门的大权。这次大逮捕，实际上是全斗焕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

全斗焕政变后，立即把大批亲信安插到南朝鲜的军队和政府各个部门，并在军队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1955 年前毕业于士官学校的老一辈军官大都被清除，大批重用 1955 年以后的那几届毕业生，师一级的权力基本上被陆军士官学校 1955 年以后的那几届毕业生所控制。全斗焕成为继朴正熙之后的又一个“铁腕人物”。南朝鲜的反对党也指出，全斗焕所作所为是企图争取“继承朴正熙衣钵的活动合法化的一种努力”，在朴正熙被刺一个月后，全斗焕军人政权便重新走上了朴正熙军事独裁的老路。

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后，南朝鲜的民众和爱国人士反对军事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不断高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日益表面化，各政党围绕修改“维新宪法”和选举总统等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南朝鲜争取民主和民族统一的国民会议负责人之一金大中同前总统尹浦善、宗教界人士咸锡宪等，不顾全斗焕的“非常戒严令”的威胁，发表声明和谈话，主张废除“维新宪法”、

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矛头直指全斗焕的独裁政权。

1980年5月17日，全斗焕为继续进行独裁统治，对人民群众进行大肆镇压，发表了第10号“非常戒严令”，禁止一切政治集会和游行，查封了国会、各在野党总部和大学，并以“煽动暴乱”的罪名逮捕了大批民主人士，其中包括南朝鲜在野的平民党总裁金大中、民主党总裁金泳三、共和党总裁金钟泌。5月24日，全斗焕下令将刺杀朴正熙的金载圭绞死。这样，在朴正熙被刺半年多后，南朝鲜的军事独裁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南朝鲜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谁是谋杀的真凶 ——意大利前总理莫罗之死

1969年，地中海滨的意大利出现了一个叫“红色旅”的组织。该秘密组织专门以绑架、暗杀政府高级官员为目的，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制造了一系列的恐怖事件，其中最重大的事件是绑架和杀害了意大利前总理奥尔德·莫罗。

库乔受审

1977年5月10日，一个阳光照媚的上午，意大利都灵市法院门前，人头攒动，记者们手中的镁光灯不停地闪烁着。在尖厉的警笛声中，一辆铁甲囚车，在摩托车、警车的开道护送下，来到法院门前，早已守卫在这里的持枪巡警高度紧张，食指都压在扳机上，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车门打开了，一个身材不高、长着一脸大胡子的年轻人戴着脚镣、手铐，走下囚车。这是一个十分英俊的意大利男子，长期的关押使他面色苍白，但两眼喷发着复仇的火焰。在九名身材魁梧、手持冲锋枪的警察的簇拥下，他显得格外单薄。

记者们一拥而上，把话筒伸向囚犯，来自四面八方的不断闪光的照相机使他不得不眯缝起眼。他感到愤怒和不适。

“喂！库乔，这次审判你将与法庭合作吗？三年以来，还能记得是第几次上法庭吗？”

“我也记不清了，我还是那句老话：他们无权审判我，我拒绝与他们合作”，库乔咆哮着，“这些老爷们就是这样缺乏记性，我已告诉他们多次了，这是在审判我和活下去之间作选择。谁愿意穿着丧服在法庭上耍威风，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在警察的押解下，库乔走到法庭上，面前是一个2米高、3米长的钢笼，大厅四周黑压压地站着一圈警察。

库乔停了下来，不觉放声大笑：

“没想到，你们竟如此怕我！”

他低头钻了进去，警察立即“咔嚓”一声扣上了大锁。这种情形使人联想起古罗马竞技场上被锁在铁笼中的野兽。

大法官巴巴诺戴着法官的黑帽，身披黑色长衣，装模作样地坐在审判席的中间。他宣布开庭，照本宣科：

“被告库乔，被指控于1969年组织‘红色旅’，数年来……”

“听着”，库乔大吼一声，打断了巴巴诺的话，“你们无权审判我！被审判的应该是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老爷！”

巴巴诺下去与库乔交锋，依然慢条斯理地念着，坐在他左右的法官们一个个尽量把目光转向别处，不去与库乔对视。而过去的三年中，法官像走马灯似地更换，谁也无法审完一个小时。

库乔明白，这一次审判是有备而来的，法官们都是精心挑选过的，没有一个能被他的恫吓吓退。他几次试图去打断巴巴诺，但是没有成效，巴巴诺仍然旁若无人地念着。

库乔突然转向法官的右侧，那里坐着陪审团。他怒睁两眼。凶神恶煞般地威胁着：

“你们必须立即离开法庭！否则我的同志们会把你们一个个毫不留情地杀死，像杀狗一样！”

陪审席上的陪审员脸色全变了，他们惴惴不安，交头接耳，不安地骚动起来。

“请相信我我说的是实话，‘红色旅’历来言必信，行必果。请你们想想八天以前律师柯罗希的下场。他死有余辜，我曾一再警告他，而他竟不听劝阻，执意要当我的辩护律师。这不过是一个小丑的角色，我的同志们在八秒钟内就要了他的命。难道你们也想走他的老路？”

陪审席上的陪审员们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一名妇女站了起来，声音中带着惊慌：

“大法官，罪犯以恐吓和威胁妨碍公正的判决，我申请退席。”法庭秩序顿时大乱。

原来，5月2日，都灵著名的律师柯罗希被政府指定为库乔的辩护律师。当他走进关押库乔的戒备森严的监狱时，铁栅门中，咄咄逼人的目光直射过来，柯罗希不禁毛骨悚然。

“听着，库乔，我是来拯救你的，是你的辩护律师。”

“滚吧，小丑，我库乔从来不要什么辩护律师。我所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我相信，真正能拯救我的，是我的同志们。你等着瞧吧！”

“可怜的人，你已经大祸临头了，看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绑架、杀人、用枪射击政府官员的膝盖。我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正义事业。当然，我是律师，我不管什么正义和主义，我的道德就是利用口才和对陪审团的心理控制，利用繁琐的法律条文为当事人争取到有利的情势……”

“可怜虫，立即滚回去，等待你的是正义的审判！”库乔歇斯底里地凶狠地吼叫着。柯罗希夹着他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逃了出去。

当他驱车到家时，周围的环境一切正常，只是路边上比往常多了几辆轿车。他打开车门，平静地下了车，按响了门铃。说时迟，那时快，街角处一辆汽车突然启动，疯狂地向柯罗希开了过来，车窗中伸出的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柯罗希。柯罗希将公文包扔到地上，拔腿便逃。枪响了，律师的后背、大腿和胸口都冒出了鲜血。

“混蛋——”枪声中夹杂着怒气冲天的咒骂。柯罗希被枪杀后，没人再敢为库乔辩护了。

库乔的报复

库乔，37岁，是意大利“红色旅”的缔造者之一。10年前，他曾是都灵特伦多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又是该校活跃的学生领袖之一。

当时的意大利正处在“经济奇迹”时期，政府对大学采取了开放政策，利用各种途径广招学生。学校成了大学生们的理想世界，但毕业后的大学生则完全缺乏社会保障，就业无门，住房、交通、卫生、福利种种问题都难以解决。校园中和社会上形成的巨大落差，引起了大学生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学生们经常闹学潮，上街示威游行；政府则派警察进行镇压，双方不断冲突，乃至发生流血事件。

一次，库乔等人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与前来弹压的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学生们捡起石块，警察则投掷催泪弹，库乔和他的好朋友莱诺和莫迪形影不离，勇敢地战斗在最前面。

一颗催泪弹“嗤嗤”地冒着白烟落到了库乔面前，莱诺与莫迪奋不顾身上前去捡，就在这时催泪弹爆炸了。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两位朋友倒下了。库乔抱着好友血肉模糊的尸体，泪流满面地对着警察发疯似地喊道：

“不能这么算了！我一定要复仇！”

那天夜里，库乔呆在莱诺和莫迪的墓地里，哭了很久，也想了很多，他认为：警察的催泪弹每次扔到示威人群前面时，都有四五秒的时间才爆炸，这是为了让学生们尽快躲避。而这一次，当莱诺和莫迪同时弯腰去捡时，催泪弹突然爆炸了，一定是在一个该死的警察手里停了几秒。要是能找到那个狗东西，我一定要把他身上打得像个筛子一样……

猛然间，库乔想到了枪，他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头，自问：

“我们怎么这么蠢？我们手无寸铁去游行，就像伸着脖子等别人来砍。最好的办法是拿起枪，成立自己的城市游击队。你们安心去吧，活着的人要继续战斗！”

朋友的死，使库乔报仇的念头化为实际行动。他站在朋友的墓前发誓，一定要组织一支游击队，向政府的决策者和执行人讨还血债。他们开始设法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秘密机关联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基地中，第一批游击队成员接受了训练，掌握了射击、格斗、擒拿、爆炸技术。库乔将他的游击队称为“红色旅”，选择了一枚环绕着圆圈的五角星作为旅徽。

“红色旅”成立不久，针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一系列报复行动拉开了序幕。库乔发起了“使政府权力机构残废运动”。这个运动是在意大利的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市制造恐怖事件。库乔解释说：“政府机构的官员是为权力机构效劳的鹰犬，应该打碎他们的膝盖，使他们终身不能走动。政府官员的残废，象征着政府的残废。”

1969年，在罗马的国会大厦前，一位高级官员正迈步走上台阶。“啪——啪——啪——”数声枪响之后，一名摩托车手猛踩油门，扬长而去，被打碎膝盖的官员倒在了血泊之中。

在威尼斯国际机场，一位外交部官员正准备出国访问，登机前去洗手间，早已埋伏好的杀手从腋下抽出装有消音器的手枪。枪声响起，官员惨叫着倒地，膝盖上血流不止。

在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都灵都出现了枪击政府官员的恐怖事件，一时间人心惶惶。政府和警察局注意到：这是同一伙人干的，但他们的动机尚不清楚。

1973年，菲亚特汽车公司的汽车大展引起了世人的关注。造型新颖、色彩华丽的名车各领风骚。一天夜里，随着“轰隆——轰隆——”的爆炸声，陈列汽车的展厅冒出浓烟烈火，待警察和消防队扑灭大火后，一辆辆被烧毁的汽车残骸惨不忍睹。警察在现场的一面墙壁上发现了一枚环绕着圆圈的五角星。初步侦察发现，这次爆炸事件和以往的枪击事件都是一个自称“红色旅”、自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危险组织所为。该组织有纲领和目标，要求以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主张用暴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警察局在各个城市进行大搜捕，但一无所获。从那以后，“红色旅”组织大大扩张，不久便有400多名成员，拥护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失业的年轻工人。

库乔将“红色旅”组织得非常严密。它的基层细胞为小组，每小组由三人组成；小组和小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每六个小组构成一个核心，各地的核心构成旅部。一般行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即使某个小组被警方破获，也不会危及其他小组成员的安全，因为小组中的成员是不知道其他小组的活动情况的。

意大利政府机构的官员谈虎色变：“‘红色旅’的组织机构就像一条蚯蚓，当它被切成数段时，每一段都能蠕动。”

“红色旅”在库乔的领导下，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行动，使意大利政府和警察局难以应付，疲于奔命。官方出动大批人员布控，但收效甚微。在政府的专门指示下，警方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对付“红色旅”。在长达几年的追捕行动中，双人各有损失，而“红色旅”的元气并未受挫。在1975年夏天的一次行动中，警方偶然获得重大的胜利，库乔被捕了。

消息传来，“红色旅”积极开展各种营救活动，发誓要以更大、更多的恐怖活动来回击政府对他们首领的逮捕。库乔在法庭上，面对一次次的审判，不断向法官发出恫吓。这是一只好对付的“烫山芋”。库乔在法庭上威胁陪审团的战术立即生效，在那位女陪审员的带动下，陪审员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要求退席。大法官巴巴诺神情沮丧，宣布退庭时，他说：“法警，请把罪犯带回去。被告，听着，我们终究要审判你！”库乔狂叫着：“来吧！我等着，我等一千年！”整个法庭都在颤抖。

“宝石”行动1978年3月15日凌晨。睡梦中的巴巴诺大法官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朦胧中，他抓起电话。听筒中传来一个低沉而充满威胁的声音：“这里是‘红色旅’！巴巴诺，我们以上帝的名义起誓，绝不让后天的审判如期进行！”

巴巴诺一下子清醒过来，色厉内荏地说：“不可能！为了这次新的审判，我花了足有10个月的时间，才组成了新的陪审团。”“你不信？等着瞧好了。”“后天就要审判了，你们还能干什么？”“哈哈——”对方在笑，“还有两天时间，足够了，明天你就会知道的！”巴巴诺拿着听筒，呆若木鸡，一股寒气从脚底直逼脊梁。有人说，意大利人天性懦弱，一点都不假，一个黑手党就够让人心慌的了，又冒出了一个“红色旅”。而眼下都灵市民对“红色旅”畏之如虎，巴巴诺为了组成新的陪审团，用上了吃奶的力气。一些市民为了逃避入选，甚至举家搬迁，一时成为世人的笑柄。

巴巴诺转念一想：这次法庭开庭地点设在警察营里，从全国各地调来了4000余名警察，难道他们敢劫狱？他莫名其妙地摇摇头。

上午，巴巴诺派人将开庭的消息告诉狱中的库乔时，库乔嘲弄地讥笑道：“这已不是什么新闻了，不要枉费心机，不会有结果的。”

“库乔，你听着，这次不是上一次，法院一定会执行对你的审判的！”

“说得轻巧，我们的人不会让这场闹剧开场的，等着瞧吧！”库乔的脸上挂着阴森的笑。

3月16日清晨4时30分，61岁的意大利前总理莫罗便睡不着了。对莫罗来说，这一天可能是他30年政治生涯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日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呈现的最大危机是无政府主义，多少年来，意大利很少有哪届政府执政能满一年，因此，意大利人民不相信政府。但是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结束了，在莫罗的努力斡旋下，各党派之间已达成协议，组成一个多党联合政府。今天，国会将讨论这个协议，而各党派的党魁已经私下向莫罗保证：协议一定会获得通过。

莫罗是个政治家，是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主席，曾经在战后五次出任意大利总理，在他出任总理期间，曾多次解决了政府的危机。没有莫罗，意大利早就四分五裂了，人们称赞莫罗是意大利的希望。在联合政府协议即将提

交国会讨论的早晨，莫罗已兴奋得无法自己。他决定起床。

辗转反侧中，妻子依列娜被他折腾醒了，她睡眼惺忪地问：

“天亮还早，你是不是太兴奋了？协议能不能通过要等国会讨论后才能见分晓呢。”

“我相信国会一定会通过的！”莫罗自信地说。

“国会能否通过，我不管。我只知道，政治是那样自私自利，而且没有人性。”依列娜叹了口气，忧郁地说。

“亲爱的，每当我高兴时，你却多愁善感。我相信这是家庭的制约作用，当然是有益的。我好像是火车头，你却是制动器，不让我跑得太快而飞离轨道。”莫罗不乏幽默，他穿好晨练的运动服，去阳台上练体操。

莫罗做梦也没想到，他正面临巨大的危险——“红色旅”将重大行动的目标放在莫罗的身上要绑架莫罗来交换库乔。这，就是“宝石”行动。

莫罗呼吸着早晨新鲜而自由的空气，练完体操后，他回到盥洗室洗漱，面对镜子，仔细地梳理稀疏而灰白的头发。镜中的他容光焕发，嘴角露着淡淡而坚定的微笑。他相信自己魅力犹存，并且一定能使协议在国会中通过，因为协议是他的政治生命。

依列娜亲自端来了速溶咖啡和意大利馅饼。莫罗以极好的心情围上餐巾，他觉得今天的早餐特别可口，胃口大开。

门铃响了，反恐怖小组的警官——莫罗先生的保镖走了进来。他叫里奇，经过严格的特殊训练，反应敏捷，临事冷静而且有决断力。他与其他四名警官专门保护莫罗，莫罗则认为多此一举，他曾无可奈何地对里奇说：

“你的出现，只会把我和人民隔离起来。”

里奇只好抱歉地笑笑：

“这是奉命行事，我们要随时保卫您的安全。”

莫罗拿掉了餐巾，随里奇向外走去。依列娜送他到门前，两人拥抱，莫罗深情地与她吻别。他认为这样会带来好运。

“依列娜，这么美好的一天你打算怎么打发？”莫罗微笑着，边走边问。

“摆弄它们。”她指着庭院中的一小块菜地回答道。那里种满了蕃茄、大豆和辣椒，在旭目下显得生机盎然。

莫罗很愉快地走了，登上了豪华漂亮的菲亚特轿车，保镖车紧随其后。他哪里知道，危险已经临近。

为了绑架莫罗，“红色旅”专门派人去捷克斯洛伐克受过训，目的是确保“宝石”行动的准确、协调和万无一失。“红色旅”已经进行了半年以上的筹备，多次派人查看过地形，对一切细节都了如指掌。

行动的地点选择在玛利奥夫尼街和斯特里街的交汇处。这里是莫罗住宅与国会间的必经之路。大清早，路上行人稀少，来往的车辆也不多，显得冷冷清清的。四名身着意大利航空公司雇员制服的人，提着旅行袋，站在路边，好像在等班车去机场。一位美丽而娇小的金发女郎站在三名高大的小伙子之间，姑娘的制服太宽大，显得有些不合身。她名叫安娜，是“红色旅”的首领、本次行动的指挥者。

马路对面有几个穿电话公司制服的人，他们也是参加“宝石”行动的人，他们的任务是破坏这一带的电话线，以防止目击者报警。一辆从委内瑞拉大使馆偷来的车停在小巷中，挂着黑色的外交牌照，任务是堵截莫罗的车。

每天早晨8时30分，都有一个花贩子来到这里贩花。为了不让那个花贩

子碍事，安娜派人趁夜将他的车胎扎破了。显然，花贩子到现在还没有露面。

安娜还专门安排了一辆警车停在路上，以应付可能遇到的检查，并在得手后掩护行动组成员逃离现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太阳越升越高，街上的行人逐渐多了起来，然而莫罗的车还是没有出现。人高马大的安东尼奥显得忐忑不安，左顾右盼。他看着安娜，仿佛在问：怎么办？安娜略蹙眉头，用严厉的眼神消除了安东尼奥的疑虑。微风拂来，吹乱了美女的金发，有一绺落到唇际，她轻轻地用白玉般的牙齿将头发咬住。

9 时刚过，莫罗那辆银色的菲亚特轿车从斯特里大街向这边驶来，后面紧跟着保镖车。安娜轻轻地咳了一声，示意成员注意，安东尼奥将帽子取下来，周围的“红色旅”成员立即行动。

挂外交牌照的汽车从小巷中开了出来，拦在莫罗的车前，不紧不慢地开着。

坐在司机身旁的里奇立即警觉起来，前面的旅行车里只有一个司机，而且车上挂着的是使馆的黑牌照，他略微放松了警惕，往街两边望去。街的一边有几名身穿电话公司制服的人在修电话线，另一边有几名身着航空公司制服的人在等班车。看来一切正常，他伸向左腋下摸枪的手放下了。莫罗却有些着急，因为他的车被迫减速，跟在旅行车后。司机鸣笛，示意要超车，与此同时，前面的车突然急刹车，莫罗的司机猝不急防，也猛然踩下刹车，使得里奇和莫罗猛烈地前后摇晃起来。没等他们明白过来，安娜等人已从旅行袋中抽出冲锋枪向路当中冲去，动作快如闪电。只见安娜挥动手臂，用枪托猛击挡风玻璃，“哗啦”一声响，霎时玻璃便化作无数碎片。里奇刚刚拔出枪，“哒哒哒……”一阵疾风暴雨般的扫射，他和司机先后倒在车厢里，全身到处在冒血，甚至未来得及叫喊一声便死于非命了。

保镖车中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在紧急刹车后，四个人被撞得眼冒金星。当他们明白自己中了埋伏时，其中一人刚打开车门冲出来，便被铺天盖地的弹雨打得浑身弹孔，其余三人都被打死在车里。

莫罗好后悔，眼前的血使他明白：不坐防弹车是绝对错误的。

安娜的动作、性格和语调与她的外表形成强烈反差。她用黑洞洞冒着缕缕白烟的枪口对准莫罗，大声命令：

“莫罗先生！下车！”

莫罗面色惨白，抱着公文包故作镇静地下了车，按安娜的命令，向路旁的警车走去。当他回首保镖的尸体和血时，只觉得天旋地转。刚刚发生的事情像是一场恶梦，他想像布鲁诺一样，迈着平静的步伐，挺着胸、昂起头走向鲜花广场，慷慨步入天堂，但他毕竟不是布鲁诺，在警车旁他突然扔掉了手中的公文包，用一种可怜的声音乞求道：“求求你们，放我走吧。”

安娜推了他一把：“上去！”莫罗顺从地上了车，“红色旅”和警车一阵风似地走了。

几名目击者慌忙报警，电话中寂静无声。

当依列娜和孩子们在警察的保护下到达莫罗被绑架的现场时，立即被眼前的惨景惊呆了：菲亚特车和保镖车已面目全非，车身布满了弹洞，里奇、司机和三名保镖惨死于车中，另一名保镖的尸体趴在大街上，汽车里流出的血和地上的血汇成了一条条小溪，周围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和维持秩序的警察。依列娜看到莫罗坐过的比较干净的后座时，忍不住内心的悲愤，放声痛

哭起来。

政治无情

莫罗被绑架，全国震惊，全世界震惊。警察在全城展开大搜捕行动，呼啸的警笛声不绝于耳。一天过去了，毫无线索。

第二天，政府调动了几万军队配合警察大搜索，凡能隐藏歹徒的地方，如废工厂、仓库、地下室、下水道都搜查过了，还是毫无踪迹。

“红色旅”、黑手党、莫罗的政敌都有可能绑架莫罗，一时间满城风雨，谣言四起。

到3月19日中午，莫罗已失踪三天。罗马《信使报》记者巴沙拉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让他去亚兰诺路过街天桥下拿一封信，里面有关于莫罗的消息。

巴沙拉赶到天桥下，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一封信，里面有“红色旅”绑架莫罗的第一号“公告”。“公告”要求用莫罗交换“红色旅”领袖库乔，如果政府不释放库乔，“红色旅”将杀死莫罗。在“红色旅”的旅徽后，还附着莫罗的一张近照，照片上的莫罗神情沮丧，失魂落魄地坐在那里，政治家的风度已荡然无存。

警察和军队又通宵达旦地进行大搜捕，整个罗马市区像是过了一遍“筛子”，周边地区也同样展开搜查，仍然一无所获。警察局得出结论：“红色旅”肯定将莫罗转移到其他的城市或乡下某一处僻静安全的地方去了。于是全国性的大搜查又开始了。

其实，“红色旅”关押莫罗的密室就在离绑架地点斯特里街不远的一座地下停车场的修理库中。“红色旅”在修理库中建了一处隔音密室。就在莫罗被绑架的第一天和第二天，都有警察对修理库进行过搜查，但却没能识破其中奥秘。

第一号“公告”发表后，“红色旅”又接二连三发出公告，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迫使意大利政府作出让步。

莫罗亲自写信给政府，以个人的名义呼吁政府同“红色旅”谈判，释放库乔。意大利政府拒绝了“红色旅”的要求，对莫罗的信置之不理。

依列娜亲自奔走呼吁，满怀希望和乞求，一次次求见政府要员，希望他们能以政府名义与“红色旅”对话，拯救莫罗的生命。依列娜失望了，她一次次遭到拒绝，政客们擦着挤出来的眼泪对莫罗表示同情，却又以种种理由拒绝谈判。

求救信写得越多，依列娜跑得越勤，莫罗的价值就越低。但是依列娜还不死心，她去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总部中，逐个寻找、求见由莫罗一手提拔的领袖们及莫罗的亲密朋友，哭诉着：“为了这个党，莫罗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和莫罗“私人感情极深”的战友们说：“党的立场不能改变，我们绝不同恐怖分子对话。这样，即使莫罗遇害，意大利在精神上仍战胜了敌人。”

依列娜忍无可忍，大声驳斥：“我觉得关键在于：莫罗是一位政治领袖。如果是一名妇女或儿童，你们这些人就会争先恐后地营救，以显示自己的仁慈和同情心。而现在，你们从坚定不移地放弃救援莫罗的行动中，博得的只是自己对暴力毫不妥协的声誉。再说莫罗从政治舞台上消灭，会给你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政治利益。”

政客们哑口无言，脸都胀成了猪肝色。

到1978年5月10日为止，莫罗已在与世隔绝的密室中生活了整整55

天。

失去自由的囚徒生活，比莫罗想像的要好得多，密室中有浴室、卫生间、电视机、电冰箱，还有许多“洗脑”的“革命”书籍。

在安娜的安排下，他要接受“人民法庭”的审判；要阅读“红色旅”的“革命”文献和“革命”书籍、公告等；还要每天一封，甚至两封、三封地给政府写信。50多天时间中，莫罗写了80封信，每封信都希望政府中的朋友们能暂时忘记一下政治，回忆起昔日的感情，从人道主义方面考虑，接受他的请求。

但是，随着政府拒绝与“红色旅”交换人质的声明在电视中的一次次播出，莫罗的希望破灭了。他常常失眠，30年来追求的政治理想，现在正成了断送他生命的“罪证”。想到这些，莫罗不寒而栗。依列娜的话是对的，政治是那样自私自利，没有人性。他仿佛听到了死神临近的脚步声。

“依列娜，亲爱的，我的孩子们啊，我多么盼望再见你们一面啊！”莫罗伤心不已，老泪纵横。他静静地等待死亡，彼“红色旅”绑架之初，在登上警车的瞬间，恐惧感笼罩着全身，向“红色旅”乞求的举动，真是太不应该了。人迟早都是死，为什么不从从容容地去面对死亡呢？决心已下，当死亡的时刻到来时，他不会再感到恐惧，不会再像狗一样去哀求。

美丽的安娜来了，在莫罗眼中，她有天使般的容貌和魔鬼一样的内心世界。她和她的人环绕着莫罗，宣读“人民法庭”的最后判决：

“对意大利前总理、资产阶级代表莫罗的一切指控成立，判处莫罗死刑，立即执行。”

莫罗毫无惧意，平静地问：“可否请一个神父来，为我做祈祷？”

安娜点点头，一会儿，一个被蒙上双眼的神父被带了进来。祈祷声回荡在密室中：

“啊——罪孽深重的人，愿你的灵魂早升天堂——阿门——”

神父走了，安娜用手抚弄着莫罗的头发：

“来，我来为你理发——”

她的声音是那样温柔，多像依列娜，手也像依列娜那样柔软。霎那间莫罗竟产生了幻觉，待他清醒过来后，厌恶感油然而生。

莫罗开始洗人生最后一次澡，换上被绑架时穿的那套衣服——白底蓝条衬衣、瑞士毛衣和浅蓝色西服，并打上那条有着

白色图案的领带。这是他离家的那天早晨，妻子依列娜精心为

他挑选的。往昔的美好时光浮现在眼前，痛楚感在莫罗的心头荡漾开来。

最后的晚餐是丰盛的，面对美食，莫罗难以下咽。他长叹一声，放下手中的刀叉，摘下餐巾。

“要不要来点镇静剂？莫罗先生？”安娜关切地问。

“不，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要！”莫罗拒绝了。在“红色旅”成员的押解下，莫罗走出密室。

夜色很美，繁星满天，像碎银屑玉。这是莫罗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欣赏着夜空。

“请上车吧！莫罗先生——”安娜轻柔的声音中透着残忍。她用装有消音器的枪比划着。

轿车的后座已被拆除，莫罗按命令侧卧在后座的车板上，他蜷着身体，紧紧地闭着两眼。依列娜出现在脑海中，像圣母玛丽亚一样，微笑着向他走

来，越来越近……

枪声是那样沉闷，像从地狱中传来一般。

第二天清晨，在离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总部几码远的一辆黑色轿车中，警察发现了前总理奥尔德·莫罗的尸体。

罗马电视台新闻广播员用悲怆的语调宣读意大利政府特别公报时，全国都沉浸在悲痛中。内政部长科西嘉，一个自称是莫罗最好的朋友的人泪流满面地说：“‘红色旅’想要制造内战。但是，我们将取胜，民主将取胜，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失败……”

但是，依列娜却说：

“莫罗虽死于‘红色旅’之手，但他是被意大利的政客们政治谋杀的。莫罗的尸体在天主教民主党总部门前被发现，就是对无聊政客的强烈控诉和无情嘲弄。”

“ 黑暗的九月 ”
——毛泽东川西遇险记

彭德怀暗中保护毛泽东

茫茫草原，天低云暗。

毛泽东单独住在川西班牙佑附近的一座毡包中。不远处是一条淙淙流过的小河，前敌总指挥部便设在河对面一座破旧的喇嘛庙中。

毡包外，毛泽东独自叉腰而立，劲风吹着他长而飘逸的头发，手中的烟头冒着白烟，快燃到手指了，他却浑然不觉，脑海中只在思考一个问题：朱老总和张总政委的左路军为什么现在还不来？会不会……

毛泽东忧心忡忡。

警卫员陈昌奉走来，小声地报告：

“ 主席，彭军团长来了—— ”

“ 晤…… ” 毛泽东仍在沉思，烟头猛地烧到手指，他急忙扔了烟头，“ 谁来了？ ”

“ 彭德怀—— ”

“ 有请！ ”

三军团刚刚达到阿西，彭德怀便风风火火赶来了。

“ 主席，你还好吧？ ”

毛泽东兴奋起来，笑着说：

“ 彭大将军，你好啊？我身体蛮好，能吃能睡，只是有一件东西想得我差点有命…… ”

彭德怀哈哈笑道：

“ 无非是红烧肉和海椒。 ”

“ 知我者，德怀也！ ” 毛泽东赞叹道，“ 红烧肉，光想来补补脑、解解馋。 ”

“ 主席，这里都是回藏区，哪来的猪？我给你带来一只肥

毛泽东意犹未尽，叹道：“ 何以解忧？惟有猪肉。羊肉有得猪肉香啊！ ” 他指着一个树墩：

“ 老彭，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说你的来意吧。 ”

“ 主席，你有得考虑红军总司令部吧？ ”

毛泽东心中一惊，想起“ 英雄所见略同 ” 的古话，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

“ 他们下令，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码本都收缴了。 ”

“ 噢，这件事我已晓得了。张国焘的意见是红军军事统一嘛，要求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职权分开，工作程序明确。中革军委各机构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军团单位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他要统一电码本，刘伯承参谋长也同意了。 ” 毛泽东有意轻描淡写。

“ 连我们一、三军团和军委、中央通报的密码本都缴了。我打电报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联系，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林、聂也隔绝了。 ” 彭德怀嚷道，他拉着毛泽东的胳膊小声说，“ 姓张的大胖子有野心，想吃掉我们。 ”

毛泽东也认真起来，谨慎地说：

“ 彭老总，说话要有根据，我们不要说破坏红军团结的话！ ”

彭德怀一瞪眼：

“当然有根据，姓张的想把林、聂调走，派他们的人来，也私下和他们谈过话。再说，这次行军的安排你注意了没有？”

毛泽东愕然：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我看很正常嘛。”

“最前面是林、聂的一军团，现在到了哪里，我们也搞不清。中间是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然后是前敌总指挥部和中央机关，再就是李特的红军大学……”一提李特，彭德怀气不打一处来，“那小子凶神恶煞，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毛泽东插话：“彭老总，都是自己人，不要这样说。古人云，取之衣貌，失之子羽。”

“最后才是我们三军团，前后又互不通气。这个阵势，要想吃掉我们易如反掌。”

毛泽东沉吟着，在口袋中摸索一阵，找出一支揉得皱巴巴的烟，一撕两段。彭德怀点上火，两人都默默抽烟，半晌，毛泽东说：“这是李先念送来的战利品，都抽光了，只剩这一支了。四方面军好人还不少，难道张国焘真是心胸狭窄的白衣秀士王伦？他还不至于对我们下毒手吧？”

彭德怀一片忠心：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真到那时悔之晚矣。”

毛泽东点点头，心情沉重：

“老彭，你的部队现驻何处？”

“在牙弄，离你这儿大约有 20 里。”

“先不要走，你到河对面前指去看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回头再来我这里吃海椒嫩羊肉。”

彭德怀来到前敌总指挥部，见过徐向前、陈昌浩，又去作战室找参谋长叶剑英。

“一军团现在何处？”

“在俄界附近……”叶剑英明白彭的意思。

彭德怀低声说：

“三军团准备了电台，新编了密码本，想送给他们，谨防不测。但这茫茫草原，没有地图，又没有向导，真是急死人。”

叶剑英想了想：

“我派武亭同志带着指北针去寻找他们的行踪，一定把密码本送到林、聂手中。”

叶剑英很神秘地告诉彭德怀：

“班佑的东北方草地边缘还有一条路北上通甘南，要比从拉卜楞寺过去近几倍。”

彭德怀惊喜不已，忙问：

“老毛知道吗？”

“我已告诉他了，建议他改走近道，主席已同意从那里转弯，一军团就是按此路走的。”

“好！我的后卫也变前卫，和一军团联系上后，我们也立即尾随北上。”
为防止出现意外，彭德怀秘密派遣第十一团隐蔽在离毛泽东住处不远的

山林中。

左路军出师不利，张国焘决定南下

延至8月下旬，张国焘才决定向右路军靠拢，他放弃从阿坝北进的路线，在草原上寻找一条路向墨洼、班佑移动。第五军担任开路先锋，官兵们在军长董振堂的率领下，在茫茫水草间，在没膝甚至齐腰深的泥沼中艰难跋涉。

大军行动的第二天，大雨倾盆而下，张国焘、朱德披着雨衣也行进在队伍中间。

张国焘苦不堪言，不断用手抹着脸上的水：“朱老总，前方道路看不清，是否继续前进？”

朱德知道、张国焘本来就不想北上，向右路军靠拢，更非张国焘所愿。现在天降大雨，部队行动困难，张便有打退堂鼓之意，于是说：“老张，前方有条白河、藏族称为噶曲河，一遇大雨，河水便会上涨，我们应加快速度前进，否则就可能过不去……”

张国焘无可奈何，只能跟着往前走。这不是走，是活受罪，一滑二陷，全身上下都是泥浆。他实在是想不通：毛泽东是南方人，干嘛不往吃大米的南方走，偏向人烟稀少的西北行？北上抗日，只不过是宣传而已，日本人在华北，离陕北还远着呢。

夜晚宿营，只能吞咽被雨水泡过的炒面，草地上到处是水，只能在高地上支起毡包遮雨。战士们互相依偎着，用仅有的一点体温互相取暖，很多人看不到天明就默默地死去了。

班佑的毛泽东，望着如注的大雨和黑如锅底的天，同样忧心如焚。他在毡包里团团转，突然叫陈昌奉拿伞，要去前敌指挥部。

风雨太大，伞根本不起作用。毛泽东落汤鸡似地出现在前指门前时，徐向前急忙迎上去：

“毛主席，雨这么大，你怎么又来了？”

陈昌浩递上一条干毛巾，毛泽东擦着头上的水说：

“国焘对向右靠拢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现在天公不作美，北上的决心不会动摇吧？”

陈昌浩摇摇头：

“我想不会吧？意见归意见，但既然定下来了就应该执行。只是……”风雨交加，他也不敢乐观。

徐向前考虑了一下，征询道：

“我们派一个团带着牦牛和粮食去接应他们，再打个电报催问一下？”

毛泽东立即表态：

“好！用我们三人的名义给他们发电报。”电文如下：

朱、张、刘三同志：

目前敌情、战情、地理情况，极有利于按原定计划向甘南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线，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地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突出封锁线。

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

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

九月一日

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第三天下午，董振堂的前卫部队果然因噶曲河泛滥，无法向前推进。噶曲河横亘在前，平日深不过膝的小河沟，已成深逾丈余、宽约300米的大河，波浪滔滔，汹涌澎湃。

先头团团长李屏仁和政委谢良报告：

“河水很急，我们沿河而上走了几十里，想找浅的地方徒涉过去，还未找到……”

刘伯承问：“等河水落下去，估计要几天时间？”“听向导说，最快要等三四天才能过河，还要看水流情况。”张国焘皱着眉：“参谋长，部队携带的干粮还能吃几天？”“部队按规定每人携带三天的干粮。现在已两天半了，省一点的话，不出两天就要闹饥荒了。”朱德低头不语。张国焘主意已定，大声命令：“暂停前进，等总司令部到达查理寺后再决定下一步方针。”张国焘、朱德致电徐向前、陈昌浩通报情况：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电报字里行间，除对中央决定北上方针的不满外，已表达了南下的意思，特别是最后两句，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霸蒋军胡宗南部和各路川军正积极部署，以便在草地附近一举歼灭红军。军情似火。中央内部对北上还是南下亦产生意见分歧。毛泽东认为：目前无论是向北还是向南，都有机会，如果红军不分裂，暂时向南也是可以的。周恩来抱病参加会议，严重的肝脓肿使他骨瘦如柴，但两眼仍炯炯有神，他的立场很坚定：

“我们已制定了北进方针，千辛万苦过了草地，仅一军团便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目的是什么？北上抗日。因此，左路军向我们靠拢、共同北上为上策，南下是下策。目前，我们还是应该劝国焘他们北上，与我们统一行动。”

毛泽东与张闻天分析形势后说：

“只要大家认为南进暂时是有利的，我们也应该考虑南进的意见，只要红军步调一致，不分裂为好！”

徐向前、陈昌浩是实际指挥作战的，认为屯兵于草地边缘，于形势最为不利。于是两人联名致电张国焘、朱德：

胡不开岷，目前突出西（固）、岷（州）时间甚易。总的行动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

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要南进便有利，可交换意见；周意北进更有出路；我们亦以不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下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请即明电

中央局商议.....

9月8日夜，阿坝的红军总司令部灯火通明，酥酒灯吊在梁上，不时发出“劈啪”的声响。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反复商议，最后，张国焘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既然中央政治局也有南下的意思，即使是下策，还是南下嘛。南进为何就不好？我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初就提出：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的计划。这是我们在四川经营多年的良策。”

朱德长叹一口气，只得同意：“好，给徐向前、陈昌浩发电。”电文如下：

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朱德、张国焘。阿坝之夜，只有强劲的秋风怒号，微弱的寒虫悲鸣。同样的夜晚，同样的时刻。川西的前敌总指挥部依然灯火通明。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博古、玉稼祥和周恩来围坐在火塘前，气氛倒还融洽。经过讨论，大家的意见终于达成一致，认为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意见是正确的，并电告阿坝的红军总司令部。电文如下：朱、张、刘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的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炉、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愈、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深思熟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浑元）、王（均）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

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张国焘要求右路军南下的电报和周恩来等要求左路军北上的电报几乎同时向对方发出。历史又一次到了转折关头。红军是团结北上还是分裂南下，路线之争，关系到大局和前途。这一夜，红军的领导人们都彻夜未眠。9月9日，东方的黎明似乎来得特别晚。在浓重的阴霾中，太阳

苍白无力地挣扎出一丝丝光明，给大地带来微弱的希望。上午8时，在电报室中的电台前，张国焘腆着浑圆的肚子，双手叉着腰，中气十足地口授一份语气强硬的电报。向、浩转恩、洛、博、泽、稼：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 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 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 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 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慰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全、炉霍均优于洮、夏，邛崃、大邑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 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问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 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张国焘

九月九日八时

张国焘暗藏杀机，叶剑英泄露“天机”在徐向前的前敌总指挥部中，原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参谋长叶剑英，现在任前指参谋长；原五军团参谋长毕占云担任侦察科科长；赖光勋担任地图科科长；吕继熙担任作战副科科长；陈茂生担任机要科科长。

当党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前敌总指挥部“三驾马车”就路线问题产生激烈分歧时，一方面军在前指中的“卧底”人员便出色地发挥了作用。

9月9日上午，彭德怀来到前敌总指挥部，径直找陈昌浩，声音中略有焦急情绪：

“政治委员，你们对向北和向南有什么最新决定？”

陈昌浩看着眉头拧成疙瘩的彭德怀，不禁莞尔：

“彭军团长，来得好，我专门有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伙计，快说快说！”

“我们昨晚22时给总司令部发了个电报，当然是让朱、张两首长尽快北上。左路军如向南发展，决无前途可言。川北、川西地区，多为大山，从懋功到天全、芦山、雅安一线，东有岷江，南北不过几百里。敌人碉堡线已成，采取高困长围之策，我军必处于危险之中。再说，这么狭窄的地带也养活不

了我们十万大军。甘南很富庶，我们又是北上抗日，经济上、政治上都有益处，为什么不长驱直入呢？”

彭德怀听得连连点头，最后竟高兴地用拳头捶着陈昌浩的肩头说：“还是政治委员学问大，眼光远，做起思想工作来头头是道。回去一动员，部队准高兴，总算要摆脱这不进不退的境地啦。我去看看叶剑英参谋长，回头见！”他大步流星地走了。机要员进来，将张国焘要求南下的电报稿交到陈昌浩手中，他看了两行，表情严肃起来，在屋中踱来踱去。

徐向前走进来，见此情形，便知道情况不妙。陈昌浩阴沉着脸，将电报递给徐向前，自己在一旁长吁短叹。徐向前看了电报，一时也没了主意，傻愣愣地站着，一言不发。彭德怀来辞行，兴冲冲地说：“向前、昌浩，我就回去，动员部队北上甘南吃小米。”

陈昌浩憋不住，表情怪怪地回敬一句：

“吃小米，怕没有大米好吃吧？我们各自提个口号：你提打到甘南吃小米，我提打到天全吃大米，看看响应你的人多还是同意我的人多？阿坝地区恐怕也比甘南好，是个基本的游牧区，有羊牛吃，比农业区还好！”彭德怀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质问道：“这撞上什么鬼了？刚才好好的，怎么转眼工夫变了腔调？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我们北上抗日，难道没有大米就不革命？”

陈昌浩也恼了：“想吃什么就去吃什么，等吃饱肚皮再谈大道理不迟。”徐向前赶紧去劝，彭德怀火了，一甩手出了门，气呼呼地过了河，朝着毛泽东的驻地走去。“嗨嗨，欢迎欢迎，大将军驾到，八面威风啊！”正躺着休息的毛泽东打趣道。“老毛，你高枕无忧，天要塌了！”“天塌了，地接着，什么大事这么吓人？”“主席，我从前指来，陈昌浩的口气变了，一个劲地大谈南下比北上优越，肯定是张大胖子又来电报了。”毛泽东心里沉甸甸的，但有意活跃气氛：“天要下雨娘要嫁，我也有得法哟！”

“主席，不是这个问题，一军团走了几天，现在还没有联系上，不知在哪里。如果他们真执行张国焘南下方针，他们人多势众，动起手吃掉我们怎么办？而且他们有搞掉你的想法，也不是一两天了，张国焘的秘书黄超曾找过我说：‘中央内实际主事的不是总书记张闻天，而是毛泽东。’他一个不满而立之年的娃娃怎会有这种高见？这肯定是张国焘的鬼活。他们有害人之心。”

毛泽东认真地点点头：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德怀，你有何高见？”

彭德怀早有方案，附耳说：

“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局面，可不可以先下手为强？把陈昌浩他们抓起来算了。”

毛泽东没有说话，两手在口袋上乱拍，彭德怀一见，知道他烟瘾上来了，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包“哈德门”香烟。

“哪里来的？”毛泽东的声音中，透着迫切。

“四方面军程世才军长送的，他们打包座时的战利品，自己不舍得吸，又送给我了。”

毛泽东抽出一支，闻闻烟丝的香味，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

“四方面军广大的指战员都是好同志。打包座时，有一位烈士，右手打断了，左手还举着大刀片……扣押人质？”他像是在问彭德怀，又像是自问，

摇摇头，“不能那样做，即使让他们抓了我们，也不能那样干，豆萁相煎的事，君子不能为啊！”

彭德怀还想说服毛泽东：

“你这是妇人之仁。如果他们强制中央和三军团继续南进，一军团单独北上也起不了作用，而且我们会被他们吃掉。扣押人质的意见我有得向第三个人讲过，只是在处境危急的时候，提出来供你参考，以便求得一个脱身之计。”

毛泽东为彭德怀的耿耿忠心所感动，紧紧握着彭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想办法与林彪他们联系，让他们暂停北进，听候命令，万不得已时再说。”说罢，毛泽东将烟蒂扔到地上。

彭德怀骑马刚刚离去，叶剑英便神色凝重地快步进来。

“主席，有紧急情况”，他掏出一份电报，“这是一封张国焘秘密发给陈昌浩的急电，是前指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同志接收、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同志译出来的，正好陈昌浩在给干部们作形势报告，他们就将电报交给了我。”

毛泽东打开一看，电文如下：

8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毛泽东内心掠过一片不祥的阴云：这分明是命令陈昌浩等人向中央下毒手嘛。但他仍然不动声色，平静如初：

“剑英，莫要惊动他们，赶快回去，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一会儿去前指，再与向前、昌浩好好谈谈。”

叶剑英回到前指喇嘛庙，见人头攒动，会议仍在进行，陈昌浩还在高谈吃大米与革命的关系。他凑到陈的秘书身旁，悄声说：

“这是一份电报，一会儿昌浩同志讲完话后，请他看。”

不显山，不露水，水不惊，鱼不跳，叶剑英沉着冷静地完成了任务。

后来在延安，毛泽东多次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毛泽东曾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

“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1960年11月，朱德在谈到张国焘时说：“到阿坝，他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在1972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讲：“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有不少同志听到，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指吕端）的事来比喻吗？……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坏了。……古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毛泽东“金蝉脱壳”，乘夜北上

川西，三军团驻地。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

博古、王稼祥、彭德怀紧急研究对策。

“电报的内容，是强迫我们就范，否则要展开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已到了图穷匕首见的时刻了。”毛泽东分析道。

病中的周恩来躺在担架上，显得疲惫、虚弱，他浓眉一扬，目光依然敏锐：

“张国焘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与中央对着干。事已至此，我们这些人就是跟着南下也很危险。”

博古还带着书卷气，天真地说：

“国焘同志是个老布尔什维克了，党的纪律还是懂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他不能不占一条吧？”

张闻天低声与王稼祥交换意见，王的腹部有重伤，说话时有气无力。两人商讨过后，张闻天说：

“既然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向他的亲信下达那个密电，要说服张国焘，已不可能了。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应该针锋相对，旗帜鲜明，打着旗号北上！”

彭德怀哼了一声：

“人家部队多，监视你，怎么打着旗号走？不交火才怪呢。”

毛泽东坚定地大声说：

“应该立即给张国焘发个电报，不要再说中央正考虑南下的话了，否则他会认为我们是阿斗，是软弱可欺的。告诉张国焘，只要他还是中共党员，就必须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只有一个方针：北进！但是，要摆脱不利的困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只有等到半夜时分，我们来个金蝉脱壳，人衔枚，马带嚼，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往北到俄界方面，与林、聂一军团会合。”

他不慌不忙地点上一支烟，继续说：

“明晨两点，中央机关以‘打粮’为名，分头出发，在三军团驻地集中。分别通知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凯丰、叶剑英；另外，起草一份《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一、三军团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立即做好出发准备。”

周恩来叮嘱说：

“党中央和红一军团单独北上的形势是十分紧张的，如果稍有不慎，有可能和四方面军冲突起来，大家行动时千万要小心。”

毛泽东接着说：

“彭德怀同志，你要在路口多派部队接应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的同志们，在关键地方要放警戒哨。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打枪，以免伤了和气。”

一切布置停当后，毛泽东不露声色，谈笑风生，走进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略感意外，急忙迎了上来：

“主席来此，一定有重要指示。”

“不，我来看看你们，顺便问一下何时出发北进？”

陈昌浩对毛泽东怀有戒心，投石问路：

“国焘总政委和朱总联衔，要我们转告部队南下的指示。不知主席有何看法？”

“非也！路线问题，一定要有党性原则。昌浩同志，昨晚10时，国焘同志要求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中央认为是不合适的。中央恳切地指出：目前的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北上抗日，人心所向，不可逆转。向南，政治上被动，敌情、给养均对我不利，将要陷红军于空前未有之困境。中央认为：

北上的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北上。如果东出不利，可以按国焘同志意见，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地区，或通新疆，伺机再向东发展。”

陈昌浩听着听着，脸色便难看了，大声说：

“红军总司令部有权命令前敌总指挥部执行南下命令！请转告中央，如果随右路军行动，就必须执行张总政委的命令。”

“我也告诉你们：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是枪指挥党。请转告国焘同志‘和为贵’，我负责将你们的意见转达给中央。”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口气略有缓和，“有些事情欲速则不达，尤其是战略问题，思想上总要转个弯子嘛，国焘同志的意见也有道理，可以重新研究嘛！”

陈昌浩的态度也缓和下来：

“好吧，希望你们尽快研究，以便共同行动。”

“时间不会太长，请稍安毋躁。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会。”

陈昌浩诚恳地说：

“毛主席，其实我心里也很不安。中央和红军总部意见分歧，耽搁在此，受害的是整个红军，是革命事业。我是政治委员，是做思想工作的，如果红军分裂，那是我的罪过。我是共产党员，懂得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但我又是前敌总指挥部的政治委员，也必须执行红军总部的命令。”

“我理解你，你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我不怀疑。当然，指挥权的问题是听中央还是听总部的，这还有一些争议，不能怪你们。向前同志在哪里，我能不能和他再谈谈？”

“主席，向前在隔壁，你请自便。”

毛泽东去找徐向前，只见他躺在床上，头上搭了条毛巾，一副痛苦的表情。

“向前同志，身体不舒服？”毛泽东关心地问，上前用手拭他的前额。

徐向前挣扎坐起：

“主席，我头疼欲裂。这些天来，左路军要南下，右路军要北上，争来争去，人的精神都快崩溃了。军情紧急，我只希望大敌当前，莫再争执。”

“向前，你是前敌总指挥，向北向南你是怎么考虑的？”

“两军既然已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人多，有在川西活动的经验，我认为还是听国焘同志的指示好！”

毛泽东感叹道：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向前同志，你安心休养，我告辞了。”

草原隐没在夜幕之中。

在夜幕之中，许多人在紧张地准备着。离中央规定的行动时间越来越近，身在前敌总指挥部的叶剑英正苦思冥想脱身的办法。

夜光表“嘀嗒嘀嗒”地走着。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显得很着急，他已秘密通知政治部中一方面军的人员半夜起来“打粮”，军委秘书刘英睡得迷迷糊糊，被人从被窝中叫起来，打上背包就走。

杨尚昆通知了不少人，但他的妻子李伯钊白天去李先念的三十军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不知道夜间的行动。为了不惊动四方面军的人，杨尚昆只好忍疼割爱。

乌云遮住残月，掩盖了中央纵队的行动。

时间到了，叶剑英镇定地来到作战室，他的目标是“偷”走墙上的作战地图，其中最重要的是最近在包座战斗中缴获的甘南地区形势图。作战科副

科长吕继熙在值班。

“吕继熙，我们要先走了，你和毕占云、赖光勋、陈茂生等同志不能走，要留在这里，否则会引起怀疑。”叶剑英悄声说。

吕继熙点点头：

“首长，你放心走吧。”

“喂，吕继熙，有陕西、甘肃地图吗？”

“墙上挂的是十万分之一的甘南地图。”

叶剑英走过去，装作拿东西，将地图碰落在地上，他说：

“这张地图很重要，挂在这里碰坏了，收起来吧！”

吕继熙走过去拾起来叠好，放在皮包中，叶背起皮包，大步流星出了门，和哨兵敬了个礼便走了。

树影下、杨尚昆正焦急地等待着，见了叶剑英，喜出望外：

“怎么才来？曾希圣带二局的同志在一点半就走了。只有李维汉和林伯渠的军委纵队和中央机关，坛坛罐罐太多，又不舍得扔掉。”

军委秘书长肖向荣从黑暗中走来，叶剑英将皮包交给他，叮嘱道：“一定要保护好，这是最重要的。”

他们向牙弄方向大步前行，刚在路边喘气，“的的……”身后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他们连忙躲进草丛中。一队骑兵疾驰而过，没有发现他们。

1984年，杨尚昆回忆那天晚上“金蝉脱壳”的经过时说：“显然，骑兵们是来搜寻我和剑英的。他们认为我们是高级干部，一定会骑在马上，并且会有人护送，所以根本没有注意路边暗处还藏着步行者。”

天明时分，黎明驱散了黑暗，经过一天一夜折腾的毛泽东脱离险境，来到了三军团司令部。毛泽东说。

“彭军团长，给林、聂发电报，就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待命，再写封详细的信说明情况，请武亭同志送去。”

彭德怀立即命人去办，又巡视人群，问：

“怎么还未见叶剑英他们？会不会……”

正当他们疑虑之际，叶剑英、杨尚昆及曾希圣等赶来，毛泽东一见，喜形于色：

“剑英、尚昆、你们来了，太好了，我们正担心呢。”

叶剑英脸上挂着笑容：

“主席，我把前指作战室的地图拿来了，是甘南的。”

肖向荣取出地图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打开一看，是张十万分之一详图，便笑着说：

“好哇，剑英立了一大功。我们正愁不知从哪里北进，好！这个‘小差’开得好！”

叶剑英笑道：

“陈昌浩早晨起来，找不到我，又找不到地图，一定会气得大叫大跳呢。”

博古担心地说：

“剑英，你快走啊，你把他们‘坑’苦了，让他们捉住决不会轻饶你。”

毛泽东长叹一口气：“剑英，博古说得对，你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

俄界前进。我们总算都脱险了。”彭德怀放出警戒哨，又对毛、叶等人说：“麻痹不得，我们还未完全脱离危险。三军团主力已北进，剑英，你随他们走。我留杨勇团殿后，人数不多。”毛泽东从口袋中掏出一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对杨尚昆说：“找人多抄几份，贴到路口、墙上、树上，表明我们的态度。”杨尚昆接过，交由红军宣传员贴在路口醒目的地方。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越了雪山，通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了胜仗，消灭了白军 49D（即 49 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的，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可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惟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创造陕甘川新苏区

去！

中 央

九月十日

红军分道扬镳东方的云层中，透出万道霞光。前敌总指挥部中，徐向前刚刚披衣而起，陈昌浩仍在沉睡。警卫员慌慌张张闯了进来：“徐总指挥，出事了，叶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作战室中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一惊：“你都了解清楚了吗？”此时，陈昌浩也醒了，忙问：“夜晚的警戒是怎么搞的？再去查一查！”电话铃声大作，是前面部队打来的：“徐总指挥吗？有重要情况报告：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连夜向北出走了，还放了警戒哨。”徐向前听后如五雷轰顶，呆呆地坐在床板上发愣，脑子里乱哄哄的，心情异常沉重。陈昌浩似乎有思想准备，大声命令：“来人，去把叶剑英给我抓回来，地图也一定要缴过来！”他转过身对徐向前说：“老徐，老毛他们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打开的北进之路悄悄溜走了，这算什么？”电话铃声又一次急促地响起：“徐总指挥吗？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气呼呼地嚷：“请示，请示，老徐，你说打不打？”徐向前问：“打谁？打自己人？老陈，你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天底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对着电话吼道：“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对此事，徐向前后来回忆说：“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制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这时，两个战士用担架抬着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何畏进来，身后跟着教育长李特。何畏原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为迎接中央红军，在懋功战斗中负了重伤，后任新成立的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何畏拿着一张毛泽东、周恩来签发的要求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说：“今晨 3 时，红大接到北进的命

令。红大特科团，即原一方面军干部团的团长韦国清、政治委员宋任穷集合特科团的学员宣布，中央的方针是北上，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就跟他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许多学员都跟他们跑了。”李特火冒三丈：“立即派部队尾追他们，把他们截回来，不行就来硬的。”陈昌浩控制住激动的情绪：“这样吧，老李，你带一队骑兵去追中央，劝说他们回来，实在不愿回来就分道扬镳。记住：不准开枪。这是命令！”

李特将腰间的大号左轮手枪向后一推，转身跑了出去。

后来徐向前回忆道：“那天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毛泽东随队步行，发现远处身后尘土飞扬，李特跃马扬鞭冲在最前面，大喊：“部队停下！”他终于追上了北上的队伍，猛一勒马缰，大灰马竖起前蹄，长嘶一声，停在路中间。

毛泽东等停了下来，见李特的追兵气势汹汹，宋任穷、韦国清等人纷纷赶到毛泽东身边。德国顾问大鼻子李德也停了下来，遵义会议后，他失去了对中央红军的实际控制权，只能跟着队伍长征。这时，他瞪大眼睛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李特带人来到毛泽东面前，厉声问道：

“现在总部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已下了南下的命令，你们为什么违反命令，私自北进？”

毛泽东口气很和蔼、但很坚定地说：

“谁违反命令？中央决定是北上，张总政委的命令是南下。请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懂不懂党的组织纪律？是中央听张国焘的，还是张国焘听中央的？”

李特语塞，半晌他大叫道：

“中央？中央能带队伍逃跑？张总政委为什么不能下令阻止你们？”

毛泽东不去理睬李特，面向广大指战员说：

“同志们，大家想一想，向北是不是逃跑，向南是不是进攻？南面敌人已集中了主要部队，而陕北、甘南的敌人相对薄弱……”

“这正是你们消极避战、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的表现，你们不敢打国民党主力，只是一味向北逃跑。”李特振振有辞，转身面向红大的学员们喊道，“不要听毛泽东的花言巧语，这样往北下去，逃入荒无人烟的西北边还抗什么日？再说谁都明白‘我能往寇亦能往’的道理，除非你们逃出国境，否则蒋介石总是会追上你们的。即使你们能穿过沙漠到新疆，那对苏维埃究竟有何意义？对这种路线你们还不抵制、反对？”

人群中，四方面军的一支宣传队赶来了，他们喊起口号：

“坚决拥护张总政委的南进方针！坚决反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毛泽东平静地说：

“中央北上的目的，是抗日。我们树起抗日的旗帜，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目前日本在华北加紧侵略，中央已发表了‘八一’宣言，抗日的主张已得到全国人民的热情拥护。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人民拥护的。”

李特一只手按住手枪，另一手指着毛泽东：

“这是一派胡言，明明是右倾逃跑主义。你们放弃了中央苏区，放弃了根据地，一路逃到这里，红军主力八万人被你们的错误路线折腾得剩下不到一万人，现在还继续北逃。来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机会主义……”

话音未落，大鼻子李德担心他会做出不利于毛泽东之举，一把抱住李特。李特嚎叫着、挣扎着，仍摆脱不开，竟用俄语骂道：

“你这蠢猪、你在帮打倒你的人！”

李特的卫兵围了上来，此时为中央红军担任后卫的教导营，在营长黄克诚指挥下，包围了李特等人。

毛泽东身后站出来一个横眉怒目的人：

“李特，你敢动粗，我彭德怀与你较量一下！”他一挥手，附近小山坡上出现了许多端着枪的人。李特吓傻了：

“毛主席，我是奉陈昌浩政委的命令行事的，有话好说。”

毛泽东示意李德放开了李特，恳切地说：

“请你回去转告昌浩和向前同志，并转告国焘同志：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只有北上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希望。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我们先行一步，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来。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另外，为了不让你为难，四方面军在红大干部团中的学员们，可以跟你们南下。”

毛泽东命令宋任穷、韦国清召集特科团，发表讲话：

“学员们、同志们，中央在北上或南下的问题上，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志的意见有分歧。分歧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的目标还是一致的，要进行土地革命，要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矛盾正在急剧变化，抗日已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革命的形势和高潮正在到来。北上抗日，是中央在新时期到来前向全体红军发出的号召。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行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回来的，我们欢迎你们。”

彭德怀命令：“让路！”

教导营自动让开一条道，李特带着人马向南去了。

一行秋雁“嘎嘎”叫着飞向南方，蓝天下，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变成“人”字。

毛泽东抬眼远眺，感慨万千。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分合合，最终达到目的地！”他大手一挥，“北上！”

致命的失误 ——“秘密军”谋杀法国总统戴高乐

“秘密军”宣布：判处戴高乐死刑

1962年8月22日晚8时18分，在巴黎郊区的解放大街，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的车队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的袭击，总统戴高乐和他的妻子伊夫·戴高乐侥幸脱险，安然无恙。

次日，一个自称“全国抗敌委员会”的秘密组织，在向新闻界发布的一份公告中声称，他们对此事件负责。公告说：

1962年7月3日，戴高乐将军因犯叛国罪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62年8月22日晚8时30分，特别行动第一团的一支别动队用冲锋枪和轻机枪袭击了共和国总统的车队。

法国并没有“特别行动第一团”，很显然，所谓的军事法庭和判决，纯属子虚乌有，故弄玄虚。

巴黎警察局大出动。刑警大队长莫里斯·布维尔全权负责调查此案。警察局的巡逻队在默东附近的一片茂密的森林中发现了一辆被人遗弃的轻型卡车，从汽车中搜出了两枝冲锋枪。五个弹夹、一个手榴弹和一公斤带导火索的可塑性炸药。导火索曾被点燃过，但因为只燃烧了一半就熄灭了，汽车才没有被炸毁。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线索，有几个匪徒陆续被捕，根据他们的交代，疑点渐渐都集中到一个叫热尔曼的人身上，他是这次暗杀行动的现场总指挥。

刑警队长莫里斯·布维尔露出讥讽的表情：

“你瞧，又是这个叫热尔曼的家伙干的。而在此之前，警察局的暗探们都发誓这个叫热尔曼的人是不存在的。这帮笨蛋！”

他立即从监狱中提审1961年9月8日在塞纳河桥公路上刺杀总统戴高乐的几名在押凶手：马努利、维尔芒迪、鲁维埃、拉普拉德等人。直觉告诉他，这两起刺杀事件，可能是同一组织所为。

马努利，35岁，被捕前是保险公司业务承保人。他眉清目秀，脸上还带着稚气，但那个棱角分明的下巴上却留下了一大块光润明亮的伤疤，表明他是个身经百战的杀手。马努利过去曾是一个修道院的修士，后去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当过志愿兵，从修士变成了杀手。

刑警队长将一根刚点燃的烟塞进马努利嘴中，等他贪婪地猛吸几口后开始问话：“好了，现在谈谈热尔曼的事情……”

“我跟你说过多次了，那个叫热尔曼的家伙我完全不认识。那还是1961年6月的一天，我在巴黎参议院大楼的一间办公室

中，第一次看见热尔曼。他的样子像一名高级军官，小平头，目光炯炯，充满了自信与刚毅。他很有头脑，精于计算。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但一见面我就感觉到，这个精明的人一定会是我们‘秘密军’的头。”

马努利又开始吸烟，回忆当时的情形。

“塞纳河”行动那是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秘密军”成员正在召开秘密会议，马努利和几个身着笔挺的法兰西陆军军服的高级将领，正在听热尔曼讲述刺杀戴高乐总统的行动方案。热尔曼胸有成竹，层层布置，从大处到

细节都无可挑剔。众人无不佩服，频频颌首。

最后，大家决定，由热尔曼带领暗杀组成员到暗杀现场去实地勘察。热尔曼开来一辆黑色轿车，载着马努利驶出喧闹的巴黎市区。轿车沿 19 号公路行驶了 20 公里，路边出现一堆黄沙，热尔曼放慢了速度，兴奋地说：

“这里面可以埋藏一个大炸弹，总统的车队一到，‘轰’的一声，肯定上西天。马努利，由你亲自负责这次行动！”

“我要知道戴高乐车队的情况。”马努利不像热尔曼那样乐观。

热尔曼早有准备，从西装口袋中取出一张折好的纸：“这是爱丽舍宫停车场的停车顺序单。戴高乐车队出发时正常速度是每秒 30 米，正常车距是 30 米，他的专车一般是排在第二位，车牌号码上面都写着呢。”

马努利佩服得五体投地。

热尔曼又叮嘱说：

“关键不是等车队一到就引爆炸弹，而是要等戴高乐的车过来。为了准确掌握引爆的时间，必须在路旁停一辆汽车，用前灯向负责引爆的人发出车队到达的信号，信号频率表示戴高乐的车在车队中的位置。”

“神了！”马努利心想，“这个魔鬼才是这次行动的真正指挥。”

“我手下有行动队员 50 名。”马努利补充道。

“五个人就足够了，又不是围猎。”

刑警大队长认真地听着马努利所述的每一个细节：

“你是说热尔曼是行动的真正指挥者？”

回答是肯定的。莫里斯·布维尔又命令带出犯人维尔芒迪。此人约 30 多岁，一头乱蓬蓬的棕发，满脸皱纹，饱经风霜，外貌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他出身杂技世家，从小四处流浪，耍把戏卖艺。他于过多种职业，两度参加军队，却没有信仰，属于能被重金收买的那种人。

维尔芒迪说：“有个叫热尔曼的对我说：‘你负责见信号就引爆。在军队，你在这方面是最优秀的。’我答应了，问报酬是多少，他说：‘让你下辈子也花不完。’我说：‘要有反坦克手榴弹和手雷就好了，我会把他们统统干掉的。’”

第三个被询问的人叫鲁维埃，36 岁，身体瘦弱，脸色苍白。他从小家境贫寒，受人欺侮，形成了孤僻、冷峻的性格。

“我不知道什么热尔曼。有一天，马努利来找我，把 45 公斤的可塑性炸药交给我说：‘你设法将这些炸药装在一只丙烷钢瓶中，把雷管塞进红色可塑性炸药里，再接上电线，电动控制引爆。记住，炸弹爆炸的范围半径要达到 50 米。去准备起码 650 米以上的电线，你担任特别行动的电工。’”

从死牢中带出来的第四名犯名叫拉普拉德。他是奥利机场的一名检验员，有敏锐的目光。他负责监视戴高乐的雪铁龙高级防弹轿车的行驶，一旦与他的汽车平行后，便打开车前灯发信号，后面的维尔芒迪就按下引爆电钮。他也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热尔曼。

还有两个形影不离的家伙，自命不凡，一个叫贝尔维西，一个叫巴尔邦斯。

贝尔维西是汽车推销员，属于另一个地下组织，喜欢出风头，炫耀自己。他常穿一身耀眼光亮的白色服装，盛气凌人地在街上横冲直撞。他到处向人显示对戴高乐的敌意，并向灌他白兰地的人和盘托出要对总统采取极端行动的秘密。与他形影不离的则是 27 岁的，留了一撮胡须的巴尔邦斯。他们曾是

同一个伞兵部队的战友。

他们是自告奋勇来参加这次特别行动的，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也没见过热尔曼。

马努利接到指示：7月23日夜晚可以行动。他立即命令巴尔邦斯和贝尔维西去铺设电线。从沙堆到雷管之间的导线将近700米，要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铺完，而且只能在黑夜中进行，公路上还有川流不息的各种车辆。他们趴在地上，像蚂蚁那样一厘米一厘米地前进。只要负责警戒的人从路边汽车上发出危险信号，他们就立即停止，像晰蜴一样窜入草丛，蛰伏起来。眼看胜利在望，笨牛一样的巴尔邦斯失手损坏了电源器，重新换已来不及了。

7月23日夜晚，马努利躲在树林中，窥视飞驶而来的戴高乐总统的车队。最先开来的是两辆开路的保卫车，紧随其后的是两辆轿车，其中一辆架设着天线，另一辆是戴高乐的专车。一架直升飞机在汽车上方盘旋，担任空中警戒。车队风驰电掣般从沙丘旁经过，安然无恙。这真是个动手的好机会，马努利等人只能眼巴巴地瞅着，与它失之交臂。马努利使劲捶着自己的头，怅然而归，等待着下一次机会的降临。回到巴黎，他便携带妻儿去海滨浴场度假，显得若无其事，并将炸弹等器材委托给贝尔维西保管。

一天清晨，睡梦中的贝尔维西被警察逮捕了。在拘留所中，他认识了同监的犯人麦尔兹上尉。后者是以反政府人士面目出现的。贝尔维西按捺不住心中的秘密，迫不及待地托出暗杀总统的计划。麦尔兹立即报告了秘密警察。很快，在漆黑的夜幕中，秘密警察拆除了沙丘中炸弹的引信。秘密警察决定放长线钓大鱼，以便暗中监视这一伙“秘密军”的行动。不久，贝尔维西根据医生的诊断书获释。

9月7日，马努利接到热尔曼的一个神秘的电话：戴高乐的车队将于9月8日黄昏经过第19号公路前往科隆贝。

是日夜晚，马努利与维尔芒迪、拉普拉德再次检查电源线和引爆电器。万事俱备，拉普拉德负责监视戴高乐的雪铁龙牌轿车的行驶，如果一切正常，就按原计划行事。

正当他们检查完毕准备返回时，负责暗杀行动的电工鲁维埃拦住了大家：

“慢着，请诸位听听我的意见。我们再埋设一枚凝固汽油弹，当炸弹引爆后，再爆炸凝固汽油弹，形成一堵火墙，这样就能将戴高乐与随行人员隔开。”

马努利一听有理，当即在那枚已被拆除了引信的炸弹附近又埋设了一枚凝固汽油弹。

这一危险的紧急情况是警察局始料未及的。戴高乐处于危险之中。

9月8日，漫长的白天使马努利一伙人如坐针毡，终于盼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他们像鼯鼠一样，奔向潜伏地点。

9时整，拉普拉德的汽车急速开来，停在公路边的草地上。远处戴高乐车队的灯光隐约可见。

公路上，雪铁龙平稳地高速行驶着，离那堆沙丘已经很近了。戴高乐的随从副官戴博内瓦尔上校坐在司机弗朗苏瓦·马鲁的身旁，想到那个“秘密军”的杀手按动电钮后下见轰炸声和火光的失望表情，他的嘴角不禁浮现出一丝微笑。而在后排的戴高乐却很舒适地坐在座椅中闭目养神，身边的夫人正注视着窗外。

车队以每小时 110 公里的速度驶过塞纳河桥，沿着一条笔直的公路前进。9 时 43 分，公路旁草地上的汽车前灯亮了，维尔芒迪兴奋不已，眼看戴高乐的雪铁龙进入预定地区，他猛地启动电钮——

黑暗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道火墙腾空而起。

此时，坐在戴高乐的雪铁龙前排的戴博内瓦尔上校被爆炸声和火焰惊得目瞪口呆：

“怎么一回事，炸弹的引信不是说已经拆除了吗？”

雪铁龙像一条火龙，从浓烟和烈火中窜出来，在它的身后。竖起一道约两米高的火墙。

戴高乐扭头注视着后面的壮观景色，说：

“这是凝固汽油弹！”

司机马鲁沉着镇定，猛踏油门，轿车像箭一样冲到塞纳河畔离出事地点约五公里处的罗米伊。车停后，戴高乐走下车，他一边搀夫人下车，一边关切地问：“有没有人受伤？”

宪兵很快封锁了塞纳河桥，维尔芒迪落网供出了全部同伙的姓名。电工鲁维埃、巴尔邦斯、贝尔维西、拉普拉德、马努利相继在各地被捉拿归案。

只有真正的元凶热尔曼漏网，巴黎的警察经过多次审问后，甚至怀疑是否真有这个叫热尔曼的人。只有莫里斯·布维尔相信热尔曼的存在。

热尔曼的真名叫巴斯蒂安·蒂里，公开的身份是航空工程师，曾参与法国第一枚导弹火箭的设计工程，有一副精干数学计算的头脑。他总结塞纳河公路行动的教训时认为：用人工引爆炸弹，有个运气的问题，雪铁龙车每秒可行驶 30 米，稍有差池，就会导致全部行动的失败。因此，热尔曼决定：下一次行动使用冲锋枪。

太阳救了戴高乐巴黎郊外。在一处交叉路口，出现了热尔曼的身影。他站在小克拉玛的勒克莱克大街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旁，手中拿着一张报纸，像是在等车。他的眼睛四下转动着，观察着周围的地形。“街对面约 100 米的地方，可以停一辆面包车，第一行动组可携带长枪藏在里面。等我确认戴高乐总统的开道车开到和面包车并排的地方时，我手中的报纸一扬，应该会有 150 颗子弹穿透那辆车。等总统的雪铁龙紧急刹车后，第二组成员就从对面的小街涌出来，在最近距离内狂扫警卫的摩托车，消灭警卫后，两个行动组以密集的子弹把戴高乐打成个马蜂窝。行动结束后，所有人撤到停在另一条街上路边的三辆车上，迅速逃走。”热尔曼自言自语，一遍又一遍重复他的计划，又反复测量着距离，以确保行动万无一失。这次行动他决定亲自出马，站在公共汽车站旁向行动组发信号。

热尔曼这次的助手比上次的更强。第二行动组组长由炮兵中尉托内担任。他出身于一个有着良好教养的绅士家庭，35 岁，有两个孩子。1961 年，他参与了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入狱，但没多久便越狱逃走。第二行动组组员乔治·瓦但，外号“瘸子”，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农业工程师，也参与了政变，后来成为一名杀手。第一行动组组长塞热·贝尼埃曾是部队中的优秀射击手，对暗杀有疯狂的兴趣。其余的成员都是一些亡命之徒，没有丝毫法律观念。

热尔曼连续侦察了几天，又查对了去年的日历，估算出 8 月 22 日这一天的天黑时间是晚上 8 时 35 分；而过了这一天、天黑的时间就更早了，戴高乐的车队将于晚上 8 时 10 分左右经过，因此，热尔曼决定：“8 月 22 日晚必

须干掉戴高乐。”

1962年8月22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的确，这是一年里最炎热的一天，也是最闷的一天。巴黎城里的居民纷纷前往海滨度假，而在富丽堂皇的爱丽舍宫里，总统戴高乐身着深灰色的双排扣西服，系着黑领带，正很有风度地主持内阁会议。会开得太长了，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中午只有短短一个小时的间隙，供与会者用餐和休息。有几位部长流露出不耐烦的疲惫神情。一名部长正振振有辞，高谈阔论，戴高乐仍然聚精会神地听着。

爱丽舍宫的停车场上，停放着16辆黑色的雪铁龙牌DS型高级豪华轿车，部长们的司机聚集在背阳通风的墙边，互相抱怨漫长的内阁会议，嘲讽、评论着部长们。只有插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小三角旗的DS19型雪铁龙牌轿车司机弗朗苏瓦·马鲁在认真擦拭戴高乐的座车。马鲁生性沉默寡言，但车技高超，头脑冷静，遇事果断。自塞纳河桥谋杀事件发生后，戴高乐更信任马鲁了。

晚霞绚丽多彩，时钟正指着7时30分，厚重的防弹玻璃门终于被侍从武官打开，大腹便便的部长们鱼贯而出。轿车一辆接一辆依次开了过来，由侍从武官逐一打开后座车门，部长们先后钻进座车。车队驶出爱丽舍宫，向郊外的圣奥诺雷区急驶而去。

10分钟以后，戴高乐总统出现在玻璃门前，挽着夫人的胳膊走下了台阶。侍从武官打开车门，戴高乐夫人坐在第一辆车左边的后座上，总统本人则从右边上了车。他们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检查了后座两侧的车门之后，打开前门，在司机马鲁身边坐下。

第二辆车上是总统的保镖昂里·德儒戴，一位长着鹰一样锐利的眼睛的身材魁梧的阿尔及利亚人；另一辆车上是总统的卫队长杜克雷警长。

头戴白色头盔的摩托车手发动引擎，驾着开道车驶向大铁门，总统座车紧随其后，另一辆DS19型雪铁龙也跟了上来。当车队驶出大门，沿树荫浓密的大街向克雷蒙梭广场疾驶而去时，栗子树下，一个戴头盔的青年人猛踩油门，座下的小摩托车发出“突突”的声响，猛然向前一窜，尾随总统车队而去。

沿途的警亭听到刺耳的警报声，知道总统车队即将通过，立即打开绿灯，并拼命阻止其他方向的车辆通行，忙得不亦乐乎。车队进入广场，又奔向亚历山大三世桥，向加兰尼将军大街驶去，再往前必定是荣军大街了。小摩托车猛然在路边的一家咖啡店门前停下，车手从口袋中掏出一枚硬币，拨通了一个神秘的号码。那一边，是焦急等待着的热尔曼。

“喂，货已发出，共三箱。”

“很好，谢谢你！”热尔曼将手中的酒瓶往下一掷，其余11个人纷纷抄起冲锋枪下了楼，分别上了停放在后院的六辆车。热尔曼抬起左手腕：时针正指向7时55分。“行动！”热尔曼一声令下，六辆车风驰电掣般离去，10分钟后，各组进入伏击地点。

热尔曼拿着报纸，装作等车，来到公共汽车站旁。对面的面包车前，斜倚着第一行动组组长塞热·贝尼埃，只要热尔曼挥动报纸，他就立即命令隐蔽在路边草丛中和汽车中的射击手开火；托内中尉和“瘸子”瓦坦随即迅速冲出，拦截警车。此时，杀手们都已打开枪上的保险，眯起左眼向公路瞄准。

暮霭沉沉，四野开始暗淡下来。

戴高乐车队已驶上郊区大道。车辆稀少，马鲁开始加速，每小时近60

公里，两辆开道的摩托车被甩到了后面，车队驶进小克拉玛的勒克莱克大街时，他瞟了一眼手表：时针指向8时17分。

8时18分，热尔曼望眼欲穿，终于看到车队正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冲过来，他拼命地挥动手中的报纸。

街对面100米处的贝尼埃，眼前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了。他扭转头问面包车里的人：

“那家伙到底挥动报纸没有？”

话音刚落，总统座车的尖尖的车头已掠过车站到了他的面前，贝尼埃匆忙下令：“开火！”

“哒哒哒……”暴风雨般的子弹射向车队，车速太快了，大多数子弹只是击中了车尾，座车的两个车胎被打中了，气压的消失使两个高速奔跑的前轮打滑，座车东倒西歪地向前冲去。几颗子弹打碎了后窗上的玻璃，当戴高乐恼火地回头时，一颗子弹从离他鼻子只有几英寸的地方擦过去，坐在司机马鲁身旁的布瓦西厄上校大叫着：

“趴下去！趴下去！”

戴高乐夫人从不知所措中清醒过来，一头栽到丈夫的怀中。戴高乐直挺挺地坐着：

“怎么？又对我开战了？”

马鲁的方向盘震颤着，他竭力控制着，只觉得车子在飘，他踩着刹车让雪铁龙慢慢向前滑行，在车子失去动力的一刹那，重新踩动油门，车子如离弦之箭一般向前冲去。

交叉路口的另一条横街上埋伏着托内中尉，两辆高速冲来的车子，使他一下子失去了拦截的勇气，他决定将车子开出横街，和戴高乐车队平行行驶，用冲锋枪横射总统。然而，他晚了半秒钟，戴高乐的车已冲在前面，他的车与第二辆警戒车并行。愤怒的瓦坦将半个身子探出右边车窗，把冲锋枪的全部子弹射向戴高乐专车的后部。从破碎的后窗中，他依然看得见戴高乐总统傲慢的、嘲弄式的身影。

“混蛋！为什么不向这些白痴们回击？”戴高乐生气地咒骂着。

第二辆车子的值班保镖德儒戴正从腋下掏出他沉重的左轮手枪，但司机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气得大骂，勉强还击着。

此时，警卫摩托车也跟了上来，整个车队越过道路交叉处的环行路、继续向维拉库布莱前进，将“秘密军”远远抛在后面。

沮丧至极的热尔曼在黑暗中已完全看不见总统的车队了，他们知道很快便会有麻烦，来不及考虑其他事情，只有跳上五辆汽车撤退。匆忙之中，只点燃了森林边的一辆轻型卡车上的可塑性炸弹的导火索，来不及看它爆炸便逃走了。导火线只燃了一半就熄灭了，为警察搜捕凶犯提供了线索。

杜克雷警长通过车上的报话机与维拉库布莱通话，报告了遭到袭击的紧急情况。10分钟后，总统的车队抵达那里，直接将车开到停机坪上，此时一架直升飞机已发动了引擎。

总统座车面目全非，等候在那里的军政官员将车包围住，左边车门被拉开，惊魂未定的总统夫人抖着裙子上的碎玻璃碴被扶下车，戴高乐从右边被打成蜂窝状的车门中潇洒地走了出来。他并不理睬周围人的关切问候，转到车的另一边搀扶他的妻子。

“来吧，亲爱的，我们回家去！”他们向直升飞机走去，戴高乐回过头

对人们说，“他们射不准。”

司机马鲁却瘫在座位上精疲力尽。座车右边的两个车轮已经不起作用，只是靠车圈支撑滑行，将车开到这里需要高超的技术。只有杜克雷警长走上前，向他表示祝贺。

刑警大队长莫里斯·布维尔根据马努利和维尔芒迪的交代和森林边留下的轻型卡车中的证据，成功地布下天罗地网，不到10天，热尔曼，即巴斯蒂安·蒂里被抓获，其他几名“秘密军”成员也被一一逮捕。

1963年3月11日早晨6时40分，太阳刚刚出来，懒洋洋地照在巴黎郊外的军事监狱之中。狱警押着巴斯蒂安·蒂里走出牢门，将他反绑在广场上行刑的柱子上，20米开外，有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当行刑队长拿着一块黑布去蒙他的眼睛时，他突然问：

“先生，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好吧，谁能拒绝一个将死的人的问题呢？”

“先生，这次总统是怎样从我的枪下逃生的呢？我查过前年的日历，8月22日应该是8时35分天黑……”

“巴斯蒂安·蒂里，你的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于太相信前年的日历，去年8月22日的天黑时间是8时10分。”“难怪他们没看清我挥报纸的动作。”声音是那样后悔、无奈。“听着，就是这平常的25分钟的失算，改变了法国的历史。”

巴斯蒂安·蒂里木然了，他的眼睛被蒙上了，其实就是不蒙，他也茫然，什么都看不见了。他想喊：“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误！”但枪声先于他的喊声响了起来。这一页历史翻过去了，只有一群白鸽在枪声中飞向蓝天。

一次“失败”的刺杀 ——刺杀汪精卫前前后后

楔子

这是一桩至今未能水落石出的历史陈案。

1938年底，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伙出逃重庆，踏上了叛国之旅，这在当时乃是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始终扑朔迷离，令人疑窦丛生。当时即有人指出这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合演的一出“双簧”，更耸人听闻者，认为这是蒋介石刻意为汪精卫布置的一个“陷阱”。

以上怀疑并非故弄玄虚，人们提出了许多疑问。

疑点之一：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上午乘飞机离开重庆珊瑚坝机场，同日中午抵达昆明，19日下午之时由昆明飞河内。在这期间，云南省主席龙云曾三度电告重庆，报告汪精卫行踪，但据国民党官方记载，蒋介石直到21日才在陕西武功接到龙云的电报。他因为主持军事会议而在前一天由重庆出发来到武功（按计划应是18日动身，因陕西方面天气原因，飞机延迟起飞）。

很难想像，如此重要的消息，竟无故耽搁了几十个小时。在此之前，汪精卫叛迹已显，其重要党羽、家属、文件细软已先期赴昆，军统局的特工也开始了监视行动，为什么在最关键的时候，蒋介石要网开一面？因此冯玉祥断定：

“汪精卫带着……许多人乘坐专机到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交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所以汪精卫之到南京组织汉奸政权，说蒋介石事先连想也想不到，那是谁也不相信的话。”

疑点之二：在汪精卫叛逃事件中，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是最关键的人物。他是汪精卫投向日本怀抱的牵线搭桥人，可以这样说，没有高宗武，汪精卫即使想投降也叛国无门，或者至少也要换一种形式。但是，人们有确凿的事实证明，这位将汪精卫扶上虎背的高宗武正是蒋介石的心腹（蒋介石对他有提携之恩，甚至高宗武的亲事也是由蒋氏夫妇作伐，充作月老），是周旋于蒋、日、汪三者之间的多面间谍（这一点已被日本特工证实，高宗武在帮助汪精卫从事汉奸活动的同时一直与重庆保持秘密联系，并递送情报），是埋在汪精卫身边的钉子（汪伪政权成立前夕，高宗武约同陶希圣，窃取日汪密约后潜至香港，登报宣布反水，并企图策反日本国会议员、前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公子犬养健）。由此可见，高宗武代表汪精卫与日本人进行私下交易时，蒋介石是知情的，但他却任其发展，甚至提供方便。蒋介石才是这一事件的幕后总导演和操纵者。

疑点之三：河内刺汪行动功亏一篑。

刺汪：戴笠心事重重

军统局老板戴笠一个人低着头静静地想着心事，甚至没有注意到前来报到的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

戴笠为蒋介石给汪精卫布下的圈套而拍案叫绝。

这个计划从酝酿到实施已有大半年了，本来进行得颇为顺利。他们利用

汪精卫反共、媚日，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以及对权力地位疯狂追求的心理，利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对日本的熟捻，利用日本方面和战两手的侵华政策，由高宗武向日本人推出汪精卫，充当起卖国贼的角色。

蒋介石为什么处心积虑、费尽周折地陷汪精卫于不义呢？这有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蒋汪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矛盾，与蒋同其他军阀之间的矛盾不同，双方俱以争江山社稷、争天下第一人为目的。而桂系、阎系、粤系，以及四川、云南、西北等地方军阀，则更着重于割据称王，拥兵自重，蒋介石与他们的斗争也主要集中在集权与分权等方面，不以争江山为目的。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汪精卫存在，这场斗争就将延续下去。

第二，非常之事必以非常之手段解决。在十几年的蒋汪斗争中，蒋介石也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汪精卫不是一个能被轻易打倒、能轻易服输的对手。由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汪精卫从未停止过反蒋行动，尽管屡次失利，却屡仆屡起，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另外，汪精卫的资历、影响毕竟太深太大，潜在力量非常可观，在国民党内具有相当的号召力，蒋介石不可能也不敢采用粗暴的方法以武力解决。前几年蒋因一时冲动扣押胡汉民，几乎导致天下大乱，群雄并讨，一度十分被动，这一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如若运用一般的权术阴谋，蚕食削弱政敌力量，又收效甚慢，不可能从根本上打倒汪精卫。因此，只有通过巧妙手段，陷汪精卫于不义，使其人神共愤，彻底丧失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从精神上摧垮对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第三，汪精卫对目前的抗战已产生了破坏作用。从抗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拼命叫嚷：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这不仅针对共产党而言，也是借此约束国民党内的各派各系。但是，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却与蒋介石的这种要求有所抵触。从抗战政策来说，蒋介石终究是国民政府的领袖，在军事上负全责；而汪精卫却是个投降主义者，大量散布投降主义的论调。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这样做势必混淆视听，影响士气。现在，不是有这样一批求和派，正聚集在他的身边吗？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连蒋介石的心腹周佛海也改弦易辙，追随政敌汪精卫了，其危害已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

不仅如此，汪派人马还对蒋介石本人大加攻击。淞沪抗战，是蒋介石刻意准备的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大战期间，可谓殚精竭虑，全力一搏，连夫人宋美龄都上前线劳军，结果遭敌机轰炸，车翻人伤。汪系却大看笑话，冷语讥讽：

“劳什么军啊！慰问品发到士兵手里，每人分得一颗红枣。”

他们甚至到处扬言：

“抗战，就是让全国人都为着蒋介石一人而殉葬。”

这些，使蒋介石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

第四，将汪精卫推向日本人，并不会太大的恶果。关于这一点，通过分析即可明白。汪精卫的实力在政不在军，汪自以为登高一呼，八方响应、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内几支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与汪的关系都不甚融洽：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均是主战派，虽与蒋介石素有矛盾，但事关国家存亡，他们不会冒天下大不韪；阎锡山老谋深算，明哲保身可以，卖国投敌则断乎不敢；粤系张发奎部虽与汪渊源最深，但后来却看破汪精卫反复无常的嘴脸，已与

之割袍断交；只有云南王龙云尚没有把握。但是，云南地处大后方，中央军已有部署，即使兴风也起不了大浪；况且龙云纵然对汪报有同情相助之心，但让他公然卖身投敌、兴兵叛乱，他也未必肯轻易应允。

另外，汪精卫身居高位，一旦叛国，势必造成国际影响，在国内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但这无碍大局。蒋介石对中国的特点、民族的习性有很深的了解，经数千年来传统文化思想的浸润，爱国主义和憎恨外来侵略的情绪已经成熟并日渐强烈，汪精卫的投降行径势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反而会激起更强烈的抗战热潮。相形之下，他蒋委员长的形象将更完美和伟大，抗战领袖的地位也会愈益巩固。

果然，汪精卫叛逃的消息一传出，全国一片声讨之声。1939年元旦，国民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其文曰：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散发违背国家之主张。艳（29）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悖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誉之报刊，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蛊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电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动摇国本……

在一片声讨声中，汪精卫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叛国之举，使他昔日的“光彩”荡然无存，两者之间巨大的落差不能不让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更令人踟蹰与徬徨的是日本当局政潮的起伏。1939年1月4日，刚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近卫内阁宣布辞职，继任首相平沼因对前任所肇始的诱降汪精卫的“和平行动”不感兴趣，反应冷淡。汪顿失所依，被搁置在河内，大有被遗弃之势。他整日苦思冥想，极为悲观。汪曾痛苦地回忆道：“在河内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情况确实如此，由于日本人的失信，从出逃河内到刺汪案发生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汪精卫一直蛰伏在住所中，以译书写稿打发寂寞的光阴。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对于才脱离重庆，立刻转向，向打倒重庆的路上迈进”，于情有所不忍。这是符合汪精卫性格的。

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眼见丈夫愁眉不展的样子，心里阵阵发酸，悄悄走出屋外，唤来她的侄子陈春圃：

“日本人不负责任，把我们弄出来，放在这危机四伏的异乡撒手不管了。”

陈春圃也不满，诉苦道：

“是啊，安南是法国人的天下，对我们约束很严，侍卫们连一枝枪都未带来。”

陈璧君大吃一惊：这样，安全还有什么保障？她嘱咐侄儿，想办法通过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申请签证。

蒋介石闻讯大惊。

假使汪精卫就此幡然悔悟，罢手不干，事情还未到无法挽回的地步，还有办法补救。从过去的历史看，国民党内因党争激烈，派系复杂，开除某某党籍，恢复某某党籍，简直是家常便饭。汪精卫被逼走海外已不是第一次了，可卷土重来也不止一次。汪系中人现留在重庆的为数不少，基本力量都保存

了下来。若再网开一面，今后时过境迁，难保他不会再兴风作浪。

蒋介石接受了以往的教训，这一次，一定要将汪置于死地而后快。

他没有采取肉体上消灭的方法，因为各方面情报表明，汪近日来一直蛰伏不动，与日本人也没有进一步的勾结，可谓叛逆未显。此时杀汪，他蒋某人未免会被人指责为手段太狠，言行不一，因为他在公开的场合一直表示要对汪精卫宽大为怀。另外，像这样简单地解决问题，未免太便宜汪精卫这个令他恨之入骨的对手了，于心实有不甘。

蒋介石是玩弄阴谋的行家里手，他更偏爱以一种复杂的方法解决问题，以便从中获得一种常人无法体会到的快感。

于是，由军统局负责的这一次行动的难度更大了，充满了复杂性和机密性，难怪连杀人不眨眼的戴笠也心事重重。

领命：陈恭澍奔赴河内

戴笠终于从沉思中抬起头来，打量着向他敬礼的陈恭澍。

陈恭澍，黄埔五期生。此人一流身手，心思缜密，胆大手狠，抗战前华北发生的几件大案，都是由他一手制造的：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制裁石友三，捉拿殷汝耕，惩罚王克敏。虽有成有败，陈恭澍毕竟深谙此道，是军统高手。

戴笠原本对他十分欣赏，屡屡委以重任。陈恭澍春风得意之际，却忘乎所以，犯了“家法”，违反了军统的规矩。

按军统规矩，组织里的人是不能私自结婚的。这一条除了对最上层的一些大特务没有约束力之外，一般执行得还是很严格的。有一次，军统内部竟拘禁了五六十名犯此禁条的男女特务。陈恭澍仗着功劳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居然瞒着戴笠喜结连理，这就让戴老板不快了。从此，戴笠渐生嫌恶之意。

恰好汪精卫投敌案发，戴笠接到蒋介石密令，就立即想到了此人。只有戴笠知道，此案的难度已非常人所能想像，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吃力不讨好。戴笠选中陈，一方面是借重他的才能，另一方面也算是一种惩罚。

陈恭澍一向相信他的直觉，每逢大事来临，他的手指都会不由自主地变得僵硬起来，但这并非是紧张的表现。

这几天，他的右手阵发性地痉挛，手指蜷曲难展，北方正月里的天气滴水成冰，这样，他就更痛苦了。陈心里暗忖：又要发生什么事了？

果然，傍晚时分，天津站的译电员给他送来一份密码电报，时限等级列为“十万火急”，报头上注明“亲译”，待译成明文，只寥寥数语：

克日来港，电话××××联络。

这类没头没尾的指示陈恭澍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匆匆交代了善后工作，立即启程赴香港。到港的第二天，已经与在那里等候的戴老板接上了头。

双方已经好几年未见面了，陈恭澍因违反“家法”，故而底气不足，见了这位让人畏惧的上司，已露出几分畏缩。

“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香港站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行了。”戴笠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转身进了屋子。

陈恭澍略略有些发怔，连忙去找王鲁翘打听详情。

王鲁翘，山东人氏，杭州警校毕业，原为戴笠贴身警卫。此人长得极帅，是一位白面郎君，然而心狠手辣不逊于任何职业杀手。他膏力过人，善使利斧，刚刚办完一件大案：千里追踪，捕杀当年刺杀汪精卫的主谋——连戴笠

也为之头疼的恐怖人物王亚樵。

王鲁翹只简单地告诉陈恭澍：“去河内。”

不用说，任务与不久前逃到河内的汪精卫有关了。聪明的陈恭澍很快猜出了答案。

河内相会戴笠在河内只呆了两天，在他们一行人到来之前，军统特务方炳西已先期到达。他原来是从比利时回国的留学生，被戴笠看中，招入军统。方炳西长袖善舞，擅于同各种人打交道，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这在作为法属殖民地的河内是很有用处的。短短几天里，他已经做了许多布置工作，在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租赁了一幢两层楼房，楼上有两间卧室，楼下是客厅连饭厅，院子里另有厨房和佣人房间，戴笠一伙即下榻于此。后来，这里成了刺汪行动的指挥部。两天里，戴笠只和方炳西在一起，跑进跑出。显然，他对方更为信任。直到临别前，戴笠才向陈、王二人交代任务。他概要介绍了汪精卫出逃重庆的经过，并特地带来一份上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的《艳电》剪报，让大家传阅，惟独对汪叛逃前的内幕一字不提。“我们这一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务求发挥我们的工作效能，以不负上峰对我们的期待。”他咽了一下口水，不满意刚才那番干巴巴的讲话，视线一转，犀利的目光集中到陈恭澍身上，语气严厉起来，带着杀气：“这是什么性质的任务，什么人能下达这样的命令，诸位都是聪明人，明白得很。只许成功，不准失败。否则，哼，死后都要让你在阴曹地府里哆嗦！”陈恭澍心头泛起一阵寒意，他知道这些话是专门说给他听的。

为了缓和气氛，戴笠起身开了一瓶酒，给每个人倒了一杯，在灯光照耀下，黄澄澄的煞是好看。陈恭澍接过来一尝，却是满口苦涩。“戴老板此次布置的任务，大概就像这杯苦酒一样。”这样想着，他皱着眉头强咽了下去。

“现在，我需要你们做的有两点：第一，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第二，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动。我回重庆后，会随时给你们指示，要注意联络。”

说完，他又当面交代，这里的事由陈恭澍负责，但一般性事务由方炳西去办，不必让陈分心。也就是说，方有单独行动的权力。

陈恭澍一怔，感觉到了戴笠对自己的不信任。方在这里，不是起了“监军”的作用吗？他心头一阵委屈。

大概是察觉到了陈恭澍的不满，任务布置完毕后，戴笠将他叫到另一个房间。

早憋了一肚子话的陈恭澍不待戴笠开口，气呼呼地问：

“对汪的工作，除了刚才所指示的两点外，是否还需要作进一步或是应变的准备？”

戴笠两眼瞪着他，并不回答。

陈恭澍有点心慌，语气缓和下来，建议从天津站调人——那些都是他的老部下，指挥起来得心应手。

戴笠一口回绝：

“太费时间了。发电报，候船期，办手续，耽搁太多，我看不必了。今后我会从重庆给你调人手的。”

连碰钉子的陈恭澍禁不住又冒起了火，他虽然没有胆量拒绝接受这项任务，但要将这种情绪表现出来。

“那么，这里的工作告一段落，我是否还回天津？”

戴笠的浓眉扭了起来，那张马脸拉得更长了，这句话惹起了他心中的积火，他没有回答陈恭澍的问题，反而责问道：

“你结婚为什么不按规定报告团体许可？”

陈恭澍心里好气恼，这件事已过去几年，孩子都生了两个了，现在却还遭人敲打，戴老板也真太能记“仇”了。

对方态度的不自然使戴笠止住了责骂，正在用人之际，也不便过于为难军统的这员干将。他费力地挤出一丝笑容，转变口气安慰了几句，话题又回到了当前的工作上。戴笠递给陈恭澍一张名片，交代说：

“这个人地位特殊，我已经和他约妥，指定你和他单独联系。他可以给你提供高级情报，也可以提供行动线索。他不是军统中人，对他要有礼貌，有分寸。”

方炳西从另一间屋里走了过来，提醒戴笠：去香港的班机起飞时间快到了，车已停在了门口待命。

这是戴笠在河内与陈恭澍的惟一聚。

“刺汪”成员齐聚河内

一批批杀手正源源不断地涌向河内。

岑家焯、余乐醒两人联手出击，经滇越路进入越南。

岑家焯，黄埔三期生，在军统中资格较老，当陈恭澍还在南京第一期“特务警员训练班”受训时，他便是该班教育组的副主管了，而主管则是军统三巨头之一的郑介民。将他调至河内协助陈恭澍，可见戴笠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余乐醒则是军统中出名的技术专家，他是湖南人，曾留学法国，获得过化学博士学位。他长得高且瘦，目光敏锐，凶光毕露，年纪不大，头发却花白，一支香烟常在手，是个细心的人。临来之前，戴笠专门致电陈恭澍，指定余为参赞机要与技术指导，要陈恭澍特别重视他的意见。

岑、余两人都是军统局的高级特务，此外还有一批参加具体行动的职业杀手，其中几人是戴笠精心挑选的。

余鉴声，杭州警校毕业，与王鲁翹同窗。两人后来又娶了一对姊妹花，成了连襟，彼此间配合默契，是干这行的最佳搭档。

张逢义，山东人，黄埔七期毕业，最大的特点是胆识过人、随机应变、遇事不慌，是陈恭澍在北平站任上的部属，也是陈的得力干将。

郑邦国，安徽人，行伍出身，身材高大，说话粗声粗气。他善于用枪，连发点射，在靶上能打出花来。

陈布云，江苏徐州人，生得敦实，沉默寡言，杀人越货却毫不含糊。

以上诸人，陈恭澍个个满意，称赞戴老板有眼光，唯有一位，却是让人感到不快的。

此人名叫唐英杰，这是化名，他的真名叫张效良。陈恭澍之所以对此人知根知底，是因为唐是他在天津时的老部下。

唐英杰干黑道勾当的本领陈恭澍无可挑剔。他少年逢名师，深山学艺，得到真传，尤其擅长腾挪功夫，轻功在军统中无人能比，虽说不上踏雪无痕，但窜房越脊，如履平地。有人亲眼见他四从层楼上手持一把雨伞坠下，似半空中风筝忽悠悠潇洒落下，落地后毫发无损。初出江湖，他首先在上海大世界献艺，技惊四座，被偶而路过的戴笠一眼看中。唐英杰自恃这身功夫，不把陈恭澍放在眼里。此人还是个好色之徒、采花大盗，弄得一身杨梅大疮。

唐英杰自命不凡，陈恭澍布置任务也要看他心情好坏，心情不好，唐便

不肯卖力。偏偏陈恭澍也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怎能容他猖狂，双方的关系也就可想而知了。戴笠了解这一情况后，为了息事宁人，一纸调令将唐英杰调走了事。

现在，他却又将唐英杰遣来河内，根据唐的特长，此人肩上的任务还特别重要，汪宅内部的情况就靠他这位“鼓上蚤”去摸清了。陈恭澍暗自摇头。

以后的情况，果然被陈恭澍料中。

以上这帮人马，都归陈恭澍直接调度，但另有几位文客，身后的背景就复杂了。

曹师昂，湖南人氏。他不是军统中人，曾在法国留学，学的是航空专业，现任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一处航空科长，精通法语自不必说，还娶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小姐作太太。这样的人派遣到河内协助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也是戴笠费尽心机才物色到的。

曹师昂交给陈恭澍一个沉甸甸的纸包，指着它说：

“老兄一定知道这里是法国属地，他们为了提防安南人反抗，对于持有或使用武器者，不管是谁，一律处以重罚。幸亏有我太太作掩护，带着这包东西，一路上提心吊胆，今天总算可以交差了。”

他打开纸包，里面是两枝美国造的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弹。枪是司维斯牌的，杀伤力很大，是杀手们常用的武器。

陈恭澍接过来掂了掂，暗忖：重庆方面费尽周折将武器送来，说明离行动的日子不远了。

曹师昂此行的任务自然不止是将枪交给陈恭澍。临行前，戴笠为他设宴饯行，席间，给他的口头指示是这样的：

“先与方炳西同志取得联系，再由方代约陈恭澍见面。”

陈恭澍知道后，心中自然不快。既然他是行动组的负责人，为什么有些事要隔着他，而且身旁还安置一个监督者？凭他老牌特工的眼光可以断定，就连眼前的曹师昂，也负有另外的秘密使命。

圈中有圈，计中有计，这就是河内刺汪案的最大特色。

如果陈恭澍能知道更多一些秘密，他肯定会大吃一惊。

河内刺汪案结束后多年，有人披露戴笠曾数次赴河内指挥调度，但陈恭澍却一口否认。他记得十分清楚，戴笠只去过河内一次，是和他及工鲁翹三人同行的，以后就再也没见过面。

直至后来撤往台湾，陈恭澍无意中与当年行动组成员曹师昂邂逅，从他口中，才得知戴笠确实曾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去过河内，而且还不止一次。

曹师昂提出两件事作为佐证：

“戴先生在河内遇见了西南运输处海防办事处主任黄强，曾当面警告他，无论如何不能说出去。”

“戴先生去过谭天塹的住处，看见床底下有女人的鞋子，衣橱上的把手又有点摇晃，他不留情面地叫谭天塹把那个躲在衣柜里的女人请出来，当场弄得下不了台。”

曹师昂提到的那个谭天塹，是和他一先一后到达河内的行动组成员。谭也曾留学法国，专攻财经，在军统中任教官职。戴笠为什么派这样的人来，陈恭澍一直不明白。

他之所以相信曹师昂的话真实，是因为他曾去过谭的住处（谭单独另开房间），看见他房里有女人衣物，但谭却始终没有请佳人露面，陈恭澍当时

还暗笑他太小气，金屋藏娇呢。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位法国女郎，两人无正式婚姻关系，只是露水夫妻，名不正，自然不可轻易示人。戴笠突然造访谭宅，自然会撞上这类尴尬事。令人不解的是，戴笠来河内，为何要对陈恭澍严格保密呢？试想当时军统在河内的活动，还有什么比“刺汪案”更重要的呢，又为何撇开这一行动的具体负责人而另有布置？种种疑点，令人费解。

至于戴笠临行前交代下的那个神秘人物，陈恭澍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甚至连一丝边际也猜不出。据对方称，他原籍江苏无锡，曾在欧美留学，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可陈恭澍观察一阵后，觉得此人除了脸上那副高度近视眼镜略有文化人特征外，却是谈吐粗鲁，身材五短，一点书卷气也没有。

此人对陈恭澍夸耀说，他在当地的华人社会中很有办法，与法国驻河内的官员也颇有交情，还特别与法国籍的警察总监熟识，且不时举办酒会和舞会增进感情。他让陈恭澍称他徐先生，并介绍了一个当地人做向导。

这个人名叫魏春风，20余岁，长得眉清目秀，机灵活泼。老牌特工陈恭澍以为他年轻，没经验，竟差点看走了眼，未想到在后来的刺汪行动中，此人居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密电：制裁汪逆

重庆派来的人均已陆续到齐，陈恭澍统计了一下，连他自己在内，一共18名杀手，后来有人戏称“十八罗汉”，或称“十八金刚”。在军统历次行动中，杀人绑票本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从未有过调动如此强大力量的先例，这也说明了这次行动的性质和重要性。陈恭澍暗暗揣摩着，心里还是颇为放心的。有这么多“罗汉”、“金刚”助阵，对付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一个没有特殊保护的流亡客，应该不是难事。

这天一大早，陈恭澍就开着车子，按照那位徐先生提供的地址，摸到汪精卫的寓所前。他要亲自“踩点”，作为制定行动计划的依据。

陈恭澍驾驶的是一辆二手货福特车，这是方炳西在抵达河内时购置的。车子外观极普通，半新不旧，一点都不惹眼，但性能良好，最大的优点是启动灵活。

汪精卫现在的住址是高朗街27号。这是一片高级住宅区，门前有一片草坪。街道宽阔，路边植有一排棕榈树，间或有几株高耸的大王椰树迎风摇曳，浓荫蔽日，把房子全部遮住了。左邻右舍都是法国人，差不多每家门前都有车库，备有汽车。

高朗街27号是一幢西式楼房，共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幢，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又有角门。陈恭澍前前后后转了一圈，发现后门的道路十分复杂，巷道纵横，曲径通幽，是作案后撤退的最佳选择。

惟一的麻烦，就是汪宅外面有位安南警察巡逻，汪精卫并没有请求保护，大概是殖民当局防患于未然，临时安置的。如何处置他们，倒是件颇为棘手的事。

好运气撞到了陈恭澍的怀里，这个问题的解决容易得令人难以置信。徐先生介绍的那个魏春风一语喜煞了烦恼人，他告诉陈恭澍，他的女朋友的亲叔伯哥哥就在警察局当差。而且，正负责那一段的巡逻。

陈恭澍越来越信任这个不知来历的魏春风。魏春风虽不是行动组的成员，却成了行动组在河内的方向盘、地图和引导者。陈恭澍、王鲁翹几乎整天和他泡在一起，就连作为指挥中心的住处也不对他保密了，互相熟悉到不分彼此的地步。这个年轻人发挥出了超乎想像的作用。

一切布置停当，行动组成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嗜杀成性，在河内憋了四五十天，尚未闻到血腥味，未免有些按捺不住了。

一道电波将他们的血液又刺激得沸腾起来。

1939年3月19日凌晨2时，方炳西半夜敲响了陈恭澍的房门，递来一张已经译好的电文：

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重庆方面已经以叛逆罪判处汪精卫死刑。

这是意料中事。陈恭澍虽然兴奋，却并未感到意外，甚至觉得这一行动的本身也不算艰巨。一切早就盘算、计划好了，所以他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给行动组成员下达了任务。

“遵照上峰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某的行动为攻击目标。

“出动后，由本人督导指挥，各同志与本人无法直接联系时，指定由王鲁翹同志指挥，余鉴声同志协助。

“进入汪某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导王鲁翹、余鉴声二同志指向目标，随即加入行动行列。

“张逢义、郑邦国、陈布云三人，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他各人位置，听任王鲁翹指定。

“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其他有关细节，责由王鲁翹、余鉴声再与各同志作具体规定。

“行动的时间，自即刻起，进入战备状态，静候通知。”

真不愧是职业杀手，这一行动计划得井井有条，疏而不漏。

陈恭澍又特意通知了徐先生。

徐先生说话很含糊，似乎在劝告陈恭澍：

“如果以为国除害的法律观点来说，这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一种制裁方法。若是牵涉到政治纠纷上去，这不是一个最明智的解决方法。”

陈恭澍没有时间与他争执，只是敷衍了几句。这位徐先生又转而嘱咐他事情要干得利索些，不要拖泥带水，免得今后给他带来麻烦。

“这个自然。”陈恭澍一拱手，退了出去。

回到驻地后，陈恭澍又一次将王鲁翹、张逢义、余鉴声召集在一起。这是行动组的核心。

陈恭澍要求，在3月20日之前，再作最后一次侦察，仍指定唐英杰出动，他是这方面的行家。另外，还得让魏春风从当地警探方面进行复勘，以便两相印证。如侦察结果与以前情况一致，则定于3月22日夜11时出动。进入汪寓后之一切行动，由王鲁翹负责，以他为主，完成制裁任务。

“现在，最最要紧处就是情报必须百分之百地准确。”陈恭澍一再强调，他要张逢义陪同，立刻去找唐英杰。

唐英杰又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中午过后，唐英杰才跑了回来。陈恭澍责备他不该私自溜出去，他却说肚子疼，刚才是出去买药的，附近没有药房，因此耽误了时间。

“分明是瞎话。”陈恭澍现在正用得着他，也就没有揭穿，只是请他晚上再出动一次，特别注意汪精卫的卧室所在是否有所变化。

这一次，唐英杰十分乖巧地答应下来。

陈恭澍还不放心，又唤过张逢义，让他晚上陪着唐英杰，免得这个家伙偷工减料，敷衍了事，误了大事。

功亏一篑时隔多年以后，陈恭澍还一直后悔失去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否则就能避免陷入唐英杰情报不准的误区了。

3月20日，也就是唐英杰出动侦察的第二天。一大早，唐英杰回来，迎面撞见陈恭澍，没有好气地报告说：

“我去过了，是在张逢义监督之下进行的。我在楼顶上停留了很久，一点动静也没有，楼里开着灯的还是三楼朝北的那间，不会错。‘他’就住在那里。”

陈恭澍没去理会唐英杰话中的刺，眼睛转向张逢义，要核实一下。

“没错，这个家伙赛狸猫，汪宅的人毫无察觉。”张逢义肯定了唐英杰的报告，还捎带奉承了一句。

陈恭澍放心了，这么重要的事，谅唐英杰也不敢因偷懒而撒谎。他就没有想到，唐英杰如果奉命撒谎，他又何惧之有呢？

刚要打发唐英杰回屋睡觉，魏春风一头热汗闯了进来，整个计划被迫突然提前了。

“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出走迹象。”魏春风的第一句话就惊呆了屋中所有的人。

众人尚未反应过来，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起，听筒里传来徐先生的声音：

“汪精卫偕同全家准备午前起程到打功，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转道西贡，就此放洋，尚不清楚。”徐的消息又比魏春风更详细了一些。

两条消息如此吻合，令人不得不作出如下判断：汪精卫全家就要离开河内了。由于时间紧迫，其中一些疑点已来不及查清，马上采取行动才是正理，陈恭澍当机立断：

“请王鲁翘、余鉴声分头传达，立刻召集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各自携带武器、备件，集合待命，准备出发。

“责由魏春风回去联系当地眼线，在不露痕迹的前提下，守候在27号附近，发现情况，火速电话报信。

“通知方炳西，守住徐先生，请他设法利用河内警政关系，了解汪精卫的动态。”

然后，他拉着王鲁翘检查那辆福特车，加满了油箱，试了引擎，用满是油污的手拍拍王鲁翘的肩膀：

“这下全看你的了。”

10时刚过，魏春风从外面打电话回来。

“有两辆黑色大轿车，已经从汪寓大门内开出，正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

稍停一会，又听见他报告：“汪夫妇都在车上。”

显然，他是一面打电话，一面在监视对方动态。

“追！”陈恭澍大吼一声，这也是其他特务们的共同反应。

福特车已到了极限速度，过了红河大桥，遥遥望去，有两部黑色大轿车，正停在路边的一块空地上，车头对正路面，以便随时能启动加速。

陈恭澍稳定一下情绪，为了保险起见，他一踩油门，擦着那两辆轿车超越过去。就在这一瞬间，依稀看到了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的身影。

还未来得及调转车头，靠车门而坐的郑邦国已大声喊叫：

“赶快调头，他们跑了！”

待福特车调转方向后，那两辆黑色轿车已经和他们拉开了 200 米的距离。

陈恭澍这一急非同小可，他一面提高车速，一面让大家做好射击准备。他未想到，这样子除了打草惊蛇，又能有几分把握。

对方的车速明显快于福特车，距离越拉越远，陈恭澍纵是心急如焚，也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他把自己甩脱了。

事后，陈恭澍冷静下来，遗憾之余，却发现了一些不曾注意的疑点：

打叻是地处河内至西贡之间的一处避暑胜地，但现在时值初春，到那里去干什么？是否真去那里？

为什么车过了桥停在那里？停在那里干什么？

是否发现有人跟踪就折回河内，还是另有原因？

这些疑问永远解不开了，1941 年 10 月，陈恭澍在上海执行任务时被捕，陈壁君曾审问过他。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反问她这几个问题，以解开自己心中的疑团。

平心而论，这次行动的失败并非偶然。消息来自那位徐先生和魏春风，他们两人为何同时知悉汪精卫要外出？行动组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出动，又有几分成算？敌情不明，道路不熟，遇到关卡怎么办？遇到当地警察盘查拦截怎么办？遇到汪精卫的侍卫抵抗怎么办（他们并不知道汪精卫的保镖没有武器）？这些他们都没有考虑。行动组此举除了打草惊蛇外，对完成任务毫无助益。

也许，有人的目的正在于此。

高朗街的枪声

这一趟徒劳往返的追逐，行动组铩羽而归，个个心头窝着火。陈恭澍虽未丧失理智，但判断与行动，已开始带有感情的色彩了。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下令立即行动，决定破釜沉舟，就在当晚，对汪宅进行突击性强攻。

陈恭澍再次对人员进行调整调度：

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四人进入宅内，并指定郑邦国为开路先锋。郑力大身粗，勇猛强悍，足可当此重任。

唐英杰紧随郑邦国之后，引导登楼。他事先曾几度侦察，当熟知路径，必不致有误。

王鲁翘为主，余鉴声为辅，协力执行锄奸任务。

张逢义、陈布云在户外望风，以为哨戒。

魏春风继续和当地人士保持联系，并随时与陈恭澍保持联系。

一切布置妥当，当夜，陈恭澍亲自驾车，转了几个弯，便到了高朗街。车刚在左侧的一个巷口停下，王鲁翘等几人还不曾下车，两个安南警察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这一惊几乎使众人当场怔住。这两位安南警察打着手势嘀嘀咕咕比划着，他们谁也听不懂，情势顿时紧张起来。

陈恭澍暗自担心，右手向装有手枪的口袋滑动。就在这时。魏春风却如及时雨般从天而降，他一把拉过陈恭澍，问他身上是否有钱。

陈恭澍将口袋中的钞票一古脑儿全部交给了魏春风。只听一阵交头接耳，两位警察轻而易举地被打发走了。

就连陈恭澍也感到太不可思议了：他们一伙人深夜开车来此，已属形迹

可疑，魏春风恰到好处地出现，未免太及时、太凑巧了。

他顾不得推敲这许多，一挥手，几个人便消失在黑暗中。

唐英杰事先多次“踩点”，对汪宅四周情况了如指掌，在他的带领下，一伙人绕到27号院的后门。

唐英杰用力一推，门已从里面锁上。这难不倒他，只见他稍后退几步，然后借助助跑的力量，腾空而起，双手在墙头一拍，人已如一团棉絮落到墙内，真是身轻如燕，声息全无。

唐英杰转到门边，摸到一把头号大锁，双手一扭，竟纹丝不动，连忙又探出头来，示意众人翻墙而入。

身强力壮的陈布云弯下腰来，余鉴声、王鲁翘、郑邦国以此为梯，翻过围墙。

穿过后院，踏上台阶，一伙人已摸索至楼房前，眼前一道门拦住了进楼的路。想到刺杀目标已近在咫尺，几位杀手止不住心跳加快，神经高度兴奋起来。

郑邦国一马当先，用手一推门，纹丝不动，扭动门球，里面已经反锁。他心头火起，不及细想，抽出随身携带的利斧，连劈数下，奋力一踹，门果然应声而开。

紧随身后的王鲁翘浑身透着杀气，一个箭步，越到前面，未等唐英杰带路，手持武器，飞上了二楼。

唐英杰、余鉴声不甘落后，如影随形般地跟着上了楼梯。郑邦国则易攻为守，留在底层，既为了掩护楼上行动者的安全，也为了保护通道。

几名杀手一连串的动作配合默契，简直是天衣无缝。

适才那一脚踹门声，早惊动汪宅上下。郑邦国突然发现有人正从另一房间开门探望，他抬手两枪，将来人吓回后，撕开嗓子大喊。

“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

这一情况，与汪精卫的侍卫许少泉的回忆完全吻合：

“厨师何兆住在后面的一间小房里，听到异常响声，便打开门张望。特务朝他连开两枪，打伤他的左脚。惊闻枪响，我们准备冲出去，可是房门已被特务堵住，又一声枪响，特务打伤戴云生（汪侍卫）的左膀，并有几枝枪对准我们，对方威胁说：‘不准动，谁动就打死谁。’因出境时不能携带武器，我们都是赤手空拳，加之又不知对方来了多少人，均不敢冒昧从事。”

许少泉除因为惊慌失措而未能看清对方人数外，其余回忆都符合事实。

枪声划破了夜空，坐在车上的陈恭澍的心也随之紧张起来，他调转车头，对着27号方向瞭望，却又一无动静了。再环顾四周，时隔不久，又传来三声枪响。他再次慢车缓行，准备接应行动组的撤退。

陈恭澍听到的第二次三声枪响，是王鲁翘打出的。原来他冲上二楼，却不见一个人影，屋门都紧紧关上。正待转身上三楼，却与另一个人迎面相撞，双方都吃惊不小。王鲁翘见不是目标，连忙摇动手枪：

“不准喊，快回去。”说完再不理睬，转身又跃上三楼。

上到三楼，王鲁翘直奔右首，冲向带阳台的那间北屋。他毫不迟疑，根据唐英杰的侦察，已确定这就是汪精卫的起居所在。

门紧锁着，推不动，也扭不开，显然屋中有人。他退后两步，身体像出膛炮弹一样，猛然撞去，却感到肩膀一阵疼痛，看来此门坚固异常。

唐英杰也飞身冲了上去，他递过斧子就退了下来，换上余鉴声，负责二

楼警戒。王鲁翘以力劈华山之势，硬将这坚固的房门劈开一尺见方的窟窿，探出手扭动门闩，想不到那里面已经锁死。

缩回手，王的目光穿过窟窿向内张望。屋中人已经吓呆，台灯依然亮着，在灯光照射下，只见床下趴着一个男人，上半身隐藏在床下，完全看不见，腰背双腿则完全暴露在外面，想必是闻声后一时不知所措，下意识地躲入床下，依据所见的形体特征及唐英杰的侦察报告，王鲁翘断定：这就是汪精卫。

王鲁翘不再迟疑，一连三枪，粒粒子弹都射入床下那人的腰背。惟一遗憾处，就是无法进入房间验明正身。

王鲁翘自觉大功告成，一声唿哨，行动组成员纷纷作鸟兽散。

度日如年的陈恭澍正焦急地驾车转悠，他又感到了手指发僵。按理说，像他这样的老牌特工应该沉得住气，毕竟事关重大，他反而患得患失起来，生怕有一丝闪失。第二次枪响后，他看了看表，此刻已经过了午夜，准确地说，是零时9分，行动组应该干完活了，为何不见踪影？

正疑虑着，却见巷口一个穿便衣的人向他挥手，定睛一看，却是个陌生客。他在示意他离开，或是转到另一边去？为什么在夜静更深、枪声大作之际突然出现？这些，陈恭澍都来不及考虑，只想离开此人视线，于是加大油门折向了另一个巷口。

事有凑巧，从汪寓中撤退出来的王鲁翘正好从巷口钻出，他双手抄在裤子口袋里，意态悠闲得如过路者。只听“嘎”的一声，抬眼看，福特车已停在他的面前。

招呼王鲁翘上了车，陈恭澍又围着27号绕了一圈，再不见有人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两辆警车呼啸而来，陈恭澍见势不妙，只得驾车先逃。

王鲁翘的兴奋劲还未过去，不待陈恭澍发问，他早已眉飞色舞了：

“活干完了，眼看着汪精卫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动弹了几下就伸直了。美中不足，未看到他的面孔。”

陈恭澍如释重负，轻松地吐了一口气，这是他受命执行本案以来最愉快的时刻。他的手指又灵活如初，利落地点燃了一根香烟。事后，他形容当时兴奋的心情时说：

“这一段时刻，要问时间有多长？可能只有两秒钟。这两秒钟与几十年一比，简直长短悬殊，不成比例。而人生有这样经历的，想是不多。”

这两句话细细体会，韵味无穷。

遗憾的是，陈恭澍的欣喜，很快就被懊丧所代替。

回到据点不过10分钟左右，唐英杰、陈布云两人先后回来了，其余人杳无音讯。张逢义根本没有进汪宅，余鉴声、郑邦国是和王鲁翘一起出来的，他们不会在汪宅遇到狙击，难道半道上被警察逮去了？

他们将希望寄托在那架电话机上，盼望着魏春风能打电话来。可是，电话机仿佛也睡着了，直到凌晨5时左右，才响了起来。

陈恭澍急忙抓起话筒，未及开口，对方已劈头盖脸，一顿责骂：

“你们搞错了！那个人好好的一点事情也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犹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沉船，陈恭澍只觉心头一阵冰凉，握电话的手痉挛得几乎无法控制。一股凉意很快遍及全身，他已无心再听对方啰嗦了。

尾 声

随着时光的流逝，有关河内刺汪案的材料陆续公布于世，已垂垂老矣的

刺汪行动组组长对当年的失败仍然耿耿于怀。览毕这些材料，陈恭澍却感到更加困惑不解。

从有关的国民党官方或半官方所公布的材料看，日本人古屋奎二所著的《蒋总统秘录》较为详细，按出版该书的日本《产经新闻》的说明，此项材料系由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提供，当有所据。

再就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于1979年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了，该局的前身就是军统局，一些重大案件的档案记录仍在该局保管。有关河内刺汪案的描述，理应是根据档案编辑而成的。

以上两书的记载，却与陈恭澍当年所亲历的事实有许多不符之处，虽竭尽渲染描绘，但明显掺有水分。按陈恭澍的评论，是“成分不纯”、“渲染失真”。

倒是曾做过汪伪中央委员的金雄白50年代末以“朱子家”笔名撰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对此案作了十分详细的描写。就连陈恭澍也承认，此人所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必有所本：“其中有关汪案的内情，他所知道的比我多。涉及我们行动部分的，当然要让我。”这是中允之言。朱子家的描述十分细致。

高朗街27号，地居河内僻静之一角，屋凡三层，底层：前面左右两大间均为汽车房，相邻的后面两大间为仆役室，楼梯则处于全室的中央部分。中层：向北两大间，与楼梯两侧各有小室两间，均为汪氏随从人员之卧室。向南的两间，前一间为客厅，后一间为饭厅。顶层：楼梯左为两浴室，右为两厕所。向北两室，右为朱执信次女公子朱微女士的卧室，左为曾仲鸣、方君壁夫妇之卧室。向南两室，右为何文杰、汪文惺夫妇卧室，盖与其左汪氏夫妇一室相毗连，而曾仲鸣之卧室，又刚与汪氏之卧室相对，相距且仅数丈之遥。

3月21日深夜2时许，夜深入静，全宅的人都已入睡。忽有人从后园逾垣而进，循屋后的小门入室，当行经底层仆役室时，一个随从戴芸生与厨子何兆，闻足声启户查看，凶徒见之，即发枪射去。戴芸生手臂中一弹，何兆腿、臂各中一弹，另一随从陈闽星，闻枪声逃匿平房汽车下，凶徒又发一枪，地上水泥片伤其胸部，乃循梯拾级而登。中层梯头的一室，为汪氏内侄陈国琦所卧，亦闻声而出，凶徒迎头相遇，再发一枪，又弹中其腿部，迫其折入邻室，行凶者于是再登顶楼。朱女公子首先听到间歇之枪声数响，入室至楼头查察，适其邻室的曾仲鸣亦同时出现，闻楼梯有杂沓的脚步声，亟推之一同退入曾之卧室，急关其户，而凶徒已追踪而至。他们用利斧把木制的室门劈开一洞，将驳壳枪伸入室内，凶器是可以连发的快慢机，幸朱女公子入室后，正躲在门右的贴墙处，刚好是一个为枪弹射程所勿及的死角，得幸免于难。而曾仲鸣夫妇，则立于卧榻之前，直对着暴徒的枪口，他们一按枪钮，子弹如连珠发射，仲鸣腰腹部中弹累累，密如蜂房，其夫人方君壁亦中三弹。一在臂，一在腿，一在右胸，两人同时倒卧于血泊之中。

此时何文杰夫妇也早被连续凄厉的枪声所惊醒了。起先是楼下的数声，睡梦中尚以为炮竹声，但以后向曾氏房中发射的排枪，近在咫尺，才觉得巨变已生时腋。他与文惺女士披衣而起，方走出室门，汪氏亦已闻声而出，低声问文杰：“什么事？”文杰含糊地说：“没有什么。”就急急把汪氏推回室内。于是汪氏夫妇与文惺就于黑暗中坐在门旁靠壁的地上。迨汪氏闻到对室仲鸣夫妇所发出的沉重的呻吟声，几次想冲门而出，却为文惺女士力持不

放，如汪氏出室，当然也必遭毒手，又如凶徒知道汪氏所居即在对房，则只须一转身，汪氏夫妇也势必为仲鸣夫妇之续。而仲鸣夫妇受伤的倒地声，凶徒们却以为已把汪氏一击而中，就仓惶下楼而

何文杰是最幸运的一个，当他把汪氏推回卧室时，他还不知受伤的是曾仲鸣夫妇。所以假如他从汪氏室内出来，对着曾仲鸣的房间走去，又刚好与得手后的凶徒们遇个正着，而他无意中竟先折而向右，经过自己的卧室，再走到楼梯向下俯视，看到中层有人伸手正在扭息电灯，他发觉情形不对，急退回，仍沿原路回到汪氏室中。前后经过了约 30 分钟的时间，枪声停止，凶手也料已远遁，文杰才敢去至仲鸣的卧室，推门而入，朱

女公子正在门后颤栗，而仲鸣夫妇都已倒在地上，伸手一摸，湿漉漉滑腻腻的鲜血流满了一地。在床头灯发出的微弱光线中，他看到自己的半个指头已被鲜血所染红了，朱女公子下半身的裙裤，也溅满了血渍，放在前面的竟是那样一片惨怖的景象。

没有人确实知道进入室内的凶手究竟有多少。在行凶的时候，因为汪宅以内，全部都是赤手空拳，连一技自己的枪也没有，所以他们乃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为所欲为。在中下层，各个寝室的门口、楼梯口、窗口，以及屋外的四周，且都有人驻守监视，直掩护至他们全都离去，汪氏的秘书汪纪，才在二楼窗口向街外狂呼“救命！救命！”因为朱女公子请法语，由何文杰陪着下楼用电话报警。事后知道，那时凶徒们还公然留在后园以侦察室内的动静，直听到朱女士在电话中呼援的声音，他们相信目的已达，始从容再逾垣而逸。

以上文字，显然带有感情色彩，褒贬之意跃然纸上，这种态度大概与金雄白早年与汪系集团有交往有关。另外，由于作者并非亲眼目睹，在细节上仍然有些失实，但是毕竟提供了许多陈恭澍不知道的关于汪氏方面的内情。两相对照，互为补充，可以使整个事件的全貌得以展现。

当年河内行动组刺杀汪精卫之所以功亏一篑，事后总结，均认为其根本症结在于情报错误，误将曾仲鸣居所当成了汪氏居所，从而导致了误中曾仲鸣的结果。担任第一杀手的王鲁翹由于完全相信唐英杰多次的侦察报告，汪氏卧室的位置已经牢牢地印在脑海之中，所以闯入后，方会毫不犹豫直奔三楼，找到意念中的房间，挥斧劈门，举枪便射。这一连串的动作，本属自然，所以，他不服气地为自己辩解说：

“劈开的那个门洞并不算大，视觉也不够开阔。屋里开着的是一盏床头灯，虽不暗，但也不怎么亮，只能说是朦朦胧胧地看得见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并不能完全肯定趴在床底下的那个人就是汪精卫。可是‘先入为主’，因为根据我们的侦察报告，认为这个人就是汪精卫，并无疑问，所以开枪就打。如果在事后说这未免有点儿冒失，并不为过；倘若批评我害怕得慌张起来，那就太冤枉了。其实，外面有人警戒，身后又有人防护，就是汪家的侍卫有意抗拒，我也是有恃无恐的，的确是一天连干了两回，都弄得虎头蛇尾，因而吊出心火，有些耐不住性子倒是真的。”

陈恭澍带着一脑门子火去找唐英杰，他要对方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每次的侦察报告都说汪精卫住的是曾仲鸣被打死的房间，为什么与实

际情况不符？是不是侦察不够准确？”

唐英杰振振有辞，一口咬定汪精卫就住在他认定的那一间：“人是活的，会走又会动，如果临时调换了房间，我能拦住他们不让换吗？”

陈恭澍被驳得哑口无言。

直至《蒋总统秘录》出版，他才发现该书全译本第11册第203页上的一段记载与唐英杰的说法完全相符：

3月21日，汪兆铭的秘书曾仲鸣在河内高朗街汪的隐密住宅中被爱国之士所诛杀，因为刚好在这一天夜晚，汪兆铭和曾仲鸣偶然换了卧室就寝，刺客误认为曾仲鸣为汪本人，对室内射击数枪。

陈恭澍怀疑，这一材料的来源就是唐英杰本人给军统局的秘密报告。随着汪案解密，他的报告又在档案中复活，经整理改编采用后，也就成了来源可靠的原始资料了。

持上述看法者为数不少。

曾仲鸣是否有与汪精卫临时换房一事？曾是汪精卫近侍、亲信的萧南称：“寓河内时，汪昼间在曾仲鸣房间看书写字（曾房内光线较佳），在外窥探者以为该房即汪卧室，殊不知昼间在该房，夜间不在也。”

戴笠的重要助手沈醉也撰文说，河内行动组出动的当夜，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稍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他和老婆搬到另一间房间去了。

但是，仔细分析当时的情况，以上推断都有不合情理之处。

27号楼坐南朝北，二至三楼的面南房间才是正房，条件与采光也是最佳，否则，二楼的客厅就不会设在南面，而让警卫人员住在北面了。

三楼的四个房间，朝南的两间之间有门相通，左首一间既让与汪精卫的东床何文杰及其女汪文惺夫妇居住，那么隔壁者，自然汪氏夫妇入住最合适。而且，此房带有晒台，面对花园，理应

为主人居住的房间。如若汪与曾换房，则应该是汪住北屋而曾调至南屋才合乎情理。

即使汪精卫昼间利用曾屋看书写字，唐英杰俱是夜间出动侦察，理应不会被迷惑。且唐亲自登上楼顶，双足勾檐，倒挂卷

帘向内窥视，当不致有此失误。虽然张逢义随去监督，也只是远远观察，以防他偷懒懈怠而已。

另外，从金雄白的叙述中，可见他对汪宅内部情况了如指掌，有过详细调查，也从未提到换房一事。汪住南屋，曾住北屋，一直是如此安排的。

至于沈醉所言，他既不是亲临其境，所叙又多属道听途说，有关这一段的叙述，则错误颇多。由此可见，将误中曾仲鸣说成是因曾汪临时调房所致，已不是用“自圆其说”几个字所能解释的了。沈醉甚至连27号楼房有几层都搞不清，因此他的话已不足为据。

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事。据透露，“仲鸣腰腹部中弹累累，密如蜂房，其夫人方君璧亦中三弹，一在臂，一在腿，一在右胸”。陈恭澍对此大惑不解。

他回忆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我只先后听到两次枪声，共五六响，不像文中所说的开了好几次枪。

至于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女士是否住在一起，我们不知道。说她也中了三枪，倒卧于血泊中，王鲁翹同志并无此项报告。如果有，他绝不会隐瞒，也用不着避而不言。”

王鲁翹向陈恭澍汇报的情况也如上述。

那么，金雄白是否夸大其辞了呢？

曾仲鸣后因伤重不治，汪精卫对之颇有“以身代殉”之痛切。亲笔为曾氏撰写行状，其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晨丑时，天未明，凶徒数人，持械突入寓所，发弹数十，伤五人，君伤最重，是日午时卒，夫人君璧奋身救君，亦中三弹，余三人伤，轻重不等，凶手被捕者三人。越日，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衽为，且据凶手供称，谋杀目的是在兆铭云云。

陈壁君在大陆解放后，也在监狱中供称：

“我与曾妻子在三日前，刚由香港前来看望他们，是夜全家伤的共六人，曾中数十枪，方亦中三枪，我与汪房未被进入，其后陈匪为李士群诱捕，述往事，说他们每日都从邻街的大楼上，用千里镜窥视汪的住宅，看得明明白白，不知何故，竟入曾房（此处陈也未提及换房一事），曾仲鸣同志遂代为中枪了。”

当晚住在楼下的汪精卫侍卫许少泉，在事发后也曾去过曾仲鸣屋，他回忆说：

“……只见曾仲鸣的卧室房门洞开，床前血溅满地，曾仲鸣下腹部连中数弹，已撒手西归，方君璧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大腿中了三枪。”

双方各执一词，所述遇异。然而，这一切不能运用一般的非彼即此、非此即彼的方法予以推断。原因很简单，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必要说假话。

那么，击中曾仲鸣的其余子弹从何而来，方君璧那三枪又是由谁射出，难道不是疑问吗？

自第二阵枪响后，到陈恭澍接应王鲁翹上车，其间不过几分钟，加上延误的时间，大约10多分钟左右，陈恭澍即驾着车子离开了高朗街。而汪宅上下是在刺客走后30分钟左右才出来报警，这中间，是否又有新的情况发生？

魏春风突然出现，陈恭澍在巷口遇见的那位向他打手势的便衣，曹师昂、谭天堃等人千里迢迢赶赴河内，身力行动组成员，却从不参与行动组的行动，作为军统局头目的戴笠数次秘密潜往河内，唐英杰没有理由地搞错情报，而所做的解释却成了官方答案的依据……这一切的一切，未免太蹊跷，太令人费解了。

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整个的行动。

陈恭澍被火速召回了重庆，他本想再干一次，将功补过，但戴笠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甚至善后事宜也无需他交代和处理。

一路上，陈恭澍的心情可想而知。戴笠临行前的交代犹在耳边：“只许成功，不准失败。”陈恭澍眼前一片黑暗，军统局“家法”无情，按照“规矩”计算，12年监禁是最轻的了，无期徒刑直到极刑，都是可能的。

陈恭澍多虑了。回到重庆后，他仅仅被冷落了一段时间，河内失败一事竟无一人提及，如同被遗忘了一般。不久，他又蒙戴笠召见，重新启用了，满天的阴云倏然而散。

河内刺汪行动失败了，也许戴笠以及他身后的蒋介石，追求的正是这样

的效果。即使是当事人陈恭澍，以及汪精卫之流，对此也是既不敢想也想不到的。

世事如棋，蒋汪对奕，前者处处棋高一着。高朗街的血污，恰似斗牛士手中的红布，逗引得汪精卫疯性大发，他只得以险取胜，不再犹豫，下计利害地一头扎进日本人怀中，以国家利益、个人声誉作赌注。殊不知，这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从此，汪精卫失去了在中国政坛上东山再起的可能，失去了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和资本。

最高暗杀令 ——刺杀李宗仁

沈醉受命

1948年11月间的一天，在昆明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的少将沈醉，突然接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发来的亲译电报，让他速去南京。沈醉知道定有紧急任务，便于次日下午乘飞机前往南京。抵宁后刚刚在保密局的高级招待所住下，毛人凤便找上门来。

“这次叫你到南京来，有非常紧急的情况要处理，要你来主持一项重要的暗杀任务。”

沈醉略感奇怪，问道：

“局座，这项工作原来不是由保密局专门主管暗杀业务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负责的吗？何必这么大老远把我调来？”

毛人凤神秘而兴奋地悄声说：

“是蒋总统特地指名调你来负责的，重任啊！这是你的光荣，也是本局的光荣。”

“蒋总统指名我？”沈醉不解。

“你忘啦？戴老板出事时，你表现下俗，总统对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沈醉恍然大悟。那是1946年3月15日下午，保密局的前身——军统局局长戴笠乘机由北平飞南京，飞机在云雨中突然

中断了联络。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介石大

为着急，因为戴笠掌握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如果飞机因汽油用尽落到解放区，将会造成极大的损失。蒋介石立即命毛人凤派一个将级特务携一部电台，乘飞机沿途寻找，如发现戴的飞机，便跳伞下去，无论如何要找到戴笠。毛人凤回去召集了20余名将级特务，宣布了任务，原以为会有不少踊跃报名者，孰料竟无一人站出来。毛人风声泪俱下哭求众人，最后沈醉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承担这项重任。

蒋介石亲自接见了沈醉，当他得知沈醉不会跳伞时，大为赞赏沈的勇敢精神，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因戴笠尸体和飞机残骸在南京郊区发现，任务遂中止，但沈醉的表现却令蒋介石暗暗称赞，因而此次指名要沈参加特别行动。

毛人凤说完后，便立即与沈醉乘车去黄埔路中央军校内的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在办公室亲切和蔼地接见了他们。

“噢，沈同志，你好！”他关心地问，“听说你在云南昆明，家在那里吗？家里有什么人？都好吗？”

沈醉受宠若惊，急忙敬礼，回答道：

“总统好！感谢总统对我家人的关心。我家里还有老母亲、太太和女儿，她们在昆明都很好。”

“目前局势不稳定。但是共产党并不可怕，而我们的内部有些人却在危害国家的利益，离心离德，甚至从中破坏、捣乱，暗通

‘共匪’，勾勾搭搭，阴谋推翻政府。”蒋介石郑重地说，双眼露出凶光，“对这些坏人宵小，应该予以无情打击与坚决惩罚。”

蒋介石又问：“毛局长告诉了要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

“告诉过了。”

“这次决定叫你主持这项工作，是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这是我对你的特别的信任，千万不要辜负我对你的希望。共产党迟早总可以打败，而内部的异己分子比共产党更难对付，所以只好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统一起来，一致对外。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所以能打胜仗；而我们却有两个、三个敌人，几方面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

“这次行动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你绝对不能泄漏出去，一定要从速布置，做好准备。等我作出最后的决定，便要绝对完成使命。要学学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刺客，如刺王僚的专诸、刺秦王的荆轲、高渐离等等，以他们为团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生命这种精神为榜样。”蒋介石走到沈醉面前，慎重地交代着。

他拍拍沈醉的肩膀，赞扬说：

“你为团体、国家、为领袖尽忠，出生入死，我是知道的。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为寻找戴局长失事飞机又愿冒险跳伞到‘匪区’，这种勇气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我是很赞赏的。”

沈醉受宠若惊，他胸脯一挺，大声表示：

“沈醉不才，一定坚决完成领袖交给的任务，决不辜负领袖的殷切希望。只要领袖需要，我个人做出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完成领袖亲手交给我的任务！”

蒋介石破例握着沈醉的手，转过脸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好同志，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回到招待所后，沈醉忍不住问毛人凤：

“总统接见我们，委派我们重要任务，但制裁何人，他却一直没有说，我也不敢问。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毛人凤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又四处看了看，狠狠地吐出三个字：

“李——宗——仁。”

“是副总统？”沈醉怀疑耳朵出了毛病，脱口而出，惊愕地半天合不上嘴。

“听好了，就是此人。你明天上午到局里来，只有你、我加上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和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我们四个人研究行动方案。这次行动大重大了，连副局长徐志道都不能参加。”

第二天上午，局长办公室中，毛人凤、沈醉、叶翔之与潘其武密谈，研究暗杀方案。

蒋介石与桂系貌合神离，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但为什么要下毒手杀害李宗仁呢？这还要从竞选副总统说起。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军队先后向中原、苏皖、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解放区发起了猖狂进攻。11月11日，国民党军攻克了华北重镇张家口。

蒋介石闻讯，喜出望外，当天在南京宣布：“11月15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11月15日上午，国民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开。蒋介石致开幕词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60岁

了，就更不能像过去 20 年那样担负繁重的任务，所以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

一贯独裁专制的蒋介石竟假惺惺要“还政于民”了。

大会于 12 月 25 日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接着就该行宪，该酝酿选举总统、副总统了。大会决定于 1948 年 3 月召开行宪国大。

蒋介石曾口头表示：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选。

消息一出，李宗仁便决定参加竞选，并着手准备工作，组织竞选班底。

1947 年国共战区局势逆转，国民党兵力从战争之初的 500 万人锐减至 370 万人；共产党却从战争之初的 120 万人发展到 200 万人。国民党的后台大老板美国慌了手脚，杜鲁门总统及国务卿马歇尔派魏德迈将军来华调查国民党在国共战争中失败的原因。

8 月 24 日，魏德迈在蒋介石官邸举行的茶会上发表声明对蒋介石的领导表示不满，他说：“中国虽因连年战争和革命受到削弱和破坏，但仍拥有为其自身之复兴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质资源。这种复兴，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

这句话有讥讽蒋介石领导失败的弦外之音，使蒋介石惊出了一身冷汗。次日蒋介石在召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时小心翼翼地问：“魏德迈将军在《声明》中有中国需要‘令人振奋的领导’一句话，是不是美国真想逼我下野？”

魏德迈与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谈话时，白毫不掩饰地指出：“一年来的作战经过证明了蒋介石在军事上指挥无能……战局发展至今天这种地步，应由蒋介石独负其责。”

魏德迈还与北平行辕主任、桂系首领李宗仁就挽救局势交换了意见。

是年 9 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去华北巡行，物色接替蒋介石的人选。他在提交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认为：“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日趋式微，在华北知识分子中，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则资望日高。关于他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

李宗仁问鼎美国方面开始有换马的想法。在美国政府安排下，李宗仁于 10 月份决定竞选副总统。

10 月 12 日，李宗仁电召上海的桂系重要人物程思远赴北平。16 日下午，程思远的飞机抵达西郊机场时，北平行辕参议刘仲华已在停机坪迎候，并将程思远送往北京饭店下榻。是晚，李宗仁在中南海居仁堂设宴招待程思远。

李宗仁意味深长地告诉程恩远：

“明年 3 月，我要竞选副总统。我要你来的目的，是商量此事，并为我南京部署一切。”

程思远吃了一惊，沉吟片刻，说：

“德公（李宗仁字德邻，人称“德公”），根据去年 12 月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副总统是没有什么权力的，比美国副总统还不如。因为美国副总统还可以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并且是参议院的当然议长；而中华民国政府的副总统，在个人独裁体制下，是不能参与国家大计的。不知德公对此为什么感兴趣？”

李宗仁不以为然，说：

“我并不想拥有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虚名，只是想借此摆脱北平行辕主任这个职务。照我看来，东北和华北的军事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如不

趁早走开，我不知道将来如何收场。除了准备做俘虏，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好的下场？！”

“德公，如果竞选不成功，那怎么办？”

“那只好解甲归田，不可能有别的打算。”

五天以后，程思远要飞回南京。临行前，李宗仁交给程思远三封信：一封是交给蒋介石的；另一封是交给蒋介石的亲信吴忠信的；最后一封是用火漆密封的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英文密函。

“三封信务必亲自送到收信人手中。我在信中已告诉蒋、吴二公我将竞选副总统之意，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何去何从，还要听从蒋介石的裁决。你要与吴礼卿（吴忠信字礼卿）保持密切联系。我请他在蒋介石先生面前代表我善为说词，以促其成。”

李宗仁又拿起英文信，“这封信很重要，你亲自交给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先生。”

回到南京后，程思远立即赶到大悲巷雍园1号白公馆，将李宗仁欲竞选副总统的消息告诉了白崇禧。

白崇禧吓了一跳，嚷道：

“这件事冒的风险太大，如果不幸而失败，则将何以善后？！”

白夫人马佩璋也表示反对，说：

“非常时期，不可介入政治漩涡。”

程思远为难地说：

“德公决心甚大。论关系，您和德公二人外间都说是一人。于公于私，情面难却，请再三思。”

程思远走后，白崇禧考虑再三，即与在上海的黄绍竑联络，黄绍竑亦表示坚决反对李宗仁参加竞选。两人商议后决定由白崇禧与李宗仁联络，阻止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建议李宗仁最好竞选监察院院长。黄绍竑还专门赴北平劝说：

“德公，既吃不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年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你去竞选，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李宗仁却充满自信地说：“我的看法与你们不同。你知道国

民党政权在人民眼中已反动透顶，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产党，因此大家希望我们党内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派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获胜的可能性愈大。”

开弓没有回头箭，从此，李宗仁干劲十足，在安徽等地银行家的支持下，筹措竞选经费，在北平、上海等地成立了竞选办事处，四处宣传，发表当选成功将辅佐蒋介石改革国民党的主张。

蒋介石作梗

某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时，要白崇禧向李宗仁转达他的两点意见：“一、北平行辕剿共任务重要，不可轻离。二、蒋为军人，李亦为军人，两位军人参加竞选不妥。请告李中止竞选之念，不可南来。”白当即电告李宗仁，李宗仁却不屑一顾，依然兴致勃勃，到处发表讲话，宣传他当选后将实现民主自由的主张。

不久，全国各报相继刊登了副总统候选人名单，程潜、于右任、李宗仁、

莫德惠与徐傅霖榜上有名。其中莫氏为“社会贤达”，徐氏为“民社党”，其余为国民党。

李宗仁认为于右任年迈，程潜功勋稍逊一筹，莫德惠、徐傅霖无法与自己抗衡，因而更加信心百倍。1948年3月20日，李宗仁率领其竞选班底十余人乘专机南下，飞往上海，在上海龙华机场出乎意料地受到上海市长吴国桢及各机关、团体、新闻机构代表、记者的欢迎。一时镁光灯闪烁，像天上星星眨眼，又像节日的焰火，热闹非凡。李宗仁招待中外记者，再次重申促进民主政治的决心。

这一炮果然不同凡响，使李宗仁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当李宗仁一行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又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蒋介石政府的失望，李宗仁是以一种新兴民主势力代表人物的面目出现在国民大会上的，这一切引起了蒋介石极大的忌恨。

蒋介石在官邸接见李宗仁时，尽管脸上挂着笑，嘴上还重复着“总统、副总统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党内外人士都可以自由竞选，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的老一套，但暗中又在搞小动作。

一日，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请李宗仁去议事，当李宗仁赶到会议室时，却见于右任、居正、吴稚晖、程潜、吴忠信、张群、陈果夫、孙科、丁惟汾都在。张群站起来说：

“奉蒋主席之嘱，特请诸先生来与李宗仁谈话。”大意为：蒋先生认为本党同志参加竞选应尊重本党意旨，由党内提名。众人都同意这个办法，美其名曰避免“党内摩擦”。

李宗仁当即反驳说：

“选举正、副总统既是实施宪政的开端，则任何国民都可以按法定程序竞选。如果仍由党来包办，则我们的党将何以向人民交代？现既以行宪，本人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其他任何办法，本人将反对到底。”

居正等见局面尴尬，起身打圆场，请张群回复蒋介石。众人不欢而散。

蒋介石只好亲自出马，动员李宗仁退出竞选。他单独召见李宗仁，说：

“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李宗仁上了牛劲，执拗地说：

“我现在很难从命。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之前不唱是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丁丁冬冬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唱了，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在锣鼓热闹声中忽然掉头逃到后台去呢？我在华北、上海、南京都组织了竞选事务所，哪能无故撤消呢？我看你还是让我参加竞选罢！”

蒋介石沉下脸，大有一手遮天之势：

“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李宗仁一头恼火：

“这倒很难说！”

蒋介石没想到李宗仁敢当面顶撞，火冒三丈地大叫：

“你一定选不到！”言外之意，不信走着瞧。

李宗仁毫不客气地回击：

“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天时’、‘地利’都对我不利，但我得‘人和’。各界人士对我很好，纵使你不支持我，我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蒋介石见“说服”不了李宗仁，气得在房中乱转。李宗仁走后，蒋介石

便召集心腹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真如一把匕首插在我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的这把刀子拔去。”众喽罗心领神会。

“黑马”出山

蒋介石还有一招杀手锏，便是推孙科参加副总统的竞选，以此抵消李宗仁的影响。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后人，是国民政府副主席、立法院院长。更重要的是，孙科是广东人，与两广关系一向较深；又与黄埔系、CC派交情颇深。孙科如参加竞选，必能拉走一批原本支持李宗仁的选票，再加上蒋介石的支持，是胜券在握的。

李宗仁早料到这一手，曾托白崇禧询问孙科的意思。孙科却将头摇得像个拨浪鼓，竭力表白：“决无此意，决无此意……”

本来，孙科的确无意入围。他认为根据宪法，副总统是吃闲饭的位置，立法院院长却有实权。宪法规定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舍此“鸡腿”取彼“鸡肋”，太不划算。

蒋介石令宋美龄“劝驾”，孙科终于亮出底牌：

“我搞了八年的立法院，还是让我守这个摊子罢！”

宋美龄开始往“鸡肋”上加“作料”：

“你一面做副总统，一面兼立法院长，岂不两全其美？”

孙科胃口大开，说：

“这样最好，但依照宪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立法委员是不得兼任官吏的。”

宋美龄钻空子说：

“宪法上却没有说立法院长不得兼任官吏呀！”

孙科明知骗不了人，便说：

“立法院长是立法委员互选出来的。”

宋美龄莞尔一笑，指点迷津：

“宪法规定的是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却不是官吏不得兼任立法委员。何况副总统全国只有一个，它和一般官吏应该有所区别。”

她怕孙科不放心，又说：“大不了，让国民大会把这一条款修改一下。”

无独有偶，蒋介石也认为总统无权，宁愿当行政院长，无意竞选总统。

张群倒很了解老蒋的心思，他向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说：

“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

所以他不愿意当总统，处于一个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能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

果然，在宪法外又增补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蒋介石才腆颜登上总统宝座。可见所谓蒋记宪法，只是权术者的一块遮羞布，是可以依独裁者的意志而改变的。

孙科公开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因为这一次蒋介石拍胸保证：一切经费由蒋本人提供，而且蒋介石带头投孙的票，其余人谁敢不看蒋的眼色行事，这个副总统是十拿九稳的。

果然，“黑马”声势浩大。蒋介石的黄埔系、CC派控制的各级党部，以及其他党政军机关夤缘之徒，像竞血的苍蝇一样，铺天盖地威胁利诱国大代表，凡选孙科者，要钱有钱，要官有官；不合作者，必食苦果。报纸公开刊登不利于李宗仁的消息。孙科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名列候选者第一，一时气

势汹汹，大有阻江断流的架势。

《救国日报》发难

4月19日，国民大会开始选举总统，选举票上印着“蒋中正”和“居正”的名字。11时，开始唱票，10张票中倒有9张是“蒋中正”，偶尔一张为“居正”。大家心里明白，居正不过是走过场而已。有的代表却淘气，在居正票上写了“居不正”，唱票的唱了数声“蒋中正”，突然一声“居不正”，引得哄堂大笑。洪兰友急得大喊：“这是废票！”他又扭头斥责唱票人：“以后再遇废票，千万不要再唱了。”尽管如此，仍然有代表在蒋介石的名字上打“×”，还有写“孙中山”的。选举结果，蒋介石以2430票名列榜首，居正得票269张，此外还有废票35张。蒋介石当选为总统。

4月23日开始选举副总统，这是此次选举中最精彩的一幕。为各候选人抬轿子的人忙得不亦乐乎，大街上打洋鼓、吹洋号，宣传车上的大喇叭声嘶力竭，传单像秋风中的落叶，遍地都是。一清早，李宗仁、郭德洁夫妇便站在国民大会堂门前的台阶上，笑容可掬。李宗仁一见到国大代表便上前握手；郭德洁满脸带笑地说：“请帮忙！”孙科也步人后尘，拉着夫人陈淑英谦恭地站在大门口与代表们握手。

10时15分开始投票，各候选人手下的人手心都紧张得出汗。唱票时，一会儿尽是“李宗仁”，一会皆为“孙科”，“程潜”、“于右任”参差其间，间或也有“莫德惠”、“徐傅霖”。唱票逐渐集中到“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身上，恰似波滔汹涌，高潮迭起，险象环生。

第一轮完毕，李宗仁得票最多，共754票，孙科599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按规定，无人得到超过代表总额一半的票数，次日将对前三名进行第二轮选举。

形势的确到了最后关头。是日下午3点，蒋介石急召贺衷寒、袁守谦，面嘱他们为程潜助选，并拨给活动经费法币100亿元。蒋介石叹了口气说：“孙哲生（孙科字哲生）不是李德邻（李宗仁字德邻）的对手；只有为程颂云（程潜字颂云）助选，才能胜过李德邻。”

蒋介石为何做出如此选择呢？原来，是日，龚德柏主办的《救国日报》，刊登了孙科和蓝妮的一段“丑闻”。

孙科的原配妻子是他远房表妹陈淑英，他们是在美国结婚的，并育有两男两女。男的名叫“治平”、“治强”，女的叫“穗英”、“穗华”。抗日战争前，孙科在上海结识了蓝妮，很快坠入爱河，有一女名叫“穗芬”。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各地没收“逆产”，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颜料。孙科闻讯，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说这批染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洪兰友便写信给中央信托局局长吴任沧，说蓝妮为孙科院长之如夫人，请看在院长面上将染料发还。

龚德柏得到此段“秘闻”，原想趁机敲诈一笔钱，谁知孙科并不买账。于是他早不登晚不登，偏偏在竞选副总统的当口，在《救国日报》头版刊登了孙科、蓝妮的“丑闻”，一时洛阳纸贵，轰动京华。

国大广东代表团气势汹汹，要到《救国日报》社发难。薛岳在国民大会堂门前振臂一呼：“谁不去谁就是衰仔！”薛岳抗战时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曾三次坚守长沙的辉煌的胜仗纪录，被誉为“华南虎”，此番虎威大发，很快便组成了一支“讨伐军”。这支“讨伐军”中还有陆军上将张发奎、余汉谋、李扬敬、邓龙光、香翰屏，海军司令陈策，空军大队长张惠光，可谓

陆海空三军大出动。他们百十人乘两辆大交通车风驰电掣，来到《救国日报》门前，“乒乒乓乓”大砸一阵，《救国日报》的招牌被摔烂，门破玻璃碎，一片狼藉。众人一阵呐喊，杀将进去，掀翻排字架，捣毁排字盘，铅字如暴风骤雨般满天飞。龚德柏拔出手枪，守住楼梯口大叫：“谁敢上楼，必与之一拼！”军官们却怕死，隔梯与龚氏对骂一阵，便鸣金收兵。但经此一番折腾，孙科在竞选中颓势已现。事后，李宗仁让程恩远交给刘士毅四根金条，转交给龚德柏，聊充“损失费”。

4月24日上午，代表们在国民大会堂再次进行投票。李宗仁、郭德洁夫妇依然笑口常开：“昨天很感谢，今天还请帮忙。”结果李宗仁获1163票，孙科获945票，程潜为616票，结果仍未超过半数，还须进行第三次选举。

鸣金收兵

是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分别召见程潜、贺衷寒、袁守谦等人。蒋介石亲自部署，让袁守谦、贺衷寒把为程潜争来的选票，改投孙科，分散李宗仁的选票，以图战胜李宗仁。

蒋介石又劝说程潜退出竞选，并补偿他的竞选费，起用他的助选人，程潜忍气吞声地答应了。

蒋介石还交代孙科去看于右任，以争取支持于右任竞选的人转投孙科门下，并亲自登门拜访于右任。

蒋介石一心一意帮助孙科，不择手段打击李宗仁的做法，使不少代表产生了逆反心理。不少代表反感地说，“老蒋让我们选孙科，我们偏不选孙科，看他能怎么样？卖票给李宗仁，就不卖给孙科！”

是晚，程潜到中央饭店向他的助选团宣读《放弃竞选书》。他说：“和谐为团结之基，克己为民主之本。本于此旨，放弃被选举权。敬爱我的各位代表先生，请于其余两位候选人中，另择一位接近诸公理想者，投下神圣一票。个人进退，不足介怀；诸友隆谊，永矢不忘。”

代表们得知其中隐情，义愤填膺，表示选程潜选定了，除非他合法落选；坚决不承认他放弃被选举权，不同意改选别人。

蒋介石的党羽四处煽风，八方点火，甚至在大街上散发传单造谣说：“李宗仁的竞选演说是从共产党标语上抄来的，他的竞选经费是亲共的李济深从香港提供的。谁选李宗仁，便是反对蒋介石，不会有好下场。”

李宗仁连夜在雍园1号白公馆召开助选团会议，商量对策。七嘴八舌，烟雾弥漫。黄绍竑突发惊人之语：

“德公，你也声明放弃竞选。”

李宗仁为难地说：

“若老蒋乘虚而入，怎么办？”

小诸葛白崇禧微微一笑，点拨道：

“程颂云放弃在前，德公放弃于后，看太子和哪个竞争去！”

李宗仁恍然大悟，命助选团推敲一段声明文字，曰：

“选举有某种压力存在，国大代表不能自由选举。最近有人散发传单，公开攻击李宗仁先生，谓李先生当选副总统，就要逼宫；或三个月后，就逼领袖出国。此外，并制造种种谣言，极尽诬蔑侮辱之能事。迹其用心，无非欲颠倒黑白，淆乱视听，以打击李先生之竞选活动，而遂其操纵把持之诡计。兹悉李先生为表其光明磊落之态度，已向国大主席团正式声明放弃副总统竞选。深恐社会不明真相，特为郑重声明。”

这一夜，黄埔路蒋介石官邸灯熄得很早，一反灯火通明的常态。蒋介石在胸前连划几个十字，祈祷上帝保佑，便上床睡了。一夜春梦，好香好熟，及至处处啼鸟，方从梦中醒来。沐浴之后，他穿着睡衣吃早点，阅读早报，突然在头版头条看到李宗仁放弃竞选的声明，大吃一惊。竞选无法进行，在国人面前，他岂不又失了颜面？

孙科为形势所迫，也声明“为肃清外间流言，消除误会”，放弃竞选。一时间，把蒋介石晾在台上，无法收场。

上午8时，2000多名代表来到国民大会堂，顿时像开了锅一样狂呼乱叫。众人拿着程潜、李宗仁的声明乱骂一气。洪兰友在台上对麦克风大喊“肃静”，几千喉咙直叫：“罢选！罢选！”一个个纸团飞向主席台。大家一齐跺脚，嘈杂声直震屋瓦。眼看会议开不下去了，会议主席李文范只好宣布“休会一天”。代表们把手中文件扔得满天纷飞，骂声绕梁，“反对包办”、“反对独裁”、“反对操纵”之声遍布南京城。

蒋介石火了，找来洪兰友、陈立夫等人下了死命令：

“不管李宗仁、程潜放不放弃竞选，三日之内国大必须复会。有再敢拒绝出席、罢选者，统统以‘通匪附敌’论处。”

蒋介石还找来毛人凤，命令：

“李宗仁如返回北平，就派战斗飞机在淮河以北将其击落！”

主子变脸

4月26日清晨，蒋介石桌头的电话响了，他气急败坏，正要大骂对方搅他好梦，却听出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声音，便立即柔声细语了。

司徒雷登说：“美国国会原通过的四亿六千三百万美援之事，可能会因副总统选举而受到影响。美国是希望中国有个坚强的民主政府的，但从这次选举来看，中国是不够民主的。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美中那个双边协定。有不少记者打新闻电报到美国去了，美国人会留下不良的印象。”

接完电话，老蒋暴跳如雷。过后还是担心那笔美援，没有它，蒋介石政权将会很快崩溃。他忍了又忍，拿起电话和颜悦色地与白崇禧通话：

“健生兄，你去劝劝李德邻，不必负气而去。竞选当中，流言蜚语，闲是闲非，总是有的。只要问心无愧，不理它便是。”

国民党中常会召集紧急会议，推举张群、王宠惠、白崇禧、张知本、陈布雷五人敦促李宗仁、程潜、孙科复出；国民大会主席团也推出胡适、曾宝荪、陈启天、孙亚夫等人去劝副总统候选人参加选举。

蒋介石又屈尊去找白崇禧，让他多劝劝李宗仁继续竞选。蒋介石违心地干笑着说：

“健生，你告诉德邻，我一定支持他。”

在白崇禧的敦促下，李宗仁的弓不再拉得那样硬了。几番扭捏，千呼万唤，方才应允重新参加竞选，只是说：“选举一事，听国民大会公决。”此时形势完全对李宗仁有利了。蒋介石的让步，使他手下人的气焰收敛了许多，胡搅瞎闹起哄的现象顿时减少了。

4月28日，李宗仁、孙科、程潜等“不由自主”地参加第三次投票。白崇禧以大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在台上说：

“蒋主席（蒋介石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命本人转告各位代表，选举可以自由投票。”

有的代表私下说：“现在‘可以’了，原先是不‘可以’的。”

是日第三次投票开箱，唱票者高声宣布：李宗仁得票 1156 张，孙科 1040 张，程潜 515 张。按选举法规定，三选仍不过半数时，挑两名选票多者，再进行四选，以票数多少论胜负。

程潜因票数太少，依法退出。陈立夫向蒋介石保证，四选时选程潜的那一部分票可以改投孙科，是有把握获胜的。是晚，黄埔路官邸又是灯火通明。蒋介石召见亲信，一一布置。蒋介石兴奋地说：

“三选结果，李德邻少了 7 票，孙哲生多了 95 票，这是我们的胜利。如果明天程颂云的那一部分选票再投孙哲生，我们定可大获全胜。希望诸位继续努力。”

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当晚也没闲着，他们专程前往中央饭店孔雀厅，拜会程潜和拥程的代表们，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双方助选团早定下了君子协定，互不拆台，互不拉选票，三选落选之人，便支持对方入选。李宗仁因此信心大增，胜券在握。

这一夜，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等人都是彻夜未眠，只待东方发白，四选见分晓。

1948 年 4 月 29 日，晨曦终于露出来了。上午 8 时，国民大会堂主席台上，12 个票柜整整齐齐排列着，代表们鱼贯而上，依次投票。大喇叭中反复念着李宗仁、孙科的名字，双方势均力敌。双方助选团和候选人紧张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渐渐地，“李宗仁”多于“孙科”。在唱到第 10 个票柜时，孙科的精神要崩溃了，他垂着头，悄悄离开了会场。终于，12 个票柜都唱完了。李宗仁得 1438 票，位居榜首；孙科得 1295 票，比李宗仁少了 143 票。

李宗仁以微弱多数票当选副总统。

会场上一片欢腾，拥护李宗仁的代表互相握手，欢呼雀跃；拥护孙科的代表则哭丧着脸，哑口无言。李宗仁、郭德洁好像又经历了一次台儿庄大捷，众星捧月般前呼后拥地出了国民大会堂，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

礼服风波

总统上台，必举行就职典礼，总统必穿礼服。蒋介石是五星上将，宋美龄早让手下人去准备。据说黄仁霖找来一位曾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做过礼服的前沙皇御裁缝，给蒋介石量制了一套仿沙皇样式的“五星大礼服”。礼服做好后，因是“个体户”所为，传出去不太合适，遂转划到太平路大同服装公司账上，由国民政府军务局长俞济时出面订做。此外，还赶制了一套“四星”的副总统礼服。5 月 20 日举行正、副总统就职仪式，直到 5 月 19 日，副总统礼服才做完，李宗仁穿上也很合身，顿时神彩飞扬。

蒋介石在 5 月 20 日早晨更衣时，对着穿衣镜左顾右盼，颇为得意。五星大礼服佩上“青天白日”、“宝鼎”、“采玉”、“文麾”等勋章，金光闪闪，加上绶带、丝绦，煞是好看。侍卫边服侍边讨好地说：“总统，你这五星大礼服就是比李宗仁的四星礼服神气得多。”

蒋介石一下子拉长了脸，怒问：

“怎么，李宗仁也有一套礼服？”

侍卫陪着笑脸：

“是仿您的礼服做的。”

“娘希匹！”蒋介石边骂边扯衣扣，“不穿礼服，不穿礼服，穿原来的蓝袍黑马褂。”

听见老蒋大发雷霆，宋美龄赶快过来，柔声问：

“达令，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干嘛发这么大的火？”

“李宗仁学我，也做了一套礼服。他穿，我就不穿！”蒋介石上了牛劲。

“穿上吧，达令，多神气，多好看啊！”

“我就找难看，也让李德邻难看。我不穿礼服，让他去穿吧！”

蒋介石穿长袍马褂前往总统府。李宗仁闻讯，只好脱下“四星礼服”，情急之中换上军服，戴上八枚勋章往外就走。

于是，在就职典礼上，蒋介石蓝袍黑马褂、披绶带，挂一枚“采玉”大勋章，坐在正中；李宗仁一身戎装，挂满勋章坐在其旁，像个马弁、侍卫。蒋介石总算出了李宗仁的洋相，内心稍平衡了一些。

李宗仁强装笑容，貌恭心恨。这一幕选举总统、副总统的闹剧收场了，但蒋介石政权的内部矛盾却从此愈演愈烈。

蒋介石的“鸿门宴”李宗仁很惬意地躺在沙发上，手里翻看着蔡锷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这本书是他喜爱的兵书之一，从军以来，每当闲暇，便一卷在手，慢慢品味，认真思考。尽管很多章节他都能背诵下来，但他还是喜欢看。

客厅中传来夫人郭德洁轻柔的呼唤：

“德邻、德邻，蒋夫人宋美龄来了电话，邀我们今晚去‘美龄宫’晚餐，我已答应了。”

李宗仁一惊，奇怪地问：

“不年不节，又没什么事，好端端地请我们吃饭？没有理由。蒋先生又要玩什么花样了，我们不去！”

郭德洁娇嗔而来：

“德邻，干嘛把人想得这么坏？你与蒋先生到底还是拜把换帖的兄弟，虽有恩恩怨怨，现在人家是总统，你是副总统，面子上也要过得去。过去你做人不是这样的。”

为了满足夫人的虚荣心，李宗仁只好说：

“好，夫人，我去，和你一起去赴宴行了吧？这些年来，我正因为胸怀广阔，从平淡二字用功，所以别人都称我是宽厚仁者，我桂系才能人才济济。”

郭德洁笑着打断他的话头：

“好了好了，准备一下，我们早点过去，不要迟到。”

5时整，李宗仁夫妇的黑色凯迪拉克轿车到了中山门外的“美龄宫”。这座官邸是当年奉安大典之后，蒋介石为给孙中山守陵而修筑的。紫霞湖风景宜人，中山陵和明孝陵之间的这块地方是蒋介石亲自相中的。他曾说，他一辈子都不会有孙中山那样伟大，自诩比明太祖朱元璋要强一些，因此在两人的陵墓之间选择了一块风水宝地，留着当墓地；修建官邸，名曰“美龄宫”。“美龄宫”有着飞檐斗拱的古典传统建筑风格，更为有趣的是瓦当和立柱都刻有很多美丽的凤凰。这也是蒋介石帝王思想的一种体现。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已等在门厅，双方一见，彼此热烈握手，宋美龄与郭德洁还亲切地拥抱。

蒋介石有礼貌地请李宗仁夫妇步入餐厅。

洁白的餐布上，摆着鲜花，香槟酒、高脚杯、刀叉齐全，蒋介石笑容可掬地说：

“你们两位不必客气，今天是家宴，一个不相干的人也没有。”

宋美龄端起杯子说：

“上个月（10月）的30日是介石的61岁生日，由于当时达令在北平，正好又是他的得意门生廖耀湘兵败的日子，因此当时他无心过生日。今天算给他补过。”

蒋介石脸上挂着笑，端起酒杯：

“我今天破例喝一点香槟。来，共同举杯。”

李宗仁、郭德洁连忙端杯说：

“为蒋总统夫妇愉快、健康干杯！”

“哎，什么总统，这是家宴。德邻，记得吗？民国十五年（1926年）我们北伐，在长沙会师，大约是8月15日，我们桃园结义，交换兰谱。上面有我自己所撰的四句誓词。”

李宗仁忙说：

“生死之交，如何能忘？誓词是：‘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对对对，难得德邻还记得，一晃20多年了，没想到，现在我是总统，你是副总统。”蒋介石感慨万分，“来！为兄弟之谊，共同干一杯！”

两人一饮而尽。

蒋介石笑吟吟的，关心地问：

“德邻，刚才我看到你的座车，好像是美国的凯迪拉克？”

李宗仁点头说：

“这是当副总统以后才换的。美国车很好，里面设备都很齐全。”

蒋介石像是无意问起：

“德邻，你现在的专机怎么样？设备好不好？”

李宗仁老实回答：

“是一架普通的飞机。”

郭德洁插嘴：

“是二战美军的过时飞机，设备都陈旧不堪，坐着不舒服。”

此时，蒋介石夫妇一唱一和，像演双簧。

宋美龄说：

“达令，我的‘美龄号’可不可以送给德邻夫妇？”

“别别别，那么贵重的东西，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别开玩笑。”李宗仁慌忙辞谢。

“达令，你不提起，我还忘记了。我们有‘中美号’够用了。”

蒋介石满脸堆笑，对郭德洁说：

“弟妹，我当大哥言而有信，‘美龄号’送给你们。我坐‘中美号’，我兄弟副总统却坐一架旧飞机，我多没面子啊！”

“千万不能开这种玩笑，君子不夺人所爱。”李宗仁突然想起一句古话。

“唉，德邻，我们是真心的，千万别客气。”

宋美龄又对郭德洁说：“弟妹，‘美龄号’里的设备是一流的，又舒适，又方便，你可以好好享受享受。”

一听说蒋氏夫妇要送飞机，郭德洁当然心花怒放，对李宗仁撒娇着说：

“德邻，明天你带我乘‘美龄号’到上海还有杭州去玩玩。我说过好多次了，你总是不去。”

“好，好！”李宗仁漫不经心地答应着。

回去的路上，李宗仁一直在考虑老蒋送飞机的动机，惹得夫人不高兴，

郭德洁嗔怪道：

“不管蒋介石这个人怎样阴鸷狡诈，但总念兄弟之情的。他送我们一架飞机又有什么不好？”

李宗仁也生气地说：

“无功不受禄。蒋先生与桂系一直有很深的矛盾，我估计白送飞机没那么简单。”

为此，夫妇俩在观点上不一致，彼此别扭了几天，上海、杭州之游被搁置下来。

暗杀流产

在沈醉的办公桌上，放着李宗仁傅厚岗官邸周围的地形图和房屋地形图。沈醉、毛人凤与叶翔之在研究行动方案。沈醉已设想了两套办法，以做到万无一失。毛人凤问：“行动方案制定出来没有？”“昨晚我几乎一宿都没合眼，反复思考总统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我认为行动可分两部分：一部分人负责暗杀；一部分人监视李宗仁，防止他离开南京。暗杀任务工作重大，我来主持，但需要派两名老练的、枪法好的助手来完成此项工作。”毛人凤点头说：

“人选我已替你物色好了。一个是秦景川，一个是王某。秦景川你是了解的，过去在军统局担任暗杀工作，枪法准确，也机警沉着。”

沈醉听完较满意，又问：

“另一名的情况如何？”

毛人凤略带几分得意：

“此人加入组织不久，原来是东北的惯匪，从小杀人越货，能以手枪射落空中飞鸟，是一名职业杀手。名字你不必知道，只叫他‘老王’就行了。”

沈醉略有不满，说：

“什么人物这么神秘，不就是个神枪手吗？局座，我在军统中也一向是有名的神枪手，我要杀的人没有能逃过我的枪口的吧？”

毛人凤不敢得罪沈醉，陪着笑脸说：

“神枪手越多，保险系数也越大嘛。”

“暗杀最好在户外进行。傅厚岗的巷子较窄，他的汽车进出转弯时速度很慢，你们可埋伏在两面，同时都可以射击。”毛人凤指着李宗仁住宅附近的地形图说，“如果李不出门，你们再到他的住宅去狙击。我找两个在南京电灯公司的同志协助进行，先停他家的电，然后借口检修变压器，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向李的寝室、餐厅等处射击，乘警卫人员慌乱之际，你们再潜进室内进行暗杀。”

叶翔之从口袋里拿出两颗锃亮的黄铜子弹递给沈醉：

“这是美国最新研制的，乍一看与普通的子弹没两样，但是子弹弹头内装有最猛烈的毒药，射中人体任何地方，都可以引起血液中毒，无法救治而死亡。”

“我们在他家周围是否设个旧书摊？书摊的好处是可以狙击。除可以侦察外，还可以在那里多留几个人，借看书的机会能够多呆一些时候，不易被人发现。”沈醉提议。

“好！想得周全。”毛人凤称赞，他指着地图，又说，“马路拐角处设书摊最好，汽车到这里速度最慢，我们可看清里面有几个人，以便一举成功。”

“这个地方我选调军统临澧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关德厚担任狙击手，

他一向是干行动工作的，经验丰富。”

毛人凤拍着胸脯说：

“这些由我负责，这次我们专门成立一个‘特别行动组’。我专门命令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都应尽量满足。”

沈醉接着又展示他的第二套方案：

“为了防止走漏风声，李突然离开南京，我们要在机场、火车站、京杭国道各处设立一些联络点。”

“这你大可放心。飞机的问题总统有办法，我们可以在光华门外面通往机场的那条街上开设一家小杂货铺为掩护，再安上一部电话。一旦发现李宗仁的凯迪拉克前往机场，立即用电话按规定的暗语报告。我通知两架战斗机随时做好升空准备”，毛人凤阴险地笑着，两手一张作了个爆炸的手势，“飞机失事，这是上策。”

叶翔之分析道：

“李宗仁的军队，现大部分集中在安徽一带，我们要注意这个动向，如果他从中华门站坐火车，一定去芜湖等地调军队来实行武装‘逼宫’。只要他出南京，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小站进行狙击，不必先请示总统。”

“李宗仁外出的任务由我亲自负责，我估计有时他爱好打猎，可能出中山门沿京杭国道去汤山或到太湖、杭州等地游玩。如果他乘车外出，我特地拨给特别行动组两辆高速汽车，接报后，立即追去，在半路上狙击更好。”毛人凤得意洋洋地说，“总统对我说过，在南京城里动手，一定要先等他作最后的决定；如果李不辞而别，便是自寻地利之门，谁也帮不了他。”

不久，傅厚岗巷口的拐角处，开设了一家二层楼的旧书店，底下店堂营业，二楼是经理室，熙熙攘攘，整天‘顾客’不断……

南京下关车站、中华门车站等地，出现了几处香烟摊，摊主两眼贼溜溜地乱看……

光华门外通往大校场机场的铁路口处，新开了一家杂货铺，门可罗雀，仍然开张……

京杭国道汤山温泉的大路边，开张一家小饭馆……

天罗地网，四面撒开，子弹、冲锋枪、汤姆森机枪、火焰喷射器、炸弹、战斗机，只待蒋介石一声令下便可直射目标。

毛人凤还阴险地研究了桂系在南京的其他几个头头，以便在刺杀李宗仁后“一锅端”。

在从11月中旬抵达南京到次年1月下旬结束暗杀任务的时间里，沈醉天天处于高度紧张、随时待命的状态之中，最难受的不是行动，而是待命。

1948年11月，白崇禧通电要求蒋介石下台，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向蒋介石实行“逼宫”。毫无疑问，蒋介石认定是由李宗仁指使，因此制定了暗杀李宗仁的计划。

由于蒋介石得知美国方面有“换马”的意思，而他派宋美龄赴美寻求美援又遭到美国总统的拒绝，遂决定推李宗仁代理总统以渡过危机。李宗仁懵里懵懂当上了代总统，在不知不觉中躲过了一场杀身大祸。

1949年11月20日上午8时，李宗仁因中南战局恶化，离开南宁赴香港。12月8日8时许，李宗仁夫妇及子女从香港启

347

德机场赴

美国治病，从此与蒋介石政权分道扬镳。

1965年7月17日晚，李宗仁夫妇从海外飞回祖国，到达广州。7月20日上午11时，李宗仁夫妇飞抵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等人的欢迎。26日上午，李宗仁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李宗仁回国后，旧部、袍泽纷纷来看他。一天，民革中央尹冰彦约沈醉去李宗仁在京的住宅史家胡同共进午餐，李宗仁对沈醉说：

“在南京时，只知道有人注意我的行动，万万想不到蒋介石要暗杀我。多亏沈醉将内幕写出，并登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上，才得知此事。”

郭德洁后怕地对沈醉说：

“我们真没有料到，蒋介石夫妇送我们那架飞机是准备要我们的老命。我们要是坐了上去，你们准备好的战斗机追来射击、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真是人面兽心！”

李宗仁感慨地说：

“我这次回到北京，听人们叫蒋介石为‘蒋贼’、‘蒋匪’，总不习惯，我还是称他蒋先生。从这件事上看，我这位拜把兄弟真和禽兽一样，我也愿意叫他‘蒋贼’了。”

郭德洁万万想不到，十几年前和夫君李宗仁的一场别扭，中止了她憧憬许多天的西湖画中游，也避免了一场厄运。而李宗仁对蒋介石看法的彻底改变，也来自与沈醉的一席谈话。

